社科文献 SSAP 学术文库

| 文史哲研究系列 |

中苏关系史纲

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第三版

REVIEWING AND RECONSIDERING THE HISTORY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1917-1991

（下）

沈志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 SSAP 学术文库

| 文史哲研究系列 |

中苏关系是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进程最具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苏关系的演变，对解读中国历史是必不可少的。本书围绕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极具可读性。书中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国家计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档案资料；作者还曾到美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等国收集档案资料，并对当事者做了大量的访谈，这在中外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正因为如此，本书的论述信实可靠。作者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种种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读来拍案叫绝。正如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陈兼所言：本书作者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牛军，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最深、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8366-5

9 787509 783665 >

定价：198.00 元（上、下）

社科文献 SSAP 学术文库

| 文史哲研究系列 |

中苏关系史纲

1917~1991年
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第三版

REVIEWING AND RECONSIDERING THE HISTORY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1917-1991

（下）

沈志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全二册／沈志华主编．--3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0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文史哲研究系列）

ISBN 978-7-5097-8366-5

Ⅰ．①中…　Ⅱ．①沈…　Ⅲ．①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17～1991　Ⅳ．①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7959号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文史哲研究系列

中苏关系史纲（第三版）（上、下）

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主　　编／沈志华

出 版 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荣欣
责任编辑／赵　薇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52.5　字 数：698千字
版　　次／2016年10月第2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8366-5
定　　价／198.00元（上、下）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三篇

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

1960～1979 年中苏关系演变的大致脉络就是，两党关系由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到关系破裂，同盟关系由瓦解走向敌对。中苏关系的内核已发生变化，两国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逐步向以国家安全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新的军事冲突的因素。就中国方面来说，这一时期有三个关键性转捩点。其一，1962 年：中共在内部将中苏两党两国的斗争定性为敌我性质，为两党关系的破裂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二，1964 年：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对外防御战略，苏联成为除美国之外的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个假想敌，中苏同盟关系至此破裂。其三，1969 年：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事件爆发，两国关系一度濒临战争边缘。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到 1970 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两国关系转入军事对峙和政治对抗阶段，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第一章

中苏分歧公开化与短暂的缓和

· 对外方针分歧引发理论争论 / 373
· U－2 飞机事件中的中苏互动 / 387
· 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斗争 / 397
· 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的抗争 / 405
· 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 / 412
· 经济困难背景下的短暂缓和 / 424

作为中苏两党共同起草的文本，1957 年的莫斯科宣言确认，苏共二十大“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①] 这时，因苏共二十大召开而出现在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两个表现，似乎已经消失：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赫鲁晓夫在波匈事件爆发后便亦步亦趋地接受了毛泽东“三七开”的说法；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尽管中共坚持保留意见——其实只是一些枝节或提法问题，但最后还是与苏共达成了妥协。无论如何，在这份国际文件中全面肯定一个党的代表

① 《1957 年 11 月 14 日至 16 日后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之二），《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22 日。

大会，即苏共二十大，这即在事实上接受了苏联共产党对内对外纲领政策的核心部分，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遵循的共同准则。对于在这次大会上意气风发、斡旋调度、纵横捭阖的毛泽东来说，会议最终的成果却是形成了一个以苏联的方针政策，即以赫鲁晓夫的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共同纲领。这个结果实在让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和纯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心有不甘。与此同时，由于苏共也尽量吸收中共的看法，以致宣言中多处出现“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的文句。莫斯科宣言实质上就是一种中苏互相妥协的产物，而这种妥协埋下了日后中苏两党分歧公开、走向分裂的伏笔。①

随着 1958～1959 年中苏两党在中共对外政策（炮击金门、中印冲突）和对内政策（“大跃进”、人民公社）方面分歧的产生与发展，谁的理论思想代表马克思主义正统，谁的方针政策代表国际共运的正确方向，谁能成为这个运动的领袖的问题，愈益突出起来。以 1957 年莫斯科宣言为起点，中苏两党开始发生向“左”与向“右”的分化。苏联从苏共二十一大以来，宣传的论点进一步“右”转，更加强调战争可以避免，强调和平共处及和平过渡。中共则夹带着“大跃进”的激情，认识继续“左”转，愈益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强调武装斗争、非和平过渡及与帝国主义无法和平共处。双方事实上不过都是在重申并强化宣言中支持自己观点的那一部分内容，分歧逐步扩大。1959 年 10 月两党领导人大伤感情的争吵发生之后，尽管双方确定的方针都仍然是以维护两党团结和友好关系为目标，前提却都是要对方承认错误。两党都表示要团结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而问题在于究竟是苏共代表马列主义的原则基础，还是中共代表这个基础；是遵循

---

① 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结果的最新研究，可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 年第 6 期。

苏共确定的条件实现团结，还是遵循中共确定的条件实现团结。由于这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共同的规律，以谁为领袖的大势，意识形态的分歧已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到了一起。而当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时，就预示了两党分歧最终公开化的前景。问题只在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公开，究竟谁先正式迈出这一步。

第一节　对外方针分歧引发理论争论

1959 年底 1960 年初，中苏两党在继续把中苏团结确定为基本政策时，都提出了实行这一政策的指导方针，即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团结，但对于这个原则却各有说辞。

1959 年 12 月，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在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方面一切好的东西给予应有评价的同时，我们应该对那些关系到我们共同利益而观点又有分歧的最重要问题坦诚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在原则上捍卫我们党认为是正确的立场。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我们深信，中国的同志们将坚定地站在统一和与苏联友好的立场上。① 是月初，刘少奇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② 毛泽东则于 4 ~6 日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谈到，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应该相信他的这种错误到后来是会被纠正的，应该有这个信心。③ 翌年 1 月，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

①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9 卷，第 78 页。
② 《刘少奇年谱 1898 ~1969》下卷，第 474 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231、233 页。

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至于中苏关系，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团结，估计是可以团结的。关系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要向他们做工作。影响是相互的，过去十月革命影响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影响他。虽然赫鲁晓夫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帮助他，我们要向赫鲁晓夫做工作。[①]

中苏两党不约而同地确定的这种方针，显然是一种有条件的团结方针。两党都在强调自己的立场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对方应该向自己趋同。毛泽东更表明了中共要影响苏共，要帮助赫鲁晓夫，做他的工作的意图。在这种思路指导下，1960 年伊始，中国即以对印外交政策和列宁诞辰纪念为切入点，开始了团结进程中与苏联的两轮较量。

其一，具体外交政策上的较量。

1960 年 1 月 19 日，在赫鲁晓夫即将访问印度之前，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就 1959 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请他转告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事件是印度挑起的，道理在我们方面，希望苏联领导人访印时不要表示过问此事的意向。苏共中央的回复却是，在此问题上，苏联今后将继续坚持“严守中立”的立场。中方对此表示惊讶，周恩来向契尔沃年科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做出全面的分析。尽管契尔沃年科随后解释说“中立”一词是他口头转达时用词的错误，周恩来仍然坚持认为，取消该词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②] 在中国看来，塔斯社 1959 年 9 月发表的对中印边界冲突保持中立态度的声明已经反映了苏联的这种立场，声

① 《林克日记》（手稿），笔者收藏，第 124 ~ 126 页；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7，第 7 页。

② 《周恩来年谱 1949 ~ 1976》中卷，第 280、281、283 ~ 284 页。

明的发表，首次向外界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①] 经过 10 月初两党领导人的那场激烈争吵，苏联方面要想抚平双方感情的创伤，维护团结，就应该修正自己的立场。

事实上，苏联方面对中印冲突的立场主要还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即不给美国干预冲突以口实、防止把奉行中立立场的尼赫鲁政府推向帝国主义集团。莫斯科认为，如果苏联公开宣布在中印争端中单方面、直接地支持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加入其中，因为据苏方获得的消息，美国政府正打算积极地站在印度一边，艾森豪威尔已经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问他需要多大援助。[②] 另外，印共领导也不止一次地请求中国采取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方法，以免给印共带来损失，尤其会影响到由共产党人执政达 28 个月之久的喀拉拉邦的形势；[③] 何况即便能推翻尼赫鲁，上台的也绝不可能是印共领导人高士，而是更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④] 而中国关于苏联发表"中立"性声明就是公开了中苏分歧的这种指责，有一些强词夺理的成分。客观地讲，在国际冲突事件爆发时，呼吁停火，寻求和平，对冲突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塔斯社 9 月 9 日的声明可以说反映了中苏两国方针的

---

① *КуликБ. Т.*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 причины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 : ИДВ. РАН.，2000，с. 292；Mark Kramer，"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s Appraisal of Sino – 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香港，1996 年 1 月）论文。以后，邓小平又在 1960 年底的莫斯科会议上和 1963 年 7 月中苏两党的会谈中明确提出，1959 年 9 月 9 日的塔斯社声明第一次将中苏分歧公布于世　参见 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9 – 84*，Longman Group Limited，UK，1985，pp. 21 – 22；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10 卷，第106 ~ 107 页。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中国方面公开提出了这一指责　参见《人民日报》1963 年 9 月 6 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 71 页。

②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 292；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9 卷，第 138 ~ 139 页。

③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9 卷，第 138 页

④ 福建省档案馆，101/2/374，第 172 页。

不同，但也可以解释为是在做表面文章。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政府无论在开战、停战问题上，还是在整个和平谈判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中立者的角色。那时，中苏两国在外交上配合得非常默契，毛泽东从来不曾指责斯大林暴露了双方的分歧。[①] 因此，核心的问题并非莫斯科采取了发表“中立”声明的方式，而是苏共领导人不赞成中共对待印度的外交方针。说苏共因此而首先暴露出中苏两党的意见分歧，根据不足。但是，事隔数月后，中国要求苏联在外交政策上与自己步调一致的态度更为强硬了，开始对苏联的这种中立立场进行挑战性的回应。

1960 年 1 月 8 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通告说苏联准备单方面宣布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内苏军裁减 120 万人。时隔一日，周恩来即在外交部关于苏联就裁军问题同中国接洽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说：拟于赫鲁晓夫本月 14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向各国议会提出裁军号召的建议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一方面赞成裁军，另一方面正式声明没有中国自己参加，不承担任何义务。但是 13 日毛泽东让伍修权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赫鲁晓夫中方的意见时，却只谈中共中央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步骤，没有通报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后一个意图。2 月 1 日，毛泽东在就派代表参加华约国会议一事给赫鲁晓夫的复信中，仅表示相信这次会议必将为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揭露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扩军备战阴谋，以及鼓舞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做出新的贡献，而对于中方要继续声明自己承担义务是有条件的这种意思，依然没有透露半分。[②]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审定了与会中国代表康生的发言稿。[③]

---

① 关于中苏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政治合作，详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1953 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1 年第 3 期。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第 8、21 ~ 22 页；《周恩来年谱 1949 ~ 1976》中卷，第 278 页。

③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333 ~ 334 页。

2月4日，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康生在会上的发言强调指出：国际局势出现某些和缓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美国统治集团被迫做出某些和平表示，是要以所谓‘和平取胜的战略’来麻痹世界人民的斗志，破坏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梦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所谓‘和平演变’。”“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发言特别重申：“我们希望有关各国就普遍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中国政府从来毫不犹豫地承担它所同意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但是，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①]这是再次不指名地警告苏联，不要在裁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在苏联国内继续高度评价赫鲁晓夫1959年9月访美成果，说其是“打开苏美关系的转折点”，“开辟了国际形势的新时期”，“世界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赫鲁晓夫热衷于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苏共外交方针的局面下，[②]中国方面这种不合作、不捧场的态度和举措，对于莫斯科来说，不啻是一次新的打击，由此引发赫鲁晓夫在会议闭幕时的宴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是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③]

赫鲁晓夫的这一不冷静反应对于中国来说，其严重性在于，他将矛头指向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个人。这即触及了中共和毛泽东最

① 《人民日报》1960年2月6日。

② 福建省档案馆，101/2/374，第172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33~334页。

③ 1998年3月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50~252页。

敏感的神经，促使中国迅速采取最直接的报复行动，由《人民日报》于2月6日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为标题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①] 对此，苏联方面做出的回应是，同日，在参加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口头声明，全面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指责中国反击印度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映。[②] 不过，苏联方面没有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上述谈话和苏共中央的口头声明。[③]

如果说康生在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发言中宣布这一立场，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表态，外部世界尚难悉其详，那么这次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公开中方的立场，确能引起外界注目。苏联由此认为，中国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议上讨论的内容公布出去了，实际上也是将中苏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④] 不过事实上，中国的这一步骤，原则上还不能说就是公开了与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分歧，道理同上，它也可以是同盟国之间选择的一种策略，就保护自己阵营的利益而言，中国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不承担义务的说法，毕竟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核武器政

---

① 华约国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例会在1960年2月4日召开了一天，会议通过了缔约国宣言，签字仪式于是日下午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签字仪式在莫斯科举行》，《人民日报》1960年2月6日），随后闭会，闭幕宴会应是在4日当晚举行。由此，6日中国公开发表康生讲话稿，应是对赫鲁晓夫影射之言的报复性回应。以《人民日报》一般于凌晨3点多开印，5点多印完，早晨发行的情况看，康生讲话稿有可能在5日夜即发排了，这反映了"老套鞋"事件的影响。对此，中国有关文献的记述"中国公开发表康生的发言，引起赫鲁晓夫的强烈反应。在这次会议闭幕时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影射攻击毛泽东"（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33页），应有误。

②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0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33页。考虑到莫斯科与中国的时差，以及口头声明的这种方式，苏方此举应是对中方公开康生讲话的回应。6日早晨《人民日报》发行时还是莫斯科前一日的夜里，肯定早于6日中苏两党会谈的时间。而康生一行是在7日晚离莫斯科返京的。《康生伍修权回到北京》，《人民日报》1960年2月9日。

③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33页。

④ 1998年3月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

策方面有了回旋的余地。因此，苏联方面的指责，同样牵强。

中苏这一轮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的较量，主要还不是关于国际共运共同纲领的争执，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国对赫鲁晓夫出访印度时明确苏联袒护尼赫鲁的态度的忧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要出一下1959年塔斯社声明令中国陷于尴尬境地的那口恶气。中国要求苏联在具体外交政策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以及苏联在中国举措的刺激下再次于阵营内部会议上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实际都是一种干涉他国内政的表现。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与阵营中各国自身利益的矛盾在这场较量中凸显出来了。对于中国来说，这次冲突只是要刺激一下赫鲁晓夫，提醒他不要在向资产阶级分子尼赫鲁示好时，忘记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战友和盟友。而要真正达到帮助赫鲁晓夫、使他回归中国认为的正确路线的目的，还是要进行一场思想斗争，所谓真理不辩不明。由此，即将到来的列宁诞辰日——4月22日，被中共认为是挽救赫鲁晓夫的最佳时机。

其二，意识形态论争中的较量。

1月19日，即周恩来通告苏方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有理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规定：（1）4月21日党中央在北京主办纪念会，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做报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4月22日举行纪念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或书记处书记做报告。中央的纪念会将邀请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来宾参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纪念会应邀请当地兄弟国家的外交人员和专家参加。（2）《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报纸和理论刊物，应在4月22日前后陆续刊载文章，论述列宁思想。内容可包括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劳动、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和不断革命、群众运动和人民

群众的首创精神、党的领导、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等方面的理论。通知特别要求：这些文章在联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阐述列宁思想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时，应以刘少奇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为依据，并严格遵守 1959 年 2 月 8 日《中央关于不得在报刊上批评兄弟国家的理论著作和影片的通知》的规定。[①]

此项通知导向的核心在于，要以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而作》的文章为范本。此文是刘少奇应《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之约于 1959 年 9 月 14 日写成的纪念文章，它全面评说了建国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赞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强调指出，“非难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非难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非难党的总路线的人”，“就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文章还特别提出：“中国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国际意义的。”这篇文章实际是在回应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中共“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对内政策的批评，透露出一股反驳、辩论的劲头。该文在 10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之前曾送毛泽东审阅，刘少奇在送审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毛泽东批语说：“看过，很好。”[②] 这里所谓的外国同志虽未具体言明，但文章批驳的对象是苏联已明确无疑。因此，尽管通知规定不得在报刊上出现批评兄弟国家的言论，其真正意图却还是要在国内掀起一波全面批判苏联纲领路线方针的活动。一方面仍然不指名道姓，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给赫鲁晓夫造成压力，促使其向中国的观点靠拢。

---

①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11/14/272，第 14 页。

② 《人民日报》1959 年 10 月 1 日；《红旗》杂志 1959 年第 19 期；《刘少奇年谱 1898～1969》下卷，第 464 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527 页。

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对中国政策和毛泽东的臧否，被看作一次反华动作，直接促发中共要加快宣传自己的观点，抓紧实施拖住赫鲁晓夫转向修正主义的步骤。2 月 22 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了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行为应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在 3 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要根据列宁的观点，加紧撰写文章，阐述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的主张。[1] 4 月中旬列宁 90 周年诞辰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书记处于 15、16、18、20 日，紧锣密鼓地分别讨论了即将发表的由陈伯达起草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和胡乔木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等三篇文章。毛泽东在 10 日和 16 日亲自审读和修改了第一篇文章。[2] 至此，中共中央原定的通过宣传列宁思想隐晦批驳苏共理论的纪念列宁诞辰的形式，变成了主旨在于反击的行动，辩论的内容更为集中，矛头直指苏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中国的舆论宣传阵地，一时弥漫出些许火药的味道。

4 月 16 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 8 期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 90 周年》。该文对铁托现代修正主义的种种指责，赫鲁晓夫同样可以对号入座。其中所专门批驳的铁托的“新时代”理论，即世界已进入“新时代”，这个时代的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经济合作、经济竞赛等问题，以及关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认识，事实上还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苏共二十大上首先提出来的。全文笔锋犀利，并且使用了一些激烈的言辞，诸如“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251～253 页。

② 《杨尚昆日记》（上），第 483～495 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第 139～142 页

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主义的企图，不过是帝国主义末日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而已”；[①] 等等。这篇颇具分量的理论宏文，实际已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向赫鲁晓夫提出了挑战。

中共中央此篇打头文章问世之后，对于中国方面的发难，莫斯科一时慌了手脚，应该如何应对，苏联领导层内部议论纷纷，或表示应纠正中共的错误；或要求划清界限，坚决回击；或建议“不要着急！他们正盼着我们卷入论战。要有耐心，不要对他们的行动做出反应！”即如雨果的名言：“喊得最响最凶，往往表明立场软弱。”[②] 后一种意见显然暂时占了上风，苏联方面只以继续宣传自己纲领的方式作为回应。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于4月16日和17日重新刊登即将出版的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佩洛夫领导的写作组新编撰的列宁传记，同时配发按语，强调符合苏共现阶段纲领的列宁的理论思想；并于17日和18日发表文章，赞扬苏共二十大在“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贡献。[③]

不过，苏联的“高姿态”还没有持续几天，赫鲁晓夫就失去了耐性，决定直接应战。4月21日，苏共中央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布消息，对中国的宣传立场进行了批评。[④] 随后，在4月22日列宁诞辰日的当天，中苏两国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中苏两党充分利用这

---

① 《人民日报》1960年4月20日。

② *Капица М. 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 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 Москва, 1996, с. 71.

③ Telegram from Hong Ko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16, 1960,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 1960 – 1963, Box 1367, Folder: 661.93/6 – 1660, National Archives, US; 《人民日报》1960年4月19日。

④ *Капица М. 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 с. 71.

个时机，各自引经据典，以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形象，宣传自己的理论观点，同时不指名地批驳对方的种种认识。只是由于时差，中国方面还是走在了前面。

22日上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文章强调指出：中国确信自己“能够用跃进的速度前进”，“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正是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吵闹不休，但是列宁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中，“早就给了这伙蠢材以一个致命的痛击”。文章特别引证说：列宁并且预言，“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文章重申“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的原理，决没有也决不会‘过时’”，并列举了一长串中国认为的美国的好战言行，质问说：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之流所说的“自由中的和平”吗?[①] 尽管这篇文章把首先巩固和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团结作为第三个伟大任务加以专门论说，但其主旨是反驳赫鲁晓夫对中国国内政策的批评，在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理解以及确立样板模式的问题上，与苏联叫板；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的，欧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实现，“将创造消除战争的现实可能，使战争不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观点，以及苏联国内称艾森豪威尔希望和平、不愿战争的舆论导向，提出了挑战。

同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万人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林彪，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应邀参加并同坐在主席台上。中共中

① 《人民日报》1960年4月22日

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做了题为《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长篇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大会实况。4 月 23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发表了陆的报告。这篇报告实际重复了前两篇文章的一系列论点，讥笑“现代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斥责“现代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诬蔑为‘教条主义’，乃是工人阶级的叛徒腐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卑鄙手法”。报告还突出宣扬了毛泽东个人的作用，说“毛泽东同志充分地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我们的条件下，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是日上午，《真理报》发表社论，论说苏联共产党在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宣传苏联的实践实现了列宁的思想。[②] 傍晚 6 时，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体育宫举行万人集会，纪念列宁 90 诞辰。苏共中央领导人阿里斯托夫、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米高扬等出席。列宁的战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库西宁在会上发表讲话，[③] 强调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贡献”。讲话指出：早在赫鲁晓夫以前，列宁就曾经推行和大力支持过和平共处的主张，“今天为了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重复帝国主义是侵略性的这一旧的真理是不够的”。“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只看问题的这一面。必须要看到阻止战争的巨大力量的出现。也不应当看不见这样一点，即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讲话引证了列宁关于“将来有一天战争的破坏性会如此巨大，以致战争会完全成为不可能”的观点，评说苏联的和平共处

---

① 《人民日报》1960 年 4 月 23 日。

② 转见普罗祖缅希科夫《苏中领导人眼中的 1960 年》，闻一译，《中共党史资料》第 65 辑，第 205 页。

③ 《人民日报》1960 年 4 月 24 日。

政策“是惟一正确的、有生命力的政策”。[1] 库西宁的讲话实际明确回应了中共中央上述三篇文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对中国不断“重复”“旧的真理”的“教条主义”认识方法提出了批评。不过在应战的同时，库西宁还是表示苏联政府正在奉行一种“坚持原则、但是有妥协余地”的政策，摆出了息事宁人的姿态。[2]

对于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两党的这次争执，中苏两国都采取了保留性的宣传措施。中国方面没有转发库西宁的报告，只在23日和24日介绍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纪念活动时简要报道了苏共纪念集会的情况，直到27日才在《人民日报》第6版的报道中简短摘录了《真理报》4月22日社论，其中没有苏共自我宣传的内容。苏联报界则在转载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纪念文章时，没有采用一篇中共的文章。双方好像都不想扩大这场争执，不想加重分歧，尤其不想为对方的理论认识提供市场。

但是实际上，自1959年初以来，中苏两党两国通过报刊或会议，公开讲述各自在重大理论和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看法，就是在向外界宣示双方的分歧，西方也已从这种公开的舆论宣传中看出了端倪。只是进入1960年后，中苏两党在列宁诞辰日前后的这一轮意识形态上的公开较量，使得这种分歧更加引人注目。[3] 不过，这毕竟还是一场背靠背的、不指名的论争。在这场各自寻章摘句、为我所用地引经据典，一个针对修正主义者，一个针对教条主义者的较量中，中共扮演了挑战者的角色。鉴于铁托实际已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成了

---

① Telegram from Hong Ko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16, 1960,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 1960－63, Box 1367, Folder: 661.93/6－1660, National Archives, US;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3041号，1960年4月24日，第20、21页；第3044号，1960年4月28日，第29～30页。

② 《内部参考》第3041号，1960年4月24日，第21页。

③ 中共中央上述三篇文章的发表和苏共中央库西宁的报告，不仅在西方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使苏联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受到极大震动，他们第一次知道双方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很多人甚至以为是翻译出现了错误　详见《内部参考》第3040、3041、3042、3043、3044、3046、3059、3062号；*Долинин А.* Как наши ракетчики китайцев обучали//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13 мая 1995г.

“死老虎”，而赫鲁晓夫正在鲜活地宣传着苏共那套异于中共的理论思想，并以此指导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理论家们事实上一开始就把赫鲁晓夫与铁托画上了等号。苏共则被动应战，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威，防止东欧国家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因相信中国而逐渐背离苏联。毕竟在他们看来，中国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了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这些文章被译成外文，匆忙通过各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寄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反映中共中央观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①] 从表面上看争论的目的似乎在于辨清谁的对内对外政策真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要表明谁有资格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据主导地位，谁将在国际共运中担当主角，引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尽管针对帝国主义分离中苏同盟的阴谋，毛泽东指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中苏两国人民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他们之间的团结。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休想在中苏两国之间找到任何的可以利用的空隙。赫鲁晓夫也曾警告试图挑拨中苏关系的人：“不要在没有裂缝的地方去找裂缝”，你们将看不到这种裂缝，“正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②] 但是这轮较量之后，中苏两党的分歧事实上已经初步公开化了。即如共运中有的党所认为的，反修正主义不只是反南斯拉夫，这三篇文章一发表，“似乎世界上已有两个中心、两种意见”。[③] 中苏双方在报纸杂志等党的舆论宣传阵地上一番暗藏杀机的较量，使得西方世界从镜子

①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24页。
② 陈毅：《中苏同盟是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人民日报》1960年1月31日。
③ 《杨尚昆日记》（上），第607～609页。

里看到了自己的耳朵。只不过，对于西方世界来说，“龙和熊意见不一致”的含义并不明确，它仍然可能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分歧。[①]

中共通过与苏共的两轮较量，迈出向赫鲁晓夫施加压力、促使苏共向中共政策趋同的第一步之后，一次事件的发生，使得中苏两党实现团结的天平向中国方面倾斜，毛泽东看到了赫鲁晓夫向中共思想理论靠拢的可能性。

第二节　U－2飞机事件中的中苏互动

事实上，中国从意识形态上向莫斯科提出挑战，应该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提醒赫鲁晓夫，不要在即将到来的解决柏林问题的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上，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妥协。结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帮了毛泽东这个忙。

1960年5月1日，苏联防空火箭部队在斯维德洛夫斯克地区击落了一架侵犯苏联领空的美国U－2型飞机，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承认，他是在美国政府知道的情况下驾机进入苏联领空，用特殊的无线电技术装置和摄影装置搜集战略情报的。[②] 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在5月5日的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通报了这一情况，激烈地谴责美国军用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行为，并不无警告意味地向旁听会议的西方大使透露说，苏联的陆军和海军已经开始装备火箭武器，因此成立了火箭部队总司令部。[③]

其实，美国飞机带着间谍目的深入苏联领空并非鲜见之事，它们

---

① 《内部参考》第3042号，1960年4月26日，第28、27页；第3046号，1960年4月30日，第30～31页。

② 张金发：《中苏共关系：中国民族主义的背离》，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86，第94页；《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19日，8月21日。

③ 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至1991苏共历史大事实录》（以下简称《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544页。

侵犯苏联的堪察加、楚科特加、库页岛、波罗的海沿岸、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等地区，仅 1953 ~ 1956 年就有 100 多次。1958 年 6 月 27 日，美国一架四引擎的军用飞机还深入苏联领空达 170 公里；两个多月后，美国军用间谍飞机再度深入苏联领空。[1] 而苏军击落美机的事件却偏偏发生在与中共进行笔墨之争和四国首脑会议即将召开之时，的确令一直鼓吹与西方缓和的赫鲁晓夫一时陷入了尴尬境地。他既想继续推行自己既定的外交政策，又要顾及国内传统势力借此事做文章，动摇其在苏共党内的地位；既想避免就此与美国发生冲突，断送掉已营造多时的缓和氛围，又要考虑抵消反复强调帝国主义本性难移的中共舆论声势的影响，维护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和地位。两相权衡，赫鲁晓夫不得不在中国，以及同中国息息相通的本国保守集团的压力下，转而对美国采取强硬措施。

而艾森豪威尔政府从 5 月 5 日一开始否认有此类事件发生，到 9 日被迫承认，表示这种飞行是根据总统的指示和包括进行“广泛空中观测”在内的计划进行的，这种观测包括采用“渗入”苏联领空的办法，再到 12 日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转交致苏联政府照会，再次声称进行这种飞行是美国的既定政策，[2] 态度一直十分蛮横。这种情况不啻给了赫鲁晓夫一记耳光，进一步激起了他的愤怒。苏联方面开始重新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 5 月 11 ~ 14 日举行的苏军党的基层书记会议上提出：当战争威胁还存在，全面彻底裁军还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应当表现出最大的警惕性。[3]

5 月 16 日，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预备会议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法国内阁会议厅举行。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军用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的挑衅行动和美国政府坚持对苏联采取挑衅政

---

① 《人民日报》1960 年 5 月 21 日。
② 《人民日报》1960 年 5 月 19 日
③ 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第 544 ~ 545 页。

策的做法，要求美国政府宣布今后不再对苏联采取这种行动和奉行这种政策，并且严惩直接参与这次事件的罪犯。他表示："除了把政府首脑会议大约推迟六个月到八个月的时间之外，再没有更好的办法。"对此，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回复说，侵犯苏联领空的飞行"已经停止了，而且将不恢复"；但是，这种飞行不恢复的期限只限于他担任总统的期间。[1] 实际回绝了赫鲁晓夫的其他要求。

会议就此流产后，赫鲁晓夫亮出了坚定的反美姿态。18 日，他在巴黎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发表声明还击艾森豪威尔，指斥说：帝国主义者习惯于像古时候俄国商人的那种做法，用芥末往狗腿子嘴唇上涂，而那些狗腿子说"谢谢"，并且深深施礼。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侮辱，我们有自己的尊严，是代表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人采取任何挑衅活动都不能吓倒苏联，要我们屈膝是不可能的。对于 16 日艾森豪威尔的答复，赫鲁晓夫指出：可见美国总统所答应的不是放弃侵略政策，而只是在 1961 年 1 月以前暂时"停止"飞行。如果我们满足于这种虚言搪塞和他所"赐予"的 1961 年 1 月之前停止在苏联上空飞行的"恩惠"，苏联人民、我国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社会舆论将不会了解我们。在这个声明中，赫鲁晓夫一方面不无威胁地警告说：飞机能不能在苏联领空飞行，"这要由我们来决定，我们要十分肯定地决定——我们将击落这种飞机，将给飞机起飞的基地、给那些建立这种基地和实际使用这种基地的人以毁灭性打击"；一方面也注意留有余地，表示再过 6～8 个月，如果他们不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挑衅，那么，我们将同我们的伙伴重新会晤，以便讨论和解决成熟了的国际问题。[2]

与此同时，苏联国内从 16 日晚电台广播赫鲁晓夫的声明之时起，

---

① 《人民日报》1960 年 5 月 21、20 日

② 《人民日报》1960 年 5 月 19 日

就掀起了支持政府立场、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浪潮。17日一天当中，莫斯科100多万人分别举行了5000多次集会，反对美国的战争挑衅政策。苏联各战斗部队也举行集会支持赫鲁晓夫的声明。远东军区还有军官表示："我们根本不能同把背信弃义和进行强盗活动作为政策的国家首脑进行谈判。对我们所有军人来说，结论非常清楚：要更加做好战斗准备。"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各主要报纸则纷纷发表文章，揭露美国的对苏侵略方针，故意葬送四国首脑会议，指出：为了要使和平共处成为政治现实，就必须使帝国主义者放弃他们反对苏联的强盗政策。现在美国侵略者的真面目已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管他们如何巧妙地回避，都不能逃脱自己的责任。艾森豪威尔像一个忠实的奴仆那样代表着自己的资产阶级，代表着自己的帝国主义掠夺制度。等等。①

艾森豪威尔的霸道行为，使赫鲁晓夫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大大地作了一场秀。不过就中苏关系而言，这场秀中更引人注目的却是中国的反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场中苏互动式的作秀，乃至引起西方世界的猜疑，认为北京最近的大叫大骂和好战态度可能是在巧妙地配合克里姆林宫。②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配合只是表象，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主旨是要促进赫鲁晓夫转而向中国的目标靠拢。

事实上，随着1950年代后期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以及中苏之间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国际共运中路线斗争的展开，中国在不指名地批判赫鲁晓夫的同时，也在愈加积极热情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武装斗争和革命起义，争取获得更多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支持，反对并干扰苏

---

① 转见《人民日报》1960年5月18、19、21日。
② 《内部参考》第3067号，1960年5月28日，第17页。

联的缓和方针。出人意料的是，在上述《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 90 周年》等三篇文章发表不久，美国方面就适时地送来了中国可资利用的“炮弹”。毕竟在中国看来，这一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中共论点的完全正确，“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1]

5 月初，当坐在苏联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旁听席上的西方各国驻苏使节，面无表情地倾听赫鲁晓夫通报苏联击落美国 U－2 间谍飞机的经过时，中国大使则是眉飞色舞、得意扬扬，深信这件事终于向赫鲁晓夫证明了他的错误，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采取强硬态度。[2] 消息随即传回北京，与此前对苏联纪念列宁诞辰活动做低调报道大相径庭的是，中国方面迅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一轮新的大规模宣传战蓄势待发。

5 月 9 日，《人民日报》即以《对苏联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为题发表社论，指出，U－2 飞机事件是“美国统治集团长期以来一贯奉行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继续。这种政策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挑衅”，“也就是对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挑衅。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和人民对美国当局的抗议和谴责”。这大概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先发出的支持苏联对抗美国的声音。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 5 月 7～14 日连续五次会见应邀来访的亚非拉国家代表团，谴责美国进行积极的战争准备，介绍中国的反帝斗争经验及革命和武装斗争经验。会见中，毛还在外国客人高唱中国歌曲《东方红》时打着拍子，而后鼓动说：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坚决支持一切地方的民族民主运动。[3] 如此频繁地公开谈话，使得 16 日的美国报纸评论说：毛泽东在十天中发表了五次讲话来迎接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 73 页。
② 《内部参考》第 3059 号，1960 年 5 月 17 日，第 27 页。
③ 《内部参考》第 3061 号，1960 年 5 月 19 日，第 23 页。

重要的最高级会议，这对一位通常每年只发表两三次政策讲话的领袖来说，显然是太喜欢讲话了。“毛在口头上的攻击使巴黎前景暗淡。”①

在第五次讲话，即5月14日四国首脑会议召开前夕在武汉接见日本和拉丁美洲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虽然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② 却又同时强调：事实仍然是，取得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是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在谈起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情况时，他指出：苏联人做得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国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这样的真理：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应当存有幻想。毛泽东还影射赫鲁晓夫1959年9月访美后曾说艾森豪威尔似乎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的旧事，讥讽和提醒说：“过去，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同日，新华社、北京广播电台摘要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之后，西方媒体，如共同社、美联社、美国《新闻周刊》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在15日和16日纷纷就此进行了报道和评述。③《人民日报》也于16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措辞激烈地提出反对向美国人让步的警告，宣称“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凶恶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④

可以说，作为国际共运旗手地位最强竞争者的毛泽东就此事件的公开亮相，以及中国方面的舆论压力，对赫鲁晓夫决定在四国首脑会议上做强势表态，采取强硬的反美对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赫鲁晓

① 《内部参考》第3067号，1960年5月28日，第17、16页

② 《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日

③ 《内部参考》第3067号，1960年5月28日，第17页；《内部参考》第3060号，1960年5月18日，第21～23页；第3061号，1960年5月19日，第23～24页；第3063号，1960年5月21日，第12～13页；第3067号，1960年5月28日，第16～18页

④ 《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日

夫开始重拾已经放弃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性”等词语。一时间，莫斯科的时钟好像被拨成北京时间了。

随着毛泽东态度的明朗化及事态的发展，中共中央领导层明显兴奋起来。5月16日，周恩来飞抵武汉，于会见在那里等候毛泽东接见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之后，当晚与陈毅进见毛泽东，商谈了中苏团结等事项。[①] 翌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后者根据苏共中央的委托，通报苏联对召开这次首脑会议的立场时，邓小平说：赫鲁晓夫同志5月16日在巴黎的演说是一次很好和很有说服力的演说，我们从中看出了苏共中央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我们的立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因为他们不在，但是在京的中央委员已经交换了意见，所有这些同志都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演说。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完全对，他去了巴黎，他应当去”。邓并强调指出：“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件好事”，因为他的侵略行动使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真面目。我们共同的立场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阐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正确的立场。邓表示，5月18日中国报刊将全文发表赫鲁晓夫的声明；中共中央已决定在国内开展支持这一声明的运动。邓还请契尔沃年科转达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热情问候，说：美国人联合它的队伍以反对我们，但他们的联合是靠不住的。而我们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因为这个团结是建立在统一的思想和目标的基础上的。[②] 同日下午，毛泽东向杨尚昆就赫鲁晓夫在巴黎提出强硬声明事再次发表了议论。与此同时，穿梭于武汉和北京之间，商议并传达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最近的国际形势等问题。[③] 这时，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19、320页。

②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05页。

③ 《杨尚昆日记》（上），第503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19、320页。

在巴黎的强硬姿态与中国的反帝方针非常接近，他似乎已经站到了与中共中央的思想和目标相统一的基础上了。

从巴黎这次会议召开到5月17日宣告失败，中国国内的宣传声势也与苏联同步展开。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宣称欢迎四国首脑会议召开的同时，强调中国"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衷心地希望通过四国首脑会议，在揭露美国战争政策和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①] 5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责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重申东风日盛、西风日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不可能放弃它的侵略政策。5月18～25日，《人民日报》还连续摘要报道苏联各主要报纸的评述文章，报道赫鲁晓夫16日的声明和莫斯科及各地群众集会情况，并于头版全文发表赫鲁晓夫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等。[②]

当中国反美舆论宣传文章铺天盖地之时，5月19日下午，毛泽东在途经株洲时进一步指示坐镇北京的邓小平，要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并明确要求北京的集会要在20日即举行。[③] 于是，翌日，首都3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空前浩大的示威和集会。周恩来、朱德、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警告说：对苏联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挑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每一次挑衅，都一定要受到加倍的回击。契尔沃年科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当帝国主义更加公开地张牙舞爪的时候，各国人民都应该更加提高警惕，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警觉地注视和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的阴谋，准备随时给予侵

---

① 《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日。
② 《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25日。
③ 《杨尚昆日记》（上），第503页。

略者以坚决的毁灭性的反击。他最后并高呼："苏中两国人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打倒战争挑拨者，世界和平万岁！"等口号。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示威集会情况，同时发表了邓小平的讲话。此后，到5月23日止，中国各地城乡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数已达5300多万人。[①]

在短短几天中，毛泽东导演的这幕声援苏联、反帝反美的戏剧，无论规模还是声势，都极大地超过了当事国苏联。以此，中苏互动的结果是，毛泽东的风头盛过了赫鲁晓夫，以至于西方媒体评论说，在四国首脑会议前夕，毛泽东把他的手指戳进了赫鲁晓夫的肋骨，会议召开时，赫鲁晓夫席位的背后巍然出现了毛颀长的身影；认为世界共产主义战略中的中国路线战胜了赫鲁晓夫的路线，U-2飞机事件大大加强了毛的地位。莫斯科和北京对待世界问题，特别是和平共处问题的明显分歧现已消除，中苏裂缝弥合了。西方舆论甚至预测有可能形成强硬的莫斯科—北京轴心。[②] 总之，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破产等事情，显示出中国对1960年世界事态的分析比苏联高明，每次都是中国的态度占了上风。

一次飞机事件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突然加剧，赫鲁晓夫立场的变化，振奋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精神，使他们看到了赫鲁晓夫向中国政策趋同的可能性，尤其看到了中国压力所起的作用。这个时期新华社《内部参考》较多选发外电关于中国影响的评述，实际就反映了中共中央的好恶倾向，表明中央领导层及毛泽东本人十分看重中国意识形态压力和种种举措，对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所产生的作用。只不过，一波宣传运动高潮尚未完全过去，毛泽东已冷静地看到了事态的另一面，做出了以下两种评估。

---

① 《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25日。

② 《内部参考》第3061号，1960年5月19日，第24、23页；第3063号，5月21日，第12、13页；第3067号，5月28日，第20页。

一是认为赫鲁晓夫转而采取强硬立场，有被迫的成分在内。5 月 21 日，毛泽东向金日成指出：赫鲁晓夫“一时指挥欢迎艾森豪威尔，一会儿又指挥不要欢迎。搞得神魂颠倒。5 月 1 号打下了美国飞机，活捉了驾驶员。2 号艾森豪威尔说‘U－2’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这就逼使老大哥再无考虑的余地了，这才下了决心，到巴黎去不是开会，而是去揭露，事先有照会”。即如毛泽东认为“说得很好”的中国驻英代办宦乡 5 月 28 日对四国首脑会议流产的国际形势的分析：19 天来，苏联对美帝的政策逐步由过去单纯的和解绥靖，转变到坚决揭露和强硬斗争，主要是由于美帝的蛮横进逼逐步促成的。首脑会议散场后，赫鲁晓夫态度又突然软化。根据这种情况推断，苏联斗争策略的转变主要是间谍飞机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战争和平等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有了真正全面、深刻的新认识，因此摇摆和犹豫恐怕不是一时所能避免的。①

一是看到赫鲁晓夫还有逐步转变的可能性，实际对中苏关系的前景做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5 月 22 日，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分析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维营会议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这次为了 U－2 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将赫鲁晓夫定性为半修正主义。②

总之，毛泽东这时一方面敏感地觉察到了赫鲁晓夫的三心二意，一方面仍然认为此人还有挽救的余地。由此，他摆出了准备重新拿

---

①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 年 5 月 21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第 200～201 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270、271～272 页。

起意识形态争论武器的架势，开始批评1959年11月罗马欧洲资本主义国家17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是修正主义的会议，强调“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毛泽东说：“难道你们十七国党已经得到政权了吗？一点政权没有，就急急忙忙宣布连根铲除战争，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是资本家高兴，起了欺骗作用。”毛泽东再批和平过渡理论，强调“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民族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叛变革命的，对这类人寄有很多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他还表示“将来要算算账”，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到底还要不要。“现在我们要公开谈了”。[1]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直接促成了此后中共中央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方针的确立。中国要继续向苏联加压，再拉赫鲁晓夫一把，至少拖住他右转的步伐。于是有了中苏两党在第二战场的角逐，分歧终于公开化了。

第三节　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斗争

既然当年中共接受了12国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莫斯科宣言》，接受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签字的、更多反映赫鲁晓夫观点的64国《和平宣言》，[2] 事实上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是国际共运的指导原则，随着苏共与中共思想、方针上相悖的距离逐步拉大，而双方都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并且都要争取对方向自己趋同，中共将争论的触角伸向国际组织就是早晚之事。鉴于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共运

---

①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毛泽东接见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记录，1960年5月28日。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24页。

中大多数国家和政党都支持苏共的观点，中共尤其需要争取更多的追随者，以提高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在中共看来，对于亚非拉国家中那些尚未取得执政地位的革命党和那些赞成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团体来说，中国激进的口号和纲领比苏联谨慎的缓和策略更具有吸引力。这样，借着 U－2 飞机事件所造成的反帝反美声势，中国开始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开辟与苏联进行角逐的第二战场，全方位对苏共进行批评和帮助，压其在中共的原则基础上达成双方新的团结。

1960 年 6 月 5～9 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前，中苏双方围绕世界工联书记处准备的总报告展开了争论。

中国代表团认为，这个报告在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总危机等六个问题上的提法存在重大的原则性错误，并且认为报告中对中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加引号的方式予以表述，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不友好态度。6 月 1 日，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和苏联团长格里申举行会谈，苏方拒绝了中方的这种指责，并且表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加引号只是苏方行文的一种习惯性表达方式，丝毫不掺杂感情色彩。翌日，在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会党员代表举行的会议上，有不少代表指责中国犯了“左派幼稚病”。6 月 3～4 日，世界工联书记处和执行局召开会议，对报告进行了修改，中方仍然声明对其中某些错误论点保留意见，但是同意把报告草案提交理事会讨论。① 刘宁一并表示，中国人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把这些分歧带到理事会公开的会议上去。②

---

① 2002 年 6 月 5 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次会议的总报告文本。

② 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 年 7 月 13 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9 卷，第 125 页。

6月5日，会议开幕，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马赛尔·布拉代表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做了会议第一项议程报告。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则在下午的会议上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对美国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事件做了呼应，都谈到了美国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及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①] 带有某种程度的强硬色彩。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表明世界工联书记处会彻底放弃总报告的论点，改变其在苏联主导下制定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路线为宗旨的工作纲领。苏共其实是在把自己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

为了避免在大会上形成争论，6月5日晚，中共中央召集17国工会共产党和工人党党员负责人40余人举行座谈会，进行内部交换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中共领导人说明各国同志是否同意中共的意见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希望他们回国后把中共的意见转告各自的党中央。邓小平开始在会上阐述中共中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对于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苏联代表团来说，中共中央的举措无异于以“托洛茨基方式”，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于是，格里申勉强听完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之后，即表示反对，并且拒绝邓小平的解释，拒绝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挽留，带头退场，东欧国家的代表也纷纷跟着站起来，座谈会中断。[②]

苏方这种不容争执的态度，使得中国根据自己意见修改报告草案的最后努力落空了。中国方面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于是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

---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60年6月6、7日。

② 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自存有关报告；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76页（书中所记在中共中央6月5日召集的座谈会上，由刘宁一致辞说明中共的基本观点，应有误）；《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487～488页。

共的观点。根据这一方针，6月6日，周恩来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并发表讲话。他说：和平“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①] 翌日的《人民日报》即几乎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专刊。

为了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成员宣传中方的观点，6月8日上午，中国工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在工联理事大会上发言时，全面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表明了与会议总报告不同的认识。刘长胜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不赞成那种不区别战争的性质而笼统地提“赞成不赞成战争，反对不反对战争”的错误论调，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正义的战争也“可以避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合乎实际的。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一些根本原则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如果不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在保卫和平的问题上走入歧途。他提出：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贯坚持冷战政策，坚持扩军备战，制造紧张局势。我们要坚决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揭穿帝国主义的丑恶的原形，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才有可能使冷战不至于发展为热战。对于苏联提出的裁军建议，刘长胜在表示赞同后说：现在有人认为，这种建议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依靠这种建议，就能根绝“战争危险”，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才能出现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着，所谓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不可设想的。世界人民都必须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能用天真烂漫的态度去对待美帝国主义和其

①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1页。

他帝国主义。刘长胜的讲话，引起与会代表的普遍注意，他讲话结束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许多亚非拉国家代表发言表示支持刘的讲话。[1]

与此同时，在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三个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也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尖锐斗争”。中方代表还劝告各国工会代表“和平之路没有什么可走的，不要向资本家乞求和平”；“同帝国主义分子坐在一个桌子旁边仅仅是为了揭露他们”，而同他们谈论和平，就意味着“美化他们，把他们打扮成和平使者”。中方代表还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世界工联书记处面临失控的局面，为此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理事会休会和举行紧急代表大会。经过中方代表的力争，书记处放弃了休会的建议，苏方代表也表示“不同意的各点可以不写”。此后又经中方代表的反复争执，终于达成了中方认为的“比我们设想要好的决议”。会议结束后，刘宁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样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的斗争和把世界工联理事会这个表决机器的指挥棒打翻，在工会会议上还是第一次。报告认为，同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次会议虽然是工会会议，但是将产生深远的影响。[2]

短短几日，中国利用世界工会会议在北京举行之机，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在世界国际组织中继续同苏联的论争，努力获得热衷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斗争的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支持，加强对苏联的压力，争取赫鲁晓夫改变方向，向中国的立场趋同。即如后来彭真所指出的：“为了保卫列宁主义，为了将来到马克思那里作鉴定，我们不

---

① 《人民日报》1960年6月9日

② 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自存有关报告；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25～126页

得不斗争。我们向世界工联谈话不是没有考虑的，不要估计我党中央冒失，找他们谈是为了拖住他。老实讲，当时还没有这样大的雄心，当时听说他们搞党纲，不要他走的太远，为此才写三篇文章，几个月后才找工联谈话。这个问题他们一直攻，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把他们拖住了。这以后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①

可以说，中国通过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的论坛，首次正式对外界说明了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率先在国际社会组织中公开了两党的分歧。

苏联方面就此提出批评说，中国在世界工联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使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会议，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评，不仅如此，还把他们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在苏联看来，中国工会代表对苏共的批评是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一系列委员会的工作中进行的，而"出席会议的有许多其他党的代表，以及非党的工会活动家"。苏联方面认为，中国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的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且遭到了他们的坚决反击。于是中共领导人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分裂"步骤，他们不仅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而且在有非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会人士参加的许多委员会里，批评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这些行动实质上是在公开号召世界工联开展斗争，反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在当代世界发

① 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3～14页。

展的最重要问题上的观点。[①]

应该说，苏方的这种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即曾报告说，中国在1960年6月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会议上，在世界工会联合会这类组织中公开游说自己的主张，反对苏联。[②] 至此，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由党内到党外完全公开化了。

中国工会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的活动及其获得众多国际组织成员支持的情况，无疑将赫鲁晓夫推入了两难的境地，使他不得不面临艰难的选择：或者向中国的立场靠拢，或者背负起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制造分裂的罪名。

莫斯科显然切实感受到了这种压力，试图避免此类尴尬局面的出现。此次会议之后，被激怒了的赫鲁晓夫开始了反戈一击的行动。

其一，苏联方面针对中国代表在会上的种种做法，竭力指责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运中使用缺乏党性的派别活动的手段，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期间中国的举措就是一种拉帮结派的表现。[③]

其二，莫斯科加强了对中国的舆论反击。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之际，苏联国内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直接涉及与中国论战的文章，批评中国教条、“左”倾的错误。这些文章的依据就在于，列宁在他的这篇关于“左派幼稚病”的文章中批评了拒绝在“反动”工会工作或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极端左翼共产主义者，并强调了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妥协的必要性。如6月10日，有舆论宣传称：“目前的左翼分子把实现和平共处、停止军备

①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25～126页；《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普罗祖缅希科夫：《苏中领导人眼中的1960年》，《中共党史资料》第65期，第196页；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等译，三联书店，1982，第174页

② Sino－Soviet Relations，9 August 1960，Fiche 64，Item 255，NIE100－3－60，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Authority and Control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8 August 1961，Fiche 84，Item 318，NIE 10－61，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

③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23～127页。

竞赛、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的政策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国际局势微不足道的恶化都看作是他们片面观点的证据。”两天以后，《真理报》又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翼分子的话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他们的大意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6月23日，《共产党人》杂志则宣称：“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从而“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倾的”。[①]

其二，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进行报复。对于苏联方面来说，刘宁一曾明确表示不把中苏双方对会议总报告的分歧带到公开的会议上去，但是6月5日中共中央召集17国工会党员负责人座谈会，发表不同于会议总报告的意见；尤其是在事先不与苏方通气的情况下，率先在大会上公开这种分歧，并且积极向其他工会代表、工会活动家进行鼓动、宣传，这种行为不啻是一次突然袭击。对此，彭真后来在与苏方会谈时就这次座谈会问题表示：我们同格里申一起拟定了会议参加者的名单。米高扬当即就反驳说：你们邀请他们出席招待会而不是会议。他同时还指出：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你们背着各国共产党，在工会活动家中间公开宣扬你们特别的观点。你们不该这样做，这些问题应该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中央级的会议上进行讨论。[②] 可以说，中国这次在国际组织会议上主动出击的方针，直接导致了此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

---

① 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pp. 18 – 19.

②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45页。

经历了6月初的被动与尴尬，赫鲁晓夫决定要把主动权重新抓回到自己的手里。于是，半个月后，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即如苏斯洛夫所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召开，是由于有北京的世界工联理事会。[1] 这样，中苏双方在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上的斗争转移到罗马尼亚的首都，更为激烈地展开了。

第四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的抗争

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召开之前，6月2日苏共中央向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导人发函，建议利用6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和“确定我们的共同方针交换意见”。对此，除中共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都表示同意。[2] 这时的毛泽东已从U－2事件后赫鲁晓夫立场的变化中看到了中共压力的作用，精神振奋的他很难按照苏共的部署行事，他要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进一步宣传推广中共的理论观点及方针政策，确立起中共的领导地位。

6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王庄约见康生等人讨论苏共的意见，提议改期在11月7日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理由为6月、7月我们有事，不能参加。如果苏方同意，中共则于8月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两党共同起草文件。[3] 两天后，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推迟召开。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常

---

① 《杨尚昆日记》（上），第544～545页。

②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6月2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07、108～109、141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33～234页。

③ 《杨尚昆日记》（上），第509页

委会议，讨论答复苏共中央6月2日来函。10日，他复函苏共中央说：收到你们6月2日和6月7日两次来信，我们完全同意两个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并提出：在罗党三大召开时，各兄弟党代表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根据商谈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做任何决定。毛泽东随即正式建议：将社会主义阵营12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扩大为举行世界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共同讨论有关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像上次莫斯科会议那样，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签署发表共同宣言。会议召开前成立起草委员会，准备宣言草案。[①] 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历史似乎重演了当年毛泽东一再推迟1957年莫斯科会议召开时间的那一幕。

但是，苏共中央在以新的信件向各兄弟党通报与中共商定的意见时，表示在布加勒斯特预先会晤时除不做出决定外，不排除讨论国际问题的意见。各党对此均表示同意。[②] 这实际就为以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如果没有6月初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苏共向中共意见靠拢之势，或许还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阶段，至少中苏两党能够以比较平和的方式，寻找到一个缩小分歧的结合点。但是，中共不仅要在国际共运政党的讲台上树立自己的形象，而且还要在世界国际组织的论坛上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前述中国方面在开辟第二战场时实际对苏联构成的突然袭击之势，改变了事态的走向。

中国工会代表团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苏联的斗争“打翻世界工联理事会的指挥棒”之后，中国方面即注意到了莫斯科的宣传攻势，对苏方可能进行报复这一点已有了思想准备。正在上海的毛泽东读到了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04~205页；《杨尚昆日记》（上），第510页。
②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41页。

一份报告，其通报说6月10日和12日，苏联报刊连续发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40周年的文章，这是当前新的重大动态。报告认为，这两篇文章标志着苏联要从前一时期的辩解转入对中国进行反击，企图缩小中共的影响。他们给中国戴上“现代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压一压与中国有共同点的其他兄弟党。苏联这样做意味着在一个时期内将会与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论争，也有可能出现露骨的公开批评，其目的就是要在其内部和外部，缩小我国纪念列宁诞辰的三篇文章的影响，弥补前一时期威信上的损失。[1]

6月16日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参加罗共三大，其担负的使命就是对赫鲁晓夫进行劝说。所谓劝，即在于说服苏方修正自己的错误。途经莫斯科时，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等人与彭真举行了长达八九个小时的会谈。赫鲁晓夫的意图其实也是一个“劝”字，希望通过会谈，让中共承认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上的错误，避免双方的争吵延续至布加勒斯特。由此，会谈开始后苏方首先提出的就是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问题，指出中国的措施极端危险，违背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苏方责问彭真等人：“你们怎么在寻找盟友反对苏共?”接着便又是提出时代、战争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等当代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总路线等中国内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等。中共代表团则除了做出回答外，重提斯大林、和平过渡等苏共二十大的有关问题。[2] 两党的互相劝说变成一次交锋，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此时在赫鲁晓夫看来，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把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当成共同纲领，认为它已清楚地回答了当代世界发展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11~212页。

② 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26、128~140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1页。

的重要问题。而中共领导人却断言，在国际共运中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弄清楚，并以此为借口，试图推翻莫斯科会议两个宣言的重要原则，这就不仅是对苏共，而且是在同所有兄弟党相对抗了。[①] 于是苏方表示，到布加勒斯特可以继续会谈，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负责人都在那边，可以利用此机会集体交谈一下。[②]

至此，中共代表团已明确估计到赫鲁晓夫有可能利用参加罗党三大的机会，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扩大争论，争取宣传与舆论优势。为了证实这种估计，代表团成员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向苏共联络部等有关方面了解情况。摸底的结果表明，该部正在积极准备，并已通知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苏共干部中也有要开兄弟党会议的传闻。代表团根据这些迹象判断，赫鲁晓夫要在布加勒斯特开会的可能性很大，中共须按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由于这件事还需中央做最后判断和下决心，刘晓受命即日乘飞机回国，向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请示应对方略。而中共中央考虑的结果则是：还得顶，无非毁灭。[③]

罗党三大开幕后的第二天，6月21日，赫鲁晓夫在大会发言中影射攻击中共，说：对于那些教条主义，“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你们的耳朵”。[④] 苏共代表团并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或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分析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开会时发生的事件，对中共关于时代等国际问题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全面批判。[⑤] 这就在兄弟党内部彻底公开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亮出了回击中共的

①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27页。

②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83～84页。

③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83～84页；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3页。

④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4～15页；阎明复：《随彭真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2期，第35页。

⑤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第175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1～522页。

架势。翌日，赫鲁晓夫试图做缓和与中共争执的最后一次努力，再同中共代表团进行会谈，指出中共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展开的行动是派别活动；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但不允许以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苏共。面对赫鲁晓夫继续提出的一系列指责，中共代表团针锋相对，寸步不让。[1] 会谈成了双方的又一次激烈交锋。

事态发展至此，对于中共代表团来说，赫鲁晓夫要利用即将召开的兄弟党会议组织对中共的批判，已是必然之势。因此，客观地说，苏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议上对中共的反击，已不能算作突然袭击。出乎中共预料的实际只是绝大多数党的代表团支持苏共，并且跟随其攻击中共的观点，中共代表团仅获得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明确维护。6月24~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称布加勒斯特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先后召开。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共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以及关于国际共运战略策略问题的错误观点。苏方承认，这次交换意见带有事先准备的性质。会上，各兄弟党意见一致。[2]

会议期间，面对苏共代表团带头围攻的紧张气势，彭真以光荣孤立、舌战群儒的姿态奋力反击。在这场对中共的"同志式的帮助"中，[3] 中苏两党可谓是短兵相接。在24日的会议上，当赫鲁晓夫谈及这次会议就是要看是谁脱离了莫斯科宣言，要"对对表"时，彭真表示，听了赫鲁晓夫的发言，理解了这次会议的性质就是指责中国共产党，并随即反驳说，违背莫斯科宣言的不是中共，而是苏共，应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对表"；同时还回应批判中共最激烈的保共领导人，

①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2页；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27页。

②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41页。

③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3~75页。

反问保共机关报把艾森豪威尔叫爷爷是不是符合莫斯科宣言的精神。26日51国兄弟党会议即将结束时，面对赫鲁晓夫在总结讲话中对中共的全面批驳，彭真予以反击，并指责其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完全破坏了国际准则。[①] 争论中双方的用语都很尖刻，颇伤和气。不过，根据参加会议的苏共代表所言，会上，中共代表完全有机会解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彭真发了三次言，却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避而不谈，只是多次重复——按他的话——代表团来布加勒斯特之前毛泽东给他交代的那些话，指责苏共中央信函的全部内容“都是对中共的诬蔑”，却同时又补充说，他没读过整个信函。[②]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一些兄弟党提出了发表公报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支持。这时，不论幕后是否有苏共的操纵，赫鲁晓夫都已把中共推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要么在公报上签字，要么就背负起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罪名，可谓报了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陷入类似被动境地的一箭之仇。会议并根据各兄弟党的委托，由苏联共产党倡议秋天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可以说，赫鲁晓夫又刻意借此把国际共运中兄弟党大聚会的倡导权从毛泽东手里夺了回来。

中共中央此时还不能“毁灭”，不愿意成为各兄弟党的对立面，不想同赫鲁晓夫把关系搞僵，“还要留有余地拉他一把”，故指示中共代表团6月24日在反映赫鲁晓夫观点的会议公报上签了字，但同时又布置他们于26日散发了一个书面声明。声明一面指名批评赫鲁晓夫，说他破坏了会谈前中苏两党达成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滥用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

---

① 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7页；阎明复：《1960年中苏关系大转折》，未刊，2007年1月20日；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40～341页。

②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43页。

于人，中共在马列主义一系列基本原则上同赫鲁晓夫有分歧，国际共运的命运绝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中共决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首次在国际会议上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一面表示：中共同赫鲁晓夫的分歧，从中苏两党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①

只是，由于会谈公报表面上是经兄弟党一致提议的产物，中共关于苏共在该问题上进行突然袭击的指控，实际也就背上了牵强和不公之名。毕竟国际共运中党际关系的原则之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世界性的兄弟党会议，不能一党说了算，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也不能由两个主要大党包打天下，两党事先达成的协议就可以否决掉其他党的建议。

会议结束后，6 月 28 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的同时，重新全文刊登了 1957 年的莫斯科宣言，以示公报观点与宣言之间的差距。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借强调宣言“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等论述之名，阐扬中共关于国际问题的认识，批评布加勒斯特公报。毛泽东还提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议论虽针对反帝而发，但字里行间已溢出一股与苏共的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豪情与气势。在他看来，“最早笑人的人是不妙的。我们的方针是：不怕孤立，后发制人”。②

中共表面上签署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实际继续与苏共叫板的姿态，激怒了赫鲁晓夫，使他迈出了不理智的步伐，决定利用经济手段，压中国屈服。

---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543 ~ 1544 页；《杨尚昆日记》上，第 514 ~ 515 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 75、100 ~ 103 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 85 ~ 86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第 226 ~ 227、254 页。

第五节　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将从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撤完。中国政府复照请求苏方重新考虑此项决定，苏联政府拒绝，[1] 以此，率先将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一时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呈现分裂的趋势。

此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7月13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报告了导致赫鲁晓夫决心撤退在华专家的直接原因。首先，中共违反与苏共关于不在两党之外暴露双方分歧的约定，“走上了公开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赞许的共同路线的道路”，“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其次，中共采取宗派主义手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拉拢他们“反对苏共的路线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孤立苏联共产党”。再次，中国领导人企图利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机会，“在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最后，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举行的中苏两党代表团莫斯科会谈及赫鲁晓夫与彭真在布加勒斯特的会谈中，面对苏共关于中共搞派别活动的批判，“中国同志对所提出问题的实质不做正面回答，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同时又怀疑我党原则立场的正确性”。

对于“中共领导的主要错误”问题，科兹洛夫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

---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35～236页。

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但是，当事情涉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的时候，当我们处在中共领导以其观点公开对抗我们整个运动的事实面前，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就这些问题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报告接着对布加勒斯特会议进行了总结，认为这次会议“对国际共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更明确地揭露了中国同志们的错误立场，第二，各兄弟党表现出一致意见”。①

不过，点燃赫鲁晓夫愤怒炸药的导火索事实上还是上述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表现，及其在会议结束后所摆出的强硬姿态。赫鲁晓夫于会下和会上精心组织的对中共的批判完全没有收到他所期望的效果，不仅中共不肯“低头认错”，而且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竟然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起来顶撞苏联老大哥，使赫鲁晓夫陷入尴尬境地。② 面对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中共通过发表社论宣示批判会议公报的立场，公开与苏共叫板的举措，赫鲁晓夫于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要挟或惩罚中国人。科兹洛夫当然不能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赫鲁晓夫的沮丧和气急败坏，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在对布加勒斯特会议进行总结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莫名其妙地提出了在华苏联专家问题，说：“由于中国开始‘大跃进’和采取其他措施，实际上不再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苏联专家在那里遭受批评，似乎他们的观点保守，他们的许多建议被束之高阁。此

---

①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40～141页。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另一个文件讲述了1959年以来中共加紧与各国共产党接触，试图“排挤苏共并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活动情况。见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共与兄弟党的联系，1960年9月10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05～213页。

② 详见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1～86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6～300页。

外，我们对这样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中国人开始用他们错误的立场、精神影响苏联专家，这自然引起了我们专家的愤怒，他们已向莫斯科通报了这种情况。”因此，苏联政府“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决定从中国召回全部苏联专家。[①] 殊不知苏共中央决定采取的这个措施与科兹洛夫正在谈论的主题——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统一，恰恰是自相矛盾的。

就这样，1960 年 7 月 16 日上午，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要求面见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因陈毅不在北京，下午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接见了他。苏达利柯夫递交了关于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照会提出：“近来，中国方面开始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执行明显的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这种路线同条约义务和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都是不相容的。”照会在列举了一系列中国方面不信任、不尊重苏联专家，调唆他们反对苏联党和政府的事实之后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必须声明，中国方面的上述行为是对苏联不友好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同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相矛盾的。”“中国方面的这些行为，实际上已使得苏联专家不能继续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受托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其中包括军事专家和顾问，根据他们自己的愿望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召返回祖国。”“苏联政府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会正确地理解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②]

---

①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9 卷，第 145 页。与此相比，赫鲁晓夫从阿尔巴尼亚撤退专家和拆除设备的行为，更具有单纯惩罚的性质。参见 Mark Kramer,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 - Soviet Split, 1955 - 1964,” paper delivered at a conference entitled “The Cold War in Asia” (CWIHP an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January 1996), pp. 13 - 14。

② 外档，109 - 00924 - 01，第 11 ~ 16 页。这一照会最早公布，是以英文发表在美国《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 Issues8 - 9, Winter 1996/1997, pp. 249 - 250）上的，不过文件日期标明是 7 月 18 日。考虑到该档案是译自德国档案馆收藏的俄文文本，所以这里标明的时间并不是苏联政府向中国递交照会的时间，而是苏联将照会分发给各国共产党中央的时间。此外，刘晓在回忆录（《出使苏联八年》，第 89 ~ 90 页）中几次把这一时间说成是 6 月 16 日，则显然属记忆错误。

向章汉夫递交照会后，苏达利柯夫向莫斯科通报说：他有这样一种印象，“对于章汉夫来说，照会完全是出乎意外的。章汉夫和递交照会时在场的中国外交部其他工作人员，怀着焦急不安和张皇失措的心情听完了照会的内容”。[1] 章汉夫确实感到事情很严重，所以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办公室报告了情况，并说照会全文正在抓紧翻译，晚上即可送出。[2]

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反应。7 月 18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几段话：“1917～1945 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3] 周恩来后来则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苏联全面撤退专家，“这是把党的原则上不同的意见、理论思想上的一些争论引到两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来了，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违背原则的事情”。[4]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感到愤怒，并认为苏联的指责毫无道理，但还是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7 月 31 日，章汉夫会见苏达利柯夫，并递交了中国的复照。复照指出：“中国政府认为，苏联政府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损害了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复照于驳斥苏方照会所提出的种种指责之后声明：“苏联政府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不论从法律上、道义上、政治上说，都是无法辩解的。被召回的苏联专家，

---

① АВПРФ，Ф.0100，оп.53，д.11，п.454，л.240，转引自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95。

② 外档，109－00924－01，第 9～10 页。

③ 《党的文献》1996 年第 1 期，第 10 页。

④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545～1546 页。

绝大多数在华工作合同尚未期满。现在突然把他们撤走，这显然破坏了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有关协定和合同，必然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建设工作造成一些损失，并且带来一些困难。这种片面破坏协议的行为，在一般国际关系中也是罕见。”何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明确规定了‘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的神圣义务。因此，这就更加重了苏联政府这种行为的严重性”。“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如果苏联政府的回答仍然坚持将全部苏联专家召回，中国政府将感到极大的遗憾，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条件下尊重苏联政府的意见。”[①]

中国当然知道照会不过是一种外交程序，不会有任何作用。所以，未等苏联答复，8 月 1 日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安排专家撤退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我们应当肯定，在我国的苏联专家绝大多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热情帮助的，对我国人民是友好的。为了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我们必须做好专家的撤退工作。各部门、各地区和各聘有苏联专家的基层单位，对即将返国的专家和家属应当尽一切可能热情送别，充分表达我国人民对苏联专家的谢意，善始善终地搞好和他们的友谊团结。应当把这次送别工作看成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好了，这几千人就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的宣传员和中苏人民友好团结的活生生的见证者。因此，各部门、各地区和各基层单位都应当指定主要负责同志一人挂帅，配备必要的助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把这项工作做好。”为此，国务院还详细规定了十点注意事项。[②]

鉴于中方在安排送别苏联专家的工作中向他们宣读了苏联和中国

---

① 外档，109－00924－02，第 11～32 页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3/43/208，第 1～8 张；外档，109－00927－01，第 1～5 页。

的照会,[①] 8 月 4 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在与陈毅的谈话中，指责中方各聘有苏联专家的部门向专家宣读照会是不合法的、不寻常的和不友好的，代替了苏联机关的职权，想在专家中散布对召令的怀疑，其结果只能使事情复杂化；苏方照会是绝密文件，宣读出去容易泄露，被外国间谍利用；苏方对此很气愤，提请中方注意并请有关部门停止这一行动。陈毅反驳说：撤退专家是苏方单方面制造的政治性事件，是震动全中国、全世界的大事。苏方毫不顾及对兄弟国家的条约、合同义务，使中国遭受严重损失是小事，对两国友好关系造成伤痕是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果你们不突然撤退专家，那就根本不会有读照会一事。专家是当事人，我们宣读照会是为了把真相告诉他们，即苏方要撤退专家，我们极不愿意，我们很需要他们，但挽留无效，别无其他目的。将来两党会谈、兄弟党会谈时还要谈，这样的大事是瞒不住的。总有一天，中苏政府要被迫交代这件事情。你们不责备自己单方面决定撤退专家这种决然的、不留余地的行动，反而责备我们读两个照会。你们对我们这种必要的解释工作如此指责，而对自己方面那些引起了严重后果的行动却无动于衷，我感到奇怪。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你们片面决定停刊友好杂志，继之又片面发动撤专家的严重政治事件，我不知道你们的第三个行动是什么，望你先打一"招呼"，以免突然。有些事，我一直不愿讲，例如，你们大使和代办在北京都由部长、总理、少奇同志、毛主席接见，而我驻苏大使在莫斯科见副部长就很困难，只能见一些司长、副司长，中苏友好竟下降到如此程度！谁接见，这是小事，但说明有不愉快的事。虽然我们痛心，但友好还要维持。两国间根本没有根本性利害冲突，我们应比弟兄还亲，强大的帝国主义还摆在两国面前，如

---

① 肖向荣报告了 8 月 4 日上午各单位分别向军事专家宣读照会的情况：当时接受听的 102 人，拒绝听的 11 人，在外地来不及赶到的 71 人。多数人表示，这是两国两党的事，可经党和政府解决，并说中苏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苏联使馆得知此事后，立即打电话通知外地专家拒绝听，并分别召集各组专家开会。外档，109－02085－07，第 25～26 页。

果真的有了战争，中苏还要一起应付。我们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方面、在国际问题上有些分歧，可以辩论，但不能伤同志友谊。在撤退专家问题上，我们还等待着苏联政府的回答。[①]

8 月 26 日，契尔沃年科向章汉夫递交了苏联的第二个照会，即对中国照会的复照。在这份篇幅更长的照会中，苏联把召回专家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中方在专家中宣传同苏共立场相矛盾的观点，"企图使他们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立起来"。同样，向苏联专家宣读照会，也是"打算在他们之间散布某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立场的怀疑"。因此可以断定，"中国当局在这个问题上走上了挑拨（专家）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恶劣道路"。照会仍坚持中国有关方面对苏联专家采取了"带有很大成见、偏见和不信任的态度"，轻视和粗暴地对待他们的建议，从而使这些专家感到委屈，并提出离开中国。因此，苏联召回专家一事中国方面应负完全责任。契尔沃年科表示，中苏之间出现的分歧问题一定要解决，"这是我们两国、两党、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章汉夫说：中苏之间存在的原则性分歧，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中苏是盟邦，必须团结。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为了世界革命利益，我们必须团结。中国党、政府、人民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坚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②]

如前所述，苏联撤退专家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在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共的"顽固不化"恼羞成怒，试图以此迫使中共承认错误，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向莫斯科屈服。所谓对专家本人的态度及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恶化只是借口而已。这一点，即使是苏联专家本人都看得出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曾为在华苏联专家做了 3 个小时的报告，特别谈到了

① 外档，109－02085－07，第 4～8 页。
② 外档，109－00925－01，第 1～20 页。

苏共中央1960年7月全体会议所做的决议，以及科兹洛夫的报告。出席报告会的化学专家克洛奇科回忆说：契尔沃年科的报告表明，苏联照会之所以言辞激烈，苏联专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苏联对中国国内和对外政策不满，借撤回技术援助向中国施压。[①] 当然，苏联照会中提到的某些事实是存在的，许多苏联专家在“大跃进”运动中确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工作，甚至他们本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照会的说辞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一种官方行为，坚持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意造成的。后来苏联官方还不断重复这种说法。[②]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中苏之间存在分歧，中共领导人也对莫斯科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刻意冷淡苏联专家和限制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恰恰相反，针对一些机构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尊重专家、不听从专家意见的情况，有关政府部门一再发出指示和通知，努力改善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③] 其实，1960年夏天之前，苏联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和书记处的所有讲话中，没有一次提及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问题，尽管此前从中国不断地传出消息说：专家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普遍存在不遵守苏联生产技术规则的现象，以及对苏联的技

---

① Mikhail A. Klochko, Translated by Andrew MacAndrew, *Soviet Scientist in Red Chin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Publisher, 1964, pp. 181－183.

② 如苏斯洛夫1964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就指出，苏联政府多次要求中国当局为苏联专家的工作创造正常的条件，但是对此的答复是，中国当局开始更加不友好和侮辱性地对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看作“保守分子”，并千方百计地诋毁苏联的经验和技术（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344页）。还有苏联著作指出，破坏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的协定绝不是地方行政部门的专横妄为，而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有意识贯彻实施的方针的结果，这一方针反映了中国的总的政治路线（*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Москва, 1977, с. 269）。为了印证这种说法，照会对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现象进行了夸大其词的渲染。

③ 吉林省档案馆，1/1－13/51，第6～11页；辽宁省档案馆，ZE1/2/413，第61、80～82页；福建省档案馆，136/12/235，第14～15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3/12/21，第16～17页。

术和经验提出了怀疑，等等。[1] 这也表明，赫鲁晓夫希望通过全面撤退专家来压服或惩罚中共的想法是在1960年6月才产生的，而中国在专家工作中的问题只是一个借口。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国方面对于苏联可能要进行报复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想到赫鲁晓夫真会把事情做得如此绝情和不顾信义。中苏双方通过不断往来的政府照会，一面互相指责，推卸责任，一面强调各自的维护两国团结的立场。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撤退专家的进程丝毫没有停顿。到8月底，在华苏联专家及其家属全部撤退完毕。[2] 不过，中苏之间关于这一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的争论还未结束。

9月21日，罗贵波副外长向苏联驻华使馆递交了中国政府的第二个照会。中国政府表示拒绝接受苏联的指责，并列举详细事实反驳了苏方的指责。照会指出，苏联政府说召回专家的决定是根据他们的意愿做出的，但在华专家从未有人向中国政府或有关单位提出过类似的要求，苏联使馆也从未反映过这方面的意见。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中方在专家中宣传了同苏共立场相矛盾的观点，而是苏联政府想利用召回专家的做法向中国施加压力。"事实无容置辩地说明，苏联政府对片面破坏协议的行为在法律上、道义上和政治上所负的全部责任，不管大使馆来照如何辩解，都是无法逃避和推脱的。"[3] 苏达利柯夫表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需做仔细研究。使馆全体工作人员都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友好。现在邓小平同志率领代表团在莫斯科，可以在更高级水平交换意见。"[4]

---

①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 – 1960годы），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НИИХ СПбГУ，2000，с. 149 – 150.

② 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运局1960年/479，第1～5页；国际联运局1960年/139，第34～36页

③ 外档，109－00925－02，第24～42页。

④ 外档，109－02085－04，第18～19页。

11月6日，苏联使馆递交了关于撤退专家的第三次照会。照会进一步列举事实重复以前对中国的指责，认为苏联专家是被迫撤离中国的，并希望中国方面对于召回苏联专家的真正原因做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对这个问题采取合理和客观的态度将有助于发展和加强苏中关系”。双方在递交照会的会谈中，继续进行了长时间争论，都谈到这件事伤害了两国的关系和两国人民的感情，但都为自己的政府辩护，要对方对此承担责任。[1] 此后，中苏双方均表现出和解的意向，并在莫斯科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举行了高层会谈。[2] 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10日，外交部向陈毅和周恩来提出了对苏联第三次照会的处理意见。意见说，对苏联照会的复照已报总理审批，尚未发出。“考虑到莫斯科兄弟党会议后出现的新情况”，外交部主张对苏方第三次来照暂时不予答复，将来有必要时再复。“理由是：（1）对苏方第三次来照我代表团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已经给予了驳斥；（2）如现在再予驳斥和当前两党两国关系的气氛不太吻合；（3）第三次复照主要是谈是非问题和责任问题，估计苏方是不会承认错误和承担这一责任的，如果我们发出第三次复照，苏方还会来第四次照会，如此纠缠下去，在目前亦无必要。至于因撤退专家引起的后果问题可以在将来的谈判中解决。同时，我暂不复照并不等于问题的了结，将来有必要时还可再去复照，主动在我。”[3]

至此，中苏之间关于撤退专家的争论暂时平息了，直到三年后在中苏政治大论战的高潮中才翻出老账，旧话重提。至于说到苏联全面撤退专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过去似乎估计过高。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官方过分强调了苏联撤退专家在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中的作用。实际上，从1957年起，在经济援助领域的苏联专

① 外档，109-00926-01，第10~22、1~9页。

② АПРФ，ф. 3，оп. 65，д. 610，л. 100-120. 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有关情况，详见后文。

③ 外档，109-00926-02，第54~55页

家就开始逐渐减少了。如果说专家撤离造成的困难，那么主要也是在军事工业系统，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的是国防工业，[1] 在这方面聘请的苏联专家也最多。根据苏联驻华使馆 1960 年年度工作报告中引用的数字，截至 1960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的 44 座城市和 34 个部委系统中，有 1292 名苏联专家，其中在各部委工作的经济专家共计 944 人（一机部 467 人，二机部 252 人，冶金部 101 人，水电部 60 人，化工部 37 人，地质部和地质总局 27 人）。需要强调的是，在从事经济建设的 1150 名苏联专家中，80% 以上的人在国防企业或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委（如一机部、二机部）、企业和科研机构中工作。而在煤炭部、石油部、农机部、建设部、轻工部、农业部、农垦部以及铁路运输和通信等部门，都分别只有 1～7 名苏联专家工作，在水产部、粮食部、纺织部等系统，则已经没有苏联专家了。[2] 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说，苏联专家的撤离有一定影响，但造成 1960 年代初经济滑坡和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自己的政策失误，而与苏联撤退专家没有直接关系。

赫鲁晓夫撤退专家的粗暴行动，本意是借撤退专家打击中国，警告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伤害的却是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对苏联本身也并无益处。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别人，而是苏联的外事机构。召回专家的想法首先在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受到了冷遇。远东司认为这样做会被中国人看作施加政治压力。于是，他们打算将关于这件事的几页公文束之高阁。一位副司长将照会草稿连同所有与此相关的文件

---

① 根据 1956 年 1 月 15 日李富春交给赫鲁晓夫的关于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ЦХСД，ф. 5，оп. 30，д. 164，л. 3－52），1950 年代下半期，中国领导人确定的优先需要苏联援助的部门是国防工业和原子能工业。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划，在中国修建的 104 个国防企业中，由苏联设计和援建的有 30 个，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上马的国防工程项目 141 个，所拟定的让苏联帮助设计的 104 个，占 74%。参见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с. 90，94－96

②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с. 128－129.

锁进了自己的保险柜，指望过上一段时间领导人就会冷静下来。然而，他们等到的却是上级领导的催问和呵斥，于是保险柜不得不打开。当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接到撤退专家的通知时，也感到非常"震惊"。他向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认为"撤退专家是违反国际公约的"，如果必须结束援助中国的工作，至少也应让专家留下来直到合同期满为止。[①] 在苏联国内，也有许多官员认为这是一种在感情冲动下形成的外交政策。[②] 曾任驻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就在国内正式发表意见，反对苏联撤走专家。[③] 时任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的贾丕才回忆说：一些头脑清醒的活动家曾试图让人们注意，赫鲁晓夫在不久前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曾批评斯大林从南斯拉夫撤回专家，而现在他本人又这样做，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嘲弄。但是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④]

正如有些俄国学者批评的：撤退专家并非出于需要，而是赫鲁晓夫的毫无理智的行为，这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甚至成为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⑤] 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曾经评论说：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其理由也是站不住脚和含糊其辞的，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使得中苏关系走到了无法恢复的地步。[⑥] 不管怎样，到1960年底，在中国大地上只剩下一名

---

① *Брежнев А. А.* Китай: 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8, с. 67 – 68. 美国学者陶伯曼1993年8月对契尔沃年科本人的采访证实了这一点。见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Versus Mao: 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 – Soviet Dispute," *CWIHP Bulletin*, Issues 8 – 9, Winter 1996/1997, pp. 243 – 244.

② 在笔者参加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北京，1997年10月）上，原在苏共中央有关中国事务部门工作的杰柳辛和库利克教授也都讲到过这种情况。关于苏联干部反对中苏分裂的情况，还可见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第201页。

③ 沈志华采访李越然记录。

④ 《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85页。

⑤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с. 297.

⑥ 罗伊·A. 麦德维杰夫、若莱斯·A.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邹子婴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第83页。

苏联专家了。[①]

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由这些专家维系和传递的中苏友谊也随之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人们的思考和回忆。

可以说，中国方面对于赫鲁晓夫撤走专家这一极端行为的反应始终是比较克制的。毕竟这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周边环境恶化，尤其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经济形势恶化的严峻局面。中共实际陷入了一种对苏政策趋向硬还是软的选择的困境：一方面，赫鲁晓夫挥舞经济武器对中国施压的行为，要求一贯不畏强权的中共领导人起而对抗压力；一方面，周边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险恶的状况，又要求中国尽可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正如周恩来所言：这场斗争“比对帝国主义斗争跟民族主义斗争麻烦，这个就是轻是不行，重要重得适当”。而对于毛泽东来说就是：既要“硬着头皮顶住”，又要“留有余地”。[②] 于是，一种稳定中苏关系的“暂栖身”策略出台了。而中国在处理苏联单方面撤走在华专家问题上所表现的冷静与温和，实际就是这种对苏让步方针的结果。

第六节　经济困难背景下的短暂缓和

1959 年初以后，中国的周边环境日趋恶化。东南面：1959 年 2 月，美国支持老挝亲美派内阁关于不再受日内瓦协议约束的声明，扬言可向老挝派出军事使团；年末，印尼扩大排华活动；翌年初，美国

---

①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c. 159. 在 1960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短暂的缓和，聘请和派遣专家的工作有所恢复（《聂荣臻年谱》下卷，第 764 页），但人数很少　来华苏联专家 1961 年 9 人，1962 年 10 人。见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 – 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 – 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65，c. 49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546 ~ 1547 页；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9，第 21 页

在加强介入南越的同时，又通过南越和泰国加紧对柬埔寨施压，侵犯柬的领土和领空。南面：在1959年初西藏少数上层分子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发动叛乱后，中印之间爆发边界冲突。东北面：1960年初日本岸信介政府与美国重签军事同盟条约《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美国试图组织由日本、韩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组成的东北亚军事集团。[1] 同期，国际上还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周恩来说是“西风总还要反扑。现在的特点是从西方搞起了反华宣传”。[2] 毛泽东则指出：“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反华的风潮是从几个方面来的，一是美帝，二是印度尼赫鲁，三是南斯拉夫铁托，四是兄弟党中的右倾机会主义。”[3] 总之，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了。

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则随着三年“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呈现捉襟见肘之态。超越实际的跃进行为所导致的恶果已经显现。进入1960年后，主要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尽管是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决定，实际在认识上却并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1961年计划的方针仍然是在“八字”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结果是这一年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除粮食等少数产品略有增加外，多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城乡居民的粮食、食油、猪肉、棉布等的消费量持续减少，更加剧了吃穿用的紧张。[4] 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不断加剧。

与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使中国经济建设的困难雪上加霜相应的是，中国由于外贸收购和出口计划完成较差，而进口计划完成进度较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43、63、33、50、70～72、75～76、25、13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77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4页；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8，第28、30～40页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84～887、892～893、899页。

快，造成国家外汇收支出现很大逆差，导致对外欠账增加，其中对苏欠账截至1960年12月31日，已达12.81亿元，按1961年新的汇率计算，相当于2.88亿卢布。[1] 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滑坡，令中国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了一定的困难。[2] 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中国方面不得不指示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60年10月31日通过苏联大使转递一份声明，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分期5年偿还对苏债务；重修已签订的1961年以及而后数年供应苏联货物（包括设备）的合同；撤销中苏互相供货的合同草案；暂停生产苏联订购的设备等。[3]

国际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困难，对苏欠款欠货，严峻的现实，使得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研究对苏政策时，不得不权衡利弊，顾及眼前利益。正如毛泽东反复强调和赞同的一种认识："国际问题的解决决定于做好国内工作。要战胜修正主义，既要靠政治，也要靠经济。"[4] 周恩来则指出：中苏两党两国还是要"团结高于一切"，"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5]

由此，毛泽东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依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按照周恩来的解释就是，苏联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所以问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赫鲁晓夫仍是半修正主义，可以把坏事想足，但不能超过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错误的内容，只能讲大的节目，大的问题，引导苏共注意原则性、根本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512～515页；*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с. 253－254。

② 《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

③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с. 253－254.

④ 《杨尚昆日记》（上），第518～51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92页。

⑤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32页。

性的问题。苏共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轨道。两党两国的关系总是会雨过天晴的。[1]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24字方针，其最终目的是争取两党两国重新团结起来。[2]

这时，在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负责具体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国家利益的分量更重一些，落实24字方针的重点实际被放在了“后发制人、留有余地”上面。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困难较大，又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以必须争取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利用中国的困难，伙同蒋介石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也非与苏联改善关系不行，中苏关系改善了，美国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犯的危险性就会减弱。稳定同苏联的关系，争取改善与加强这一关系，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战略意义。因此，要促进中苏关系迅速好转。搞好中苏友好团结工作，是今后的方针，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关于中苏争执的问题，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结果。中共的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3]

于是，中共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实现与苏共团结的方针，有了更多的灵活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开始显示出一种妥协、让步的色彩。

苏联方面注意到，从8月起在中国开始出现了强调和平共处政策的势头。周恩来8月1日在瑞士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开了这个头，他表示，中国愿同各国和平共处，主张亚太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把整个地区建成没有核武器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91～293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40～341、344～345、342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37页。

③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3～10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40页

的地区。[1] 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这种新的宣传动态，介绍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中国报刊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言论，并特别建议苏共中央将刘宁一不久前在东京第六届国际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上的讲话与其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讲话加以比较，指出，两个月前刘宁一与格里申会谈时还说"关于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言论只能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它排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可能性"，而这时的他却在强调"中国人民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愿意""同它实行和平共处"。[2] 与此同时，中国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强硬论点也开始有所松动，8 月 25 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作家斯特朗时表示：我们如果能把战争制止，我们还是要争取制止战争的。[3] 此后至莫斯科会议召开，中共在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会谈中，尽管争论得十分激烈，但从会谈的结果看，中国方面的妥协、让步方针，也是十分明显的。

是年 9 月初，中苏两党决定，在莫斯科 81 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双方先举行会谈。据此，9 月 17 ~ 22 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同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进行了 5 次会谈，双方发言时间共 17 个小时，表面上仍然纠缠于一些历史旧账，相互指责；实际都在侦察，相互摸底。[4] 接着，10 月 1 ~ 22 日，由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和 14 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展开工作，为 11 月份的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做准备。邓小平再次率领中共代表

---

① 《周恩来年谱 1949 ~ 1976》中卷，第 337 页。

②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9 卷，第 183 ~ 185 页。

③ 《周恩来年谱 1949 ~ 1976》中卷，第 343 页。

④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14 页；*CWIHP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 172 – 173；《杨尚昆日记》（上），第 547 ~ 548 页

团参加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对苏共提出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和告世界人民书草案等两个文件进行了讨论，围绕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

讨论中，苏共代表团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使起草委员会有破裂之虞。而中共代表团的与会方针是一定要在筹备会上达成协议，使81国兄弟党会议能够开成开好，以中苏团结为核心，形成国际共运团结的新局面，并在这一形势下逐步改善中苏关系。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代表团要利用这次会议抓团结旗帜，对苏联采取和缓方针，策略要灵活些。因此，有必要主动做出一些让步，这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苏方还是想达成协议的，只要我们灵活些，就不会形成僵局。他们于是决定：主动向苏方透一点底，使他们知道我方愿意在互谅互让、顾全大局之下，和苏方共同努力，使筹备会议达成协议。在谈判中，我方也可以暗示苏方哪些可以协商互相让步，达成协议，哪些可以达成折中方案。对于赫鲁晓夫，到一定程度时要主动采取和缓态度，对他略让些步，给赫鲁晓夫面子，让他也做出让步。[2]

而这时的26国起草委员会，已不是对苏一边倒的局面，日本、朝鲜、印尼、越南以及阿尔巴尼亚和澳大利亚等几个党，基本与中共意见一致，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时被孤立的形势已不复存在。[3] 特别是赫鲁晓夫在第十五届联大上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裁军等问题与美国代表激烈冲突，苏美关系已降至冰点。[4]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与中国恶化关系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此前他使出撤专家的经济杀手锏，初衷只在于磨去中国的棱角。当中共摆出一副灵活身段时，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37～238页。

②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99～100、97～99页。

③ 《杨尚昆日记》（上），第568、569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310～311页；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第210页

赫鲁晓夫有了面子，自然也愿意以退为进，力求搞出一个可以通过的文件。

这样，经过激烈的辩论，如邓小平所言，起草委员会就草案的95%达成了一致意见，[①] 只留下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等几个问题，到11月举行大会时解决。[②]

此时在中国国内，一方面是舆论导向、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有了更多的灵活性。《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开始强调靠发动战争推进革命是根本不可设想的。如果这样，就要引起世界大战。反帝反战力量团结起来，就有可能制止或推迟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革命不能输出，要靠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国家制度。陈毅则在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国际共运只能以苏联党为中心，不能以别的党为中心。铁托想做中心，是不行的。中国也不能够做这个中心。根据陈毅的谈话，中苏之间的分歧已不是原则性的根本分歧，中苏两党“总的政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具体政策不一定一样”，“所谓的分歧就指这些”。中共“永远站在苏联方面”。[③] 一方面则是对苏联在国际活动中的一些做法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外交部指示各驻外机构，于外交场合谈到赫鲁晓夫等兄弟国家领导人在十五届联大的发言和苏联关于裁军等问题的建议时，既不要故意表示冷淡而假人以口实，也不要对他们过分捧场而给人增加幻想。对于实现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等错误观点，不主动评论；如有人对我攻击必须顶回，但要留有余地；区别对待，不做无条件的反对，而做有条件的支持。[④]

到世界兄弟党会议召开前夕，中国方面这种缓和与苏联关系的姿态表现得更加明确了。11月5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副

---

①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42～243页。

② 《杨尚昆日记》（上），第571～573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37～238页。

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X1/27/224，第77、79～85、113、119～126页。

④ 吉林省档案馆，77/6/1，第144～145页。

主席刘少奇抵达莫斯科，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实际重复了苏共关于战争可以避免的论点。11 月 7 日毛泽东还亲自出席了苏联驻华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1] 而与此相对照的是，会议前夕，苏共却向与会代表团散发了一份批评中共的 6 万余字的信件，这就挑起了争论。[2]

1960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 日，世界 81 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其间，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争。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共代表团须坚持的三条原则：修改关于战争的论点，不写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不写派别活动问题，否则中共拒绝签署会议宣言。在 26 日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刘少奇要求从草案中删除的三点则是：关于派别活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意义以及民族共产主义。[3]

这些问题中，最关键的实际还是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中共此时已认识到，在国际文件中，不能对某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做出全面肯定，奉为共同准则，1957 年宣言起草时中共在这点上的让步，现在看来是犯了错误，所以要予以纠正。而赫鲁晓夫则认为当年的莫斯科宣言对二十大的意义肯定得不够，因此苏共二十一大可以不写，但这次的文件必须写入：世界各国共产党一致赞成苏共二十大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的正确分析，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都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4] 在苏共领导人看来，莫斯科宣言中写上了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而声明中对此只字不提，这就意味着二十大的决议是错

---

① 《人民日报》1960 年 11 月 6、8 日。

②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17～18 页。

③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第 370 页；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9 卷，第 240 页。

④ 《杨尚昆日记》（上），第 610～611 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 182～184 页。

误的，意味着1960年莫斯科声明要谴责二十大。对此，各兄弟党会不理解；敌人则会利用这一点去达到他们阴险的目的。至于派别活动，苏方解释说是针对所有党包括苏共而言；民族共产主义的指责，矛头则是对着南斯拉夫的。[①] 双方各不相让，会议一时僵持不下。

为了推动会议的进程，刘少奇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主张中方可以多做一些合理的让步，争取互相让步，以达成折中协议，并明确示意赫鲁晓夫，81国党的会议开成功了，也就是中苏关系改善的转折，因为有了共同的基础。经过反复磋商，中苏两党最终达成妥协：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评价照抄1957年莫斯科宣言；取消派别活动的提法；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问题上加进了中共的观点；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说法也缓和了许多。[②] 刘少奇并同赫鲁晓夫达成协议：先不要公开吵架，而是先经过中苏两党内部协商，然后跟主要兄弟党协商，之后才拿到群众会上去。[③]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与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等人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争论，使两党两国关系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2月1日，大会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在签字仪式上，赫鲁晓夫激动地和中共领导人拥抱了好几次。[④]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莫斯科声明的签署，似乎是中共主张大获胜利，逼得苏共不能不退让，显示了中国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

---

①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40～242页；《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85～686页。

②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1～102、96～97页；《杨尚昆日记》（上），第624～626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9～20页。

③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以下简称《现场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第22页。

④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20页；《杨尚昆日记》（上），第627、628～629页；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6页。



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1960年）

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证明了国际共运的大事，没有中国、中共的同意，是难以办通的。[1] 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赫鲁晓夫在被迫承认中共对国际共运的决策拥有真正发言权的同时，也把国际文件中再次高度肯定苏共二十大同莫斯科是国际共运的中心这一点明确联系到了一起。

从表面上看，莫斯科声明是一份调和的文件，中苏双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强调和宣传，实际上却是中共做出的让步更大，而且是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所做的实质性妥协的基础上，再做妥协。尽管声明只是重复宣言中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性质却是在重申二十大方针政策对国际共运的指导意义，巩固苏共纲领作为国际共运共同准则的地位。

莫斯科声明指出了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声明明确阐述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立场，在评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的同时，强调能

①《杨尚昆日记》（上），第624～627页

够粉碎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现实力量已经形成，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声明提出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和各国的民族利益，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强调“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同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它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声明重申：1957 年莫斯科宣言仍然是整个国际共运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①

可以说，这个声明的核心贯穿的是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而其特别重申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主旨在于突出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与各国民族利益的统一性，以及阵营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党际关系重于国家关系的内涵，进而为重新塑造苏共是国际共运领导者、莫斯科是国际共运中心的形象铺平了道路。12 月 7 日，《真理报》即以《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为题发表社论，宣称：这次会议仿效 1957 年会议的榜样，再次指出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意义。会议对国际共运中心的这一崇高评价，将更加鼓舞苏共为共同的斗争做出新的努力。会议的声明是整个国际共运的纲领性文件。②赫鲁晓夫这时实际已认可了“以苏共为首”的提法，莫斯科也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开始明确以中心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共运舞台上了。

其实在声明签字前的 11 月末，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曾说，这次莫斯科会议就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再版、连续，就是对中国党进行斗争的一个会议，反华的会议。中央还拟订了一个《关于在声明草案上签字问题给代表团的指示》稿，提出，不论签字与否，我们必须发表声明，指出这次会议在赫鲁晓夫和苏共代表团的恶劣做法影响下，造成国际共运中又一次不可容忍的恶例。我们保留对二十大不正确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人民日报》1960 年 12 月 6 日。
② 《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人民日报》1960 年 12 月 8 日。

部分的不同意见，并且也反对把不同意见强加于人。毛泽东阅后批示：原则同意。[①] 但是这个声明并没有发表，中共似乎容忍了赫鲁晓夫的颐指气使。这种态度，显然增强了莫斯科对以苏共为首的国际共运团结前景的信心。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应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在苏联进行了六天访问。此时不论是刘少奇本人还是中国其他领导人，都进一步呈现了一种向苏共观点趋同的姿态。

12 月 7 日，莫斯科 12000 多人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苏中友好群众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由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依靠当代维护和平事业的强大力量的联合斗争，在我们的时代是有可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刘并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共同强调了中苏两党、两国对于国际共运共同事业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两党两国的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②]

而在中国国内，尽管舆论宣传并未停止支持和鼓动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③] 但是中共的方针已表现出明显的让步倾向。12 月 18 日，陈毅在中宣部国际宣传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一种新的宣传基调。他指出：莫斯科声明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可以用来打击帝国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内部，发展自己，增强自己。这样说，并没有机会主义，这是中央的方针。大家要向前看，不要纠缠于莫斯科会议之前的争论，向后看。陈毅说：前一段我们挺身而出，舌战群儒，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站起来讲话谁能站起来讲话。现在争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应挺身而出，加强团结，成为团结的核心。毛主席一向能照顾大局，照顾团结，能吃亏。但又能坚持原则。他强调斗争要有一定限度，要受团结约束。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要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声明就是团结的新基础。陈毅在

①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第 372～373 页。
② 《人民日报》1960 年 12 月 8 日。
③ 《人民日报》1960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27 日等。

讲话中全面总结、批评了过去宣传中存在的片面性问题，说：你们不要以为声明不符合你们的口径，其实你们过去的宣传，如在战争可不可以避免、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平共处、联合国的作用、裁军、大国首脑会议等问题上，也有不符合中央、主席口径的东西。陈毅还要求宣传毛泽东思想时，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①

与此同时，两党两国间充满了一股浓浓的亲密友好气氛。12 月 9 日，刘少奇率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毛泽东亲往机场迎接。《人民日报》、《真理报》同时发表社论，赞扬中苏之间“伟大的友谊”。② 26 日，毛泽东会见契尔沃年科，后者转达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本人对他 67 岁生日的祝贺。给契尔沃年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非常感动，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表示在自己生日这一天接受这一崇高的祝贺，对他来说是一大荣幸，并请转达他对赫鲁晓夫的最热情的感谢。谈话中，毛泽东说：“莫斯科会议开得很好”，“会上有争论，有辩论”，“这是件好事”。毛还谈到，中国现在有困难，无法制订远景规划，“在这一方面我们经验不足”。他并对苏方邀请他访苏的建议做出了热情的反应，说：“一定得找时间去一趟。”这次谈话在非常真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一直把契尔沃年科送到了汽车旁。③

显然，中国这时面临的困难局面，使毛泽东不得不从更为务实的角度去考虑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暂时搁置意识形态论争，确立对苏让步方针。而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使得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能够放手去具体实施这种让步政策，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与苏共等多数党达成妥协，避免了国际共运的过早分裂。④

---

① 福建省档案馆，101/2/544，第 18 ~ 24 页。

② 《人民日报》1960 年 12 月 10、11 日。

③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9 卷，第 257 ~ 260 页。

④ 陈毅后来在谈到 1960 年莫斯科会议中共代表团的让步方针时曾说：中央、毛主席决定的，我们党的代表团的这些同志执行得很好。吉林省档案馆，1/1 - 17/249，第 32 页。

进入1961年后，中共的外交政策，以陈毅的话说就是，“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即，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要“把亚非国家放在第二位”，“不能厚于亚非而薄于社会主义”。陈毅还高度评价莫斯科声明“又是个新的里程碑”，提出：“莫斯科声明之后，不是斗的阶段，我们应该服从团结。”“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一点我们要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我们和苏联穿的是连裆裤，是分不开的，弟兄还是弟兄，应该有这种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感觉。把苏联共产党搞臭了，对我们中国共产党没好处。”“这回中央处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决心很大，情况比较清楚，方法很好，所以能够达成莫斯科会议声明这样一个协议。”“要当中心是可以的，要人家推举。不能自己封，人家推举我们还要谦让。”“我们要当中心，不能口里面去讲，只能讲兄弟党是平等地位，大家协商一致。”“他反帝我们推他向前，拥托他向前，他来扛大旗，我们来扛二旗，别争。情绪要转过来。”[①] 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应该说，这次莫斯科81国会议开得很好，成绩伟大，基本上把反华的风潮打下了。”“要同国际兄弟党团结，要同苏联团结，要同81个国家的党团结，不管他们怎样骂过我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等待他们觉悟。”[②] 彭真则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继续肯定莫斯科声明说：“声明是个好文件，不能一律像我中央的语言，赫鲁晓夫说自己活着也要让人家活着。看文章不要光看枝节、语气，要看本质，看主流。”“有人说，内容这样说可以那样说也可以，妙处就在这里。”“81国的文件，把我们一党的主张变成81国的主张”，“没有两面解释的东西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有的同志对声明上有二十大的字

① 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62、34、40、68、32、72、36页。
② 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8，第33、39页

样不满意，二十大如果不要，把苏联搞臭了，有何好处？苏联脸上无光我们脸上也无光，二十大搞掉，不仅苏联会出乱子，而且东欧几个国家也会出乱子。还是不出乱子好。上次也写了二十大，而且字句改了，写了各国党都有贡献，不光是忠诚。”“现在，我们应按声明办事，不能翘尾巴。”他还给过去的争论定了性：“15个月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矛盾。”“为什么吵了几十天几十分钟就解决了？原因是谁也离不开谁，两个刺猬都在冷风中取暖，谁都有刺，但还送有暖气，分裂还分裂不了。我们从未这样设想。”彭真强调说：“我们对苏联的问题，是世界头号的问题，左右都不好，要严肃谨慎。”[①] 陈毅于招待苏联经贸代表团的宴会上谈及莫斯科声明时更进一步赞扬说：“这个声明显示了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声明的基础上达到了更高的团结。”[②]

总之，如果说1960年初以来中共采取种种举措，竭力促使赫鲁晓夫向中共方针趋同，而赫鲁晓夫也从某种程度上向中共观点靠拢的话，那么到1960年末以后，情况却发生逆转，中共方针开始向苏共纲领趋同，中苏两党观点出现新的接近迹象。这种认识的统一之势，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缓和奠定了基础。

由此，1960年夏季以来逐渐显露的中苏关系缓和的迹象，以莫斯科会议为转折点，至1961年后期止，上升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的主色调。

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没有发表一篇涉及两党分歧问题的文章。[③] 在政治、外交领域，当1961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1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时，中苏双方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1961年1月初，苏联驻华使馆向中方通报

① 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4～17、19、21、24页。

② 《人民日报》1961年2月10日。

③ *CWIHP Bulletin*, Issue 10, March 1998, p. 175.

苏联庆祝《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11 周年的计划，表示：尽管今年不是逢五逢十，但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周年。苏联要广泛庆祝，其规模比一般非整数的节日广泛，和整数时差不多。这合乎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同时也合乎社会人士的意见。除莫斯科市在 2 月 14 日举行庆祝大会外，各设有苏中友协分会的加盟共和国首都和中心城市，都将举行这种大会；工厂、学校、科研机关、集体农庄还要举行友谊晚会。对此，中方答复说，中苏两党和两党领导人都认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谊，这次的广泛庆祝，正合乎这个精神，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由此，与苏方的动作相呼应，2 月 13 日，中国首都各界人民举行了盛大集会，庆祝中苏条约的签订。[①]



1961 年 7 月陈毅与葛罗米柯在莫斯科会晤

从 1960 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在苏阿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克制、调和的态度。[②] 1961 年初，在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上，中苏两国进行配合，中国方面表示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在复西哈努克信中所指出的，这次日内

① 外档，109－02251－03，第 38、39、46 页；109－02242－11，第 18 页；109－02241－01，第 7 页

② 关于该问题的情况，详见本篇第二章第一节

瓦会议的目的“应该是帮助老挝人民保证在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实现老挝的和平、团结和中立”。赫鲁晓夫于7月会见访问莫斯科的陈毅时表态说，完全同意中国在老挝问题上的意见。赫鲁晓夫并指出：在最近相当一个时期内他本人确实没有细致地过问老挝问题，他一直是依靠陈总和葛罗米柯的，至于陈总所阐述的一些观点他是知道的。赫鲁晓夫表示，今天陈总提出合作上的问题这很好，他一定要加以过问。[①]

是年夏末秋初，中国政府声援苏联政府决定进行核武器试验性爆炸的行动。中国对苏联即将发表恢复核试验性爆炸以捍卫世界和平的声明一事迅速做出反应，在发表支持性声明和转载苏联声明的问题上，还刻意寻求与莫斯科同步。在获悉苏联政府将发表该项声明后，8月30日周恩来即与陈毅商量拟定了中国政府予以支持的声明，并报毛泽东批准；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对所拟声明稿无修改；8月31日凌晨1时周恩来审改完声明稿并批送中央传阅，2时许通知外交部请陈毅于是日上午接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通报中国将采取的支持行动；陈毅随即受中共中央委托，口头通知苏达利柯夫说：中共中央支持苏联关于进行核武器试验性爆炸的决定。我们准备在苏联发表声明之后，立即发表一个声明，支持这一正确的措施。《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对此事加以详细的解释。中方认为，苏联这一措施是由帝国主义扩军备战而引起的，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周恩来还在确认苏方声明发表的时间后，指示将中国政府声明播出的时间由9月1日改为8月31日晚，认为如果苏联于31日晨3时广播其声明，上午9时左右在《真理报》上发表时已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时左右，过了《人民日报》的发行时间，故中方于是日晚播出，应是基本与苏联同步。另外，陈毅表示，苏联的声明9月1日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的声明将在同一天见报，力求在见报时间上也与苏联相一

① 外档，109-02241-01，第2页；109-03756-03，第13~14页。

致。9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国政府声明，同时发表了苏联政府声明全文。[①] 与此同时，在柏林危机期间，中国也表态支持苏联，支持华约国关于缔结对德和约的立场。[②]

作为回报，苏联则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施以援手。根据莫斯科得到的消息，泰国和马来亚试图在新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所谓西藏问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尚未恢复，苏方表示由苏联代表来对此相关提案进行反击，希望中方尽可能多地提供有关西藏情况和西藏社会改革情况的材料，以便苏联代表不仅能从政治上对西藏问题加以解释，还能利用具体材料反击泰国、马来亚等国对中国的污蔑。对此，陈毅答复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新材料。[③]

中苏之间的这种密切配合，即如邓小平所言，莫斯科会议之后，中苏两国关系发展得不错。在国际舞台上，中苏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合作。[④] 苏联方面则高兴地指出：你们的这些措施再一次说明我们两党两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的支持性措施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赫鲁晓夫也在一次有关德国、柏林问题的会议上评估说，他很满意苏中两党关系目前发展的状况。[⑤]

在军事、国防科技合作方面，1961年1月，赫鲁晓夫致函中国，提出苏联政府有可能在中国生产米格－21ф型歼击机方面实现技术援助。其后，中国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并签订有关在中国生产这种新型歼击机的技术援助协定和帮助中国生产伊尔－14运输机的协定。[⑥]

---

① 外档，109－02245－01，第12～17页；109－02245－01，第1～2页；《人民日报》1961年9月1日。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31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311页；*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 310。

③ 外档，109－02245－01，第2～3页。

④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331页。

⑤ 外档，109－02245－01，第2页；109－02999－012，第91页。

⑥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89～390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第546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66页。

中国政府还应苏方请求，允许苏联飞机一架一次性飞越中国领空，空运物资援助老挝中立派。[1] 3～8月，中国陆续向苏联递交提供武器和新式技术装备的申请清单，苏联政府指示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并采取措施满足中方的这些请求。[2] 其间，5月，中国海军舰队与苏联太平洋舰队的电台恢复联络；中苏双方在6月初商谈1961年对苏新技术和军事物资订货问题后不久，8月末，苏达利柯夫即向陈毅通报，苏联同意供应中国一批军事物资；他还奉苏联政府的指示答复说，苏联方面准备就中方提出的有关1961年对苏新技术和军事物资订货问题举行谈判，签订政府之间的协定、合同，并在1961年交货。这一期间中国向苏联提出的1961年军事订货，总计2430万卢布（新币）。[3]

事实上，中苏政治、外交上相互配合的成果，为两国的军事、国防科技合作奠定了基础。所谓投桃报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给苏联的政治支持，换得了苏联对中国军事物资需求的满足。反之亦然，莫斯科以为北京提供军事物资为资本，获取中国在政治、外交上的进一步支持。

在经济贸易、科技合作方面，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克服困难。中国接受了50万吨蔗糖。[4] 同期，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面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一份备忘录，通知说，根据中国方面的建议，苏联方面同意首先在北京就苏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各项协定举行初步谈判，并就1961年的贸易换货问题交换意见，然后在莫斯科继续举行并结束这项谈判。为此，苏联将分别派出以对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39页

②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 308.

③ 外档，109－02258－01，第8页；109－02241－01，第21、29页；109－02245－01，第3页

④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4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94、397、400页。

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为首的和以外贸部副部长库梅金为首的两个代表团访华。3 月 1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华的苏联贸易代表团和经济科技代表团，陈毅并设宴招待代表团成员。[①] 一个多月后，中国政府经济、科技代表团与苏方达成协议：1960 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 5 年内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 50 万吨蔗糖欠款，可在 1967 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②] 对此，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表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③] 在这次中苏两国政府的贸易谈判中，虽然发生过一些争论，但是在主要问题上，最后都按照中方的意见达成了协议。对于中国来说，谈判结果是圆满的。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也十分隆重，大大超过了接待一般政府专业代表团的规格。[④] 苏联方面还对中国 1960 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欠交、1961 年由于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困难的情况，表示合作和谅解。[⑤] 苏方还提出帮助中国 100 万吨麦子的问题。[⑥] 6 月，中苏签订了关于向中国提供 10 万吨小麦、10 万吨面粉和 10 万吨黑麦的协议（作为偿还，1962 年中国方面向苏联供应 15 万吨稻米）。[⑦] 中国驻苏代办向苏联外交部远东司、苏联财政部国家印币局提出了请苏联协助印制 10 元券的人民币 30 亿元，于当年底交货的要求，苏方原则上予以接受。由于交货时间紧，印制水纹需要最高级纸张，以及图案复杂费工夫等，苏方在全面仔细研究后表示，将在当年完成 16 亿元的印制任务，其余部分，可在明年上半年

---

① 外档，109-02241-01，第 4、8 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1957～1969），第 242 页；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第 602～603 页。

③ 《人民日报》1961 年 4 月 10 日。

④ 外档，109-02264-04，第 45 页。

⑤ 《人民日报》1961 年 4 月 10 日。

⑥ 外档，109-02999-012，第 95 页。

⑦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с. 275.

完成。[1] 是年，苏联向中国贷款3.296亿卢布。[2] 中苏两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也成效显著，科技新成就得到进一步交流。[3]

上述种种情况，使中苏两国似乎看到了双方之间进行友好合作的光明前景，苏联方面认为中苏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中方则表示中苏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得到妥善解决。[4]

只是此时中共对苏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迫于国内形势而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大的容忍”，所谓“革命的妥协”和“调和”，不过是“一种过渡”，[5] 两党分歧的症结并没有就此化解。因此，新的团结形成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它仅表明了中苏关系虽然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决出胜负后得到发展，却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中苏双方如果能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还是有可能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的。[6]

但是，对苏让步绝非毛泽东的真实心愿，向赫鲁晓夫做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对他来说无异于吞下了一枚苦果，必欲吐之而后快。两次莫斯科会议事实上形成的国际共运苏联和中国两个权威的结果，已与国际共运单一权威的传统机制发生深刻冲突。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

---

① 外档，109－02250－03，第156～157页。

② 据俄方材料，1950～1961年苏联提供给中国的贷款总数为18.16亿卢布，按照贷款协议使用的贷款全额：1950年2.7亿，1951年4.33亿（另有2.095亿折扣），1952年2.415亿，1953年1.352亿，1954年1.882亿，1955年2.182亿，1961年3.296亿，总计18.157亿新卢布。参见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с. 277－278。关于苏联对中国贷款的详细研究，参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人民日报》1961年6月23日、10月7日。

④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7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0页。

⑤ 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34、35页。

⑥ 参见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者已无法担负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随着革命的重点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应该移到中国，中共理应担当起国际共运的领导责任。[①] 毛泽东的抱负已容不下苏共二十大的纲领。中共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中追求话语特权、显示自身威力的态度，以及要当中心、打大旗二旗的议论，事实上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情怀。由此，中苏关系缓和短暂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刘少奇“就像看不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永远也看不到中苏两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之间的分离”[②] 的话说过没有多久，“太阳从西边升起”的奇迹就展现在了西方世界的面前。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81～282页。

② 《人民日报》1960年12月9日。

第二章

两党关系破裂与两国关系恶化

·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明争暗斗 / *447*
· 伊塔事件与两国关系趋向恶化 / *459*
· 毛泽东考虑全面调整对苏方针 / *470*
· 中苏在外交领域的新一轮较量 / *478*
· 左派队伍形成与大论战的开始 / *488*

1961 年 10 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这次会议对中共触动最大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曾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支持过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被拒绝与会并遭到指名批评；二是中共认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新的苏共纲领获得通过。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入手，开始准备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友好、缓和的局面由此结束。进入 1962 年后，中苏关系中大事不断，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的认识，影响了两党两国继续务实地寻求具体的共同利益，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但是，促使中共迈出破裂与苏共关系步伐的关键，还不是中苏两国在国家利

益上的冲突，而是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估计的变化，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以及中国党在世界左派队伍壮大的新形势下，强化了对做国际共运领袖目标的追求。中苏两党一场意识形态大论战，从思想和感情上斩断了这对兄弟之间保存的最后一丝情谊。

第一节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明争暗斗

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同处巴尔干半岛，在历史、民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就是在南共的一手扶植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1948 年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发生冲突，铁托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恩维尔·霍查及时转变立场，积极追随斯大林，加入了对铁托的讨伐行列。[①] 此后，苏阿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55 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阿尔巴尼亚是成员国之一。苏联在阿尔巴尼亚发罗拉建立的海军基地，成为华约组织在地中海上的最重要的据点。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随着苏联调整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一贯敌视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开始严重不满赫鲁晓夫与铁托进行政治调情。1961 年 2 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大召开，阿领导人在苏共代表团与会的情况下，指责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和独裁分子。赫鲁晓夫则于 3 月在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指责阿方对发罗拉海军基地苏军的态度不好。苏阿关系急转直下，斗争日益尖锐，赫鲁晓夫相继做出了停止对阿无偿经济援助和撤出发罗拉基地苏联海军的决定。[②] 同苏联关系恶化的阿尔巴尼亚转而与中共在

---

① 详见沈志华《对 1948 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5 ~26 页。

② 列·别·杰留辛：《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陈夕译，《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第 106 页；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9 卷，第294 ~295 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1957 ~ 1969），第 244 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 116 页。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下迅速团结到了一起。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为中共最坚定的支持者。中阿关系趋向密切。

但是这时，巩固与苏联的团结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共不能为过度维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而牺牲刚刚用让步妥协换来的中苏关系缓和的新局面。因此，中共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一方面是“不要中苏关系好了使阿尔巴尼亚感到冷落”，“要照顾到跟阿尔巴尼亚的团结”；一方面是“也不要去包了，苏联压阿尔巴尼亚，我们就全部把阿尔巴尼亚包过来”。“不要把文章作绝了。但是也不要去批评它不策略。”① 对苏阿矛盾始终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苏阿争执。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共实际上一直在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做劝说工作，竭力调和苏阿矛盾。既劝阿同苏联搞好关系，表示中国不插手对阿军援较好，应后发制人，要针锋相对地斗争，也要留有余地；又致函苏共中央，认为苏联从发罗拉海军基地撤退舰队“不适当”，“极不利于共同对敌斗争”，希望苏共中央改变这一决定，苏阿关系应通过协商途径得到解决。②

与此同时，中苏两党之间的信息交流稳步进行。1961 年 1 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由赫鲁晓夫报告新的苏共纲领草案。2 月，契尔沃年科大使向刘少奇通报了这次全会的情况。③ 接着，陈毅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在 7 月 21 日参加日内瓦老挝问题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做短暂停留，与苏共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契尔沃年科则在 24 日，苏联公布苏共新党纲草

---

① 吉林省档案馆，1/1－17，第 249 卷，第 71 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1957～1969），第 345 页；《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第 406 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 527～528 页。

③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6，第 491～492 页；*Кулм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 307。

案一周之前，将厚达112页的俄文党纲草案连同中文译文一并交给了彭真和杨尚昆。[1]

这个新纲领将苏共二十大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纲领路线进一步系统化，并且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新理论。在中共看来，这份文件可以说是苏共"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了。[2] 几个月前，中共中央听说赫鲁晓夫要搞新党纲后，为了拖住他不要在修正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曾通过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向苏共二十大的纲领发起过一轮攻击。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仅没有"挽救"赫鲁晓夫，反而是中共自己先搁置分歧、做出了让步。面对这个将会被拿来指导国际共运的完整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中共中央开始酝酿重开与苏共的意识形态斗争，只不过其切入的形式是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维护。

8月，在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书记会议上，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的刘晓受中央委托发表口头声明，反对苏方拒绝阿代表团出席会议的做法，呼吁改变此项决定，遭到赫鲁晓夫的拒绝及指责。[3] 中苏两党关系缓和的脆弱基础被触动。不过这只是碰碰而已，属于正常的矛盾冲突，中共对苏的既定方针并没有就此改变。故而，尽管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新的苏共纲领持否定态度，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前却一直没有公开说明自己的看法。

9月9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约见陈毅，提出：中国报刊没有对苏共纲领草案做出评论，这在外交使团里被看作中共领导人对此有自己独特的立场。陈毅当即反驳说："这是无聊的谎言，

---

①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с. 307；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47页；《杨尚昆日记》（下），第52页。

② 沈志华、于沛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第562～563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84、83页。

③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8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44～245页。

没有任何根据。我们已经全文发表了纲领草案，并出版发行了单独的小册子。”陈进而解释道：“中共代表团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即将发表贺词，而在会议召开之前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更好地学习这份严肃而重要的文件。召集记者写几篇关于纲领的文章——这并不是难事儿，瞬间就能够办到，但是，没有经过分析和思考而仓促写出的文章，有什么价值呢？对于苏共党纲草案我们可能有的只是支持。此外，还应该考虑到，目前，中共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发展农业上，中国领导人几乎长期住在各省里，我们简直是没有时间处理其他重要的事情”。[①]

陈毅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个托词，其实在8月23日至9月16日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着重研究工业、粮食等问题的中共领导人、与会者及理论家们，也曾多次讨论苏共的新纲领。[②]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提出，无疑是公开打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苏共已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只不过，这时的中共中央仍然希望回避意识形态争论，在毛泽东的认识中，依然是只要不妨害原则的坚定性，一切策略的灵活性都是必要的，一定的妥协都是许可的。[③]

为了既表示原则的坚定性，又维持策略的灵活性，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实际采取了一种迂回战略，即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会议期间及其后，只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认识和立场，对苏共纲领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与此同时旗帜鲜明地维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苏共对阿进行政治制裁，以显示对阿劳党的支持，间接表明中共对苏共纲领的态度。而赫鲁晓夫似乎与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借攻击阿劳党代表团之名，行批评中共之实。结果一个是“挺阿射苏”，

---

①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 313.

② 《杨尚昆日记》（下），第62～63、64、66、68页。

③ 林克日记（手稿），第150～151页。

一个是“打阿射华”，手段不尽相同，反映了此时中苏两党的初衷还都是想将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于是，一场明争暗斗开始了。

9月末，邓小平在会见契尔沃年科大使时，为调和苏阿关系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表示：苏阿双方“都不应该把事情做绝，应为调解留下某种余地”，说“中共和苏共之间也有大量争论，好在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没把事情做绝”。但是，契尔沃年科通报的阿尔巴尼亚的一系列行动已经危害到华约成员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利益的情况，以及苏共破例不邀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参加会议的做法，[①]已预示苏阿关系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赴苏前夕，周恩来在会见胡志明等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时谈道：这次我们去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是去祝贺，我们的贺词除致贺外，还准备强调团结，强调反帝，这样强调对敌斗争有好处。[②] 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同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赫鲁晓夫谈到斯大林时不仅措辞激烈，而且还用了一些粗鲁的形容语，如“斯大林是个坏蛋”，是个“白痴”、“傻瓜”、“刽子手”等。周恩来专注、耐心地听完这番谈话后并没有反驳，只是绵里藏针地说：“我们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对斯大林有很大的意见。这些很大的意见是与他对一系列中国革命问题的评价有关的。在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时，我们并没有把这些错误归咎于他，而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党的错误。我们把所犯的一切错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不去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对这些错误负责的问题。”[③] 通过这次谈话，中共代表团应该对二十二大可能要对斯大林做进一步否定，有了精神准备。

---

① *CWIHP Bulletin*, Issue 10, March 1998, pp. 174 - 175；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45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40页。

③ 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彭卓吾译，《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93～94页。

10月17～31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17、18日两日，赫鲁晓夫先后做了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草案的报告，阐述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严厉批判斯大林，并点名批评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①] 19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宣读了毛泽东签署的贺词。他在讲话中指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②] 周恩来的讲话赢得全场大多数人的掌声。而主席台上赫鲁晓夫等人没有鼓掌，受到全场注目，赫鲁晓夫为此"面红耳赤，表情沉重"。[③]



1961年10月15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亲临机场欢迎

---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44～245页；沈志华、于沛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第561～563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40～441页。

③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610页；《杨尚昆日记》下，第79页。不过也有俄方材料称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任何人赞同周的立场，谁也不与周交谈。参见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 316。

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扩大会议，由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对苏共二十二大的方针。[①] 其具体内容目前尚未见有材料详尽披露，但据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采取的迂回、暗中斗争的举措，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灵活、克制、软中带硬的斗争方针。

一方面，在中国国内，由《人民日报》同时摘要报道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全文发表周恩来的致词，既表示中共对苏共报告的重视，又申明中方强调团结的立场；[②] 在莫斯科，21 日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拜谒列宁、斯大林墓并献花圈，上面分别写道："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 和 "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维·斯大林"，以此对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斯大林的攻击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周恩来在 22 日与苏共主席团负责人赫鲁晓夫、科兹洛夫、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人进行长达九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只正面阐述中共对苏阿关系、苏共二十大、评价斯大林、苏共党内反党集团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有限地批评苏共对阿劳动党的做法，而不直接批评苏共纲领，不就意识形态分歧问题做面对面的争论。周恩来在分别会见胡志明、黎笋、金日成等兄弟党领导人时，也只是批评赫鲁晓夫对阿党的做法，不评述二十二大的报告和新党纲。[③] 总之，注意避免为此与苏共发生正面冲突。

与此同时，苏共方面也试图缓和中苏两党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苏共一方面表示：二十大后，中共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又保证苏共领导层重视维护苏中友谊和苏中两党的团结。赫鲁晓夫还利用 22 日的休会时间，

① 《杨尚昆日记》（下），第 79 页
② 《人民日报》1961 年 10 月 20 日。
③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第 441 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610～1611 页。

邀请中共代表团共进午餐，两个小时中不谈政治问题，摆出息事宁人的姿态。会议期间，苏方虽然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对中共进行影射攻击，但在用语上还是注意分寸并留有余地。①

由于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纲领路线毕竟与中共的立场观点差距太大，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后，对中共的指责声不断，于是，周恩来决定提前回国，以示表态。中共采取的这种回应措施，其主旨还是要在回避正面尖锐冲突的同时，表示中共依然坚持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原则立场。23 日，周恩来以要回国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由向苏方提出提前回国的要求，并指定彭真为代理团长。赫鲁晓夫对此虽心中不快，却也只能按照国际惯例去机场为周恩来送行。②

10 月 24 日，周恩来乘专机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到机场迎接，以此政治色彩浓厚的行为，向苏方表明中共领导人的不满情绪和态度。苏达利柯夫临时代办就此事向莫斯科通报说，与此前类似的迎送惯例不同的是，这次苏联大使馆的代表没有被安置在机场的政府休息厅里，而是被礼貌地送到只有中国外交部官员余湛所在的房间中。迎接周恩来的仪式异常隆重。周恩来显然没有料到毛泽东会亲往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看到毛泽东时感到吃惊，毛泽东极其热情地向他问好。在同到机场的苏联官员打招呼后，毛泽东没有说任何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哪怕是一般性的话，只有刘少奇说了几句礼节性的话。苏达利柯夫评价说：众所周知，毛泽东很少在人民中间露面，几乎没有迎接和欢送过任何人。他能够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被人们认为是打算显示对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行为的支持，这给周提前回国的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③

---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 85 页；*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c. 316；《杨尚昆日记》（下），第 79 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 116 页。

②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 113 页；《人民日报》1961 年 10 月 24 日。

③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c. 316；《杨尚昆日记》（下），第 81 页。

不过，周恩来回国后，中共代表团虽然在会上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一般性辩论，但在参观活动中，继续避免涉及两党的政策分歧，主要还是讲友好团结。彭真认为向群众讲话应和会议讲话不同，气氛要和缓一些。[①]

10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的决定，《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日发出的谴责赫鲁晓夫的声明。而赫鲁晓夫随即在27日的大会总结发言中指出：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对在大会上公开提出阿苏关系问题表示不安。据我们的理解，他主要的是担心苏阿关系的现状可能影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我们对中国朋友们的不安具有同感，珍视他们对巩固团结的关心。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能更好地促进这一任务的解决。[②]

其后，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词中就和平共处、帝国主义性质等问题不点名地与中共进行辩论，驳斥中共领导人的指责，以批评"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顽固的莫洛托夫分子"影射攻击中共。[③] 大会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并在通过的《关于弗·伊·列宁墓的决定》中提出："在墓中继续保留约·维·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④] 针对这种情况，10月30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还是决定对此默声抗议，不写文章。[⑤] 彭真也在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指示刘晓说：尽管两党争论很激烈，但两国关系还要保持友好，应多做一些友好工作，不要把形势弄得太紧张，使得没有回旋余地。中苏

---

①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c. 314－315；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13页。

② 《人民日报》1961年10月31日。

③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c. 314－315.

④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8－529页；沈志华、于沛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第568页

⑤ 《杨尚昆日记》（下），第83页

关系还在变化中，改善关系的因素仍然存在，因为两国都有此需要。[1]

尽管这一阶段中共代表团对外采取了克制的斗争策略，但是在国内，还是开始了集中批判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纲领的活动，这也成了中苏关系重新紧张的起点。

11月9~10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17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做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具有原则上的性质，在中苏两党的思想斗争中出现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永远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并将把这种立场坚持到底，哪怕这需要5年、10年甚至更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会听命于苏联，它将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成社会主义。"[2]翌日，毛泽东则在关于中国在国外得到拥护的通讯报道上批语说："修正主义者一心一意要孤立中国，究竟被孤立的是谁呢？修正主义者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而我们（所谓教条主义者）却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3]

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在中国中下层干部中传达之后，阿尔巴尼亚问题、苏共纲领问题等情况迅速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传播开来，激起了广泛的反苏情绪，人们对二十二大引起的许多重大问题议论纷纷，群情激愤。[4] 而由于《人民日报》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霍查反击苏共的报告等材料，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特别接见中国驻苏大使，对此提出指责。[5] 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面临瓦解的危机，这是中共领导人此时还不想见到的。因此，中共中央、外交部相继发出一系列指示、通知，竭力控制事态的发展。

---

①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14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42页；*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с. 316 – 317。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600页。

④ 吉林省档案馆，1/1 – 17/183，第10~14页

⑤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205页。

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阿关系问题的指示，要求对于霍查的报告，“目前，我们暂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处理兄弟国家、兄弟党可能进行的责难和挑衅方面，应掌握五项原则，包括：对苏阿关系问题，要维护阿党的正确立场和观点，要明确是非，不要含糊其辞；在谈话中要紧握团结的旗帜，区别对象，注意策略，有理有节，适可而止。应限于口谈不要见之文字，更不要走到街上，形成群众式争论；等等。[①] 11月25日中央又批转东北局的有关通知，指出：要使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问题，继续高举中苏团结的旗帜，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强调要避免发生一切可能被人利用来破坏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事情。该通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在各种公共场所特别是沿国境线地区、国际列车、国境车站和港口附近，应控制和避免议论这类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各级干部和各方人士有关苏共二十二大的反应，一律集中到各级党委宣传部以绝密电报向上级宣传部上报；各地报刊不要针对二十二大有关问题发表影射性言论；对外国专家和留学生的议论可多听少说，表示意见时，应以周恩来在二十二大的致词、吴玉章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中的有关提法为依据；等等。[②] 次日，外交部也发出有关苏共二十二大问题在对外接触中应注意的事项的通知，规定各驻外机构和外事机构在对外接触中严格按照周恩来致词的口径答复兄弟党提出的问题，如有人挑起争论，应坚决站稳立场予以回击，但也不必纠缠；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人员的探询，要以中苏两党团结牢不可破予以答复；等等。[③]

12月，苏联宣布同阿尔巴尼亚断交后，中国在继续对阿提供政治支持、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在国内发出通知，重申11月26日外

---

① 福建省档案馆，101/12/164，第66～68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1/1－17/183，第10～14页

③ 吉林省档案馆，77/7/1，第42页

交部通知中的有关精神，并强调要求中央、国务院、地方各机构组织，在对外接触中不要主动谈论苏阿关系问题。[①]

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报刊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②] 3月1日，契尔沃年科又与邓小平会见，转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提出了改善苏阿关系及苏中两党团结、搁置争论等问题。邓小平阅信后建议说：在改善与阿尔巴尼亚关系这类问题上大党应该采取主动。对于大党和大国来说，不存在威信问题。邓小平认为苏共中央提出苏中团结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两党应该努力利用现有的可能克服双方关系中存在的困难，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两党在多数问题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可以加强团结。邓小平说：“你们的信号召团结——这很好。”“对于我们而言”，“很清楚，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农业”。契尔沃年科则表示相信，苏中两党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无论多大，也不能阻碍苏共和中共的团结，只要有了紧密团结的愿望，我们就能回到真诚信任和友好的形势之中去。其后，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解决苏共中央2月来信中提出的问题，统一思想。这一建议因苏共中央要求国际会议召开的先决条件是阿领导人放弃自己的立场而被搁置。[③]

总之，随着中共越来越深地介入苏阿冲突，中苏关系重新出现恶化的迹象，但是中国这时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上，两党都表示了珍惜关系缓和局面的意图。中苏双方暂时搁置或回避意识形态争论，维持关系稳定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不过，1962年春夏之交，在中苏边界西段，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发生的大规模边民

① 吉林省档案馆，1/1－17/183，第1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46页。
③ *CWIHP Bulletin*, Issue 10, March 1998, p. 17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46页。

逃往苏联及冲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政机关的“伊塔事件”,[①] 严重干扰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路向。

第二节 伊塔事件与两国关系趋向恶化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约1500公里，基本状况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与苏联的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加上民族血缘关系和宗教文化联系，使得伊犁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之下。而这种影响得以持续深入、控制得以不断加强的重要原因则在于，苏联在那里拥有由其侨民构筑起的相当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1950年代初时，苏联在新疆拥有的12万左右的侨民主要集中在伊犁地区。他们与当地的哈萨克、维吾尔等族群众有着族源关系。1954年4月，苏联政府为了解决二战结束后国内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单方面决定遣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其后至1950年代末期，在中苏双方的协商、配合下，于每年春季开始的遣侨工作基本正常进行。[②]

但是，1960年中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冲突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后，苏联政府对中国新疆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加紧在中国边民中非法发展侨民，同时积极插手遣侨事务。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① 指1962年4~5月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的6万多边民大规模逃往苏联，以及5月29日边民冲击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中共伊犁区党委、进行打砸抢的事件 对此事件起因的考察，详见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② 据有关材料，从1954年遣返苏侨工作开始至1958年止，全新疆共遣返苏侨9.9万多人 当时留在中国的苏侨大约还有3万人，其中新疆2万人。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下简称伊犁州）档案馆，11/1/80，第7页；吉林省档案馆，77/4/61，第79~80页、关于新疆苏联侨民问题，详见李丹慧《对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1945~1965）》，《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80~99页

第一，苏联驻新疆的领事馆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以及人民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积极、主动地进行挑拨性、分裂性宣传，加快在中国公民中非法发展苏侨的步伐，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

1960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确定该年不大批遣返苏侨之后，苏驻伊宁领事馆依然做着大规模遣侨的准备工作。苏联领事指使、收买一些苏侨和中国公民中的不法分子，或直接给领馆职员布置任务，在中国的哈萨克、乌孜别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公民中进行秘密串联、非法登记，鼓动他们向领事馆要求加入苏联国籍。伊犁苏联侨民协会总会以及阿勒泰、霍城、昭苏、伊宁市等地的分会也在领事馆的授意下，有计划地在中国公民中大肆进行串联登记活动。[①]

此外，苏联领事馆、苏侨协会和苏联国内给中国人散发各种证件的活动进一步升级。这些证件有领馆发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苏侨协会发的申请加入苏籍的证件，苏联国内发的护照抄本、补发的出生证明等，以及苏联的集体农庄、地方政权组织发来的大量邀请中国公民迁居苏联、保证其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苏联方面宣传说“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并鼓动、组织他们去苏。[②]

1961 年以来，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联侨民不但自己加紧要求去苏联，而且还在社会上鼓动其他人员申请到苏联去。苏联领事馆通过苏侨协会非法发展侨民的活动也更加积极。[③] 该市苏协的秘书在发放无主护照时竟然宣称：“我们要把这里所有信伊斯兰教的人统统接到苏联去。”[④] 苏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等地接见苏侨和要求去

---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3/43/208，第 48～49 页；《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伊犁州公安局史志办编印，1988，第 40～41 页。

②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 115～116 页。

③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 27、24 页。

④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41 页。

苏的中国公民时也反复宣传说：苏联人民生活很富裕；凡是从苏联过来的哈萨克，不管有无苏侨证，我们均承认他们是苏侨；苏联的大门敞开着，欢迎大家去苏联，而且迟早一定要去，主要问题在中国政府是否批准，苏联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你们完全有权利要求回国，任何人不能干涉。[①]

1950 年代，苏方还能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承认非法发展侨民的错误，并经双方协商，解决问题。而到 1960 年代初，当伊犁州外事分处将中国外交部、公安部 1961 年 9 月 3 日《关于苏领馆发展苏侨问题的指示》精神传达给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并交付所查获的非法护照时，对方却否认其非法发照的事实。[②] 苏联方面的这种活动已经广泛、深入地展开，在其影响下，中国边民要求去苏也已形成一股风气，问题已不是双方通过协商就能解决的了。据统计，1954～1959 年遣返苏侨 86890 人，随返的中国籍家属 45983 人；而 1960～1962 年遣返苏侨 8559 人，随返的中国公民竟达 20907 人。[③] 其中还未包括那些持有苏联各种证件而尚未走成的中国人。由此可见，当时苏方非法发展苏侨的情况十分严重。

第二，苏联领事馆改变了以往在苏籍干部退籍问题上的做法，竭力阻止此类人辞退其在中国党政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

1960 年 8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彻底解决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本着争取他们退出苏籍留下工作、对坚持回国者予以批准的精神，向苏籍干部进行动员。由于多数人仍然要求回苏，公安部门陆续给一些人发了出境签证。但是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突然改变了过去的方针，对这些人多方阻挠，劝他们不要急于退

① 伊犁州档案馆，11/1/97，第 75～76 页。
② 伊犁州档案馆，11/1/97，第 191～192、195 页。
③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伊犁州外事办公室史志办编印，1997。

职，并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表示苏方不能发给他们入境签证。①

同期，苏联驻新疆的两个领事馆，即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事馆虽然同意苏籍干部加入中国籍，并长期留在中国工作，在具体受理苏籍干部退籍问题时却设法刁难，多方了解中国处理苏籍干部的方针，试图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使中方做出让步，允许苏籍干部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家机关中。苏联总领事曾提出：苏籍干部在党政军机关担任着各种不同的职务，尤其是伊犁苏籍干部的数量很大，他们不愿意退籍。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本人自愿，中苏双方只能说服不能强迫。由此，从 1960 年 5 月到 1961 年 3 月向苏领馆提出退籍申请者均未获得批准。②

苏联政策发生上述变化，应该说是别有所图的。毕竟，在中国的党政军机构中保留有苏籍干部，有利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伊犁地区有不少隐瞒苏侨身份的干部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还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在以后的伊塔事件中，苏籍干部成为坚决逃跑的一类人，其中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或对党和政府不满者，还成为煽动、组织及胁迫群众外逃的首要分子。个别上层人士在伊塔事件后则宣称“领事馆撤走了，我们还有地下领事”。③

第三，苏联方面开始利用苏中邮件往来及广播宣传，鼓动中国公民去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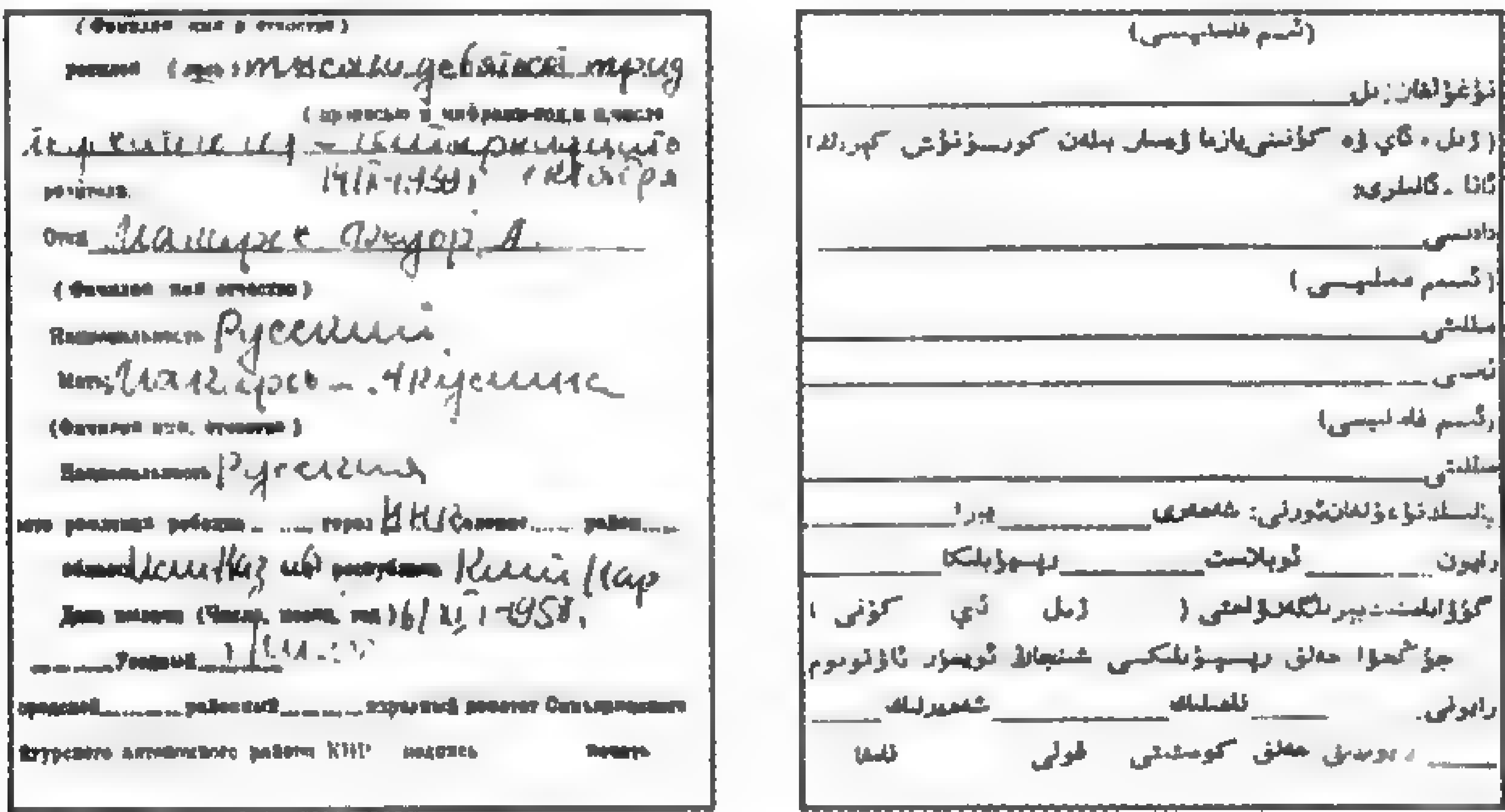
1960 年代初，苏方通过集体农庄、区乡政府往新疆各地投递信件，提供各类非法证件，寄赠报刊等宣传品，引诱中国边民去苏。苏联哈萨克广播电台对新疆的维吾尔语广播 1950 年曾自动撤销，但到 1961 年上半年又重新恢复，经常播放去苏人员的录音讲话、访问记录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3/43/208，第 49～50 页。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3/43/8，第 5～6 页。
③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 152 页。

等，赞美苏联，煽动民族分裂情绪，且频率和播出时间都与中方的维吾尔语广播电台相近，很容易为新疆地区的民众收听。①

与此同时，已越境去苏的人员也频繁与其中国境内的亲友通信，或邮寄米、面和肥皂、棉布等中国定量供应的物品，宣传苏联生活的优越，劝说他们到苏联去。1961～1962 年，来自苏联的信件、邮包猛增。特别是有的人利用亲友关系写信鼓动担任劝阻外逃工作的干部去苏，直接破坏中方进行的这项工作。②

第四，1962 年 4～5 月，苏联方面直接参与了煽动并接应中国边民外逃的活动。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期间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及伊犁地区苏侨协会向中国边民滥发苏侨证。图为伊犁地区尼勒克县公安局查封的苏方发出的出生证样本

1961 年冬和 1962 年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季托夫（又译迪道夫）等人先后 6 次到塔城专区进行非法活动，共接见当地居民 4743 人次。尤其是 1962 年 4 月，季托夫在塔城擅自召开大会，煽动群众外逃苏联，并曾往返苏联两次进行联系。其后，当地居民的外逃情绪得到

①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46 页；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 117 页。
②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 116～117 页。

渲染，形成一种舆论氛围，边民非法越境去苏行动随即开始。从4月中旬至5月末，伊犁、塔城地区参加外逃的总人数为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61361人，带走大小牲畜23万头，大车1500多辆。[①]

在中国边民外逃的过程中，苏联边防军一改过去与中国边防站举行会晤，遣返中方越境人员的做法，于边界上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口子，接运、安置外逃人员。各接待站配有医生、救护车、流动售货车，苏方一些党政军警和特务机关人员坐镇接待站。当大批群众逃跑越境时，苏方在边界铁丝网上开了几处口子，夜晚用探照灯、红绿信号弹或汽车灯照明，指示逃跑方向，并派出大卡车到边界线上接运外逃人员至集中点，登记和分发钱粮后很快内送，安置于各地的集体农庄。苏方还散布“关口子”等谣言，传令以后过去的人要多带牲畜财产，在口子上要等到生产队大多数人到齐后才放他们过去等，促成了几次大批边民逃苏的高潮。[②]



1962年中国边民逃苏时所轧出的马车路，路直通苏联霍尔果斯边卡南第一个瞭望台以南60～100米的口子。图上马车路的位置距该瞭望台约2公里

①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18、108、119、106页；《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4、7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47页。

②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19～120、107页；《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6～47页。

4月24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方面提交了第一份备忘录，指责苏联方面鼓励甚至拆除铁丝网、开口子帮助中国居民非法越境，要求苏联方面恢复边境正常状态，交回中方外逃人员。①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仍然做出决议，决定有组织地将这些逃苏的中国公民安置到加盟共和国的腹地那些需要劳动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工作。为此，吉尔吉斯共和国专门为越境的中国公民设立了安置委员会，责成相关地区的党政部门，负责越境中国公民的接待、迁移、安排工作等安置事宜；并为越境中国公民发放补助金、提供交通工具、组织医疗救助，以及安排中国公民的学龄儿童接受教育等。②

边民越境事件发生后，伊犁州各级党委迅速动员各方面力量，深入边境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教育和劝阻工作。在反外逃工作初期，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坚持“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积极劝阻，制止外逃。4月29日自治区党委发出《迅速制止边境地区群众非法越境的宣传教育要点》，各边境地区反复进行“要点”的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使很多群众的思想情绪稳定下来，不再外逃。与此同时，伊犁州还采取政治教育与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由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民兵进行武装巡逻警戒，维护社会治安，在中苏边境执行巡逻任务，依法惩处少数组织逃跑、造谣惑众、扰乱治安的为首分子，遏止了越境事态的蔓延。③

5月初，塔城、霍城等地的大规模外逃行动基本得到控制后，伊宁市的群众性外逃活动仍在继续发展。29日晚，在一些人（其首要都是持有苏联护照或自称苏侨的人）的煽动下，要求去苏联的群众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47～248页；苏联政府备忘录，1962年4月29日，AVPRF，f. 0100，op. 55，d. 1，p. 480，ll. 4－8。

② 奇韦尔特致乌苏巴里耶夫报告：安置越界到吉尔吉斯的中国公民（1962年4月26日），吉尔吉斯党和政府决议：安置越境到苏联的中国公民（1962年5月4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375～377页。

③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7～10页。

冲、砸了伊犁州人委和区党委。在“五二九”事件中，闹事者曾三次到苏联领事馆汇报情况和请示办法，苏方均把他们推到中国政府方面，一再申说：如中国政府同意，就让他们去苏联，促使这些人更坚决地向当地政府闹事，强迫地方领导人写出准许他们去苏的命令书等。苏领事、副领事、秘书等还接见了闹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领馆门前的闹事群众。此外，冲击州人委的人有重点地专门抢夺外事分处的文件档案，事后的次日，苏领馆秘书不经中方许可即带了一些邮袋回国。[①]

边民外逃带走了大量牲畜、车辆，以及造成60万亩耕地荒芜的情况，加上政府机关、企业被捣毁，粮食、物资等被抢劫，伊塔事件造成的损失达1亿元以上。[②]



1962年5月4日苏方为便于中国边民外逃，在中苏边界中国霍城县空特拜地区切断铁丝网所开的口子

5月30日，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下，苏联边防军被迫停止接运伊犁外逃居民，封锁了边界。[③] 事件发生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①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10～11、17页；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08～113、120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47页。

③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12页。

也迅速加强了伊犁全州的边防机构。1962 年 4～8 月，增设边防站 58 个，并由生产建设兵团新设了一批国营农场，以加强边境控制力量。6 月底，大批边民的外逃行动基本被制止；8 月底，沿边地区的社会秩序也基本稳定下来。①

鉴于边民祖国观念严重混乱和淡薄的情况，伊犁州党政领导机构开始对全州进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爱祖国的宣传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国的领土，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民族是祖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不是苏联人；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②

与此同时，中苏双方互发照会、提交备忘录，进行外交交涉。在这场“笔墨官司”中，中国政府连续指控苏联搞颠覆、武装叛乱，步步进逼，调门愈提愈高。中共中央则进一步确定了“利用外逃事件，挤走苏联驻华领事馆，把苏联搞颠覆活动的领馆、苏侨协会、商务处的祸根从根铲除”，有步骤地“分期分批搞”，让苏方的机构“自己走”的方针。③

第一步在新疆实施，以使新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疆，而不再是别人的新疆。5 月，中国方面查封了苏联在新疆伊犁、塔城、昭苏、乌苏、特克斯等地的苏联侨民协会。是月，中方就新疆边民外逃事同苏方交涉时指出其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事馆的非法活动，苏方关闭了这两个领事馆。10 月，根据中方的要求，苏方又关闭了设在乌鲁木齐的商务代表处和新疆其他两个口岸的商务机构。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大规模外逃事件至此告一段落。第二步在东北等地进行。9～12 月，查封了东北、内蒙古地区的苏侨协会的总会、分会、小组和侨民

---

①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 132 页。
② 伊犁州档案馆，11/1/120，第 228、231 页。
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 104～105 页。

代表处；关闭了设在苏联外贝加尔（满洲里对面）和格罗捷阔渥（绥芬河对面）的商务机构。苏联方面随之关闭了驻哈尔滨和上海的两个总领事馆，以及设在满洲里、集宁、广州、上海、大连等中国口岸的商务机构。结果是中苏之间的领事关系中断，苏联在中国“就剩光杆大使馆”了。[①]

此外，中国政府还进一步严格苏联侨民身份的界限，规定：新疆少数民族中凡同时持有苏联护照和新疆公安机关颁发的外侨居留证的人才是合法苏侨，只有苏领馆所发护照，无新疆公安机关外侨居留证的人，其苏侨身份不能被承认，其所持护照为非法证件，须予没收；同时开始清理在华苏侨。5月30日，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出通知，指出：根据中央对苏联侨民问题的指示精神，目前在处理苏联侨民申请出境问题的时候，“应当放宽尺度，简化手续”。“苏联侨民要求回归苏联的，应当迅速批准，尽快使其离境。”通知要求各地在对现有苏侨人数加以核实，对未处理的申请出境案件做一清理，先迅速处理一批。为了加快这一过程，通知特别规定：“苏联侨民要求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都可以批准，尽快使其离境。对这种人，过去要先经过苏联领事馆同意，才由我方签发出境证件。今后只要他们提出申请，就可以签发出境证。领馆同意与否是侨民本人的事，我们可以不去过问。”“苏联侨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触一般机密的人申请出境，一般不要阻留，应当迅速批准，让其离境。”“申请出境的苏联侨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债务纠纷，应当尽快设法解决。”“苏联侨民的中国籍直系亲属，要求一同出境，可以听随其走。”“我留学生带回的苏籍妻子，如果要求回苏联的，可以批准。但她们的丈夫要随走的，不能同意。”等等。关于苏侨离境的时间，通知要求大体以批准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48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104～105页。

后一个月为限期，不可过长，而且到期不走的须予以督促。[①]

根据中国方面所掌握的情报，诸如苏联方面声称还要开口子，搞中国边民外逃的活动；苏哈萨克斯坦报纸、电台大事宣传说，哈萨克人都是苏联人，是一家，反对汉族统治，应成立独立国家；新疆外逃人员的首领还组织了维吾尔共和国筹备委员会等，中国政府认为，搞颠覆活动已成为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②] 因此可以说，中国这时的加速遣侨行动的方针与前述1954年和1955年的有关方针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其初衷不再是配合苏联的计划，支持苏联的建设，而是要全面清理在华苏侨，以期尽快铲除苏联在中国，尤其是在新疆地区的社会基础，所谓“遣侨这是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方面，要把修正主义在我区的腿子拔掉，我们就要想办法挤其出境”，[③] 彻底肃清苏联的影响。

此后至1963年，根据中国外交部与苏方达成的协议，新疆方面简化手续，进行遣返苏侨的收尾工作，其中1963年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全部遣送完苏侨，对坚决不走的苏侨严加管理。这两年伊犁地区共遣返苏侨7419人，中国籍家属37528人。[④] 1964年伊犁地区分四批遣返俄罗斯四教派分子100户、559名之后，全疆的苏侨不过500多人，[⑤] 苏联在新疆的社会基础表面上被清理干净了。但是，苏联侨民的遣返实际上形成了一条返国苏侨与其留在中国新疆境内的亲属、社会关系进行联系的渠道，随着这种沟通的日趋频繁，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返国苏侨与新疆各族人民之间剪不断的关系，事实上，成为新疆地区

① 吉林省档案馆，1/1－18/248，第4～5页；伊犁州档案馆，11/2/21，第46页。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101页。

③ 伊犁州档案馆，11/1/120，第234页。

④ 伊犁州档案馆，11/1/118，第9～11页；《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⑤ 伊犁州档案馆，11/1/131，第253、263页。1965年，新疆又遣送了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东正教教徒、俄罗斯四教教徒及俄罗斯族苏人67户333人。到1966年全新疆还有外侨361人，其中苏侨201人。这些不走的苏侨、“半家户”，不仅人数寥寥，而且实际上处于受监控之中。见伊犁州档案馆，11/2/22，第33、36页。

社会心理动荡的一种新的潜在性因素。[①]

1963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在向各地通报中苏边境情况时，指示伊犁区党委和边境地区地、州委加强军事和边防工作，落实各项战备措施。是年末，自治区人委颁布了《边境禁区管理规定》。1963年秋至1964年春，伊犁州又根据自治区的有关命令和规定，划定了边境禁区、边境管理县和管理区。[②] 新疆的外事工作开始逐渐走上了“进一步突出备战，突出反修，以针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帮助苏联人民革命为中心”的道路。[③]

伊塔事件的发生虽然与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冲突加深加剧有关，迄今却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苏共决策层直接策划了这次事件。但不管怎样，事件的结果是严重影响了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中共决策层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而这期间中共党内总结“大跃进”运动的教训时出现的一种否定毛泽东设计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倾向，则进一步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迈出了与苏联决裂的步子。

第三节　毛泽东考虑全面调整对苏方针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造成的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迫使毛泽东在考虑对苏政策时不得不以眼前利益为重，先扭转经济困难的局面，再解决与赫鲁晓夫的原则性分歧。因此，中共中央不仅在莫斯科会议上对苏联做出重大让步，而且在苏共新纲领出台后，继续采取容忍态度，搁置争执，谋求稳定与苏联的关系。但是这种妥协

---

① 关于返国苏侨的作用情况，参见李丹慧《对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1945～1965）》，《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② 富文等主编《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第243～244页；《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29～30页。

③ 伊犁州档案馆，11/2/20，第31～37页。

已大大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使他的心情一直处于压抑之中。即如他在苏共二十二大后所谈到的：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不过，在毛泽东看来，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办的好事是基本的，只是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①] 这种认识实际预示了毛泽东进行经济调整、总结经验教训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是毛泽东承认错误的心理底线，如果触动或越过这一底线，必将引起他的不满。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将调整工作深入下去，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中，用"一个大的马鞍形"来批评"大跃进"，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过五年、十年后"再来总结经验"，"做出结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刘并重提他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列举过的湖南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②] 此时中共党内出现的这一类认识，显然已经含有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也即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路线的意思。这实际上呼应了赫鲁晓夫对中共国内政策的批评。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跃进"运动的目的是要显示中国的建设速度快于苏联，发展道路优于苏联；人民公社制度则是为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16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1、337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46、1024、1023页。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提供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这两项发明创造是不容从根本上否定的，否则就触动了他实行政治、经济调整的大前提，越过了他总结经验教训的心理底线。毛泽东开始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看作严重的阶级斗争，形成了“党内出现新的右倾思想”的概念，[①] 警觉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毕竟中国不可能铁板一块，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教条主义，只有马列主义。[②] 于是，他在会上提出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的意见。[③] 这种情况，事实上也促使他开始改变对外政策调整中的缓和思路，考虑中止对苏让步方针。

关于对外政策问题，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④] 王稼祥则于2月以党内通信的方式致函周恩来等人，其后又起草报告、文章，详细阐述了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在这些文件中，王稼祥一方面继续1960年末与苏妥协期间中共领导人关于时代、战争等问题的反思，强调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等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指出，中国不赞成片面强调世界战争已经命定地可以避免，但也不认为世界战争注定地不可避免，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中国不认为武装斗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过程中同帝国主义进行谈判；中国赞成运用裁军的口号；等等。另一方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03页；王力：《现场历史》，第22页。
② 毛泽东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会理事长安井郁谈话记录，1962年1月3日。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45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18页。

面，王稼祥还就对外斗争中的策略问题提出建议，主张在国际斗争中，中国“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在支持别国反帝斗争和民族独立、民族革命运动方面，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对外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对中印边境问题，要设法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民族的敌人；等等。王稼祥认为避免中美战争、改善中国国际处境的根本一环在于避免中苏破裂。为此，他建议同苏共发展对等的统一战线的关系，有斗争、有团结，维护中苏同盟；在中苏关系上应当纠正“左”的错误，那种断言紧张比缓和好，紧张能够动员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只会加剧中苏分歧和矛盾；等等。[1]

这时在毛泽东看来，王稼祥的反思性认识，是在苏共进一步滑向修正主义之后，继续向赫鲁晓夫的观点靠拢；其关于中国在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上有“左”的错误的检讨，无疑越过了毛泽东的对苏政策的认识限度。毕竟对于毛泽东来说，以妥协让步改善和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以策略的灵活性为先的应对方针，它并不是纠正“左”的错误的结果，当然也更非对马列主义原则的放弃。

7月初，在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和世界和平大会召开之前，王稼祥根据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确定的一系列缓和方针，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与会方案并主持起草了讲稿。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完全同意了这种方案。其后，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个“一不反对美帝，二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大会，具体实践了1960年末刘少奇与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先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王力同苏共中央

---

①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560～561、563～564、556～557页；《王稼祥选集》，第446～460、444～445页。

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进行交谈，就关于裁军等问题的认识达成妥协，然后召开兄弟党会议进行协商，最后由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公开会议上发表讲话。[①] 王力并在未向国内请示的情况下，同意了会议起草的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共同文件。王稼祥与中央书记处的方案其实不过是在维持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对外政策中的缓和基调，可是毛泽东却转而批评说，这样做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②]

此后，在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阶级、国际国内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③] 中共中央实际根据毛泽东的思路，提出了对整个国际形势的新看法，认为帝国主义每况愈下，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一天天更加反动和孤立，现代修正主义更加原形毕露，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马列主义左派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一天天增加，毛泽东思想一天一天成为革命人民的旗帜。这更明确显示代表帝国主义的是美国，代表修正主义的是赫鲁晓夫，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是毛泽东。整个形势还是东风压倒西风。[④] 毛泽东则根据其对国内形势的新的认识，把中央一些同志春天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批评为“黑暗风”，把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批评为“单干风”，把彭德怀等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进行甄别平反的意见批判为“翻案风”，指责说：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这不是压我？他进而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阶级贯穿在各个时期。其目的即在于防止修正主义。[⑤] 王稼祥关于对外工作的主张，也

---

① 王力：《现场历史》，第21、22页；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83页。

②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第490页。

③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92页。

④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46页。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77、114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92页。

随之被会议批评为是“三和一少”的错误。[①]

应该说，彭德怀于此时提出平反的要求，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警惕苏共势力向中共党内渗透的敏感神经。毛泽东早就把彭德怀看作中共党内的修正主义者，[②] 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拾1959年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即“通苏联”的责难，[③] 说彭德怀和高岗“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他1959年的信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急急忙忙写，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向党进攻。[④] 这种旧调重弹的结果不啻火上浇油，加深了毛泽东关于“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⑤] 相互勾结的认识，促使他将所谓“黑暗风”同“翻案风”和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紧密联系到了一起，把党内对于政策失误的反省当作了当年庐山会议上所谓的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内外呼应”，“阴谋推翻”他的领导，试图让莫斯科控制中国那一幕的重演。[⑥]

这种思维逻辑直接影响到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的检讨，使他做出了调整对苏方针的决定，将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的思路恢复

---

①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第491页。所谓“三和一少”，陈毅1962年9月1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的发言中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188页）。康生1962年11月8日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则指出：七月莫斯科裁军大会后，“有一种思想，说要同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修正主义讲和，少和民族运动左派接触联系。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83页）。以后，毛泽东曾解释说，“三和一少”是指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毛泽东同新共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记录，1963年5月22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54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44页。

③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32～233页。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91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99页。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2、523、600页。

为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的基调。按照这种调子，王稼祥和王力重新考虑中国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做法，起草了参加8月初在东京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的方案，即对苏联及修正主义国家和党的代表要针锋相对，就是要吵架。随后，中国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在会上同苏联等国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论争。[①] 这一行为被毛泽东称为"7月犯错误，8月改"。[②]

在8月26日~9月23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9月24~27日举行的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诉遭到了声势很大的批判，被上纲上线为配合"三尼"（肯尼迪、尼基塔·赫鲁晓夫、尼赫鲁）反华，利用中国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新的进攻，是"里通外国"，"国际反动别动队"，是敌对分子搞篡党夺权的阴谋。[③] 会议并继续批判"三和一少"的思想，明确将它与"黑暗风"联系到一起，认为之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是只打小算盘，不打大算盘，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④] 其间，经毛泽东批准，部分与会成员还以中央外事小组的名义，开会批评王稼祥提出的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的妥协方案，以及由他主持起草的、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信函、报告等一系列文件。[⑤]

9月2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着重讲了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进一步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⑥] 全会公报特别发表了毛泽东那段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著名论述，并强调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运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

---

① 王力：《现场历史》，第23页。
②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第490~491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93、1094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88~189页。
⑤ 王力：《现场历史》，第24页。
⑥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00、1145页。

是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①] 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至此也发展成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②]

这样，从1961年5～6月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在一年的时间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总结教训，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基本遏止了工农业不断滑坡的势头。但是，中共中央在总结政策失误的过程中触动了毛泽东同意进行调整的前提，突破了他承受失误的心理底线。由此，经过北戴河会议，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止，国内政治风向再次发生逆转，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中断了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进程。随着毛泽东将中共党内及国内出现的意见分歧和所谓的“三风”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寻找这些现象的国际背景，其1960年以来形成的务实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也开始转变。国内政治的变化最终不可避免地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③]

中共中央这时开始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继续贯彻实行这条总路线”。[④] 这就将视野投向了外交上的路线斗争，其实也就是重新突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层面，也即党际关系的层面，改变了中国1956年时所倡导并强调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相

① 《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② 王力：《现场历史》，第24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10页。
③ 参见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④ 《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①] 的外交基调。中苏两党新一轮意识形态论战呼之欲出，关系破裂的前景已轮廓初显。

不久，中苏两国在外交上展开了新的斗争，从客观上加快了中共对苏方针向斗争层面转化的速度。

第四节　中苏在外交领域的新一轮较量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足一个月，国际上同时发生两件大事：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中苏两党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由配合到斗争，重新开始进行较量。

在加勒比海危机过程中的斗争

1961 年 4 月猪湾事件之后，苏联开始加强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其后，考虑到对付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干涉活动，保护古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以及应对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西德、英国设置导弹，以军事基地包围苏联的态势，赫鲁晓夫征得古巴革命统一组织领袖、总理卡斯特罗的同意，于 1962 年 6 月开始，不断将有核弹头的中程和近程导弹秘密运往古巴，由苏军设置并操纵。美国政府获悉这一情况后，于 10 月 22 日下令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苏美关系一度紧张至极，加勒比海笼罩在核战争的危险之中。这时，对于中国来说，古巴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帝的前哨阵地，赫鲁晓夫用导弹武器帮助古巴加强防御能力，无疑有利于世界反帝斗争和古巴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10 月 25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在支持古巴反对美国战争挑衅的同时，表示“完全支持”苏联政府的立场。[②]

① 《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2 日。
②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 533 页。

但是，徘徊在核战争边缘的苏美两国很快就不敢也不愿意再将这场危险的赌博继续下去，双方开始以积极的态度谋求缓和。10 月 27 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提出了处理危机的条件：苏联撤走其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设施，美国则撤走其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设施。毕竟在赫鲁晓夫看来，土耳其同苏联毗邻，苏土两国的哨兵举目可见。美国有权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向苏联提出撤除进攻性武器的要求，苏联同样也拥有这种理由和权利。[1] 同日，罗伯特·肯尼迪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传达了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所提要求的答复：作为交换，美国政府除撤销海上、空中的封锁外，还保证不入侵古巴；同意撤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但这项决定不能公开宣布。因为，在土部署导弹是北约的专门决定，现在由美国总统单方面宣布撤除，将破坏北约的整体结构，影响到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并将严重分裂北约。赫鲁晓夫与肯尼迪随即就此达成协议。28 日，赫鲁晓夫下令停止古巴基地上的工程，把导弹装箱运回苏联，并答应由联合国代表“核查拆除情况”；美国则在 4～5 个月内撤走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2] 加勒比海的风暴平息下来了。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他不仅取得了华盛顿不侵犯古巴的承诺，而且还拔掉了土耳其美军导弹基地这枚钉子，破坏了美国对苏的军事包围态势。因此，加勒比海危机的处理“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胜利”，也是他的“一次个人胜利”。他“把世界引向原子战争的边缘而赢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不发一枪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

① 《人民日报》1962 年 10 月 29 日。

② Doberynin's Cable to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 27 October 1962, *CWIHP Bulletin*, Issue 5, Spring 1995, pp. 79－80；长春市档案馆，1/1－15/53，第 48 页；尤·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李树柏等译，东方出版社，1990，第 70～71 页；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第 225～227 页。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俄国档案文献，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9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没有给美帝国主义吓倒，而是完成了一件革命的壮举”。[①] 但是，由于苏美对有关土耳其的协定严加保密，中国并不知道有这场交易。在中共中央看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就是“在肯尼迪的核讹诈面前吓破了胆”，他们“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拿导弹、核武器作赌注，做投机生意”，一旦肯尼迪用核战争进行威胁，“他们就仓皇失措，步步退让，完全陷入被动”。因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古巴事件中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奇耻大辱”。[②]

赫鲁晓夫退却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国的宣传机器立即全速投入运转，《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通信；[③] 大报小报纷纷展开关于加勒比海形势的讨论，有的重要文章甚至把古巴形势比作 1938 年的“慕尼黑协定”，隐喻苏联用牺牲古巴主权的办法，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④] 城市贴满支持古巴的标语；卡斯特罗关于古巴和苏联领导人关系破裂的电视演说小册子，成为中国老百姓的畅销读物；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中国领导人纷纷出面在各种集会上发表讲话；陈毅在出席 11 月 7 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 45 周年纪念大会时，用“良师的口吻”当面指责苏方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支持古巴、反对美帝的示威活动自 11 月 3 日到 6 日从无间断，参与人数达到 500 万人，以至于在京苏联外交官向国内通报说：中国舆论宣传的注意力全部投入关于古巴问题的争论中了。[⑤]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转而批判说：苏联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其“真实目的，不是援助古巴人民，而是用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709 页。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6，第 3 ~ 4 页。

③ 《人民日报》1962 年 10 月 29 日。

④ 《人民日报》1962 年 11 月 5 日。

⑤ M. Y.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 – Indian Conflic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ino – Soviet Split, October 1962: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Issues 8 – 9, Winter 1996/1997, pp. 251 – 257.

侵犯古巴主权的办法来控制古巴革命；不是援助古巴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而是企图把古巴作为他们同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棋子”。“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对古巴革命和拉丁美洲革命是极为不利的”。[①] 赫鲁晓夫则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借反对教条主义、斥责阿尔巴尼亚之名，指责中国围绕古巴危机的所作所为是想挑拨苏联同美国发生冲突，而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冲突意味着引起世界热核战争。[②] 他后来还曾评论说，中国人一直在公开地大吵大嚷，并且在卡斯特罗耳边嘀咕：“记住，你不能相信帝国主义者会恪守他们所作的诺言！”换句话说，中国人利用这个事件在古巴人面前往我们脸上抹灰。[③]

这次事件，可以说是冷战年代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核战争的前景有从纯理论问题转变成现实的危险，其可能产生的灾难性结果令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惊恐不已，这不啻一针清醒剂，使他们对核讹诈手段的运用转而采取谨慎的态度。而双方在危机处理中达成的妥协，也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创造出了某种信任的因素，使他们看到了在核不扩散、停止核试验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前景。这一动向，恰恰又触动了中国维护主权的敏感神经。

此前，苏联政府于 8 月 25 日递交中国政府一份备忘录，说美国向苏联建议签订一项防止核扩散协定，其中规定：核大国不把核武器及其所需要的技术情报转交给无核国家；无核国家则不生产也不向核大国索取这类武器，不接受核武器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苏联政府对这一建议“给了肯定的回答”。[④] 此时的中国正在加紧制造原子弹，其研制工作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⑤] 故而中国政府于 9 月 3 日答复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这一建议，它“是个大阴谋”，旨在“束

---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6，第 4 页。
② 《人民日报》1963 年 2 月 20 日。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708 页。
④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 531～532 页。
⑤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X1/31/161，第 38 页。

缚中国的手脚”和“挑拨中苏关系”。[①] 随后，二机部（核工业部）便在11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目标。[②] 中国政府并在10月20日答复苏联的备忘录中声明：“如果帝国主义没有真正全面禁止核武器，中国绝对不会承担不生产核武器的国际义务”，如果苏联代替中国承担任何国际义务的话，“中国政府将保留自己对此发表相应声明的权利”。[③]

加勒比海危机过去后，中国加快了核试验的步伐，10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呈送的二机部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在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设想，同时建议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1月3日，周恩来做出批示：“很好，照办。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7日，中央专委会正式成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开始进入突飞猛进时期。[④] 中国的“独特立场”无疑使赫鲁晓夫在继续与肯尼迪就禁止核武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达成协议的进程中，陷入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在苏联方面看来，苏联一国拥有核武器就能“可靠地保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中苏关于核扩散问题分歧的实质即在于，社会主义各国在反帝斗争中“是单干”，“还是共同行动”。[⑤] 中国方面则认为是“美赫勾结，限制我们搞原子科学”。[⑥] 在美国没有做到禁止核武器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应加强拥有核武器的优势。你们有原子弹，好，我们再有一点不是更好吗？有了优势，才能制止核战争。[⑦]

---

①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2页。

② 东方鹤：《张爱萍传》下卷，第748页。

③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2页。

④ 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第432～433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12～513页。

⑤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2～533页。

⑥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83页。

⑦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94～95页。

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斗争

当加勒比海涛澜汹涌之时，喜马拉雅山麓也是风高云密，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执。

事实上，自1959年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边界冲突以来，中国方面一直认为，苏联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上却在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巴边界谈判挑拨印中关系，除了给尼赫鲁政府以大量经济援助外，[1] 还在军售方面尽力满足印度的要求。从1960年10月到1962年5月，苏联向印度交付及印度向苏联订购飞机94架，其中安－12运输机32架、米格直升机26架、米格－21战斗机12架、伊尔－14运输机24架，喷气引擎6台。[2] 1962年夏，当中印边境局势再度趋向紧张之时，苏联不仅向印度提供大型运输机，而且还在尼赫鲁已公开说明向苏联购买战斗机的用途是对付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情况下，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于8月接待访苏的印度专家代表团，向印度出售米格－21战斗机。[3]

面对周恩来就此事向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诘问，赫鲁晓夫解释说，我们是卖给了印度米格－21型飞机，也卖给了生产这种飞机的许可证。但是用军事术语来表达，就是这并不会改变中印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印的军事力量相差悬殊，是不可比较的。何况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光靠直升机和运输机就发动战争和取胜的。而且中国人也知道，从建设工厂到生产出飞机来起码需要五年的时间。我们认为卖给印度飞机对我们有利。我们不卖，英美帝国主义就要卖。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影响在印度增加了。当刘晓大使提出苏联卖给中国米格－21飞机，

---

① 外档，109－03197－01，第3页。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89页。
③ 《人民日报》1962年8月18日；徐焰：《中印边界之战历史真相》，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第243页。

但某些设备和器材至今没有全部交付，却又把飞机卖给印度的问题时，赫鲁晓夫托词周旋道：米格－21飞机目前尚未交给印度，仅是达成了协议。[①]

10月20日中国军队开始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还击印度军队。[②]边界冲突升级为一场局部战争后，苏联继续向印度交付飞机，提供山地作战的被服、帐篷等，并帮助印度设厂制造飞机、坦克。[③] 在中国方面看来，苏联出售给印度米格－21飞机等装备，会被其用来对付中国，同时卖给印度飞机这件事本身就形成了对印度的鼓励。同时，印度使用苏制米式直升机在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有时还用苏制运输机运送军需，这对守卫在中印边界线上的中国战士来说是有影响的。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中国士兵看到了苏联飞机，印象很不好。[④] 中国军人在中印边境地区打下三架飞机，其中有一架就是苏联直升机。[⑤]

在苏美关系因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一事陷入紧张之后，赫鲁晓夫试图以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对苏联的支持。10月13日，他在接见刘晓大使时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此前就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对契尔沃年科大使发表的意见，提出："我和我的同志们""也完全懂得所谓麦克马洪线并不是中印的国界。这是未被任何人承认的一条对英帝国主义有好处的线"。[⑥]赫鲁晓夫在翌日为刘晓饯行的宴会上进一步表态说：在中印边界争端

① 外档，109－03809－06，第26、30、29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04页。

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89页。

④ 外档，109－03809－06，第29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02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91页。

⑤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89页；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83页。

⑥ 外档，109－03809－06，第25页。周恩来在10月8日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时说印度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关于我们这方面，我们总是防御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持忍耐克制的态度，我们除了自卫外，从来没有攻击，没有进攻，从来不先开枪。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502页。

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如果不幸发生反对中国的战争，苏联将同中国站在一起。[1] 此后，苏联一度实践了这一承诺，10月25日，《真理报》以《为了各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的和平》为题发表社论，明确放弃以往的立场，支持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并且指称“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从来都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2]

但是，加勒比海危机在苏美达成的妥协中很快平息，苏联也随之改变了调门。《真理报》11月5日发表题为《谈判是解决冲突的途径》的社论，主张中印双方停火，但未像10月25日的社论那样，敦促印度接受中国的条件并以此作为开始谈判解决问题的基础；也没有再重复麦克马洪线是无效的那种断言。西方外交观察家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评论说：“人们认为苏联现在在印度问题上保持中立”，“《真理报》暗示结束对中国立场的支持”。[3] 事隔一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即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苏联对中印问题的态度，说明修正主义干了什么坏事。”它支持中国“是表面现象，是在古巴形势需要的情况下的支持”。“31日古巴问题上投降，反过来就不讲麦克马洪线，不讲支持我三点建议，本质的东西又出来了”，“出卖背叛我们，支持尼赫鲁”。康生也在这次会上发表讲话批判赫鲁晓夫“是实用主义者”，“可以瞬息万变，他的话不要相信”，11月5日《真理报》社论就已经变了。[4] 中共中央认为，通过在外交、宣传上揭露印度的斗争，“进一步暴露了尼赫鲁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使现代修正主义者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5]

---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49页

② 《真理报》1962年10月25日

③ 《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1日；《内部参考》第3429号，1962年11月9日，第13页

④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85、90～91页；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91页

⑤ 长春市档案馆，1/1－15/38，第59页

中国就苏联与美妥协之事大做文章，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实际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浪潮的做法，无疑惹恼了赫鲁晓夫，使他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在苏联内部摆明了同情印度、指责中国的立场。12 月 12 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报告时指出：中国声明单方面停火、撤回军队的“步骤是明智的”，但是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把自己的军队撤退到这一冲突发生的那条线上了。不从这些军队当初所在的阵地前进，岂不更好?”“没有什么边界性质的争端不可以在双方都有愿望的情况下不使用武器加以解决。”“只有理智才能制止流血，国家领导人应该有这种理智。”①

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中外交上配合与斗争的变化情况，反映了中苏两党对外战略和外交方针的不同，即如章汉夫指出的：“整个外交方针是对立的，外交上对苏工作怎能不充满斗争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此时对苏联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中苏两国两年来战略方针上的矛盾、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定性为“敌我性质”，是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根本路线的不同，矛盾的性质“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只是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两个国家关系的性质变了”，苏联现在在领土、独立、主权问题上颠覆中国；苏联已是“坏兄弟、修大哥”。中苏关系已成为一种“统战关系”。赫鲁晓夫也不再是“半修正主义者”，在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他已被说成是“叛徒”、“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敌对人民的”。只因为他“是苏联的国家首领”，所以要注意“投鼠忌器”，对他“带点统战性质”，在宣传上先“不提赫的名字”。② 中共的对苏方针也因此发生重要变化，虽然表面上仍然说是

---

① 《人民日报》1963 年 2 月 20 日。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 83、106、107 页；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 92 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 212 页；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 26 页。

1960 年确定的 24 字方针，即坚持原则、团结、斗争，后发制人、反对分裂、留有余地，但是强调的侧重面已很不相同，更加突出斗争的一面，要求采取“攻势”，强调“临阵要斗”，要“敢于斗”，中苏斗争应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的”，而不是“防御、消极、被动”的。[①] 在处于僵持状态的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中共要用革命的、马列主义的两手政策对付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两手政策，并且要不怕走向边缘。[②]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继续“左”转，中国领导人指出：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讲“从现在起，五十年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社会主义彻底变化和胜利的伟大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是历史上比任何过去都不能比拟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进行同过去不同的斗争。有些同志对当代形势认识不足，主张“三和一少”，这同没有很好了解主席的这一讲话有关。[③] 他们认为：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揭露出来了，阶级斗争更加激烈”，“逐渐走向摊牌，走向根本解决矛盾的道路”；“这些矛盾的解决，只能靠革命的办法”，“用妥协的办法是不能解决”的；由此转而提出要“三斗一多”，只是仍然强调“要留有余地”。[④]

事实上，中苏两党此时外交战略方针的分歧和斗争形势，与 1958 年和 1959 年中苏之间外交上的尖锐矛盾和斗争相比较，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中苏两国在领土、独立、主权等国家利益上的冲突，除伊塔事件的影响较大外，中印边界问题等斗争的形式和程度，与那时相比，也无太大的差别，但是中共中央对苏联的定性却有了质的变化。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根本原因，除了前述中国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促使中国外交政策向“左”的方向转化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

---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 110、112、111 页。

②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 22、24 页

③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 46～47 页。

④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 189、190、202～204 页。“三斗一多”，这时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民族主义要斗，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支持要多。

国际共运中左派队伍的出现。中国党的观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多的呼应者，国际共运中新的左派势力的形成，使得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由此，中共中央最终完全改变了对苏方针的基调，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已成定局。

第五节　左派队伍形成与大论战的开始

实际上，1950 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与斗争的发展，国际共运中赞同中共认识的左派也逐渐形成。1960 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当赫鲁晓夫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时，只有阿尔巴尼亚、印尼和日本的党不赞成这种做法。到第二次莫斯科会议时，发展为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印尼、日本、缅甸、马来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10 个国家的党支持中共，反对修正主义。而苏共二十二大后，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有的党的“革命派”通过斗争将“修正主义派”领袖逐出领导机构；有的党因右派将左派开除而分裂成为两个党；有的党左派和右派共存；有的非党组织左，进而成为新的共产党；有的党则是领导层右，基层党员左。总之，左派党的成员已不止 11 个，除了亚洲的左派党之外，拉丁美洲左派队伍正在快速发展，西欧和北美等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左派人物和组织。一支左派队伍出现了。这成为国际共运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①]

值得指出的是，不仅亚洲左派党的旗帜更加鲜明，而且历来变化

---

①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 48、51～56、65 页；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 20～21 页。11 个左派成员国的组成有所变化，苏共二十二大后澳大利亚党由左变右，但古巴作为左派党又加入进来。

很小的欧洲党，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意共左派和法共左派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响应一两年前中共《列宁主义万岁》之文，形成“三呼万岁”的局面，引起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另外，左派队伍在反修斗争中由于缺乏理论武器，许多党来向中共索要刊物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文章。①

左派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以及向中共取经的情况，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看来，这种形势的出现，是与毛泽东领导中共进行的反修斗争分不开的。中共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高举革命旗帜，反对和平主义；高举团结旗帜，反对分裂主义；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反对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这种斗争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党左派的发展。由此，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愈来愈高，“要革命的就要到北京来”。“毛泽东思想日益成为一切马列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的思想武器和团结的中心”，成为“国际运动中广大人民的旗帜”。②

1962年9月，美国《现代史料》发表了两篇文章：《1962年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文章指出：“北京已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代替者。”毛泽东思想“作用很大，影响很大，不能忽视。毛泽东主义已达到一定成熟程度。共产党集团升起了一个强大的具有吸引力的新的领导中心”。这样的估计实际呼应了中共党内的有关认识，同时也引起了中共理论家的强烈共鸣。周恩来9月26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即提到：“现阶段斗争在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上，起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

---

①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0页；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56、65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65、88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201页；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1页

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① 康生则在年末批评中共党内“对主席领导思想，发生某种动摇”，“对主席著作估计不够”的情况，指称“这是十分危险的”，“应当引起很大注意”。②

在国际共运这种新形势、新动态的影响下，到 1962 年末，中国党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的意识大大膨胀，开始集中并明确地提出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谁是真正的领袖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认为：现代修正主义争当领袖，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自居。但真正的领袖不是几个人吹起来的，真正的领袖是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将新的问题提高到新的阶段，为世界人民信服，并为事实证明是胜利的学说。列宁并没有当领袖，但实际上成了国际共运领袖。列宁之后，斯大林应运而生。现在，责任落在了我们身上，“落在我们的毛主席身上”。“今天真正能发展马列主义的是我们毛主席。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说明了这个问题。修正主义自封领袖篡夺领袖是不行的，没有人能赶上毛主席”。“世界革命领导的中心转移到我国”，“马列主义的旗帜，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就丢开了，从莫斯科宣言开始，是我们把马列主义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来了”。全世界革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仅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而且还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③

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领导人首次在 1962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并且确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法，那就是集中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在这两个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始终掌握领导权”。“要认真接受莫斯科裁军大会的教训，决不能

---

① 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第 38 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50/1 –18/148，第 90 页。

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 204、203、212、195 页。

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降低马列主义的原则，迎合修正主义，以至脱离左派，加强右派，增加中间派的动摇”。[1]

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目标明确后，中国领导人着手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以求在“三分天下”，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各占一部分”的世界大势中，[2] 把毛泽东推向世界革命领袖的位置。

其一，开始以积极、主动、进攻性姿态展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领导人已把对赫鲁晓夫是“应该斗争”，还是要“三和一少”与之“讲和”的问题，提高到了是“要不要马列主义”、“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无产阶级的党的问题”的高度，提出：“不斗争只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要马列主义就要斗争。我们历来主张团结，但没有斗争，不可能有团结，放弃马列主义原则，是达不到团结的。”他们并且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进一步与国内问题紧密联系到一起，所谓“反修正主义不仅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其性质是：“要马克思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赫走。”[3]

其二，“积极支持左派的发展，巩固壮大马列主义队伍”。具体言之就是：一方面，加强和左派党的联系，不要怕人家说中国党“干涉内政”、“分裂他们党”和搞“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亚非拉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亚非拉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保证左派的领导。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扩充左派力量，坚持做好左派工作，“这是保卫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核心部分，是我们的真正希望所在”，“这个工作的好坏是关系世界命运的重大问题”。[4]

---

①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4页。

②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19、18页。

③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85、94页。

④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4～25、28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201页

其三，要克服左派运动中没有理论、纲领的缺陷。世界革命要求中共有马列主义纲领，在国际舞台上打出鲜明的旗帜。[①] 对于中共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理论已为时七年，但是，有哪一个国家实践了这一理论呢？目前的国际局势，既不是世界大战的前夜，也不是修正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只能说是“冷战”和“热战”、斗争和谈判互相交织的“僵持共处”的局面。因此，修正主义的政策已经破产了。[②] 中共领导人这时给苏共的新党纲戴上了“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帽子，指出，这个纲领“政治上是反阶级斗争的和平主义”；“经济上是取消思想教育的福利主义”；“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全民国家、全民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苏联要把这个纲领强加给兄弟党，作为国际共同纲领，中共就要反对。而“批判他的纲领，我们工作做得不够”。[③] 要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彻底地、系统地批驳修正主义的谬论。[④] 至此，中共中央实际已在酝酿着要拿出自己的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了。

总之，就是根据毛泽东此时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决定于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做革命的促进派，利用当前有利形势，掌握主动，抓紧时机，发挥效能，调动全局，以展开新的局面，取得新的胜利”的思想，中国党“以我为中心开展工作”，在国际活动中，“冲破修正主义的圈子，逐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独立的一套，使北京成为一个国际活动中心，同帝、修唱对台戏”。[⑤]

1962 年 11 月至 1963 年 1 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11 月 5 ~ 14

---

① 吉林省档案馆，50/1 ~ 18/148，第 64 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 110 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50/1 - 18/148，第 49 页；长春市档案馆，1/1 - 16/53，第 21 ~ 22 页。

③ 吉林省档案馆，50/1 - 18/148，第 80 ~ 81 页

④ 长春市档案馆，1/1 - 16/53，第 28 页。

⑤ 长春市档案馆，1/1 - 16/53，第 28 页。

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11 月 20 ~ 24 日）、意大利共产党十大（12 月 2 ~ 8 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二大（12 月 4 ~ 13 日）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1963 年 1 月 15 ~ 21 日）相继举行。中共中央联络部分管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副部长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保、匈、捷、德四国党的代表大会，分管资本主义国家党的副部长赵毅敏率团出席意共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库西宁、科兹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分别率苏共代表团参加五党会议。各党会议上又形成了对阿尔巴尼亚党的攻击，以及对中共的直接攻击或影射批判。中共代表团认为，这是在苏共组织并指挥之下，对中国党进行的有计划地的围攻，“是修正主义者发动反华运动的一个新步骤”。[①]

各党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在任何情况下，一直参加会议到底，不退场，不作抗议表示”的与会方针和“在目前形势下，公开展开争论，是有益无害的”思路，[②] 另一方面，针锋相对地回应一些党的攻击和批判，其间由于苏共代表未指名攻击中国，中共代表团也不点苏联的名；[③] 一方面，把这种国际会议作为宣传中共主张、提高中共威信、争取并团结左派力量的重要时机，充分利用来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如在意共十大上，除中、苏、南之外，30 个与会外国代表团中，不反华的党已达半数；赵毅敏的发言迎来了热烈的掌声。[④] 在保、匈、捷三党大会期间，有的党公开发言支持中国，一些左派党代表还不避嫌地与中共代表接触，到中国大使馆聚会，或公开在会议休息室

---

① 赵毅敏：《1962 年 11 月至 1963 年 1 月下旬保、匈、捷、德、意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情况》（2001 年 4 月 19 日笔者采访赵老时，赵老提供了这一材料），第 1 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 533 页；长春市档案馆，1/1 – 15/38，第 66 页。

② 福建省档案馆，101/2/1129，第 35 页。

③ 长春市档案馆，1/1 – 15/38，第 66 页。

④ 长春市档案馆，1/1 – 15/38，第 72、70 ~ 71 页。

围坐议论。[1]

面对中国通过古巴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斗争，“更加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2] 左派队伍得到发展的局面，赫鲁晓夫在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称：“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越来越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险显露出来。不看到这一点就是害怕正视事实，回避现实，不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我们时代所肩负的全部责任。”[3] 试图以此稳住阵脚，抑制共运各党对苏共的离心趋势。

这时，尽管欧洲五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以及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共“明显的恶毒的攻击”，[4] 实质上都没有超过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的情势，中共中央却把它看作“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确提出：公开争论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它有利于我们更充分地阐明我党的观点和主张，有利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派力量的成长和发展，有利于提高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的觉悟”，“揭露和孤立现代修正主义，推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5]

不过，由于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实现根本性好转，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国际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主要还是应靠“国内工作的支持，要把国内工作搞好，这是基础”。[6] 由此，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国际斗争的方针应该是：“善于利用僵持状态，争取相对的缓和局势，赢得时间，加速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世界革命力量”；

---

① 赵毅敏：《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下旬保、匈、捷、德、意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情况》，第9页。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6，第5页。

③ 《人民日报》1963年2月20日。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31页；吉林省档案馆，1/1－19/263，第1页。

⑤ 吉林省档案馆，1/1－19/263，第1～2页。

⑥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92页。

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斗争，“三者有主有从，必须把反帝斗争放在第一位”，“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斗争服从于反帝斗争”。会议认为，建立反修统一战线的提法是错误的，要尽量推迟大分裂。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依然是：团结革命派，争取中间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积极支持民族民主运动，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揭露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①] 是年12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对苏留有余地的方针。翌年初，中共中央又要求在对国际共运左派之外的宣传中，“尽可能避免指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实在避免不了时，可以指出其错误，“但是不要给他们戴修正主义的帽子”。总之就是给赫鲁晓夫、苏共留有余地，不直接点名，不希望跟苏共公开破裂。[②]

但是，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已是斗争而不是缓和，着重强调的是“以斗争求团结”，“只有不怕紧张，才能争取缓和”；[③] 具体步骤也是以真正马列主义代表的身份，积极主动地投入国际共运中的路线斗争，扩大左派队伍，实际摆出了与苏共争夺领导权的架势。如此一来，避免与苏共关系破裂、推迟国际共运分裂的设想，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

由于中国领导人把争夺国际斗争领导权的途径确定在了反对美帝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上面，通过反帝斗争进一步揭露修正主义，事实上也就把反帝反修两个目标紧密结合到了一起，所谓的“主从”关系已为相辅相成的关系所取代。这样，中共中央1950年代确立的建立反美统一战线，集中一切国际政治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一个拳头出

①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5、24、26～27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30～531页；吉林省档案馆，1/1－19/263，第3页。
③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6、25页。

击的外交战略，至此，实际上已调整为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战略。

1962年末和翌年初，毛泽东写就《七律·冬云》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吟诵“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字里行间满溢出一股与苏联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豪情。中苏两党关系朝着分手的方向无可挽回地发展下去，大论战的气息已扑面而至了。

为了回应欧洲五党会议提出的挑战，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定稿并确定标题[①]的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正式揭开了国际共运中公开论战的序幕。此后至翌年3月8日，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导下，[②] 中国方面又陆续发表了6篇文章，回答各国党的批评和攻击。这7篇文章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批评苏共，但其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苏共领导集团。即如3月7、8两日毛泽东、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中共领导人所指出的，文章在阐述我们观点时还是针对苏共的观点。这样做既鼓舞了左派，也争取了中间派，促使许多党独立思考究竟对世界形势怎么估计，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对我们来讲，公开论战好处很大，形式上是防御性的，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真面目。[③]

1963年2月10日，莫斯科在发表《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指名批驳《人民日报》1月27日攻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社论的同时，打出了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和停止公开论战的旗帜。[④] 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停止论战举行会谈，共同筹备召开兄弟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14～517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31、245、246～254、260～261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25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52～554页。

④ 《人民日报》1963年2月23日。

党国际会议。3 月 30 日，苏共中央又在公开发表的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的问题。不过，既然两次莫斯科会议实际已将苏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纲领确立为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赫鲁晓夫自然也不会真想就一条新的总路线的问题，引起共运中各党的大讨论，给中共提供争夺领导权的机会。因此，苏共中央信中所说的总路线，仍然是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确立的共同路线。正如其在信中指出的，“最近几年世界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正确性”，因此，“我们深信，没有任何理由来修改这条路线”。赫鲁晓夫所能接受的，只是在筹备和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就最近几年来实际生活丰富了这条路线的新的东西交换意见。[1] 苏共中央这时提出这一问题，其实只是要将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进一步明确为“总路线”罢了。由于共同纲领经过了共产党国际会议的讨论，为各国党，包括中共所接受，因此，它转化为总路线，当然也是合理并且合法的，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中国党此时已不能再接受把苏共的纲领确定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即如前述，中共中央此时已认定赫鲁晓夫由半修正主义沦落为彻底的修正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苏共已是修正主义政党，苏联也已是搞资本主义的国家，领导国际共运的责任已落在了中共、毛泽东的身上。于是，当赫鲁晓夫送来这一契机时，中共中央迅速抓住，于 6 月 14 日复函苏共中央，并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信。[2] 中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了与苏共纲领大相径庭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设想，正式迈出了夺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步伐。应该说，事情发展

---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1957～1969），第 250 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 462～463、476 页。

② 《人民日报》1963 年 7 月 20 日

到这一地步，实在是赫鲁晓夫始料不及的。

7月5～20日，由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与由苏斯洛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了一场聋子对话式的会谈。双方就国际共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各自阐释自己的论点，指责对方的立场观点，[①] 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面评价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函，对中共进行了指名批判。[②]

至此，中苏两党谁都不愿也不能再做出实质性让步。对于苏共而言，让步的结果就是让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它只有继续垄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才能巩固由列宁传下来的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而对于中共来说，让步则意味着向修正主义投降，放弃掌握国际斗争和世界革命的领导权。它只有占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言人的位置，才能成为国际共运的旗手。因此，当意识形态的斗争承载了太多政治斗争的内涵时，两党之间也就没有了妥协的余地。

于是，从是年7月中旬到10月末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莫斯科方面仅在中央一级报刊上发表的批评、攻击中共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700余篇。这还不包括苏联报刊转载的其他兄弟党反对中国党的文章。后来，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停止论战。但是在他说这话后的半个月里，又有38篇反华社论和文章等在苏共中央和地方的报纸上连续发表；10月底至11月下旬，各种刊物则发表此类社论和文章65篇。[③] 中国方面围绕苏共中央公开信，从9月6日到12月12日，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紧锣密鼓地连续发表6篇重头评论文章，全面否定苏共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这就是著名的“九评苏

---

①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69～118、120～172、174～207、211～232页。

② 《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

③ 《人民日报》1963年10月31日、12月11日等。

共中央公开信”的前六评。其他各类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也是铺天盖地。中苏两党以这种形式，正式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国党在论战中斗志昂扬，已无意也无法再刹住对苏共口诛笔伐的气势。

1964 年 1 月初，刘少奇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说，现在不能够停止公开论战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许多左派兄弟党正在兴头上，已经尝到公开论战的好处，正积极行动起来批判苏共。我们要像对蒋介石那样，“宜将剩勇追穷寇”。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穷寇要追，不是穷寇莫追。毛泽东指出，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这样，2 月 4 日至 7 月 14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继续发表三篇长文（七、八、九评），从标题上就鲜明地突出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甚至把赫鲁晓夫称为“假共产主义”。7 月 25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应将反修斗争做通盘考虑。针对其他常委关于以后不要再批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党，首恶必批、胁从不问的议论，他明确说：我们的方针原来就是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批判赫鲁晓夫。现在形势对我们采取这样一个方针更为有利。[①] 中共中央领导人随之在 8 月指出：目前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已进入新阶段，应该集中力量打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②] 中共将批判的投枪直接掷向苏共最高领导人后，两党实际也就彻底撕破了脸皮。

应该说，在共产主义体系以一党权威为权力基础的政治模式，以及共产国际时代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各国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随着各党、各国作用和影响的变化，新的力量脱颖而出，原有领导者的地位也必然遇到挑战。中苏两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660 ~ 662、799 ~ 800 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1957 ~ 1969），第 255 页。

党这场以意识形态斗争为表现形式，以捍卫和夺取国际共运领导权为实质内容的论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起来进行共产主义运动时对共同纲领、总路线的需要，则是与各党根据各自国情制定斗争策略路线的需要相矛盾的。由于国际共运确立领导中心的运行机制决定了这条总路线要以领导中心的方针政策为核心，其结果势必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以一党的纲领路线涵盖众党的利益、目标和任务。鉴于各国党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不同，所拥有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背景各异，要使各党派一致接受一条以一党理论为基础的共同纲领和总路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场论战的大前提就错了。中苏两党都没有理由自认为可以代表共运各党的利益和要求，进而争相把自己的纲领路线确定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在这种前提下，无论是以苏共还是以中共为核心，其结果都是要用自己的方针政策约束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而要求国际共运中的各党服从苏联或是中国的利益。

至于论战的具体内容，可以说，导致两党口诛笔伐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对时代的认识，其他观点只是这个问题的延伸。而对时代问题分歧的根源，即在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间相差至少二三十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存在较大差异。当苏联在世界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时，中国还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而帝国主义的对华遏制政策，进一步令中国领导人低估或者不愿意承认二战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出现后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制约等诸种因素对时代的影响，依然坚持列宁几十年前所创立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学说，认为当前时代的特征仍旧是战争与革命。这种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认识基础，决定了中共的对外、对内政策要与苏共的有所不同。当双方把论战的目光聚焦于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时，谁真正具备领导国际共运的资格

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两党分手的大局由此而确定。

总之，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中苏两党关系在思想和感情上已经破裂，组织关系的中断只是时间问题了。当论战的气势日趋激烈时，两国关系也愈益紧张起来。此时，既然中国领导人已经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敌我性质，两党关系破裂后，两国关系发展的趋向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苏联为依托的国家军事防御战略是否还可靠？中共中央内部是否已有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否巩固？一系列问题引发了毛泽东新的思考，中苏关系的历史进程随之出现了新的转折。

第三章

中苏同盟关系的彻底瓦解

- 毛泽东对苏安全战略思路的转变 / 503
- 反修与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 / 512
- 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流产 / 518
- 周恩来访苏与两党会谈破裂 / 536

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大论战，造成了两党关系实质上已经破裂的现实。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事实上以党际关系为基础的模式，决定了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也必将走向破裂。这种状况，使得1964年中期成为毛泽东思考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一个关键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有两条线索交错发展着，它们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事务的观察，为他的忧患意识注入了新的因素。在对外患与内忧思考的相互作用下，毛泽东于考虑将中国集中反帝的外交战略调整为反帝反修外交战略的同时，做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一是对国家军事防御战略做出调整，由单一对美转变为双向的对美对苏；二是对内酝酿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由此，苏联开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假想敌，中国

则被视为觊觎苏联领土的扩张主义者，双方都开始加强针对对方的军事防卫措施。敌友角色的这种质的变换，彻底扭转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

第一节　毛泽东对苏安全战略思路的转变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①] 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而当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军事压力。

1960年8月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边境冲突肇始[②]后，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不断发生。1963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③] 这种提法引起苏联方面的密切关注，在莫斯科看来，中国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④] 随着中苏边界摩擦事件的增多，以及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立场的趋向强硬，苏联的回应带有了军事色彩。一方面，从1963年起，莫斯科不仅适度增强在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力量，而且还加强对蒙古的军事援助，苏军也自是年开始重新进驻蒙古布防。[⑤] 7月，苏联还与蒙古签订了

---

①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24页。

②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89页；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1960年9月28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9～230页。

③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社论），《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

④ A.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北京印刷三厂工人理论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译，商务印书馆，1977，第211页。

⑤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32页。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宣布，因处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无必要保持常备军。苏军于50年代分批撤出。见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4页。

《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其后，苏军派出许多勘探小分队，在蒙古的铁路两侧及其以东边境省份活动，为苏军的进驻勘察阵地。[1] 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9月视察东北中苏边境时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赫鲁晓夫集团在中苏边境增加了军事力量。据我边防哨所观察，有些地段的苏联边防军大约增加了一倍，哨所也有增加。增加的部队，发现有从苏土（耳其）边境调来的。[2]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将华沙条约组织的职责由欧洲东扩至亚洲，关注远东地区事态的发展。1963年7月10日，赫鲁晓夫致函哥穆尔卡等华约成员国领导人，谈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已向苏共中央提出加入华约的请求，苏共中央对此持肯定态度。时隔数日，他又表示，苏共中央建议在7月26～27日召开的华约成员国首脑和国防部长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讨论蒙古的这一申请。[3] 苏联方面加强与蒙古关系的种种举措，已经明显带有针对中国的军事防卫意图。尽管赫鲁晓夫接受蒙古加入华约的建议因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但是，中国方面很有可能从罗马尼亚方面获得了这个信息。

9～10月，中央军委中苏、中蒙边防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修改中苏边防斗争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解决边防斗争中亟须解决的实际问题。会议明确中央确定的“不进不退、不主动惹事、后发制人”的边防斗争方针，并提出：我们在军事上要有所警惕和准备。修正主义是什么坏事也能干得出来的，我们要估计到修正主义可能搞各种阴谋破坏，甚至做出冒险的行动。对于修正

---

①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以下简称《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第83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84～88页。

③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119～121、172～174页。

主义可能挑起的边境军事冲突，我们要有必要的警惕，做到有备无患。[①]

同时，中蒙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泽登巴尔不仅在8月亲自为苏联《真理报》撰文批评中国，而且还于9月4日在莫斯科对记者发表谈话，点名指责中国。1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分裂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决议，蒙古国内的反华宣传出现了空前的高潮。[②]

1964年2～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在此期间，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一些教科书、学术著作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也不确切，甚至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中国版图内。为此，苏共中央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③] 与此同时，苏联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④] 据中方观察，在中苏西段边界，自7月以来，苏方前沿兵力增加，边防设施增加，各种军事训练和演习频繁，高级官员不断到苏中边境地区活动。[⑤] 可以说，这一年已成为两国边界地区局势紧张程度逐步升级的一个转折点。

这样，进入1964年后，上述苏蒙关系的新动向、苏军在蒙古调动的迹象、中蒙关系破裂的前景，以及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迫使毛

---

① 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72、19页。

②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第81页

③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368～369页。

④ 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苏联国防开支估计：趋势和前景》，转引自《苏联问题译丛》第2辑，三联书店，1979，第294页。

⑤ 伊犁州档案馆，11/1/129，第111～113页。

泽东开始考虑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问题。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①] 5月15日~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其间，毛泽东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由解决“吃穿用”问题扭转为以战备为中心，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②] 5月27日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③] 周恩来则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④]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是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⑤] 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防御战略一直是针对美国的，其重点防御方向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⑥] 林彪关于“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意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仍然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但是到1964年，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

---

① 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64年2月27日。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0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43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778页。

④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69页。

⑤ 黄瑶、张明哲主编《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472页。

⑥ 1998年6月笔者与中国军方学者的谈话记录。

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6月16日他在十三陵水库的讲话中提出：还有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我考虑很久了。过去讲过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一是敌人可能从渤海来，从塘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二是敌人从青岛来打到济南，然后向北，向天津发展；三是敌人从连云港打来，占领徐州、开封、郑州、洛阳，从中间把我们南北打断；四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占领南京、武汉，把南北切断。顶要顶一下，也可能顶不住，完全放在顶得住的基础上考虑是不行的，要放在顶不住上考虑。[①] 此后，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②]

尽管毛泽东上述认识的着眼点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但重要的变化在于，他已开始从军事防御战略的角度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林彪当时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考虑问题，故而在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③] 林、毛这种认识上的不同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对苏安全战略的再思考。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④] 这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材料中毛首次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同他们讨论了苏联占领日本千岛群岛等问题。在谈到“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时，毛

① 福建省档案馆，101/12/120，第73~76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54页。

③ 黄瑶、张明哲主编《罗瑞卿传》，第476~477页。

④ 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54页。

泽东说："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① 事隔一日，7月12日，参加这次会见的日本人在香港就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发表了答记者问。次日，日本三家主要报纸都详细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强调说，中国领导人支持日本在千岛问题上的立场，毛泽东表示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并提及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领土问题，说毛泽东在支持归还日本北方领土要求的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了苏联。8月1日，日报还发表了周恩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声明说，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是中国的一贯政策。②

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重大反响。9月2日，《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同时配发长篇编辑部文章《评毛泽东同一批日本社会党人的谈话》，严厉驳斥说：毛泽东与日本议员的"这次谈话暴露了中国领导人迄今不敢大声谈论的目的和立场"，"中国领导人现在甚至不想掩饰自己的扩张野心了"，苏联"面对着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露骨的扩张计划"，毛泽东的论点实际就是"要求重新分配领土"。文章还提出警告："重划世界地图的任何企图"都"可能

---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X1/35/116，第37~46页。

② 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1964年7月13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1964年8月1日；Dennis J. Doolin,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ino – Soviet Conflict, Documents & Analysis*, Hoover Institution Studies: 7,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1965, pp. 44 –46, 42 –44。日本新潟大学的真水康树教授专门帮笔者查阅并复印了日本报纸对这两次会谈的报道文章，由此订正了笔者以前撰文所引用的俄国学者有关叙述的错误。笔者在此特向真水教授致谢。

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并表示“最坚决地谴责中国领导人的扩张主义观点”，苏联的边界是由各族人民在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苏联“各族人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1] 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利用会见日本议员代表团的机会，以尖刻的口气回应毛泽东说：俄国的沙皇进行了掠夺性的战争，那么，中国的皇帝又干了些什么呢？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并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中国的帝王侵占了朝鲜，占领了蒙古、西藏和新疆。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进行厮杀。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如果侵略者胆敢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我们制造了保卫自己国家、保卫民族、保卫各国人民和平的最先进的武器。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可怕武器的全部毁灭性力量，我们希望永远不要使用它”。“然而，如果别人进攻我们的话，我们将使用自己手中拥有的一切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击。”[2]

苏联的强硬态度，对毛泽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3] 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

① *Doolin,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pp. 47－57；外档，105－00295－04，第25～32页。

② 《真理报》1964年9月16、20日，转引自S. N. 冈察洛夫、李丹慧《俄中关系中的“领土要求”和“不平等条约”》，《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10月号，第113～114页。

③ 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9日。

苏安全战略的调整问题了。

是年9～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勘察了当年苏军实施远东战役时主攻方向的进攻路线和日军构筑的工事。[①] 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加强对中苏西段边界防卫工作的关注。当时身处“反修前哨”的伊犁军区在总结加强军事情报工作的报告中就提出：要“以反修斗争为中心，配合反帝，以苏联为重点，兼顾蒙古，以掌握当面动向和搜集整理基本情况、战备资料为主要内容，随时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力求提早察觉敌人的企图，保障边防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报告将所属各军分区搜集研究掌握动向情况的任务明确为以掌握北疆中苏边境苏军军事动向、边防设施、工事构筑、外逃分子回窜破坏和可能的挑衅活动为重点，指出目前急需整理的战备资料，主要是中苏，次之为中蒙边境资料，并将对外军作战的研究确定为军区所属各单位的主要工作之一，而且强调研究对象以苏军为主，要求各单位应特别注意对苏军攻防和遭遇战斗行动特点进行研究。报告所附的1964年军事情报调研要点有八条，包括苏、蒙的军事动向、军事实力、兵力部署、后勤补给，苏、蒙在中苏、中蒙边境西段地区的做法、演习情况，苏、蒙境内主要军事目标及边境兵力资料，苏蒙军事关系等。[②] 新疆军区也向总参呈报了“中苏方向战备、作战预案”、“中苏方向作战方案”等文件。[③]

---

① 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54页；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页。

② 伊犁州档案馆，11/1/129，第135～141页。

③ 笔者1998年8月曾在新疆军区档案馆查阅档案目录，见有1964年初中期新疆军区司令部向总参呈报的“中苏方向战备、作战预案”、“中苏方向作战方案”等条。不过，笔者未能获准查阅具体材料。

10月，赫鲁晓夫突然倒台，中国领导人利用这一机会改善中苏关系的尝试未果。[①] 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终于进入了不可摆脱的螺旋。

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防备苏联的成分。如果说1960年代初中国反帝反修，所谓“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的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了一起。换言之，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

1965年初越战升级后，中美通过信息沟通达成了双方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17度线的默契。[②] 在毛泽东的考虑中，美国已经构不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更大的战争危险可能来自北方的苏联。4~5月，根据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应付最严重局面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了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三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地区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③] 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对苏防御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点。

对苏联威胁的这种估计，以及对苏安全战略的再认识，不仅不断坚定了毛泽东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

---

①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19页。

② 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③ 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第55页；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页。

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毛泽东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所谓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在他看来，防止中国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一场政治革命，即“文化大革命”。

第二节　反修与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

毛泽东高举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当然是认为自己的思想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中共的方针路线代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为此，中国应当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中共应当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但是，他这时更加关注的还是修正主义在中共党内的影响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毕竟，就意识形态的评判而言，修正主义的敌意比对帝国主义的敌意更深。在他的认识中，修正主义颠覆的危险要比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大得多。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国内政治风向发生逆转后，把国内问题同国际修正主义问题挂钩，成为毛泽东观察和分析党内政治形势的一个基本思路。在毛泽东对“三风”现象和“三和一少”思想展开严肃批判，大力强调阶级斗争，告诫全党要警惕国家变色之后，1963 年初，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交中央讨论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要点》仍然认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

标，应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主，对于国防和发展尖端军事技术总体上应当收缩。此项发展战略的主旨在于继续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获得中共中央多数人的支持。[①] 这种情况无疑加重了毛泽东的忧虑：不从政治上解决根本问题，只埋头经济建设，中国将向何处去？尽管他最终对此发展方针表示了支持的态度，[②] 但这种着眼于经济利益和建设的趋势，显然是同他的政治发展战略大相径庭的。

于是，1963 年 5 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总题目叫做“反修防修”，集中讨论国内防修和国际上反修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几次讲话，于此前后写的许多批语，以及由他口授、陈伯达整理、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中，继续突出强调了阶级斗争和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指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并明确提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③] 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时，直接给“三和一少”定性说：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④]

进入 1964 年后，毛泽东关于内忧问题的考虑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方面，对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估计更加具体化了。根据毛泽东的认识，苏联之所以产生修正主义，在国内是本国资产阶级的产物，是贵族工人和富裕农民的产物，在国际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产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 1194 ~ 1195 页。

② 薄一波：《关于一九六四年计划的问题》，《党的文献》1998 年第 4 期，第 5 ~ 6 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561 ~ 563 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 1109 页。

④ 毛泽东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记录，1963 年 5 月 22 日。

物。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已经是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1] 而中国全国有地主资产阶级3500万，在工厂、农村、机关，有那么少数人就赞成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搞了15年社会主义革命，结果还有一些人民公社在敌人手中，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则为资产阶级所掌握。[2] 另一方面，对党内存在修正主义分子的估计更加严重化了。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党也是不纯的，建设社会主义15年了，还有国民党。[3] 因此，中国也有修正主义因素，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4]

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必须迫使全党把工作重心再次转向阶级斗争，转向防修斗争。而实现这种战略上的转移，就需要渲染一定的氛围，制造必要的舆论和创造有利的条件。是年，在毛泽东关于从外患转为内忧的认识及其向党内的描述中，国内修正主义的表现是具体的，将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的方向是明确的，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所显示的后果是严重的；而且，开展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已经找到，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目标也越来越集中了。总之，从在国际上反对和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转向在国内发动阶级斗争以保证中国的政治取向，毛泽东的思路清晰，步骤分明。

第一，将国内、党内修正主义的表现进一步具体化，向全党讲明，修正主义在党和政府中的确是存在的。1月，毛泽东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

---

① 毛泽东同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记录，1964年1月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谈话记录，1964年5月15日。

② 毛泽东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谈话记录，1964年9月4日；毛泽东会见哥伦比亚、瓜德罗普、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外宾谈话记录，1964年7月13日；毛泽东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16日。

③ 毛泽东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谈话记录，1964年9月4日。

④ 毛泽东会见哥伦比亚、瓜德罗普、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外宾谈话记录，1964年7月13日。

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1] 春节前，他在接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夫妇时则明确指出，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就是统战部、联络部和农村工作部；[2] 并于4月接见日共代表袴田里见等人时说：中国党内有赫鲁晓夫的同志。[3] 在5～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中国基层政权有1/3权力不在我们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手里的判断；刘少奇也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4]

第二，明确把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的大方向，让全党知道，反修防修任务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国际上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向中央决策层宣布：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的防修反修问题。[5]

第三，描述出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后果，使全党明白，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存在与帝、修、反的侵略和颠覆同样会使无产阶级丧失国家政权。毛泽东在2月会见金日成时就曾忧心忡忡地谈道：如果让彭德怀一类的人“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而且还特别强调说：“有些人不作声，但是等待时机，所以要提高警惕”。[6] 此后不久，他在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14～15页。

② 指农工部部长邓子恢支持包产到户、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只讲统一战线的同盟关系，不讲阶级斗争关系。见毛主席接见威尔科克斯夫妇谈话记录，1964年2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编《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1册，2000，未刊，第347页。

③ 毛泽东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第二次谈话记录，1964年4月10日。

④ 邓力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1949～199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457页。

⑤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733页。

⑥ 毛泽东同金日成第二次谈话记录，1964年2月29日。

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在6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①] 在6月14日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时，毛泽东要求“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②] 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议论，不仅是出于对外部威胁的考虑，更主要的还在于要提防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国内发动政变。7月14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最后一篇论战文章“九评”即强调指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③]。

第四，做社会舆论和群众基础的铺垫，找到开展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毛泽东一方面继续领导与苏联的公开论战，组织撰写并审阅、批准发表七、八、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明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在群众中为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做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其中“九评”所介绍的，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15条理论、政策，事实上已为日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勾勒出了雏形。另一方面，毛泽东向全党、全国明确，在国内开展这场政治斗争必须依靠党内外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毛泽东看来，不仅搞经济建设需要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那样开展群众运动，政治上的反修斗争只在党内进行也是不行的，1959年党内反右倾开展不久便开始进行甄别，有人随即出来翻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778～779页。

② 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248、250页。

③ 《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子。能够制约党内反对意见的真正力量在于发动广大群众。事实上，此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四清”运动就是广泛动员党内外群众参与政治斗争的一个尝试。

第五，让广大群众看清这场斗争的最终目标。在6月14日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时，毛泽东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1] 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四清”问题，毛泽东开始透露出其矛头所向。当与刘少奇等人在对“四清”运动性质的评判上发生分歧时，他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2]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3]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真正危险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1月14日发出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更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 斗争的最终目标越来越集中和明朗化。[5]

至此，发动一场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准备和铺垫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如何投入一石而激起千重浪——选择适当的时机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但是，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作为假想敌的形象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时，中苏之间正在进行的边界谈判却有希望达成协议，苏方做出的让步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注入了新的缓和因子。由此，中苏边界谈判的成败、影响问题，悄悄地浮出于中苏关系的暗流。

① 黄瑶、张明哲主编《罗瑞卿传》，第471~472页。
②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254页。
③ 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斯诺谈话记录，1965年1月9日。
④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255页。
⑤ 据协助毛泽东起草文件的陈伯达说，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要整刘少奇了。见王力《现场历史》，第147页。

第三节　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流产

在中苏之间7600公里长的边界上，实际存在着三条界线，即条约线、苏图线和实际控制线。[①] 中俄国界形成的过程及中苏边界三条线并存的状况，潜在性地构成了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三笔领土账：其一，中国在与俄国签订的19个条约中被迫割让的15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②] 其二，中苏国界三条线并存的复杂状况造成的3.5万多平

---

① （1）条约线。中俄之间的定界条约共有28个，最早者为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最晚者为1915年签订的《中俄霍尔果斯河划界文据》。通过这些文件，最终划定的中俄国界线总长约11000公里。1946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北段国界大部分成为苏蒙边界后，中苏国界东段长4200多公里，西段长3300多公里，7600公里的中苏两国边界最终确定下来（吉林省档案馆，77/6/12，第47页；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24页）。在中俄国界形成并演变的过程中，1840年鸦片战争是一个转折点 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从此发端，随着中国国力的日趋衰微，沙皇俄国政府通过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等19个事实上不平等的条约，割去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42页；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24页）。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与中国政府谈判解决沙皇俄国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悬案始，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正式对外宣布承认过中俄之间签订的割让中国领土的条约和协定，但是也从来没有正式对外宣布过不予承认（*Мясников В. С.*，*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2001，с. 191－194；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9页；唐屹主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4册新疆卷（二），台北，2001，第440～443、448～454页）。这即在实际中客观上承认了这些条约和协定。（2）苏图线，即苏联方面根据其所说的历史形成线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图（东段为十万分之一，西段为二十万分之一）所标的边界线。苏图线在许多地方偏离条约线画在中国境内，有些地方偏离的幅度还相当大，事实上违约划走了中国的领土。如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的边界线几乎全部画到中国岸边，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岛屿划归了苏方。中国历届政府也一向不承认苏图线。（3）实际控制线。苏方的实际控制线在有些地区同条约线或苏图线一致或基本一致，而在有的地段则不仅大大越过了条约线，而且还越过了苏图线，实际占据了一些中国的领土。中方的实际控制线基本没有越过条约线，但在有些地区越过了苏图线。参见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9～10页；马叙生：《踏勘边界 谈判交锋——找回失落的国界线〈之二〉》（以下简称《踏勘边界》），《世界知识》2001年第12期，第42页；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26页；唐屹主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1册东北卷，第149～151、364～368页；唐屹主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3册新疆卷（一），第139～141页。

② 1964年3月5日中苏边界谈判第二次全体会议中方代表团团长曾涌泉的发言，*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Москва，1996，с. 351；*Галенович Ю. 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ＸＸ веке：Граница，Москва，2001，с. 90。

方公里的争议地区；[①] 其三，沙俄通过武力非法占有的 17.1 万多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和江东六十四屯。[②] 这几笔账客观上的长期存在，成为影响中苏两国关系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 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在着手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确定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其中规定，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国界，应按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按照一般国际惯例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③] 这实际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

---

① 具体情况为：中苏边界西段共有争议地区 19 块，面积 3.4 万多平方公里，其中帕米尔地区 2.8 万平方公里，其他地区 6400 平方公里（新疆自治区档案馆，12/44/182，第 85～87 页；马叙生：《踏勘边界》，第 43 页）。中苏边界东段，水界共有争议岛屿 600 多个，加上有争议的洲渚即河滩地，总面积 1300 多平方公里，其中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江 600 余岛屿 750 平方公里，抚远三角洲即黑瞎子岛一地 350 平方公里，苏方控制的“界外领土”额尔古纳河地区苏联地图线中国一侧的河滩地，即额尔古纳河十八洲渚 281 平方公里（《人民日报》1969 年 5 月 25 日；*Ткаченко Б. И.*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фактах，Владивосток，1999，с. 50；2004 年 1 月 2 日李丹慧、沈志华采访李凤林大使记录；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 12－13 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2 册，三联书店，1959，第 787 页）。另外，还有争议水面约 600 平方公里（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 725 页）。陆界上有些地区苏方实际控制线越过了条约线，但面积很小，总计约 16.56 平方公里（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 13 页）。

② 此两处按照中俄历史条约规定属于中国。其一，唐努乌梁海地区（位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方向俄国的东西伯利亚），面积约 17.1 万平方公里（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 10 页）。1914 年 4 月 5 日沙俄政府宣布俄国为乌梁海的保护国，并于是年派军队开进这一地区。1921 年 8 月 14 日乌梁海宣布成立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 年 10 月 11 日图瓦作为俄罗斯联邦图瓦自治州加入苏联，1961 年 10 月 10 日改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承认过图瓦的国家主权（*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42、34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译《苏联百科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 1314 页；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第 241 页；*Мясников В. С.*，*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с. 185）。其二，江东六十四屯（位于今黑龙江省黑河市黑龙江对岸俄国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地区），面积约 4500 多平方公里。根据 1858 年中俄瑷珲条约的有关规定，中国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割让给沙俄，但保留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在原地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1900 年 7 月沙俄军队违约占领该地后，发布命令，宣称江东六十四屯“已归俄国当局管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 4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0，第 247～255 页）。该处此后始终没有归还中国。

③ 廖心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问题的原则和办法》，“1950 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04 年）论文，第 8 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309 页；《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第 237～238 页。国际法的原则和惯例是：一个国家在国体改变和新政府成立之后，对于旧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政治的或其他性质的

之初对此类旧条约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方针，而采取了事实上予以承认的态度。此方针对于解决中国与其他邻国，包括与苏联的疆界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未正式对外宣布承认不平等的中俄界约和涉及边界条款的中俄条约，但在事实上已经遵照国际法的有关原则，承认了这些界约和条约，接受了中国原有领土的法律地位。条约线是中国政府基本确认并遵守的中苏边界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之间的第一笔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账”已经销账了。

在19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时期，中国政府也未提出过与苏联之间还存在几笔领土账的问题。[①] 对于中苏领土争议问题和边界纠纷，中共中央始终坚持谨慎、宽容和谦让的宗旨，以及和平协商解决问题的方针；苏联方面采取的也是讲友好、讲团结的态度。[②] 1958年中国开始调查中苏边界问题之后，尽管中苏两党分歧加深，冲突不断，但是在强调继续加强同苏联团结合作的总方针的指导下，在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的舆论宣传氛围中，有关中苏边界的历

条约可以继承或不继承，但是对于划定两国边界的条约必须继承。如果需要进行调整，也必须在承认已经签订的旧条约之后，通过同对方政府协商，加以调整，不能单方面宣布取消或修改边界。

① 1950年代，中国领导人在与苏联领导人进行内部会谈时，曾几次提及中苏之间有关领土的历史问题。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回忆，1950年毛访苏时曾向斯大林提过此问题；1954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华时，毛曾询问是不是可以把外蒙古归还中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370页；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第447～448页；广西档案馆，X1－35－116，第39～40页；外档，105－01295－07，第1～3页）；1956年4月米高扬访华时周曾与其谈过这些问题；1957年1月周应苏方请求出访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帮助协调解决波匈事件后赫鲁晓夫与波匈之间的尖锐矛盾。其间，周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在批评莫斯科的大国主义时，以“东从日本起，中国、中东、东欧、一直到北欧的芬兰”为例，指责了苏联历史上从欧洲国家划分领土的问题（外档，105－01295－07，第1－3页；外档，105－01897－03，第24页）。不过，除1957年1月周的简略谈话外，笔者目前尚未见到其他几次谈话的具体内容。而周的说法尽管示意了中苏之间也有领土问题，但只表明中国领导人仍然记得这笔领土旧账，并无任何“算账”之意。另外，这几次谈话都是两党领导人的内部谈话。

② 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68～81页。

史和现实的调研工作仍然平和地进行着。中苏国境上蜿蜒着一条和睦的边界线。

事实上，如果在中苏同盟继续牢固、两党两国关系继续友好的道路走下去，中国政府随着边界调查摸底的深入，俟条件成熟后，应该可以找到与苏方各自都能接受的结合点，达成某种共识，进而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但是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由分歧加深到实际破裂，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开始逐渐被政治化，事务的发展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①]

1960年4月，周恩来出访尼泊尔，在2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提问“苏联与中国是否也有几段边界没有划定”时，周恩来回答说：“在地图上有些不大的差别，很容易和平解决。”[②] 但是不到两个月，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其影响旋即在中苏边境事务中表现出现。6月末，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发生了中国牧民大规模越界，遭到苏联边防军武装驱赶的事件。[③] 中苏界务纠纷升级为一场冲突。8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递交就此事件指责中方破坏苏联国界的照会，罗贵波声明说：“你们认为中国公民和牲畜所在的领土是苏联的领土，而我们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④] 22日，罗贵波在对苏联驻华大使馆所作的口头声明中，进一步使用了“争议地区”的术语，提出：“我们请求苏联方面立刻采取有效措施将自己的边防部队从上述有争议地区撤出去，不要对我方的畜牧业工作人员进行武

---

① 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1950年代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的方针政策及中苏边界状况等问题，详见李丹慧《同志加兄弟：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一）》，《国际冷战史研究》2004年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71～102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14页；《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③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89页；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1960年9月28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9～230页。

④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182页。

力威胁”，“因为这个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①]

不过，随着中苏关系进入短暂的缓和期，对于处理与苏联之间的边界纠纷和摩擦，中国方面的态度还是积极并平和的。8月22日和9月21日，中国政府曾两次主动向苏方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②] 此时，中苏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交涉，仍是围绕着有争议的领土问题进行，虽然外交部已组织编写了有关中苏国界条约及其相互关系的文件，具体罗列了这些界约与中国的失地情况，[③] 但是，周恩来在10月国务院的会议上仍然强调指出：“如果大家都开始算遥远的历史账，那么世界就要大乱了。”[④]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被中共认为是修正主义性质的新党纲后，中苏两党以批判和维护阿尔巴尼亚党的形式，开始酝酿新一轮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苏之间的边界斗争也随之出现了一个随着中苏两党政治斗争起伏而波动的形势。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斗争，日益在两国边界事务中反映出来。有的中苏边界省份的地方领导机构开始指令中国渔民在有争议的岛屿上捕鱼，并让他们告诫苏联边防军人：这些岛屿是属于中国的，破坏边界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我们的渔民离开这些岛屿”。[⑤] 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根据以后中国政府的声明，1960年至1964年9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1674起。[⑥] 而据苏共领导人日后的指责则是，1962～1963年，苏联边界经常受到

---

① *Галенович Ю. 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с. 80.

②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9页。

③ 伊犁州档案馆，11/1/133，第58～69页。

④ 《人民日报》1969年10月9日。

⑤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05页。

⑥ 1969年5月24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指出：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1964年增加了一倍半。见《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1960年至1964年9月苏方挑起边境事件的数字据此推算而出。

侵犯，有时还出现粗暴的挑衅事件。1962 年中国方面破坏边界近 5000 次，到 1963 年，闯入苏联领土的不仅有中国公民，还有中国军人。自 1963 年 5 月起，在中苏边界东段，中国边防军和受他们指使的个别中国公民向苏联边防军猖狂地进行挑衅。这一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就有 175 起。[①]

1963 年 3 月初，《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公开声明，中苏之间还存在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这一论题的提出表明，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转变为在意识形态上主动进攻和以斗争为主之后，中国政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4~5 月间，面对渐趋紧张的边界局势，中苏两国政府互发照会，商定于翌年 2 月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边界谈判。[②] 9 月 27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 月 19 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③] 而苏共中央则在翌年 2 月召开的全会上申明，苏联政府倡议就苏中边界某些地段明确划分一事进行磋商的出发点是，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苏中边界是历史上形成的，只是需要确定其中某些地段。[④] 至此，中国的边界谈判思路中包括两项议程：意识形态色彩的不平等条约的论争和有争议领土的具体事务的磋商，已是明确无疑；而苏联的谈判设想依然是就事论事，即讨论边界走向中的某些个别问题。

这样，在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如火如荼、两国边界摩擦和边防斗争趋向紧张的形势下，1964 年 2 月 25 日，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以苏联边防军司令员济里亚诺夫上将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北京饭店举行首次会晤。苏联方面提出，

---

①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10 卷，第 345、204~205、138 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1957~1969），第 254 页。

③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 210、212 页。

④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10 卷，第 345 页。

关于“某些地段的苏中国界线的走向问题”的磋商开始了；中国方面则表示，“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了。[①] 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苏两国第一次边界谈判启动伊始，即显露出两国谈判思路上的原则性分歧。此后至 8 月 15 日止，双方共举行了 8 次全体会议、10 余次团长会议、30 多次顾问专家会议。[②]

中国代表团的谈判活动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谈判方针到具体做法，都要请示周恩来，重要问题还须请示毛泽东。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是：肯定沙皇俄国同清政府签订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以分清历史是非；为照顾现实情况，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条约割去的领土不要求收回，但条约规定属于中国而被沙俄和苏联占去和划去的领土原则上要无条件归还中国，个别地方归还有困难，可通过平等协商进行适当调整。[③]

而毛泽东为中国代表团确定的谈判底线则为，历史上的中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必须提出，只要苏方承认这一点，那么，3.5 万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中方可以都不要了。[④] 这一底牌的把握，在毛泽东来说，应该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先就边界问题与苏方开始谈判，缓解边境紧张局势，以保证他计划之中的那场政治大革命顺利启动；与此同时，根据苏联难以认同“不平等条约”定义的估计，挟意识形态大论战的政治激情，坚持对苏方针以斗争为主的基调，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原则条件，辨明历史大是大非，以对国人有所交

---

① *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с. 88 –89。

② 马叙生：《踏勘边界》，《世界知识》2001 年第 12 期，第 43 页；*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вXXвеке，с. 104；*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Москва：ИДВ РАН，1996，с. 383。

③ 马叙生：《踏勘边界》，《世界知识》2001 年第 12 期，第 43 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第 54 页。

④ 参见 2006 年 3 月 24 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李凤林大使记录。

代并充分暴露赫鲁晓夫的反华嘴脸。

不出毛泽东所料，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提法反应极大。苏联政府指示代表团：如果中方将提出更广泛的领土要求，或者将尝试对现存的苏中边界条约提出异议，并将其作为不平等条约的话，那么，代表团应该驳回这些要求，同时向他们表明这些要求是毫无根据的。[①] 毕竟，就莫斯科来说，从成熟的法制观念出发，如果这次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那么该项成果将是不牢靠的。尤为重要的是，接受了中方的这一立场，就意味着中国拥有在未来重新审理两国边界问题的权利，由此，一旦两国关系恶化，这将成为中国要求收回被割让领土的法律依据。这不啻授人以柄。

此时作为谈判对手的中苏双方，不仅都带有维护国家利益的敌对情绪，而且也继续担当着意识形态辩护士的角色。2 月 26 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中苏双方围绕中俄界约的性质和谈判的基础问题进行了交锋。中国代表团坚持认为，与当时的中苏边界有关的 19 个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强调列宁时期就宣布废除中俄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并表示，中国政府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出发，为巩固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仍然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东部和西部所有边界线的走向，界约规定属于谁的就归谁所有，解决存在于边界两个地段的所有问题，缔结关于边界线的新条约。苏联代表团则主张在条约线的基础上，以历史形成线和实际控制线为依据，就某些地段苏中边界线的走向问题，共同讨论和制定出双方一致同意的文件；表示坚决不接受“不平等条约”的论断；强调说：自签署这些条约之日起，在漫长的时期内，边界线已

---

① *Мясников В. С.*，*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с. 201，202.

经被牢固地确定和保留下来，没有任何一方提出过重新划界的要求；指出：苏联是旧俄条约和协议的法律继承人，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旧中国条约和协议的法律继承人；呼吁中国代表团研究具体问题，而不要展开政治辩论；同时声明说，苏联代表团将研究关于共同重新划分所有边界线和签署有关边界的新条约的问题。[①]

在3月5日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苏双方进一步阐述了各自的立场。中方代表提出了沙俄侵占中国15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的问题，表示中国政府不要求收回；特别强调说，中苏之间仅存在一条边界线，即条约线，苏方应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这一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彻底解决中苏边界东、西段的所有问题，而非仅确定某个单独地段的边界走向；会谈结果应签署一个新的条约。苏方则明确提出“三条线”论，即条约线不是唯一基础，历史形成线和实际控制线也是谈判的基础；否认15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问题；认为此次谈判的任务是明确某些边界地段的走向；会谈结果应是签署一个“描述确定地段边界线走向的双方议定书”。[②]

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虽然按照所收到的莫斯科关于“不能把事情演变成政治辩论”的指示行事，[③] 却还是为中国方面154万多

---

①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50－351；*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Ｘ веке，с. 111－112；马叙生：《踏勘边界》，《世界知识》2001年第12期，第43页。事实上，1919年7月列宁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提出废除的中俄条约并不包括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订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条约。1920年9月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以后的中苏磋商和谈判中，苏方代表始终坚持维持旧的中俄界约的立场。1924年3月，苏方代表仍拒绝北洋政府立时废弃旧约的要求，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态度强硬，甚至于决裂也不肯让步。参见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58、87、241、242、244、247、248、249页。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②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51－354；*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с. 90－91；马叙生：《踏勘边界》，《世界知识》2001年第12期，第43页。

③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53.

平方公里领土问题的声明而震惊。他们认为，在外交谈判中，苏方代表还是第一次正式地听说这样的话。济里亚诺夫当即表示，苏联代表团受命在条约线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形成线和实际控制线来准确界定中苏国界线某些地段的走向问题，不能同意中国代表团关于“不平等条约”的提法。[①] 在苏方看来，中国方面提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一，苏方如果承认只存在一条由条约确定的边界线，那么，沙俄政府和苏维埃政府时期形成的边界线及实际控制线内的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自然是中国的了；其二，苏方如果承认了以往条约的不平等性，这些条约即成为无效条约。苏方由此认为，北京赋予了自己这样一种权力，即假如它认为有必要，那么莫斯科就应当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俄国领土归还给中国。这是苏方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并由此得出结论：北京采取的是让双边关系保持永久性对抗、中苏边界线保持军事对抗的方针。[②]

3月16日和27日，第三、第四次全体会议举行，中方论战的火药味愈加浓烈。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另一项指责：苏联在苏维埃时期“蚕食”边界线中国一方的土地。曾涌泉指出：苏联违反条约所确定的国界线，不恰当地利用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信任和友谊，以及利用长期以来中国在7000多公里的中苏边界线上总共只有200多名边防军人的情况，将很多中国领土占为己有。他激愤地斥责说：“不要求你们归还面积为1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已经是非常的宽宏大量了。除了这些领土之外，我们再也不会容许你们侵占一寸中国的土地了。”“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是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会承认你们的非法侵占是合法的！”他并在第四次会议结束发言时

① *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с. 91－92.

② *Галеновин*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с. 93.

说：纵使苏方不同意在中国提出的条件下妥善解决边界问题，中国“也要恢复”自己“对于被占领土的历史权利”。[①] 言辞已然带有了威胁的成分。

对苏方来说，中国代表的言论表现出极端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作风，苏方仿佛从中看到了包含在“不平等条约”论题中的圈套。苏联专家预测说，今后，北京就会宣布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否认自己的“宽宏大量”，即便是依照中方的条件解决了问题，他们也还是会利用政治定义对“不平等条约”的论题做出新的解释，以要求归还“被侵占的领土”。而曾的威胁性话语，更令苏方认定，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论题，可能就是对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觊觎。[②]

但另一方面，曾涌泉又在第三次会议上建议双方交换按各自理解标出边界线的地图，随之在第四次会议上宣读了交换边界线地图的具体意见。[③] 一时间，中国代表团好像停止了在历史长河中的遨游，回到了现实问题之中。此后，中苏代表团在4月18日的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互换了地图。[④] 双方将所标的边界线加以对比，显示出了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⑤] 此前只是中国单方面看法的争议地区问题，第一次摆上了谈判桌，成为谈判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⑥] 尽管这必然使磋商对话又转变成一场尖锐的辩论，但是交换地图一事本身是谈判进程中促进边界局势乃至双边关系恢复稳定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步骤。毕竟在整个20世纪，到1964年中苏双方开始边界谈判为止，两国还不曾有过这种交换活动。它令双方代表团关注的目光从“不平等

---

①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57，359；*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с. 92.

②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57，359.

③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58，362.

④ *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с. 96；*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68.

⑤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68.

⑥ 马叙生：《踏勘边界》，《世界知识》2001年第12期，第43页。

条约”的抽象问题转向了争议地区的具体问题，显露出了使谈判走出死胡同的可能性，从而为实际解决边界走向问题奠定了基础。[①] 至此，谈判的进程出现了两个层面，即非理性地指控苏联的意识形态论战层面和理智、务实地渴望解决具体问题的层面。

中方的这种举措正符合苏方的愿望及方针，莫斯科迅速对此务实迹象做出回应，表示原则上同意中方以条约线为谈判基础来进行全面谈判和彻底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主张，[②] 做出了向中方的谈判方针靠拢的重要让步。5 月初，济里亚诺夫飞返莫斯科，汇报代表团的意见：必须在分析研究边界全线走向问题上，以及在根据边界条约准确界定边界全线问题上迎合中国。5 月 9 日，莫斯科即做出了“准确界定边界全线并在目前生效的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边界条约”的指示。[③] 此后，谈判呈现某种良性发展的趋向。5 月末，双方代表团各自成立了工作小组，着手讨论边界线的走向问题。中国方面将“不平等条约”等政治立场上的争论暂时搁置一边，转入了比较务实的工作小组会晤。[④]

根据所交换的地图，中苏双方首先从东段边界线入手进行讨论，并就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即同意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 400 多个争议岛屿和约 600 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方。包括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额尔古纳河以现行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苏方控制的 200 余平方公里岛屿（苏界外领土）划归中国。对满洲里附近的陆地边界线，

---

① *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с. 94，96；*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утвердили，с. 362 –363.

② 外档，109 –02706 –03，第 16 页。

③ *Галеновин*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с. 114.

④ *Мясников В. С*，*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с. 202，203；*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74 – 376；*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с. 122；*Ткаченко Б. И.*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вдокументах и фактах，Владивосток：Уссури，1999，с. 98 –99.

以及黑龙江、吉林两省同苏联的全部陆地边界线，基本达成协议，稍有调整。双方只是同意先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挂起来。总之，整个东段边界除个别岛屿归属未定外，基本上达成协议。[①] 苏方并已起草了除黑瞎子岛之外的整个东段边界线的协议，准备签署。[②] 如此，中苏东段边界问题实际上基本解决了。对西段边界，双方只是初步陈述了各自的论据，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故未形成共同见解。[③] 这样，苏方让步举措，打破了谈判的僵滞局面。

就中苏东段边界来说，苏联方面做出这种让步的基础在于，其国内有关文件已有明文规定，在可通航的国境河流上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④] 此时，苏联政府并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现状而推翻此项认识，这就在解决边界具体问题上，迈出了迎合中国的一步，尽管这一让步在中国方面看来是“苏方在我攻势下，已开始节节退却”。[⑤] 由于中苏双方在边界磋商问题上暂时搁置原则分歧，苏方做出了重大让步，谈判取得了初步成果，出现了签署边界协议、解决东段边界问题的可能性。于是，谈判桌上乐观、缓和之气氤氲。7 月 1 日，中方工作小组组长、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向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到北戴河疗养地休息一两周的建议。随后，苏联代表团及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便去了北戴河。[⑥]

但是就在这时，7 月 10 日，毛泽东向佐佐木更三等日本社会党人

---

①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 725 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1957 ~ 1969），第 255 页。

② *Галеновин*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c. 114.

③ 马叙生：《踏勘边界》，《世界知识》2001 年第 12 期，第 43 页。

④ 1960 年 8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苏联国界保卫条例》第 5 条就明文规定：“苏联国界在可通航的国境河流上，按主航道中心线或水流最深处划分。”1926 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在“黑龙江”一节中也明确写道，哈巴罗夫斯克以上的黑龙江为国境河流，而且同中国的边界是沿航道中心线划分的。见《人民日报》1969 年 10 月 9 日。

⑤ 外档，109 – 02706 – 03，第 16 页。

⑥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 377；*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c. 101.

士发表了前述关于算领土账的著名谈话，引起苏方和国际重大反响。20天过后，当谈判重新开始时，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已重新武装了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头脑。在7月30日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再度转入积极攻势，摆出了控诉的架势。谈判充满政治斗争的气氛，苏方认为的所谓150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的"大清单"问题贯穿会谈始终。[①]"不平等条约"问题重新成为焦点。

8月15日，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苏方在毛泽东谈话的刺激下立场也转趋强硬，一方面要求谈判改到莫斯科去继续进行；一方面改变先将黑瞎子岛的归属挂起来的态度，以解决该岛问题为解决东段边界其他岛屿等归属问题的先决条件。[②] 谈判至此难以再维持下去。

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曾涌泉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又增加提出了第三笔领土账唐努乌梁海的问题，指出：1944年，在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你们背着中国人民将面积为17万多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纳入了苏联的疆域。难道你们以为中国人民忘记了这个重要问题吗?！他警告说：你们现在在边界调集了军队吧？你们是不是在预谋进行侵占新的领土的军事冲突？坦率地说，假如你们敢于走这一步，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们奉劝你们悬崖勒马，不要使事态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如果你们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拒绝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的话，那么，不排除我们可能会考虑采取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不排除我们将会尝试恢复我们的历史权利。你们认为我们有要求收复澳门和香港的权利。我们也有要求收复被沙俄侵占去的领土的权利。[③] 其时，尽管中国代表团仍然希望在这次谈判中就此前已达成的协议草签文件，苏联代表团却已失去了迎合的兴

---

①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79.

②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86 – 387.

③ *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с. 105，107 – 108；*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84 – 385.

趣，坚持将磋商移师莫斯科。8月22日，苏联代表团回国。[1]

中国方面态度的突然转变，彻底激怒了莫斯科。当苏联代表团开始着手苏中西段边界谈判的筹备工作时，[2] 9月2日，《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7月10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并在配发的长篇编辑部文章中抨击中国领导人的立场。赫鲁晓夫则于9月15日利用会见日本议员代表团之机，强势回应毛泽东的谈话。莫斯科摆出的这种强硬姿态反过来又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使他开始担忧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3] 至此，中苏双方继续进行磋商的条件显然已不再存在。10月13日，中国方面最后通报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的时间“不适当”。[4] 次日，赫鲁晓夫下台，苏联领导人更迭，两国边界谈判搁浅。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7月10日的谈话客观上起到了影响谈判进程的作用，一度使中苏两国关系陷入了紧张之中。事实上，当5～6月中苏边界谈判沿着具体审理边界线的道路逐渐推进，双方已就东段边界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一致意见时，中国方面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搁置不平等条约问题，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挂起来，签订协议，基本解决中苏东段边界问题；二是僵持在现有立场上，但将谈判继续维持下去；[5] 三是施加压力，在出现签订具体协议的可能时，让苏方承认“不平等条约”问题。毛泽东选择了第三种方略。

9月、10月，毛泽东在向外宾解释此事时说，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很多。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

①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87.
②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87.
③ 有关此情况的叙述，见本章第一节“毛泽东对苏安全战略思路的转变”。
④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87.
⑤ 如1969年开始的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即持续了近十年。

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①] 事实上，中苏双方的谈判工作小组就解决东段边界问题达成协议草案的情况，已预示了签署合理的边界条约、形成合理的边界状态的前景。如此，已似无必要让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借日本人谈日苏领土争端之机提出算中苏领土账的问题，中国代表团据此进一步把第二笔领土账唐努乌梁海问题也摆到桌面上，继续加大压力，以此刺激赫鲁晓夫使之精神紧张的做法，实际恰恰违背了毛泽东所说的目的，其直接结果是破坏了磋商的缓和气氛，使初见合理边界状态的谈判成果流产了。因此，毛泽东的这种解释，很可能是为缓解苏方对其谈话的强硬反应而做的权宜说辞。

考察毛泽东设立“只要承认不平等条约，争议地区皆可放弃”的谈判底线的本意，其实只是要同苏联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以此减轻边境冲突的紧张度，而并不要求谈成。[②] 为了保证他的反修防修政治大革命的顺利启动，赫鲁晓夫这个靶子不能倒，不能造成中苏一团和气的局面，尤其不能让苏方在谈判的旗帜下，制造改进中苏关系的假象，以欺骗人民。[③] 就此角度评估，毛泽东所确定的这个谈判门槛看似很低，实则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对于以国际法原则成熟处理领土纠纷的苏联政府来说，必定是无法接受的条件。中国的谈判代表团及其领导人没有真正领会这一底线的内涵，致使毛泽东对边界谈判第二阶段转入降低政治斗争调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不满，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有再度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曾涌泉在“文革”开始后即被揭发为是刘少奇的人而被打

---

① 毛泽东会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4年9月10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9日。

② 关于此问题，近日何方先生提供了一则口述材料，即当年他曾听胡乔木说，毛泽东的意图只是进行谈判，只关注谈判的持续，而并无要谈出结果的意思。

③ 外档，109－02715－01，第18页。

倒），于是决定以对外谈算领土账的方式，于刺激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触动一下中央领导层中有这种妥协情绪的人。另外就是，既然苏联方面坚持不认同“不平等条约”的说法，那么，中国方面也无须急于同苏联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让谈判持续进行，以通过示意边界军事冲突的前景，保持对苏联某种程度的压力，进而维持中苏关系一定的紧张度，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激发起群众对所谓的中共党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代理人的义愤及投入这场运动的政治热情。

这个时期中苏边界摩擦不断升级，边界问题的提出，是 1960 年代初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加深、斗争加剧、关系恶化的结果。而中苏边界谈判的开始，使中苏关系的内核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一个转折，即中苏关系到这时，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两国之间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由此开始逐步向以国家安全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军事冲突的因素。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苏两国关系的基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国家关系所依据的准则中，过去以国际主义、国际共运意识形态为主，这时，国家利益的分量加重了。

但是，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破裂，主要的还应该是意识形态斗争作用的结果。中苏两党大论战造成的思想上的敌对情绪，导致中国在确定谈判立场时重翻已经按照国际法承认了的旧界约的老账，既表示不要求苏方归还被沙俄割占的中国领土，又坚持要对方接受不平等条约的提法，以进攻、好战的姿态，争所谓的正义、原则。这种做法突出反映了意识形态斗争对边界事务的影响。

事实上，在中苏领土旧账问题上对国人有所交代的更为合理的方式，应该是加强国际法的教育和宣传，以此疏导民情，而不是坚持要分清历史是非，胶着于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胜负高下。从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角度考虑，根据周恩来曾有的思路，不纠缠历史旧账，以

求和缓的目的搁置政治争议，务实地争取及早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不仅有利于平息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稳定中国的周边环境，而且还有利于边境省份经济的发展、边民生活的安定，以及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坚持要求苏方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带有威胁意味地表示苏方如果不接受中方的立场，中方就将考虑改变对边界问题的态度，换言之，就是要明确地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而且不排除诉诸武力的可能，这只能引起对方的猜忌，促成中苏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如前所述，苏联正是在中国提出不平等条约问题后加强与蒙古的军事合作，并且于1964年边界谈判破裂后，以中国有收复国土的意向为由，开始加紧向远东地区增兵的。由此，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实际上进一步恶化了。

不过这次谈判虽然最终流产，但双方毕竟相互交换了地图，具体讨论了边界走向等问题。苏联方面并做出让步，同意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额尔古纳河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解决岛屿、洲渚的归属问题。这实际上解决了东段边界大多数边界线走向的具体问题，为后来中苏两国签署相关文件奠定了基础。1991年5月16日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签订，确定了中苏国界东段绝大部分边界线的走向，[①] 其内容实际与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时双方工作小组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基本相同。其中也没有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字样。[②] 只是遗憾的是，这一协定的签署由于人为的原因晚了近30年，其间还发生了中苏边界流血冲突和珍宝岛的局部战争。

应该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无果而终后，10月中旬中国以时间

---

①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96页。

② *Ткаченко Б. И.*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c. 342 – 358.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达成协议草案时，只有黑瞎子岛一处暂时挂起，留待日后解决。而1991年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签订时，悬而未决的地区除黑瞎子岛外，又增加了阿巴该图洲渚，即有两块争议地区的边界走向未协商一致，有待继续谈判解决。参见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25页；*Ткачешсо*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c. 345，346。

不适当为由推辞赴莫斯科继续磋商边界问题，并不意味着实现这次谈判曾经形成的协议草案的希望就此完全破灭。赫鲁晓夫的下台以及苏共新领导集团的履任，似乎为中苏关系的转变带来了某种机遇。但是，毛泽东试图借此机会推动苏联新领导人改弦更张，周恩来衔命赴苏会谈以失败告终，中苏同盟彻底瓦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达成两国东段边界协议的前景已是渺若烟云。

第四节　周恩来访苏与两党会谈破裂

1964 年 10 月 16 日零时，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奉莫斯科之命，紧急约见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通报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决定，并递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该通知表明苏共将继续遵循二十大至二十二大的路线，也即维持赫鲁晓夫原有方针不变的立场，而且还特别指出，苏共今后要为国际共运的一致性而斗争。[1] 伍修权随即通过杨尚昆向毛泽东等人做了汇报。是日上午发行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苏方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2]

对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实际应该在 10 月 14 日苏共中央全会结束后即已获悉。从 15 日起，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的问题。根据中共领导人的分析，赫鲁晓夫的被迫辞职应与中苏两党的大论战有关，中共发表的“九评”，揭露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真面目，打中要害，使之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的决定，不过是证实了毛泽东在 3 月份做出的赫

---

① 外档，109－02708－03，第 1～3 页；РГАНИ，ф.5，оп.49，д.716，л.360－361；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新中国外交风云》第 3 辑，第 14～16 页；外档，109－02708－03，第 3 页。

② 外档，109－02708－03，第 1～3 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829～930 页（该书记述的时间为“14 日深夜”和“第二天一清早”，应有误）；《人民日报》1964 年 10 月 16 日。

鲁晓夫可能要垮台的预见。根据毛泽东的估计，苏共新领导集团今后会有一些改变，但不会很快，也不会大幅度地变。变化的可能有三种。第一种是从修正主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目前这种可能性小。第二种是变得比赫鲁晓夫更坏，这种可能也不大。第三种则属于中间状态，即仍然搞修正主义路线，不过在做法和策略上有某些改变。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据此，毛泽东最初确定的方针是静观其变，"一肯二看"，即对苏共中央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决定表示肯定和赞赏。[1]

于是，在收到苏共中央的通知后，毛泽东迅速做出指示，由毛、刘、朱、周联名给苏联新领导人发贺电，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并指出，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这不是一般礼节性的祝贺，而是在重要时刻发出的重要政治文件，要说一点有实质内容的话。据此拟定的贺电，表达了开展大论战以来所没有过的比较热情、有所赞赏的态度。贺电当日即递交契尔沃年科，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晚播出，《人民日报》次日（17 日）于头版的位置予以发表。[2]

与苏共此时停止反华宣传相对应，[3] 中共从 10 月 16 日起也停止发表与苏共论战的文章，以及兄弟党左派批判赫鲁晓夫的文章，并表达了准备主动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意向，摆出了一种对苏友好的姿态。[4]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833、836－839、841 页。另外，契尔沃年科 10 月 16 日向伍修权通报消息时，伍修权的表现给契尔沃年科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方面似乎在此之前便已通过某种渠道了解了他所要通报的实质性内容。见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716，л. 360－361。

②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新中国外交风云》第 3 辑，第 19～20 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839 页。贺电提出，中国对于伟大的苏联"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并"祝中苏两国人民兄弟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不断发展"。

③ 外档，109－02708－01，第 96～97 页；109－02708－02，第 116 页。

④ 查 1964 年 10 月 16～31 日的《人民日报》，已无此类文章发表。契尔沃年科向国内通报说，近日彭真在一个北京市委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中国领导人打算主动改变同苏联的关系，周恩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也表述了此意思。见 *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 （*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1964，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7，с. 330－334；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840 页

面对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以及其间显露出的一些提法、做法有所变化的迹象，[①] 毛泽东在静观10天后，决定要采取行动了。10月27日，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部署说，可以考虑主动向苏方提出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并且打破常例，在此非逢五逢十的纪念日里，派出以周恩来和贺龙为首的有分量的党政代表团。我们现在的方针应该是"一推二看"，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转变。[②]

根据这一方针，中共中央在10月28～30日三天时间里采取了三个步骤。其一，向契尔沃年科大使提出，中共有意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去苏联祝贺十月革命节，顺便同苏共党政负责人进行接触，[③] 率先打破大论战以来中苏两党之间的僵局，为实现两党新的交流提供台阶。其二，进一步通报中共中央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④] 明确代表团的高规格，以及团长人选为苏方能够接受的相对温和务实的人物。其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先提出邀请12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派代表赴莫斯科的建议，并在正式向苏方提出此建议和对方尚未做出回应之前，先后向各党通报消息。[⑤] 由此亮出一种召集人的姿态，既向其他兄弟党显示中共是寻求改善中苏关系的主动方，为

---

① 尽管苏共中央摆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姿态，《真理报》文章、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领导人的讲话在一些提法上，还是陆续显露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似乎是向左转的迹象，如强调帝国主义威胁和平，苏联要加强国防力量；提高反帝反殖、支援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调子等。此外，苏联方面于基本停止反华宣传的同时，也不再提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具体时间（《人民日报》1964年11月6日、10月30日；《内部参考》第3669号，第19～21页；外档，109－02708－01，第94～97页；109－02708－02，第116页）。对于中国方面来说，这些新动向似乎表明，苏共新领导人的大政方针中还含有某种不确定因素，其为中苏关系的变化，勾勒出了某种不确定的前景。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41～842页。

③ 外档，109－02678－01，第5页。

④ 外档，109－02678－01，第7～8页；*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30～334。

⑤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42～843页；外档，109－02678－01，第7～8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81～682页。

树立中共是国际共运团结维护者的形象做铺垫，又为改善中共在莫斯科势单力薄的不利处境创造条件。

在苏共中央10月31日表示接受中方的提议后，11月1～4日，毛泽东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进一步阐释了他的“一推二看”的方针，说明中国党政代表团莫斯科之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共可能往哪个方向走，这叫做火力侦察。中共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我们现在需要积累资本”。[1] 毛泽东决策与苏共新领导人进行接触的方针进一步明朗化，其底线是，中共不会为缓和与苏共的关系而做出原则性让步，谈判的基调是“推”苏共向中共的立场趋同；方法为通过“推”进行摸底，观察苏共中央有无转变立场的可能性。总之，目标就是借赫鲁晓夫下台之机，要求苏共重新审视并否定二十大，以彻底清除苏共的“命根子”[2] ——二十大在国际共运中的法定地位，扭转中共在共运中的被动局面。毕竟中共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做出的实质性让步，导致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大会的共同文件莫斯科宣言和声明高度评价苏共二十大，造成了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成为国际共运共同准则的事实，从而令中共在与苏共的竞争中陷入了被动境地。如果这一争取莫斯科改弦易辙的目的能够达到，那么，以苏共纲领为本的国际共运总路线也就自然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将使世界革命政党的斗争能够顺利地沿着中共认为的正确路线发展，而且也为中苏两党达成新的团结扫清了障碍。即便此目标无法实现，中共也可通过率先主动与苏共接触之举，争取人心，积累资本，将国际共运分裂的责任抛给苏共，为取得共运领导权做准备。这实际是一种建立在干涉他党内部事务基础上的团结诉求，没有给周恩来的谈判留出任何调和的余地。

---

① 外档，109－02678－03，第20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48～850页。

② 中共在1960年代初时即已认为苏共把二十大当作了自己的命根子。《新情况》1961年10月19日，外档，109－03043－01，第6页。

此后，随着十月革命节的临近，中国方面通过各种讲话和文章，集中渲染了毛泽东“把推放在第一位”的基调。[1]

此时苏共党内对于苏中关系的走向持有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认为是赫鲁晓夫的一些言论和举动给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随着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类似的对苏中关系产生相当危害的不良因素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共领导人有可能会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充分利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所创造的客观条件，来推动双方关系的正常化。在苏共领导人的心中，赫鲁晓夫是苏中关系缓和的最大障碍。[2] 莫斯科的权力长廊里明显地飘忽着必须采取主动措施来改善苏中关系的思想，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假如需要，他们可以为赫鲁晓夫的粗鲁道歉，进而与中共达成恢复友谊的协定。这不仅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而且还有利于新领导班子地位的巩固，可以获得全社会的广泛支持。[3] 只是，在苏共新领导人忙于立足、尚未顾及向中共摇动橄榄枝时，中共中央抢先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在树立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形象上，占得了先机。

面对中国方面的提议，苏共中央以积极的态度予以响应，于10月30、31日，相继做出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的决议，以及同意邀请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的决定；同时通报说，苏共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的观点，即应当“循序渐进地改善苏中关系”。[4] 对于苏共领导人说来，中共的建议及友好姿态，令他们对即将举行的苏

---

① 讲话与文章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18~219、216~217页；《人民日报》1964年11月7、8日。

②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Неувашаяся попыт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имиреня. 1964－1965г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No. 5，с. 19－24.

③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 861－862；*Брежнев А. А.* Китай：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с. 89－91.

④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 16－17，15－16；外档，109－02678－03，第20~22页。

中两党会谈寄予厚望，毕竟自大论战开始后，两党的会谈如同聋子对话，各自朗读自己的长篇大论，各说各的，不做正面接触。而赫鲁晓夫的下台，中共停止论战并迈出寻求接触的步伐，以及由态度调和并且务实的周恩来作为谈判的首席代表，使得苏中双方可以面对面地直接进行交流，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因此，苏共领导人极力希望将谈判纳入建设性的轨道，通过正面交流，将各自的观点加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各自对问题的理解，找出双方分歧的症结所在，[1] 尽力争取取得良好的会谈成果，奠定改善关系的基础。为此，两天之后，契尔沃年科进一步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传达了苏方的五点意见，[2] 表明苏共领导人希望利用这一轮会谈，更为理智、细致地调和苏中两党的分歧，在不放弃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务实地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以达成新的和解。可以说，这是一种搁置争议、实际地解决具体问题的建设性会谈方针。

莫斯科时间11月5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1日，中国代表团出席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席间，马利诺夫斯基喝多了酒，说了一句带有挑衅性的反美祝酒词，得罪了美国驻苏大使。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走向马利诺夫斯基，为他“精彩的反帝祝酒词”表示祝贺。[3] 不想这位元帅又借着酒劲儿对周恩来说，希望中国人“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我们不要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由于美国记者就在旁边聆听两人的谈话，周恩来忍受了这种挑衅性的话题，走向另一边。这时其他几位苏联元帅走了过来，中方翻译听到了马利诺夫斯基继续说的话：“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

---

①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 19 – 24.

② 外档，109 – 02678 – 10，第76 ~ 79页

③ 外档，203 – 00295 – 03，第27、29页；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48 ~ 149页。

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接着他又同贺龙谈话。马利诺夫斯基在谈到毛泽东时使用了俄文中带有污辱性的脏话。其间，苏联元帅扎哈罗夫还说了一句：“任何蔬菜都是有时令的。”①

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听说此情后极为气愤，当即离开了宴会大厅。回到中国驻苏使馆后，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几位翻译的汇报，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代表团认为，这绝非偶然事件，是令中国党、国家、人民及其领袖毛主席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煽动要推翻中国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11 月 7 日夜，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代表团发来的急电，报告此事的经过，并提出代表团准备向苏共中央正式抗议，请中央尽快给予指示。②

11 月 8 日上午，毛泽东在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中国代表团的电报时说，现在好了，他们有辫子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可以抓住此事采取攻势，不要把这个事情搁到以后再说。毛泽东指示邓小平起草复电，同意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的严重抗议，要求苏共中央做出正式答复；要抓住此事件采取攻势，指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继续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不怕大吵大闹、闹僵不欢而散；坚持中共原来的立场，除非苏共承认错误或经过协商取得协议，中共才能停止公开论战。随即以特急电发给中国代表团。③显然，毛泽东要充分利用此次事件做文章，使之成为向苏方施加压力，推动苏共改弦更张，向中国方针靠拢的筹码。

中国代表团接到电报时，正值苏共领导人到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回

---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第 259 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785 ~ 1786 页；*Армизов А. 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 348 – 356；2007 年 9 月 24 日笔者采访阎明复记录。

②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新中国外交风云》第 3 辑，第 23 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862 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862 ~ 865 页

拜并共进午餐，周恩来即借机正式就此事件向苏方提出了抗议。周特别强调说，这不仅仅是马利诺夫斯基一个人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具有这种想法，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些人的想法。周诘问苏方是否希望中共也像苏共解除赫鲁晓夫职务那样对待毛泽东，指责苏联元帅关于"任何蔬菜都有时令"的话可以理解为教唆撤换毛泽东，正告苏共领导人：如果有人制订了这样的计划，那么这是徒劳无益的企图和妄想！它只能恶化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周同时提示苏方，不要像帝国主义者那样，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归结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两个领导人之间个人的争论，以及他们的个人性格和素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苏双方还能继续会谈什么呢?[①]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立即摆出息事宁人的态度，一方面对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表示愤慨和道歉，一方面反复加以表白和澄清，指出，苏共中央把中国派代表团访苏看作克服现有分歧、改善双方关系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成员或候补成员，他没有参加关于苏中两党接触的讨论；正式声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关系，只是酒后失言，而"时令蔬菜"的话也只是针对赫鲁晓夫而发。他们一再表示苏共邀请中共代表团的决定是坦诚的，动机是非常好的，希望中共能够信任和尊重苏共领导人的意见，双方能够以诚相见，不要因为此事而妨碍两党为改善关系所共同做出的努力。周恩来则说马利诺夫斯基实际是酒后吐真言，他保留中国代表团以后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②]

尽管周恩来最后表态要认真对待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意见，并提议为中苏两党的团结干杯，[③] 试图为接下来的正式会谈留下

---

① *Артизов А. Н. и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 348－356.

② 外档，203－00295－03，第 30 页；*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 348－356

③ *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 348－356.

一些回旋的余地，但是，由于毛泽东已经给苏共新领导人扣上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帽子，确定要抓住这个“辫子”，不惜闹僵地采取攻势，周恩来其实已没有什么再做弥合、补救的机会了。

11月9日晚，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周恩来一开始即利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向苏方施加压力，劝告勃列日涅夫等人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重新搞起，这样，双方才能找到一些共同点。周宣称不存在改善关系的新的条件，因为苏共继续实行以前的总路线。苏联共产党的总路线是不能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相提并论的。[1] 这种颐指气使地干涉苏共内部事务的表现，一时激怒了苏共领导人，他们态度强硬地表示，苏共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和苏共纲领并非某个人的一己之见，而是反映了苏共全党的意愿，代表着苏联全体人民的意志。他们提请中方注意：此次会谈的重点不是重新讨论中共的总路线问题，虽然对于中共路线中的很多问题苏共也并不赞成，并声明：如果每个来苏联访问的代表团都要求重新讨论党的总路线，那么谈判就会走入死胡同，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利益，苏中双方都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他们还强调：苏共中央将坚定不移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以来所确定的路线纲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做任何退让。米高扬甚至明确表态说：“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是由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问题上，我们中央是一致的，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致的差别。”苏方坚持要求双方先停止公开争论，召开各国党的会议，在新的气氛中，寻求途径，来一步一步地实现共同愿望。[2]

---

① 外档，203－00295－03，第27～34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61页；*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с. 19－24。

②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с. 19－24；*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 （*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 362－419；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86～1787页。

苏共领导人显然还没有弄明白，中共要求重新审视路线问题，就是要在“推”的过程中，摸清苏方让步的底线。而双方在举行国际会议问题上的胶着，则反映了两党对于国际共运形势的估计。对于苏共而言，情况与赫鲁晓夫在位时的判断相同，中共要求推迟召开兄弟党会议，是为了拉拢并增加自己的支持者；而在中共看来，苏共继续坚持开会，就是要在新的形势下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通过反华决议。[1]毛泽东绝不可能令自己和中共陷入这种被动局面。

由此，在11月11日两党长达6个多小时的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明确通报了中方的立场：坚决不参加将在12月召开的所谓“起草委员会筹备会议”；在苏继续执行赫鲁晓夫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解决以前，谈不到停止公开争论。他并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奉劝苏共领导人悬崖勒马，不要走绝路；关于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同苏联领导人的几次谈话，不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或联合公报，也不发表新闻。[2]

11月12日，中苏双方举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为了打破僵局，勃列日涅夫提出，苏共中央建议只要中国方面准备好，就可以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一步一步向前迈进，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周恩来表示将报告中共中央，并针对苏方的建议指出，我们的门是开着的。中苏两国都必须努力创造新的环境，寻找新的途径。[3]其态度有所松动。

只是，根据苏联方面的记载，中国代表团千方百计地回避就苏方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进行讨论，回避探讨巩固反帝统一战线的具体措

---

① 《人民日报》1964年7月31日；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85页。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86～1787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74～877页；外档，203－00295－03，第32页。

③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第29页；*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 362－419。

施。当苏方要求中国代表就中止论战等具体建议表态时，周恩来正式声明说，代表团没有同苏共谈判的全权，其使命“就是建立联系并研究局势”。[1] 因此，周恩来态度的缓和，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意义不大。

事实也正是如此，毛泽东在北京指挥着中国代表团，周恩来本人没有什么个人发挥的空间。毛的采取攻势的“推”的方针，使得谈判进程只能在非理性的政治论战的层面徘徊，而难于进入理智并务实地寻找共同点、解决具体问题的阶段。中国代表团关于重新讨论并改变作为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苏共纲领的要求，以及拒不考虑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态度，使谈判无果而终。其实在这里，无结果或许就是毛泽东所要寻求的结果，即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试探是必要的，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是不奇怪的，有一点收获也就够了”。[2] 毕竟毛的部分目标已经达到，既试探出了莫斯科恢复苏中关系的底线，摸清了苏共领导人捍卫自己原则的进退尺度；又向世人呈现了主动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姿态，并且通过代表团在莫斯科与其他党的交谈，继续阐释赫鲁晓夫在位时做出的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决定未经各党协商一致，因而是非法的，[3] 以此拆筹备该会议的苏共新领导人的台，同时将其推上了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审判台。

事实上，如果说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中苏两党会谈为双方的和解提供了机会，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双方具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基础，特别是促使倡导斗争哲学的毛泽东让步的基础还依然存在。这对于中共而言，导致1960～1961年中苏关系实现缓和的那种国内条件和国际共运环境已不复存在。到1964年时，中国的经

---

① *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 362 –419.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83页。

③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86～1787页。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与多个兄弟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有的会谈长达3个小时（如与罗马尼亚）。外档，203－00295－03，第28～33页。

济状况已完全好转；同时，国际共运左派队伍的持续壮大，使中共推举毛泽东担当共运旗手的意识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已无必要和可能再权衡利弊，对苏共做出让步。对于苏共来说则是，新领导人执政伊始，地位尚不稳固；但其坚持原有纲领和路线的方针得到了全国的支持。[1] 这使得苏共中央不能在重新评价赫鲁晓夫的路线纲领问题上轻举妄动。

其二，中苏双方都有做出让步的打算和诚意，谈判立场存在调和的余地。就中共言之，毛泽东已决心清除当年起草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时做出妥协所造成的遗患；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通过与苏共的大论战而初步形成，一场防修反修的政治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为此，他必须要求苏共新领导人与赫鲁晓夫决裂，否则中苏两党不可能实现新的团结。其定下的"推"苏共丢掉赫鲁晓夫包袱的谈判立场，没有退让的底线，故也不是真正寻求和解的方针。对苏共新领导集团而言，虽然准备务实地讨论具体问题，为两党关系的改善留出了让步的空间，但是中国代表团的要求不仅令其完全不可能接受，而且还激发出了自卫的热情，摆出了不放弃苏共原则立场的强势姿态。毕竟苏共中央不能自己否定自己，尤其不能否定为两次莫斯科会议所肯定的二十大，不能将共运领袖的地位拱手相让。

总之，中苏双方，特别是中国，已不可能再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求同存异。1960～1961 年那种"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

① 截至 11 月中旬，除俄罗斯等 5 个加盟共和国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其他加盟共和国报纸均未做直接表态；虽然有一些加盟共和国发表社论，对苏共中央新任领导表示支持，但是也有加盟共和国的报纸只提人民一心一意地相信党，而不提信任中央（外档，109－02708－02，第 124～125 页）。苏联大部分州、市党员的拥护新领导集团的立场；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节的社论，都提到了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所制定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参见 *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 271－273，273－280；外档，109－02708－02，第 124 页）。这种状况表明，在苏共党内、苏联国内，地方与中央存在有矛盾的迹象；同时也表明，在党内、国内，尚不存在否定苏共二十大的基础。

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1] 的条件，实际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样，在北京时间11月14日下午2时40分周恩来一行抵达首都机场时，看到的是毛泽东亲自在那里迎候，刘少奇等党政军民各界领导人100余人，以及数千名群众到场迎接，其场面和气氛与一年多以前（1963年7月）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会谈归来时十分相似，依然是一次显示中共团结和力量的政治示威。《人民日报》发表的中苏两党举行会见的消息，除双方参加会见的人员名单外，无任何实质性内容，标志着两党谈判的破裂。[2] 毛泽东以这种方式，宣示了他与苏共决裂的决心。

与此同时，11月14日，中国代表团刚离开莫斯科不久，由苏共中央委员鲁米扬采夫主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1月号即开始发行，上面以《共产党报刊关于共产党国际会议》为题，发表了22个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主张召开国际会议的言论，并刊载了大量指名攻击中共的文章、讲话等材料。该期杂志还以附页的形式登载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贝尔纳反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声明，指责这次核试验是"污染大气"等。[3] 苏共领导集团借这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联合刊物的阵地，宣告了苏中两党此次缓和关系尝试的失败。

周恩来一下飞机，即随毛泽东前往人民大会堂118会议室晤谈。毛在进一步询问情况后部署说，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

---

① 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外档，203－00294－05，第17～18页；《人民日报》1964年11月14、15日；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81页。

3 《人民日报》1964年11月21日；《苏联大事记（1964～1966）》，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75，未刊，第19～20页

这个原则绝不让步。毛指示撰写评述赫鲁晓夫下台的文章，说明赫鲁晓夫路线的破产。对于赫鲁晓夫的垮台和苏共新领导人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趋向，毛以宋代词人晏殊的词句做了总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①

苏共中央则于11月16日举行全体会议，一方面在对领导集团进行调整时，不仅全部保留赫鲁晓夫的原班人马，而且补选上来的人，也都是赫鲁晓夫路线的积极拥护者，并且是在赫当政时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上的，② 以此显示苏共原定路线的不可动摇性；一方面缓和对中共的态度，勃列日涅夫在特别通报与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谈判情况时提出：今后在同中国，无论是党的接触还是国家的接触方面都要采取灵活的政策。会议对与中共论争的节奏做出了新的部署：在相关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仍会继续进行争论。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要授人以柄而激化已有的矛盾。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强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苏共需要的已不再是好斗，而是成熟、审时度势和智慧，③ 对与中共论争的节奏做出了新的部署。

但是，中国方面的回应开始了。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21、22期合刊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列举赫鲁晓夫所做的12件坏事，证实其下台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由此吹响了与苏共进行新一轮公开论战的号角。《真理报》于12月6日发表编辑部文章《全民的国家》以为因应，影射中共批判"全民国家"是为了维护"个人迷信"，苏中两党的争论具有国际意义，苏联绝不回到斯大林时期。④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78～883页。

② 外档，109－02708－02，第112～114页；203－00295－03，第90页。

③ *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62 － 419;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с. 19－24.

④ 《内部参考》第3684号，1964年12月8日，第24～26页。

中苏之间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休战结束了，两党关系重蹈覆辙，回归政治论战的格局。虽然中国对苏方针、部署的原则转向在与苏联的国家关系上采取高姿态，高举发展两国关系的旗帜，但在党际关系上，依旧是要不断揭露和批判苏共新领导集团。[1] 中共实际完全放弃了再与苏共言和的努力，中苏同盟关系彻底破裂，国际共运正式分裂的前景也就在眼前了。

---

① 外档，109－02715－01，第15页。

第四章

国际共运分裂与中苏走向对抗

· 莫斯科三月会议与国际共运分裂 / 552

· 双方共同援越抗美中的矛盾冲突 / 565

· 珍宝岛冲突与中苏军事对抗 / 577

· 中美化敌为友联合抗衡苏联 / 591

进入1965年后，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三月会议和援越问题展开了新的冲突。斗争的中心，前者涉及国际共运的领导权问题，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国际共运正式分裂。中苏两党关系藕断丝连，到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①] 两党组织关系中断。后者则关系到谁能掌握对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中国不能容忍苏联控制对越南问题的发言权，因此在援越问题上实际排斥苏联，双方在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等问题上矛盾冲突不断。而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调整对越政策，改脱身为插手，加强援越特别是武器援助，使得苏越关系趋向紧密，苏越结盟的前景使中国南部处于一种新的不安全的状

---

① 《人民日报》1966年3月24日。

态中。

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运动渲染出浓重的反苏氛围。而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破裂后，随着边界问题的愈益政治化，领土纠纷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导因，成为两党两国领导人决策中的一个砝码，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1969年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两国关系趋向紧张，一度濒临战争边缘。中苏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从谨慎、克制，逐渐发展到主动反击、军事对峙。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到1970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中苏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敌对状态。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第一节　莫斯科三月会议与国际共运分裂

虽然在毛泽东看来，在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站在左派方面的只有很少数几个党、十几个党，[1] 但是，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的展开，国际共运中几乎所有的党里都有毛泽东的追随者。由于毛泽东在处理党际关系时，主要是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左派联合，依靠左派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支持世界革命，中共实际已成为另一个政治中心。加之左派队伍不断壮大，粗具阵营的规模，国际共运由此呈现分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已下定了另立门户的决心。对他来说，既然苏共是修正主义政党，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也已经变修，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同流合污了，那么国际共运的内涵实际也已发生变化，中国党应该转而率领左派党支持亚非拉国

①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28日

家的反帝革命斗争，开辟国际共运的新天地，确立起中共作为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以此，正式向赫鲁晓夫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提出挑战，并且将分裂的责任推给赫鲁晓夫承担，只是时机的选择问题了。

于是，中共中央在1964年2月29日答复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来信提出的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时，不同意在当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主张先举行阿尔巴尼亚等17个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为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做进一步准备；后又在5月7日复函苏共中央，反对其3月7日信函中提出的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即由1960年莫斯科声明起草委员会的26国党共同参加的意见。[①]

对此，苏共中央6月15日复函指责说：你们提出的反对召开会议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你们断言，国际会议以及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只会“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而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问题，才会事先预言会议将导致分裂。复函强调：生活完全证明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动，召开新的国际会议，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中共中央长久推迟会议的建议，令人不能接受。复函认为中共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在于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集团，指望在此期间增加支持者的数量，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的条件。复函并批评中共中央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分歧的课题，表示坚决反对中共领导人要求在国际共运中占有特殊地位。[②]

不管中共拖延举行国际会议的真正目的是否在于为获取更多同盟者争取时间，苏共的评论起码反映出了一个事实：如果按照苏共中央

---

① 《人民日报》1964年5月9日

② 《人民日报》1964年7月31日

的思路召开新的国际会议，以中苏两党所拥有的支持度来讲，其结果必然是继续以苏共纲领为国际共运各党所共同遵循的总路线。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会议必将重演各党代表谴责中共的历史，甚至采取集体措施，把中共开除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① 这种情况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既然他已做出了另立门户的抉择，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策略，即我们现在要采取激将法，激他开，激他承担公开分裂的责任。② 随即，毛泽东部署中共中央予以答复。而在7月28日回复苏共中央之前，他不仅多次修改复函，而且还在信的结尾处特别加写了两段话："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③ 赫鲁晓夫这个人脾气暴躁，一触即跳。果然，事隔一天，如毛泽东所估计的，7月30日苏共中央即做出回应，复函强调指出：1957年莫斯科会议已一致通过决议，委托苏共在与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知中共中央：考虑到绝大多数兄弟党已经明确表示的意志，将于12月15日召开26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会议。复函强硬地表示：即使26个党中任何一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

---

① 《人民日报》1964年8月31日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00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06～807页；《人民日报》1964年7月31日。

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在毛泽东的激将下，赫鲁晓夫摆出了决心开会的架势。尽管苏共继续声明召开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对谁进行谴责，把谁革除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而是找出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寻找克服分歧的途径，但是对于中共来说，目前的问题已不是要克服分歧，而是应该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党从国际共运中清除出去。于是，中共中央旋即回函，坚决拒绝苏共的意见。毛泽东并在8月19日召集会议，再次讨论此事。面对与会者表达的即使只剩下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两个党，中共也绝不参加26党筹备会的态度，毛泽东说，我党采取这样坚决的立场，可以使左派兄弟党更加坚定。若欲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①]

就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处于僵局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发生政变，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如前所述，毛泽东率先提出与苏共新领导人进行接触的建议，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试图利用苏方这次政权更迭的机会，一方面推动勃列日涅夫等人彻底否定赫鲁晓夫的路线纲领，一方面以主动寻求新的团结的姿态，摆脱中共与国际共运分裂的干系。但是，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以及中共在会谈中所坚持的要苏共改弦易辙的立场，使这次谋求改善关系的两党会谈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就毛泽东而言，这次对苏共领导集团进行的以推其向中共方针靠拢为目的的火力侦察，与其说是尝试寻求达成新的和解，不如说是在为中共继续沿着传统的国际共运轨道前进做最后的努力。即如果苏共新领导人能够抛弃赫鲁晓夫的包袱，使国际共运出现以中共纲领为指导的前景，则中共将留在共运内，引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沿着毛泽东认为的正确路线前进；否则，中共将退出国际共运，另起炉灶，领导亚非拉人民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08~809、812~813页；《人民日报》1964年8月31日。

从事世界革命运动。

面对苏中两党会谈中周恩来表示的坚决反对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及其筹备会议的强硬立场，以及会谈破裂后中方舆论宣传中所传达的封死这次会议的信息，[1] 勃列日涅夫也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当年赫鲁晓夫曾经遭遇的两难境地：如果因担心再次触动中国而决定取消开会，那么苏共作为国际共运首领的形象就会大失光彩；可倘若继续召集会议，便要冒中共大发雷霆，联合一些党共同抵制会议，令国际共运陷于分裂的风险。由此，解决的办法似乎只能是继续召集会议，同时降低调子，向中国暗示苏中两党的分歧既非致命，也非不可弥合。于是，苏共领导人决定将原定12月15日举行的26党起草委员会会议推迟到1965年3月1日举行，同时建议把会议改为协商会晤，会晤的性质和任务更改为各党代表团不再担负起草委员会的职能，不从事起草未来国际会议的文件草案，不确定未来会议召开的期限。会晤的目的是相互协商，呼吁参加1960年会议的所有兄弟党集体努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行动。[2] 随后，苏共先同保、匈、波、德、捷东欧五党在华沙讨论通过了3月会晤的新方案，随后又征得澳大利亚等十国兄弟党代表的同意。古巴、意大利、英国三国党同意与会。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声明，他们对于此次会晤"没有看到任何不好"，但还是不能参加。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也表示不同意参加会议。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则没有表示希望参加会晤。苏

1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此后，《人民日报》开始陆续转载兄弟党评述赫鲁晓夫下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质疑举行国际会议的文章、讲话等。

②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53页。据中方文献记载，11月24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推迟举行26党起草委员会会议，同时通报说"主张召集起草委员会的兄弟党有权进行"会议的"实际准备工作"，起草委员会可以"起草主要文件的草稿"（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43页）。笔者据这次会议所形成的共同文件等情，采用俄国解密档案1965年3月26日苏斯洛夫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的总结报告中的说法。

共中央并向参加过 1960 年莫斯科会议的所有兄弟党的领导人通报了有关情况。[①] 总之，苏共作为国际会议的召集人，避免国际共运的分裂，回避为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制定纲领的惯例，以平等协商的态度征求各兄弟党意见的表面文章，还是做足了。

但是，当 11 月 27 日契尔沃年科大使向中国外交部刘晓副部长转递苏共中央 11 月 24 日致中共中央函，通报推迟会议的决定时，却不啻是在向中共下达最后通牒。针对苏方关于举行会议不是苏共中央坚持，而是苏共中央在同兄弟党协商后表达他们的意见的说法，刘晓和参加会见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以论战的激情予以驳斥，指责苏共新领导继续强加于人，继承了赫鲁晓夫分裂主义的政策。[②] 毛泽东则在翌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态说，他们要开就开，让他们去开，我们正盼他们开，让他们掉到深渊，自掘坟墓。[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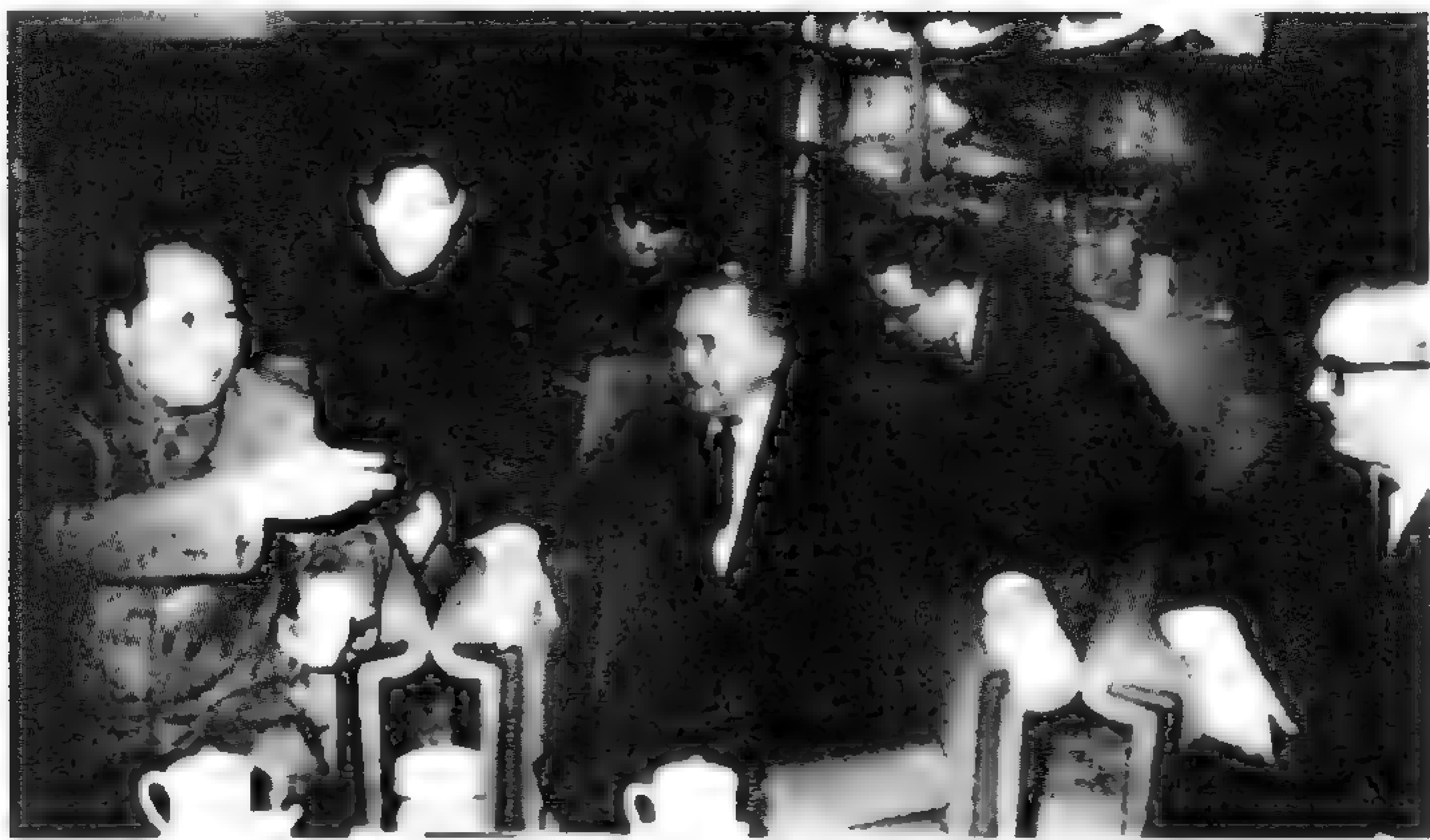
1965 年 2 月初，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前后两次在北京逗留。周恩来同柯西金举行会谈，双方为避免国际共运的分裂做了最后的努力。而毛泽东在 2 月 11 日会见柯西金时说：我们周总理同你谈过，他劝说你们不要开 3 月 1 日那个会。我倒赞成你们开，但我们不参加；并劝苏方不要再将会议改期，不要把起草委员会会议改为协商会晤，说：如果你们再改期，或者说不开，对你们不利，丧失威信。你们索性开起草委员会吧。这个会一开，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们老是不开，老是延期，这样做，对苏共形象不好。我是顺着你们的，我是赞成你们开会的。毛泽东并提出要反修正主义、教条主义一万年。针对柯西金关于中苏两党如果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一万年的看法，他表示，可以从一万年减到九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毛泽东的实际态度是：过去我们讲过要

---

①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11 卷，第 53～54 页。

② 外档，102－00142－03，第 12～17 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910 页。



1965 年 2 月 11 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苏联总理柯西金

迟四年五年再开，现在看来不行，还要往后推迟，加一倍吧，要过八年十年再看。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时间。[①] 毛泽东这个表态，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就是要继续坚持让所有兄弟党无条件接受中共 1963 年 6 月提出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 25 条建议，直接向莫斯科显示了要与苏共在国际共运领导权问题上一争高低的决心，从而最终打消了苏共缓和同中共关系的幻想。

3 月 1～5 日，在美国将侵越战争升级的背景下，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举行，被邀请与会的 26 个兄弟党中，有 19 个党到会，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 7 个党拒绝参加。[②] 会晤中各党之间存在分歧，有的要求苏联立即和共产党中国和解，有的申斥苏联对共产党中国采取犹豫不决的态度。[③] 在讨论起草公报时，关于举行世界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意共代表主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916～917 页；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11 卷，第 54 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1957～1969），第 262～263 页

③ 《人民日报》1965 年 3 月 22 日

张只应提为未来国际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英共代表则坚持说准备召开国际会议的最重要条件是苏中两党举行会晤和关系正常化。意共代表并对公报提及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保留意见，认为这些文件的某些原则已经过时。与会者主张，为了讨论新的会议的召开问题，应先进行预备会议，参加者是参加过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81国党的代表。[①]

不过，会晤最终还是一致通过了两个文件：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会晤公报。在对当前形势看法和反帝斗争问题上，与会者一致表示声援越南人民和越南劳动党，声援同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斗争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会晤公报号召各国共产党人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帝的“迫切任务”上来，“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人民革命”，“团结反帝”、“共同行动”。公报指出：“在为共同目标而斗争中，即使在政治路线和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存在分歧，也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统一行动”；并宣称“主张停止对兄弟党具有不友好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会晤并制定了关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提案，规定：通过集体努力改善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用双方会晤和多方会晤以及其他的政党之间相互联系的形式，停止相互攻击和非同志式的公开论战。[②]

这次会晤对于新的苏共领导人来说，最基本的成果就是参加会议的共产党都表示决心为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确定的路线基础上加强国际共运的统一和团结，做出自己应做的一切。[③] 通过这种表态，苏共看到了保住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的前景。而对于中共来说，这次会晤则产生了影响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形象和地位的几点

①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55页。

②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54~55、59~60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44页。

③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55~56页。

不利的因素。其一，会晤选择于美国加紧侵略越南步伐之时召开，形成了支援越南抵抗美国的共同文件，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采取一致行动援越抗美。苏共由此率先在最直接现实的援越行动中打出了反帝、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的旗帜。这就把中共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要么响应苏共的号召，服从苏共的领导；要么继续与苏共论战，把中苏两党分歧置于国际共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之上，使自己的反帝旗手的形象大打折扣。其二，会晤不再承担起草委员会的任务，而是制定了加强团结的提案和具体办法。莫斯科借此既造成了国际共运总路线继续以苏共纲领为核心的事实，又渲染了苏共的平等协商作风，进而将促进国际共运团结的旗帜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中共由此陷入被动，实际背负起了违背自己所接受的共同纲领、分裂国际共运的名声。这种状况，使中共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给莫斯科三月会晤戴上了“非法的”、“分裂会议”的帽子，并部署撰写文章进行批判，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与苏共新的意识形态上的激烈斗争。

3月4日下午，在会晤于3月3日公开发表反对美帝侵越的《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不到24小时，以及苏联政府同越南政府讨论实际步骤之时，莫斯科亚非拉国家留学生和苏联学生在美国驻苏大使馆附近举行反对美帝武装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与维持秩序的苏联军警和马队发生冲突，一些学生被逮捕和打伤，其中中国学生被捕1人，被打伤30余人，重伤住院者9人。中国驻苏大使馆于5日向苏联外交部发出抗议照会，《人民日报》迅即报道此事件并全文发表了照会。[①] 消息传至中国国内，各地群众纷纷要求对苏联镇压留学生事件采取抗议行动；中共则借这次事件，攻击苏联是假反帝，是在迫害参加反美斗争学生的同时，奴颜婢膝地向美帝国主义赔礼道歉。[②] 由此，迅速

① 《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0日，3月23、7日。
② 吉林省档案馆，77/11，第1卷，第13~15页；《人民日报》1965年3月23日。

掀起了一波反苏浪潮。

接着，在会晤结束的3月5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又发出了对此次会议如何表态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对外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表示：其一，这个会议就是赫鲁晓夫原定召开的那个分裂会议，尽管改换了名称，它的实质丝毫没有改变。其二，这个会议是非法的，中共决不承认。苏共片面召开这个会议，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①]

3月10日，《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开发表。[②] 3月1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走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重要步骤》的编辑部文章，高度评价三月莫斯科协商会晤的成果。德、波、捷、匈、保、蒙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法、意、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也在3月11～17日纷纷发表社论、文章，肯定这次会晤及会晤公报。[③]

面对苏共掀起的加强共运团结的宣传声浪，中国加紧了继续反击的步伐。3月11～18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提出：苏共领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软硬兼施，七拼八凑，总算是开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会议。这个会议，充满着凄凉和零落景象。它是一个分裂的小小的会议。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某些口号接过去，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这种情况，同美帝国主义将苏共领导的一些主要口号接过去，何其相似乃尔！毛泽东强调：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最大限度地把现代修正主义者孤立起来，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④] 毛泽东并于19日在武汉会见爱泼斯坦等外国专

---

① 吉林省档案馆，77/11，第1卷，第12页。

② 《苏联大事记（1964～1966）》，第66页；《人民日报》1965年3月23日。

③ 《人民日报》1965年3月21日。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346～350页。

家和一些亚洲兄弟党代表，就这篇文章征求意见时，赞成他们提出的，文章还可以多讲一些团结的话，把团结的旗帜拿在我们手里，要更多地强调团结大多数，强调亚非拉美人民的革命团结的意见，指示文章修改时突出强调一下团结问题。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篇文章。[①] 中央办公厅等则于3月12日联合发出通知说：即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评论莫斯科分裂会议的文章，是中共中央指名批评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要求中国驻外机构、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以及部队组织学习和讨论。[②]

3月23日，《人民日报》以《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为题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强调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章集中揭露苏共领导所谓“三假三真”的面目，即“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并将出席会议的代表分成几类，评论说：参加分裂会议的19个单位也是矛盾百出，四分五裂。文章奉劝苏共新领导，“何必要把赫鲁晓夫遗留下来的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呢？为什么不可以改弦更张呢？”文章明确提出了实现国际共运新团结的条件，那就是：公开宣布一切关于召开分裂会议的命令都是错误的、非法的，公开承认非法地召开分裂会议是错误的；公开地、郑重地向全世界共产党人，向全世界人民承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都是错误的；公开承认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是错误的；公开承认苏共领导反对中国、阿尔巴尼亚、日本共产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的言论和行动都是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23～93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7页。
② 长春市档案馆，1/1－18，第31卷，第53页。

错误的；公开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1957年宣言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轨道上来。不解决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去掉这些设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什么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停止公开论战、兄弟党国际会议，全部是空谈。与此同时，中国广播电台用多种语言，包括俄语播出了这篇文章。[①] 中国党的矛头所向已不再是国际共运不能以苏共纲领为各党共同遵循的准则，而是直指其内政，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大政方针是错误的。苏共只有自己打自己的脸，才能换来共运团结的新前途。

这样，当莫斯科把三月会晤看作对国际共运的团结和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事业的重大贡献，希望借此重树苏共对国际共运的绝对权威时，中共的强硬态度，及其对苏共新领导集团的猛烈攻击，也不啻于在下"最后通牒"。三天之后，苏斯洛夫即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协商会晤总结报告中，谴责这篇文章说：中共领导人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要求我党承认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决议中和苏共纲领中集体提出的总路线是错误的；对兄弟党充满了侮辱性的词句，指责它们是"修正主义"、"叛徒"、"两面派"等。这只能被看作想重新发动激烈的反对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冷战"。苏斯洛夫表示，苏共中央、全党和全体人民坚决反对中共的这种蛮横态度。全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总结的决议》，指出：会晤是在加强国际共运团结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苏联共产党同意会晤参加者的结论，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损失。在当今形势下，特别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恢复它的队伍的统一。[②]

---

① 《人民日报》1965年3月23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57页。

②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57～60页。

只是，苏共及其支持者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共开出的恢复统一的条件；特别是会晤既然主张新的国际会议预备会要由第二次莫斯科会议的81国党代表参加，其结果就必然是只要中共等党不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就无法举行，只能无限期地拖延，等待中共的同意。这其实已造成了决定召开世界兄弟党大会的不是苏共，而是中共的既成事实。故而，会晤关于重新整合队伍的呼吁和规定注定了只能是一纸空文。

可以说，莫斯科三月会晤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式分裂的标志。从这以后，以中共为首的左派队伍同以苏共为首的队伍展开了新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共再也没有参加过由苏共召集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国际共运也再也没有出现过世界近百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统一大会的盛况。一年以后，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回复苏共中央的邀请，拒绝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苏两党的组织关系中断，两党彻底分道扬镳。此后，中苏之间的联系再也没有党际关系的痕迹了。这种情况就一般国际关系而言，可以说是回归正常；但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和国际共运运行机制的角度看，便显得十分“不正常”了。总之，事实正如西方媒体所评论的，“共产党人可以高喊‘团结，团结’，但是现在并没有团结，也没有团结的前景”。[1]

到1965年4月，中国的外交路线进一步向极“左”方向调整，强调对外总路线的内容首先是反帝，其次是支持世界革命，第三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平等合作。[2] 反帝和支持世界革命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心目标。由于苏联方面向三月会晤的参加者散布说，中国阻挠苏联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苏斯洛夫也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责中

① 《资产阶级报刊对莫斯科三月会议的评论》，《人民日报》1965年3月22日

② 外档，109－03974－07，第69～70页

国拒绝在援助越南时采取共同行动，千方百计地贬低苏联对越援助的意义，并且尽力妨碍这一援助，[①] 中苏两国又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冲突。对于越南来说，联合反对美帝侵略越南应是国际共运的头等大事，而中国却仍然强调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认为顺利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条件是“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②] 由此，随着苏联援越力度的增强，越南党虽然为了获得双方援助而对中苏两党的对峙采取骑墙态度，既向苏方表示同意举行三月会晤，又拒绝参加会晤，其对中国的离心力却还是增强了。中国不能听任苏联将反帝大旗从自己手中夺走，听任其取得在越南问题上的发言权，听任越南投入苏联的怀抱而失去中国南部的这个保护屏障，于是，中苏两国在围绕莫斯科三月会晤进行意识形态论争的同时，又在援越抗美的舞台上展开了新的斗争。

第二节　双方共同援越抗美中的矛盾冲突

当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即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③] 是年8月“东京湾事件”爆发，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④] 同时加强援越，准备增调空军师、高射炮师到昆明、南宁等

① 吉林省档案馆，77/11/7，第36～37页；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56～57页。

② 《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人民日报》1965年3月23日。

③ 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毛泽东接见越南文进勇等人谈话记录，1964年6月24日。

④ 《人民日报》1964年8月6日。

地，并充实援越第一线的兵力。中越双方还开始磋商实施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并签订了军援协议。[①]

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期苏联对越南的抗美、统一斗争采取的却是一种消极回避的“脱身”方针，将对越南的支持尽可能限制在舆论方面，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较少。这种方针造成了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外援主要依赖中国的局面，致使河内在中苏对立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时，虽然试图保持联华联苏、不偏不倚的方针，却还是与中国维系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越南平衡与中苏双方关系的砝码实际向中国一方倾斜，苏联在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地位大大降低。[②]

面对自己在越南地位和影响的弱化，以及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趋势和越南抵抗美国侵略的决心，苏联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越政策。毕竟东南亚地区对于苏联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苏联要向该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加强其影响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与中国关系逐渐恶化的前景下，苏联既不能容许越南被美国吞食掉，也不能听任其彻底投入中国的怀抱。由此，勃列日涅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越方针，改“脱身”为“插手”，发表声明，承诺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③] 并于1965年初开始逐渐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力度。

中国随即开始十分关注苏联大规模援越对苏越关系及中越关系的潜在性影响，援越抗美的思路中掺入了排斥苏联的成分。这时在中国看来，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对内对外政策，“不但不比赫鲁晓夫好，

---

① 毛泽东接见黎笋谈话记录，1964年8月13日；Ilya V. Gaiduk，*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Chicago：Ivan R. Dee，1996，p. 16。

② 关于1961～1964年中苏对越援助情况，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26～191页。

③ Ilya V. Gaiduk，*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p. 20.

而且比赫鲁晓夫更坏”。[①] 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当政时，苏联不能把中越分开，因为苏联对越援助不大，而现在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援助，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正如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所说：“我们总担心站在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者。”为此，中国领导人反复告诫越方：苏联的援助不真诚，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国；二是进一步控制越南，改善苏美关系；三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也可能给越南制造麻烦。苏联就是要在中越关系中投下阴影，分裂越南和中国。可见没有苏联的帮助更好一些。[②]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以及毛泽东准备发动肃清中共党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大革命的现实，实际也将两国携起手来合作援越的道路封死。1965 年初莫斯科三月会晤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团结反帝、共同行动之后，4 月，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即致函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议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搁置分歧，采取联合行动。中国方面于 7 月复函予以拒绝，并指责说：你们所说的“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政策的工具。[③]

1966 年 2 月底日共代表团访华，日方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讨论通过的公报草案不仅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未点苏联的名，而且还提出了关于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与苏联统一行动援助越南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向日方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到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因此决定不发公报，只发消息。同时，毛泽东还否定了宫本显治所说的虽然不直接同苏共领导采取联合行动，

① 长春市档案馆，1/1～18/42，第 96 页。

②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 9 October 1965（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965 年 10 月 9 日），Zhou Enlai and Ho Chi Minh, 8 November 1965（周恩来与胡志明会谈记录，1965 年 11 月 8 日），Zhou Enlai and Le Duan, 23 March 1966（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1966 年 3 月 23 日），*CWIHP Working Paper*, No. 22, pp. 88, 87, 88（note 135），91。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 11 册，第 394～395 页。

但可以同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采取联合行动的意见。他认为：国际民主团体的活动用处不大，不可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就是写出最好的决议也没有用。[1] 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绝不可以与修正主义苏联在援越问题上搞联合，双方只能是分别行动，各援助各的。[2]

只是，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大目标下各行其是的同时，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对越援助的过程中发生接触，进行某种形式的协作，这样，矛盾和冲突也由此而生。1965～1969 年中苏之间在援越抗美问题上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有时甚至进行激烈的斗争。这种情况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中苏在实现苏联援越军事行动计划上的矛盾冲突

1965 年 2 月柯西金访越结束后，苏联制订了一个新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25 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根据此计划，通过苏驻华使馆向中国提出口头声明，要求：(1) 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和其他现役武装人员 4000 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 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如昆明机场），供苏联一个米格－21 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扎 500 名苏联现役军人，用以保证机场的安全；(3) 在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米格－21 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为了进一步表明此项要求的迫切性，苏联政府又于 2 月 27 日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事情很急，应越南的要求，苏联要用 45 架安－12 飞机空运 18 门高射炮和 75 挺高射机枪去越南。[3]

3 月 10 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答复苏联政府 2 月 25 日的口头声明说：苏联提出的军事计划超出了通常的军事援助范围。对于第

---

① 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等谈话记录，1966 年 3 月 28、29 日。

② 毛泽东与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 年 11 月 8 日。毛泽东在这次接见中谈道："我们虽然不赞成他们那个联合行动，但是分别行动嘛，各援助各的嘛！"

③ 吉林省档案馆，77/11/7，第 38 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1957～1969），第 265、267 页。

一条要求，中国以越南方面并不赞成苏联的作战部队进驻越南为由加以拒绝。关于第二条建立空军作战基地的要求，中国则强调，按照苏联通知的米格-21飞机的飞行距离，把昆明作为作战基地，根本起不到保护越南领空的作用，故也回绝了。而对于第三条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于2月28日回复说，大规模空运不符合苏联主张的绝对保密原则，建议改为陆运。此时再次重复说明，苏联给越南这么一点武器和作战物资，却要派苏联飞机长期在中国领空飞来飞去，这不仅不能吓退敌人，还会立即暴露给敌人知道。中国的答复指出，像这样的重大行动，没有经过越、中、苏三方协商，是强加于人。因此，中国方面不能同意苏联的这种军事行动计划。答复并指责说：苏方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苏联、越南三国置于目前就开始对美国公开作战的地位，这将使当前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形势复杂化。[①] 总之，在中国政府看来，就中苏关系目前的状况，苏联的这些要求是另有所图，实际将构成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莫斯科则利用中方的答复进行攻击，大做中国阻止苏联援越的文章。苏联领导人于莫斯科三月会晤时披露说：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紧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十分可笑的借口，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说成是企图“控制越南和中国”。苏方进而责备说：由于中国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能用铁路运输，这需要很长时间。不过，由于我们的

① 吉林省档案馆，77/11/7，第38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65、267页。

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①]

对此，中国外交部虽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开表态驳斥苏方，但认为，为了消除苏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向有关人士吹吹风，由中方涉外人员在同国外左派和中间派人士的谈话中澄清事实，说明：苏联在“莫斯科分裂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所谓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的谣言攻势，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反对中国”。但谣言的影子只有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中国认为这批武器空运不好，也无必要，建议陆运，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对越南需要，而且苏联同意给的军事物资，中国无不全力以赴，予以协助。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关于这一点，越南同志知道，苏联同志也知道。事实总是推翻不了的。而苏联歪曲事实，诬蔑中国阻挠他们援越，是一种有预谋的反华行动。[②]

1967年5月，苏联又向中国提出要经中国领空转运米格－17和米格－21型飞机各12架。苏联关于空运问题的旧话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国拒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提出空运飞机的建议是在有意识地将军事秘密暴露给敌人，是一个阴谋。这样一个大的军事行动，苏联不经协商就要迫使中国接受，无疑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越南方面在传达苏联的这个要求时，估计到中国不会同意，所以同时提出通过铁路运输飞机的方式，为中国所接受。[③]

中苏在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矛盾冲突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物资比较便利和现实的途径是通过中国的领土，因此，在整个援越抗美期间，中国铁路成为免费转运苏联和朝、蒙、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的一条重要

①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56～57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77/11/7，第36～39页。

③ Chinese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Qiao Guanhua and Vietnamese ambassador Ngo Minh Loan, 13 May 1967（乔冠华与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谈话记录，1967年5月13日），Westad etc. (ed.), 77 Conversations, *CWIHP Working Paper*, No. 22, pp. 119－120。

通道。[①] 其间，中苏双方围绕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的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其纠葛过程复杂，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中苏之间在援越中的矛盾冲突。

1965 年 2 月，柯西金访越两次途经北京时，向周恩来谈道：美国轰炸越南北方以后，苏联可以放手援越了。苏联将无偿向越南提供大炮、坦克、地对空导弹。周恩来表示：希望苏联快给越南武器，中国铁路可以帮助运输。毛泽东在 2 月 11 日会见柯西金时也指出，中国将协助把苏联的军事技术装备尽速运往越南。此后，中苏两国政府于 3 月 30 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转运苏联政府供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种物资过境议定书。中国方面随即把转运苏联援越军事物资放在优先地位，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此项工作。[②] 4 月，苏联援助越南的首批地对空导弹装备，包括 13 列火车、403 个车皮、282 名专家及部分旅团指挥器材（大部为旧货），相当于两个火力营、两个技术营、一个指挥营，开始经中国过境运往越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必须及时、安全地将这批装备和人员运抵越南，并由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亲往广西凭祥检查部署工作。4 月 14 日至 5 月 20 日，中越苏三方在凭祥进行了此批物资过境的交接手续。6 月，范文同等人在莫斯科与苏方达成有关军事援助的意向后来华，罗瑞卿在同文进勇会谈时阐明了中国对运送苏联军援物资的立场：你们向苏联要装备，理直气壮。但要有重点，逼它海运。要我们运也可以，但不许它搞阴谋。什么提供空中走廊、机场、港口等，过去、现在、今后我们都不干。罗瑞卿表示：关于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免费运输。他们的专家过境，我们也会招待的。此后不久，刘少奇于 7 月 3 日

① 中国方面规定，这些国家经由中国运送的援越物资，均免收运杂费，对内由铁路向外交部结算。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 1965 年/665。

② 吉林省档案馆，77/11/7，第 37～38 页；1/1－21/135，第 7 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1957～1969），第 265、267 页。

与阮维桢会谈时指出：苏联和东欧的援越物资，今后应主要从海上运输。中央援越领导小组办公室随即提出：苏联援越物资，大部分应要求苏方海上运输。凡过去与我达成协议由我负责转运的物资，我们负责。如有少量急需或特种物资要求我转运，可适当安排。海上运输遇空袭要求在我港口待避，可视情况临时商定。中央领导人批准了这一方案，周恩来、罗瑞卿指示说：空运物资也可答应，因为其不同于开辟空中走廊和拨给机场。[①] 7月，中越运输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并于26日签订了会谈纪要。据中越双方达成的协议，1965年下半年苏联及东欧等国过境中国的物资计划为14.85万吨，其中军事物资5.5万吨，一般物资7.5万吨。双方商定，优先安排运输军事物资。[②] 根据中国的材料，1965年3月，中国方面根据苏方提出的货单向越南运送了150车皮以上的物资；4～10月，苏方计划有40列车左右的军用物资过境。5月26日，苏越双方又在莫斯科达成由苏联向越南提供一批补充物资的协议，要求中国转运。1965～1968年，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援越物资共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中方认为，中国自始至终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严格按照协议，全部、及时、安全地转运了苏联的援越武器。[③] 但是，苏共中央于1965年7月初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方没有及时转运苏联给越南的补充物资。对此，中共中央7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予以驳斥。此后，苏联方面继续提出：中国当局违反毛泽东同志的保证，从苏方一开始向越南运送军用物资时起就制造困难。在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达成了关于增加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加速运送这些装备的协议后，中国行政当

---

① 2000年1月笔者采访有关人士记录。

② 此批过境物资中另有越南的贸易进口物资1.85万吨。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1965年/409，第2、7、3页

③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65～268页；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第540页；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50页；吉林省档案馆，1/1－21/135，第2页。

局的代表阻挠运输苏给越的物资。[1] 其实，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的处理，中国历来的做法是在援助国提出申请之后，首先征求受援国越南的意见，然后协调好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再同援助国达成相应的协议。1965 年 8 月，苏方向中方递交了补充供应越南军事技术物资过境的申请。中国方面依照惯例通知越南外交部此事后，连续催请越方答复，但直至 11 月初越方仍无回音，中国于是将苏联的申请暂时搁置。对于 10 月 7 日苏方提出的尽快签协议的要求，中方回复说：在搞清苏联的这批军事技术物资“哪些是越南方面首先必需的，它希望在什么期限内收到”之前，中国方面将不接受苏联给越南的军用物资。据此，中方向苏方代表声明，拒绝让一系列载有苏军援物资的运输车辆从中国过境，其中涉及 10 辆军机修理车以及 40 门高射炮的转运。[2]

不过时隔不久，中国方面对于特殊问题还是采取了通融的态度，在征得越方同意后于 10 月 12 日约见苏驻华武官，正式提出就上述修理车和高射炮两项物资的运输问题与苏方单独办理换文，以便尽早将其运往越南，而不必等待补充协议的签订。随后，中方又多次催询，苏方却迟迟不复。21 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有意“拖延签订”协议，并拒绝接受转运上述物资。对此，中共中央于 11 月 5 日复函澄清说，事实明摆着，这两项物资不能及时转运，责任完全在苏方，进而回击苏联是“无事生非，蓄意诽谤”，存心颠倒黑白，目的在于制造口实，做反华文章。[3]

另外，在运送苏联过境物资时，中国方面坚持按协议办事，不愿意迁就苏联，改变自己的运输计划。苏联方面则强调非常时期，援越

---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1957～1969），第 268 页；吉林省档案馆，1/1－21/135，第 2 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1/1－21/135，第 6、3、2 页。

③ 吉林省档案馆，1/1－21/135，第 3、6 页。

不必完全照章办事，可以做特殊处理。故而苏联常常违反同中国签订的运输协议，或不按时提交计划，或不按计划发车，有时甚至既无计划，又不通知，突然将列车开进中国边境站。中国方面认为，这种情况不仅打乱了中方的计划，而且使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无法衔接，是破坏协议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援越物资的正常运输。[①]

中苏之间在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问题上的唇枪舌剑、频频交锋，令急于获得大量援助物资的越南左右为难。为保证军事物资优先过境抵越，越南政府一方面于 1966 年初正式通知中国：已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达成协议，今后援越经济物资大部分安排直接海运越南港口；[②] 一方面在不得罪苏联的前提下对中国进行维护，于 6 月 19 日授权越通社发表声明，将批驳的矛头直指西方说："中国对苏联等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都尽力帮助按计划转运过境，西方通讯机构散布的所谓'过境援越物资受阻'完全是捏造和极为卑鄙的挑拨阴谋。"1967 年 2 月 28 日越南政府再次声明指出：中国"把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援越物资妥善地并且按照预定的时间运到越南"。[③]

由于苏联的军援物资继续主要经中国铁路运送，因此，1968 年 2 月 10 日，中苏双方又就通过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援越军备物资问题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只是，这项协议的执行过程依然存在问题。1969 年初，苏联方面指责中国拒绝运送苏方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迫使苏联在 1 ~ 3 月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根据苏方材料记述，500 余辆装载导弹武器的汽车被定期重新装货发往中苏边境，而后又不得不返还原处。苏联外交部声明说，3 月初，苏方代表为通告发出一列军车事，多次求见中国有关部门。中方起初以"忙"为借口推托，后又在会见时以消息传递太迟为由断然拒绝接受此项通知；

① 吉林省档案馆，1/1 －21/135，第 4 页。

② 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 1966 年/680。

③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 76 页。

而且中方代表语气粗暴，带有一股反苏情绪。声明指责中国违反苏中双方达成的新协议，重新开始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运输设置障碍。越南方面此时对越中之间就 1969 年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物资转运至越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极为关注，曾对苏方强调指出：中国要使越南脱离苏联，因此为援越物资的运输制造困难。这样，军援物资的运送也将变得非常艰难。是年，由于中苏之间战争气氛的日趋浓重，中国方面停止了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①] 苏联一度只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输送援助物品。同年，苏越另行开通了经老挝、缅甸、印度的空中运输航线。

另外，除铁路运送援越物资过境外，中国的港口也承担转运苏联援越物资的任务。但中苏之间在苏援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及推动越美和谈等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影响了从中国港口转运苏联东欧国家援越物资任务的具体落实，苏联的大部分物资是直接海运到越南的。

1965 年 7 月中越两国运输代表团签订的会谈纪要中关于“海路运输”一项规定：对于其他国家过境中国铁路运输的援越物资及一般贸易物资，如遇越南铁路接运能力不足时，越方将安排改为海运。海运物资的运力由中方尽力安排，及时发运。[②] 不过，此协议签署时间不长，中国方面即在驳斥苏方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言论时质问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你们为数众多的远洋船舶，运送援越军事物资呢？你们今年 2 月份答应给越南同志的海军舰艇，又为什么至今还不直接开往越南的军港，而要运到中国的港口转交给越南同志呢？你们辩解说，美国封锁了越南，苏联与越南不接壤，通过中国领

---

① Christian F. Ostermann，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es of 1969：New Evidence from the SED Archives，Appendix：Document No. 2，3，“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香港，1996 年 1 月）论文。

② 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 1965 年/409，第 3 页。

土运输是“唯一现实的途径”。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谁都知道，到目前为止，各国的船只仍然能够进出越南港口，中国船经常去，苏联船也不是不去。你们就是不敢用你们的船只装运军事物资去支援越南人民。你们是害怕美帝国主义。[①]

至 1966 年，苏联方面未曾中断过从苏联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船只开往越南，20 余艘船连续不断地向越南运送物资。截至是年 7 月 18 日，准备运、正在运和已运达的物资计 11 万余吨。[②] 1967 年 4 月，范文同向周恩来转达了苏方希望中国承担更多海运任务的建议：中国增加苏援越物资的船运量，从每月 1 万吨增至 3 万吨；中国开辟 2 个或 3 个港口装卸苏联的物资。对于前者，中方表示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答复此项提议；而对后者则明确回复说，目前越南的海防港并未遭到轰炸，因此还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的港口，并且怀疑苏联要求使用中国的港口不仅只是为了运送援越物资，而且还有其他的目的。[③]

1970 年代初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帮助河内抢运物资到越南南方，为以后北越统一南越的战争做准备，中苏双方在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问题上基本以配合为主，矛盾冲突虽然依旧存在，但已居于次要地位。[④] 只是这时越南由于倚重苏联的军事援助，与莫斯科的关系愈益密切了。

当中苏两国在中国的南部边疆，通过援越抗美暗中进行争夺越南盟友的较量时，苏联开始加强援助蒙古，继续增强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构建了对中国北部核心区域的军事压力态势。随着中苏边境斗争局势的日趋紧张，两国关系一度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

① 吉林省档案馆，1/1 - 21/135，第 4 ~ 5 页。

② ЦХСД，ф. 5，оп. 58，д. 262，л. 38 - 41.

③ Zhou Enlai and Pham Dong，7 、10 April 1967（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1967 年 4 月 7、10 日），Westad etc. （ed.），77 Conversations，*Working Paper*，No. 22，pp. 第 97、99 页。

④ 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1965 ~ 197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4、5 期。

第三节　珍宝岛冲突与中苏军事对抗

1966 年 1 月，苏蒙签订了为期 20 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边界长 4500 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 560 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 700 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 10～14 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平缓，尤其便于苏联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①

这一情况加之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感受到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1966 年 3 月 16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② 月末，毛泽东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在表示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我们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

---

① 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 年第 4 期，第 51～52 页。

②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21 页。

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1]

1968 年 8 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 6 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8 月 23 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公开给苏联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2] 这即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调整做出了革命理念、社会心理及逻辑上的铺垫。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从 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3 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 4189 起，比 1960 ~ 1964 年增加了一倍半。[3] 中苏东段边界黑龙江上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冲突最为激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 年至 1968 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些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7 年秋，中国军人穿便衣，偕同大量民兵，用棍棒把登上吴八老岛的苏军赶了出去。翌年 1 月，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 4 人。是年末至 1969 年初，苏联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 年 2 月 7 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进行威胁的严重事件。[4] 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在解决边界冲突的决策上可以有几种选择。

---

① 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等谈话记录，1966 年 3 月 28 日。

② 《人民日报》1968 年 8 月 23 日 1968 年 6 月周恩来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雄等人时即指出：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见 Zhou Enlai and Pham Hung, 29 June 1968, Westad etc. （ed.）, 77 Conversations, *Working Paper*, No. 22, p. 136。

③ 《人民日报》1969 年 5 月 25 日。

④ 徐焰：《1969 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4 年第 5 期，第4 ~ 6 页。

一是采取克制态度，维持现状，中国部队不进入有争议岛屿，只与苏方进行外交政治斗争，争取不使边境冲突升级，不与苏联进行武力对抗。二是维持棍棒武斗的形式，避免交火。三是准备用武力打击阻挠中国边防军上岛的苏军，并不惜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乃至热战。在“文革”极“左”思潮营造的全国上下强烈的反修氛围和反苏激情中，毛泽东选取了第三种方案，以武力反击苏联。余下的问题只在于时机和地点的选择。珍宝岛反击战方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事实上，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从忍让到反击的发展过程。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 年 1 月 24 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订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1] 这样，从 1968 年初到 1969 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做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而最终选择于 1969 年 3 月初在乌苏里江珍宝岛地区对苏实施军事打击，可以说有以下几种考虑。

其一，时间的选择。1968 年 10 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 1969 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2] 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

---

①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 318 页。

② 中共中央在 1967 年末就已经开始考虑召开“九大”，问题只在于时机的选择。参见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1967 年 11 月 5 日。

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就毛泽东的思考来说，选择在“九大”召开前对苏实施打击，对于进一步突出反修防修方针，通过边境事件强调团结，消除严重的派性，稳定国内局势最为有利。

其二，地点的选择。一方面，珍宝岛在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已被划归中国，估计苏方不会为该岛屿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另一方面，该岛又是苏军自1947年以来控制了二十多年的岛屿，[1] 在这里进行反击比其他岛屿造成的影响要大。总之，既要引起反响，造成某种紧张局势，又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因此，选择在珍宝岛作战最为有利。

其三，对苏联反应的估计。中国方面做出此时对苏实施军事打击的决定，应该还建立在一种对局势的估计之上，即认为苏联不会这时因此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如珍宝岛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的：苏联在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为进攻行动建立起可靠的基地。[2]

其四，不排除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要继续干扰苏联在国际共运中行使领导权。1969年3月17～22日，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筹备会议即将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决定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延期至6月5日召开，并为6月的会议起草了《在目前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和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一切反帝团体的一致行动》的文件。[3] 毛泽东就是要破坏这个会议，给苏联造成麻烦。

这样，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

---

① 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4页

② C. 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马贵凡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第16页。

③ 《苏联大事记（1967～1970）》，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资料室，1978，未刊，第198页。



1969年中国边防军战士在珍宝岛

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毛泽东同意予以反击，并批准了总参报告的行动部署。中共中央也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①] 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反击战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

终于，3月2日，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爆发了两国之间第一次边界武装冲突。15日，双方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激烈战斗。17日，苏军再次出动坦克和步兵上岛，试图拖回被炸毁的坦克，在中方炮火的猛烈攻击下，被迫撤走。三次战斗，双方均有伤亡。[②]

珍宝岛事件之后，莫斯科迅速采取回应步骤。第一，抢先提出抗

①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319、320页；笔者自存有关当事人回忆录

②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情况介绍》，乌鲁木齐市革命委员会室委组编《战备教育材料》，未刊，1969，第3~5、7~9页；笔者自存有关当事人回忆录；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第15~16页



1969 年珍宝岛冲突中苏联颁发的表彰证

议，3 月 2 日事件发生之后，苏联即向中国提出了“抗议照会”。第二，召开记者招待会，3 月 7 日，苏联外交部新闻司长和边防军总部副司令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具体描述了 3 月 2 日冲突的情况。第三，发动示威，苏联领导人号召群众举行针对中国的示威游行活动。第四，向西方投诉，3 月 11 日，苏联驻西德大使拜会西德总理，通报苏中边界武装冲突的情况。第五，准备采取“集体行动”，在 3 月 17 日举行的华约成员国高峰会议上，苏联要求就谴责中国侵略苏联的问题达成协议，要求东欧国家给予兄弟般的援助，即派兵到发生冲突的苏中边境地区，用集体行动对付中国。第六，进行核威胁，3 月 15 日晚，莫斯科电台谈到中苏边界事件时说：“苏联的核导弹是强大的，可能造成千千万万人的悲惨命运。”随后的几天，莫斯科电台的晚间节目都大谈苏联的核力量如何强大，中国核力量如何“不济”。[1] 第七，提出亚安体系的构想，5 月 29 日，《真理报》发表评论，谴责中国在亚洲

① 齐辛：《珍宝岛事件真相（增编本）》，香港，集思图书公司，1969，第 35 ~ 45 页

制造麻烦，点名要一些东南亚国家建立“集体安全”。接着，在6月5～17日召开的莫斯科75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指出：中共领导人“已由对和平共处的批评转为策划武装冲突，采取破坏和平事业的政策”；警告说：“想用武器作为语言来同苏联谈话的企图必将受到坚决反击”；并首次提出了要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意见，[1] 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以此遏制中国在亚洲扩张势力。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其中心意图是用这次事件做文章。其一，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2]《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则以《打倒新沙皇!》为题发表社论，将苏联领导集团与老沙皇画上了等号。[3]

其二，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毛泽东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4] 毛泽东并在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5] 1969年2月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

---

①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55～556页。
② 《人民日报》1969年3月4、13日。
③ 《人民日报》1969年3月4日。
④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
⑤ 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644、645页。

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认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①]

4月1～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②]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宣称：毛主席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③] 以此将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文章做大，即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它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④]

其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九大政治报告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美帝、苏修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⑤] 这也就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

其四，与此同时，对苏方提出的协商要求不予回应，实际为毛泽东把文章做大准备时间。3月21日，柯西金试图通过中苏热线电话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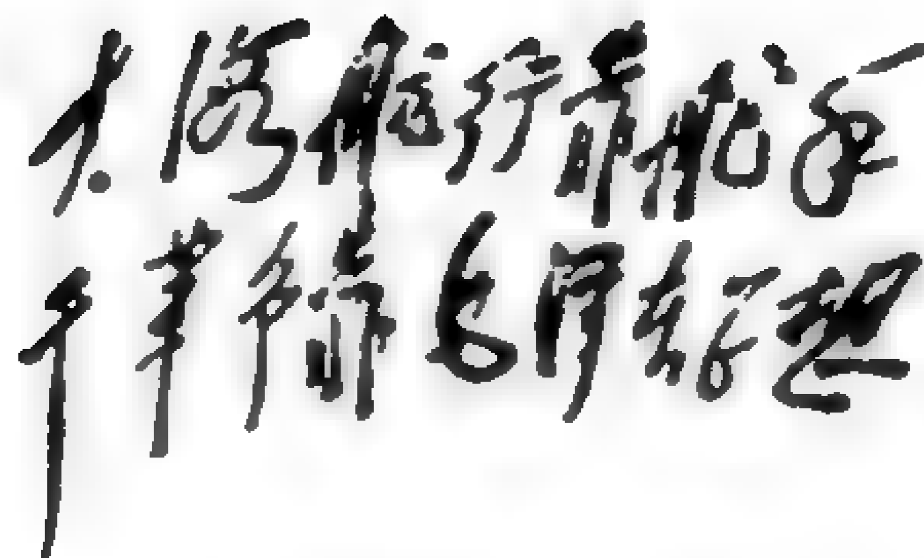
①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2，第72、87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6、288～289页。

③ 《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④ 林彪报告"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仅用一段专谈美帝，而且说其"越来越走下坡路"；专谈"苏修"的篇幅则有七八段之多，并强调其"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

⑤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仇视苏修　藐视苏修

鄙视苏修

（战备教育学习材料）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翻印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反苏战备教材（1969 年 12 月）

毛泽东或周恩来联系，遭到中国接线员的拒绝。22 日凌晨，中国外交部苏东司负责人通知苏方说：从两国当前关系来说，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可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1] 29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主张“恢复于 1964 年在北京开始的协商”，中方没有做出回应。4 月 11 日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提出 15 日就在莫斯科开始“协商”，并在第二天公布了照会。14 日中国政府告诉苏联政府：“我们是要答复你们的，请你们稍安毋躁。”直到 5 月 24 日，中国政府才做出回应，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历来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2] 其后，苏联方面再于 7 月 26 日提出举行苏中高级会谈的建议。[3] 中国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1957～1969），第 273 页。

② 《人民日报》1969 年 5 月 25 日。

③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1957～1969），第 274 页；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 年第 4 期，第 19 页

中国对苏联的请求长时间不予理睬，以及中共九大号召打倒苏修、要准备打仗的做法，不仅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而且令苏共领导人满腹疑团，不知中国的动机、目的究竟何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指责中国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中美联手抗苏的前景使苏共领导人忧心忡忡，因而开始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以迫使中国接受谈判。

一方面，苏联加强了对中国实施核威胁。《真理报》8 月 28 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提出："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 几天后，《消息报》又发表在卫国战争时期任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的扎哈罗夫元帅的文章，说"粉碎关东军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和明显地证明，任何侵犯苏联远东边界和损害它的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企图，无论来自哪一方面，都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同时，莫斯科还试图征得美国方面的认可，8 月 18 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代表询问美国方面，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①] 西方国家报刊也不断传出消息，说苏情报人员向美国试探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的可能性。[②] 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国实施军事报复。苏军决策层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在苏中东段边界增援兵力基本到位以后，避开苏军运输力量较弱的东段边界，选择便于其机械化部队运动，后勤补给线短并通畅，而中方防守兵力相对薄弱，且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苏中西段边界的新疆方向，进行军事报复行动。8 月 13 日，苏联出动飞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武装部队 300 余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对正在巡逻的一个排的中国边防分队发动突然袭击。中国边防军

① 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 年第 4 期，第 20 页。

②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335 页。

寡不敌众，除一人被俘外，其余全部阵亡。[①]

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方面做出了两种反应。一是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做出了大规模战争可能爆发的判断。8 月 28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命令，要求边疆居民和驻边疆部队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团结，共同对敌。[②] 中国的战备工作也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高潮阶段。[③] 二是希望降低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毕竟，中国在珍宝岛边界冲突之后大做文章的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目的，珍宝岛事件本身的政治意义也大于军事意义。如此，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同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这对中国更为有利。于是，中国接受了苏方关于举行高级会谈的建议。



1969 年 9 月 11 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

---

①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第 25 页；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第 146 ~ 147 页；《人民日报》1969 年 8 月 14 日。

②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未刊，1988，第 365 页。

③ 参见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 41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第 214 ~216 页

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举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署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①] 会谈中，周恩来指出苏联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的问题，表示如果苏方这么做，就是侵略战争，中国将坚决抵抗到底。[②] 柯西金则提出了如下建议：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及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研究互派大使；等等。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③]

两国总理口头协议的达成，以及苏方表露的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使中国领导人隐约摸到了莫斯科不想使事态扩大的思考脉络，暂时松了一口气，态度又强硬起来。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不久，苏驻华使馆参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用手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④] 对于柯西金提出的改善关系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

---

①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26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75页。

③ *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3，№1，с. 117、118；*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 192.

④ *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3，№1，с. 119.

而苏联方面也通过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摸到了中国的脉搏，感觉到了中国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深刻担忧。面对中国态度不稳定的情况，莫斯科决定继续利用核威胁的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9月16日，伦敦《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记者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1] 该文突出报道了克里姆林宫的两个动向：讨论轰炸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可能性问题；计划建立一个能够呼应莫斯科"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共替代领导机构。文章指出，后一点由于不久前苏联对捷克的入侵，使这种威胁变得非常现实。[2]

莫斯科的这一信息发出后，中国方面迅速做出了反应。事隔两天，9月18日，周恩来即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专项协定。[3] 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做出了苏联不会大规模进攻中国、不会对华使用核武器的正式保证。虽然此函没有确认机场会谈达成的四点措施的协议，没有提争议地区和双方武装部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问题，但柯西金还是通报说，苏联方面已指示边防军维持边界现状，避免使用武力。同时，中苏双方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4]

然而，机场会谈的口头协议和柯西金在秘密信函中做出的承诺，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尤其无法清除其对

---

① 在西方，人们认为路易斯是被授权非正式反映莫斯科在最棘手问题上的意见的人。

② 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第22页。

③ *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5，с. 57.

④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75～276页

华实施核打击和扶植反毛政权的威胁在中国领导人心中投下的阴影。面对即将来临的谈判，以及党内关于苏方利用和谈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疑虑，毛泽东对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出了过火反应。由此，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先向莫斯科出示橄榄枝，以期暂缓紧张局势。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时指出：中苏分裂，美国高兴。我们是不希望打的。[①] 由此通过朝鲜方面向苏联发出希望缓和中苏边境冲突的信息。10月6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复函柯西金，强调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应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等五项临时措施达成协议；并指出：中苏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将为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提供有利条件。[②] 另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又采取应急措施，避免在苏联的突袭中陷入被动。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0月17日，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名义正式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③] 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箭在弦上，两国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成为一纸空文。

正是在这种严峻情势下，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做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改对美苏两面作战为联合美国集中力量对抗苏联。19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

---

① 毛泽东与崔庸健谈话记录，1969年10月1日。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7页。
③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9页。

第四节　中美化敌为友联合抗衡苏联

面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最终做出联美抗苏的战略抉择，通过做大珍宝岛事件的文章，即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走到战争的边缘，又向其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中国更主要的敌人。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在羽翼丰满之后，结束了以往由赫鲁晓夫确立的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外交总路线，逐步将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到自己的轨道上，对美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苏联势力的扩展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利益及自身安全，从 1969 年 6 月至 1970 年初，尼克松“联华遏制苏”的战略构想逐渐成形，美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①] 这样，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转机。

1970 年初，中美双方开始进行高层接触，为实现和解做准备。1971 年 7 月和 10 月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通过多次会谈，中美之间虽然仍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已更加突出了双方共同的立场——都反对霸权，即苏联的扩张主义；都承诺要使双边关系正常化。[②]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之间实现了和解。

中美双方 1971 ~ 1972 年的高层会晤，表现出了共同抗衡苏联扩张

---

① 关于美国方面采取的种种措施，可参见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NSDM) 17, Henry Kissi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fense, DCI, Chairman of JCS, June 26, 1969；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南出版社，1998，第 667 ~ 670 页；塔德·肖尔茨：《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邓辛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 149 ~ 164 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3 卷（1970 ~ 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348 ~ 349页。

②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Canada) Limeted, 1979, p. 783.

的浓厚兴趣。在这一问题上，两国可以说是共同利益颇多，几乎没有什么分歧。周恩来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不仅对中苏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回顾，其内容翔实，包括苏共二十大与中苏分裂、1957 年莫斯科宣言、赫鲁晓夫撤走专家、苏联击落 U-2 飞机事件、苏共二十二大、中印关系、1963 年 7 月中苏两党会谈、中苏边界争端、边界谈判、苏联在苏中边界增兵、中国给苏联戴上“社会帝国主义”帽子、中苏珍宝岛事件、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谈、中苏贸易恢复情况、苏联害怕中美接近、苏联在南斯拉夫的颠覆活动、苏联与他国领土争端等多条线索；双方还围绕苏联问题进行了坦率而深入的探讨，在互通情报、于南亚次大陆问题上共同对抗印度和苏联等议题上达成了共识和默契，确定了具体的合作意向。尼克松甚至表示，如果中国成为第二号超级大国，那么，美国就可以削减军备了。[①] 以此描绘出了中美联手、成为准盟友的蓝图。

在 1971 年 7 月、10 月和 1972 年 2 月与基辛格和尼克松的会谈中，周恩来十分注意了解苏联的情况，中美双方互相交换有关苏联的信息，主要是美方进行通报，诸如美苏峰会、欧安会、美苏贸易扩大、解决中东问题、苏联关注中美关系并警惕中美勾结问题、美苏军控协议、苏联对中苏边界谈判的反应、柏林问题、苏联在世界裁军会议上的建议，以及中东局势等，范围宽广，内容繁多。美方表示，尽管目前美国所拥有的信息交流渠道相当不完备，但是，仍然会把有关情况通告中国。周恩来则强调，重要的是双方交换看法并一起寻找共同点。[②] 这实际标示了新的中美合作关系的开始。中美信息交流中比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2, 1972, 2: 10 - 6p. m.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 - dential Materials, 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87,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以下凡馆藏相同者只注 Box 号码，其余从略，不另注。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2: 10 - 6 p. m. ,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 - 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1032, Files for the President - China Material, Polo I, Record, July 1971 HAK visit to PRC. ;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1, 1972, 5: 58 - 6: 55 p. m. , Box 87.

较核心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核问题、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在1971年7月和10月的中美高层会晤中，基辛格表示，在核问题方面，美国的着力点主要放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上。美方将向中方通报美苏之间谈判的任何信息，以减轻中方对此的忧虑。基辛格说一旦中美之间建立起通信关系，美方将会把任何可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条款告诉中方。基辛格介绍了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拒绝“授权每个国家对正在策划挑起进攻的任何国家进行攻击”条款的情况，以及有关在军备控制领域里同中国签订防止意外战争协议的愿望。当基辛格告知美国准备于10月28日至11月10日在阿留申群岛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时，周恩来即以苏联在北冰洋的一块陆地上进行防御性反弹道导弹试验的消息相交换。基辛格访华后，美方继续将其与苏联接触的所有情况通报给中国政府。[①] 中美之间保持了联络的通畅与及时。

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向周恩来通报情况成为会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诸如：苏联近年来以令人警惕的速度发展核武器，为保持核均衡，美国决不能在核竞赛中落后，否则美国为北约国家提供的保护将一钱不值；将派遣基辛格专程到北京通报是年6月尼克松赴莫斯科与苏方签署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情况；等等。周恩来则以中国情报回告尼克松：发现当美国军舰驶向印度洋时，苏联也非常迅速地把核潜艇从海参崴派往印度洋，*而且一旦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其动作就非常快。他们甚至首次跨越可以看作日本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内海的轻津海峡，致使日本极为紧张和不满。*尼克松称赞说：“你们的

---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2: 10 - 6 p. m., Box 103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1: 20 - 11: 50p. m., Box 103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22, 1971, 4: 15 - 8: 28p. m.,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1034, Files for the President - China Material, Polo II, HAK China Trip,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23, 1971, 9: 05 - 10: 05p. m., Box103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2, 1972, 2: 10 - 6p. m., Box87.

情报非常不错。”①

其二，关于裁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尤为关心的是苏联的裁军建议对中国有何影响。1971年10月22日，他专门就苏联不久前在联大提出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一事询问基辛格，该项建议是否包括像中国这样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周认为苏方的提议是针对中国的核裁军立场而来的，并希望得知基辛格对此的看法。基辛格答曰，由于难以在情况不同、邻国不同的条件下对军事需求做比较，因此该建议实际操作困难，意义不大。②

其三，关于影响中国利益的问题。基辛格承诺说，如果美方能够找到可行的途径，将会尽力与中方商讨由别的大国提出的可能影响中国利益的任何建议，而美方将会非常认真地考虑中方的看法。③

其四，苏联在中苏边界的军力部署情况。尼克松曾向周恩来通报苏军在中苏边界的部署情况，说美方有非常可靠的情报，苏联在苏中边境部署的军事力量要比对抗西欧联盟所部署的多。*对此，如总理已经知道的，我已经要求基辛格博士为总理所指定有必要知道的中方人士提供一个涉及非常机密的情报简报，其中包含我们认为完全可信的关于苏联针对中国所部署的军队的位置和核武器部署情况。*④

其五，苏联对美中关系的反应。根据基辛格的介绍，葛罗米柯在中东的时候曾与他谈论美中关系，葛罗米柯虽然表示苏联不会反对美中之间关系的改善，但是反对美国同中国勾结。这件事情任何人都不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2, 1972, 2: 10 – 6p. m., Box 87; Memorandum of Con – versation, February 23, 1972, 2 – 6p. m., Box 87. 斜体字为原件所有，下同。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22, 1971, 4: 15 – 8: 28p. m., Box 1034. 中国主张核裁军不论国家大小，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参与。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2: 10 – 6p. m., Box 1032.

④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1, 1972, 5: 58 – 6: 55p. m., Box 8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2, 1972, 2: 10 – 6p. m., Box 87.

知道。[1]

其六，中苏边界谈判问题。周恩来曾向基辛格了解苏联是否向美方提到中苏之间正在进行的边界谈判，苏方是否提到任何有关领土要求的事情？基辛格回答说：他们非常模糊地提到领土要求。我拒绝同他们讨论领土要求问题。[2]

由此可见，中美双方实际在 1971 年 7 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后，即已就交换与苏联有关的情报问题达成了共识和默契，其后双方迅速予以落实这一合作意向，开辟联络渠道，率先在情报信息领域开始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些情报有不少属于核心机密，[3] 反映了中美两国通过高层会谈和峰会所建立起来的信任程度已达到一定的水平，预示了双方能够开始进行深度合作的前景。这些具体情节，大大充实了中美在上海公报中所声明的，主旨在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立场[4]的内涵。

通过会谈，中美双方不仅摸清了各自对苏联威胁的认识，明确了在反对苏联的霸权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实上还通过讨论印巴冲突时达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一致意见，迈出了联合起来间接对抗印度背后的苏联的第一步。美国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方面则从基辛格关于美国不要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在军控问题上不会迫于压力提出反对中国的方案，以及准备不断向中国通报关于核问题等情况的承诺，增强了坚持援越抗美与寻求中美和解同时进行的信心。

1970 年代初，南亚次大陆局势动荡不安，苏联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渗透，试图向印度洋拓展势力。1970 年末，以拉赫曼为首的人民同

---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22, 1971, 4: 1.5 – 8: 28p. m. , Box 1034.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22, 1971, 4: 15 – 8: 28p. m. , Box 1034.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22, 1971, 4: 15 – 8: 28p. m. , Box 1034.

④ 《公报》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盟在东巴基斯坦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东巴要求独立的呼声空前高涨，印度乘机插手，东巴局势失控，大批难民涌入印度。在苏联的支持和策动下，印度借口东巴动乱威胁印度安全，于翌年11月出兵东巴，将巴基斯坦肢解。[①] 苏联在这一地区咄咄逼人的攻势，使为越战所累的美国陷入被动之中。由此，在美国方面看来，正在进行的美中高层接触，应该在整个世界的大框架中探讨问题，当双方把目光投向次大陆时，不能只讨论像南亚、印度这样的地区危机，而不考虑苏联对该地区的政策。*印度本身对中国不是个威胁，但一个由苏联支持的印度对中国却是一个即时的威胁。假如印度的北部邻居苏联支持印度，中国旨在对付印度的军事行动将会受到严重挑战。当美国为了袒护巴基斯坦而对印度采取强硬态度时，不只是对印度发出信号，同时也是对苏联发出警告。* [②]这样，双方对于南亚问题的应对同苏联问题紧密相连，中美之间在印巴冲突危机的处理上，达成了维护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及其背后的苏联的共识及合作，迈出了联合抗衡苏联的第一步。

由于巴基斯坦是中美接近、实现关系缓和的一条重要渠道，中美两国一直都与叶海亚·汗总统保持着良好关系。中国不仅援助武器装备，而且还培训巴的军队。美国则更多是给巴以经济援助。中美双方都表示要感谢叶海亚在中美接触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不能过河拆桥。所以，实际在印巴战争之前，中美两国已经在同时支持和援助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和苏联。到1971年7月、10月和1972年2月周恩来与基辛格、尼克松会谈时，中美双方进一步就南亚局势达成一致，确立联手合作意向，开始具体商讨共同行动的步骤。[③] 第一，确定了支持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1970～1978），第110～111页。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1, 1972, 5: 58－6: 55p. m., Box 8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2, 1972, 2: 10－6p. m., Box 87.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3, 1972, 2－6p. m., Box 8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22, 1971, 4: 15－8: 28p. m., Box 1034.

巴基斯坦政府，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东巴问题，反对印度在东巴的军事行动，反对印度侵略的共同立场。[①] 第二，确定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撤回到本国境内后，再考虑承认孟加拉国，以及美方一旦做出承认的决定，即于实施前向中方通报的共同立场。第三，商定美方根据印度撤军情况决定承认孟加拉国的时间，并通过已建立的巴黎渠道，通报中方关于承认的时间安排。周恩来表示不介意尼克松说中美行动相似，表明中方同意在承认孟加拉问题上与美国采取共同行动。只是中方解释说，中国将会晚一点承认孟加拉国，原因在于联合国尚未就中印克什米尔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另外，伊斯兰国家都还没有承认孟加拉国，中国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②]

中美双方经过紧张磋商后所确立的危机处理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两国迈出了联手阻止苏联分割弱小的中国邻国的步伐；一方面也表明，在苏联为了扩展实力，与美国竞争，投下更大赌注的局面下，中国决定助美国一臂之力。以此，一些记者向基辛格提出了是否“会形成一个对抗印度－苏联的美国－中国－巴基斯坦轴心”的问题，尼克松竟然也口不择言地说：美中对南亚政策的一致非常重要，“当然，我说的这种一致并非狼狈为奸，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在没有完全通报你们的情况下采取任何针对印巴的行动，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在这个地区的利益要比我们的大”。[③]“狼狈为奸”一词的使用确实不当，但也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由此可见在尼克松的心中，美中合作对抗苏印的分量和价值。

正是由于中美双方在1971～1972年的高层会谈和峰会中达成了如此详细、广泛、深入的共识、默契与合作意向，才会有巴黎和平协

---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10，1971，12：10 – 6p. m.，Box 103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11，1971，10：35－11：55a. m.，Box 1032.

② 以上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3，1972，2－6p. m.，Box 87。

③ Memorandum，July 16，1971，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NSC Files，Box 1036/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2，1972，2：10－6p. m.，Box 87.

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伊始中美双方即能顺利无阻碍地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战略构想的结果。1973 年 2 月初，尼克松批准美国向中国出售包括4 架飞机等装备在内的8 套定位导航系统（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s）。[1] 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应该是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初步合作的开始。此后不久，美国国防部特别小组即着手进行中苏冲突的个案研究，设想由于中国威胁对苏联的海参崴实施核打击，苏联发动了一次摧毁中国核能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核设施之后，苏联军队开始从蒙古和苏联的中亚地区进行地面会合作战，并威胁要进攻中国的东北。中国向美国方面寻求帮助。美国准备使用携带核弹头的部署在关岛的 B－52 战略轰炸机、从中国空军基地起飞的战斗机，以及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北极星导弹。该小组并提出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如打击中国境内被苏联控制的机场、苏联部署在中国境内的核能力，以及苏联侵入新疆的军队等。[2] 中美军事合作的构架，至此实际已经确立。

1973 年 2 月 15 日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再次向中国领导人强调双方所面对的共同威胁；毛泽东则在会见基辛格和 1974 年 1 月 5 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分别提出了“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思想，认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就可以“搞一条横线”，即把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3] 从而对外明确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

① NSDM 204，Henry Kissi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Defense，Commerce Memorandum，February 6，1973，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 此份档案 1994 年 5 月解密，但其中一些涉及武器装备的内容，如飞机型号、装备的技术标准或水平等，均予抹黑。

② Memorandum For Dr. Kissinger From Phil Odeen，June 8，1973，NSSM 169，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

③ 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 年2 月 17 日；毛泽东与大平正芳谈话记录，1974 年1 月 5 日。

战略。3月，侵越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1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两国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翌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策略思想。[1] 其后，邓小平于出席4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完整地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思想：“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新胜利。“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剥削人家，“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打倒它”。这是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思想的主旨，即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特别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2]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阐述了这一思想，重申“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还加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等内容，进而赋予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建立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思想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事实上，这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已只是一种形式上、宣传上

---

① 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

② 《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的需要，美帝国主义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正如毛泽东对基辛格所说的：中美要共同对付苏联，有时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不讲不行呢。[①]

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确立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战略目标之后，中苏两国在进行政治和军事对峙的同时，仍然都希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由此，双方一方面着手恢复正常的联系渠道，1970年10～11月，双方根据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达成的协议重新互派了大使，恢复了年度贸易谈判，两国领导人政务载波电话联系也恢复了；[②] 另一方面开始举行新的边界谈判，以把握和控制边界问题这个导致军事冲突的最敏感因素。

这样，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中苏两国第二次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③] 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④] 两国代表团就涉及中苏边界的中俄历史条约的平等性问题、争议地区问题等，开始了新的斗争。到1978年夏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结束，双方共进行了15轮会谈，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⑤] 但是谈判毕竟持续未断，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两国边界上也没有再发生武装冲突。

---

① 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②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412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1970～1978），第211～212页。

③ *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3，№1，с. 113－115. 但中方材料则说，柯西金在会谈中同意了这个概念。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242页。另外，柴成文在《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边界谈判》一文中介绍说：经对此概念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47页）不过，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实际在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时就已经解决了。

④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1970～1978），第207页。

⑤ 《人民日报》1969年10月9日；*Далшев П.* В чем ж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ть затруднений н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81，№10，с. 77－82；李汇川：《中苏边界谈判的症结何在?》，《国际问题研究》1981年第1期，第14～15页。

事实上，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长期没有进展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由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中苏双边关系已转入中美苏三角外交的轨道，其中注入了更多的战略利益因素，三国之间的利益走向和政策制定日益卷入一种互动状态，构成了一种战略三角关系。其间，美国试图既通过联合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又随时摆出与苏联缓和关系的姿态制约中国，以此加强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动权，令毛泽东不断担心美国要“踏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将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①]苏联也试图通过对中国打出和谈的旗帜，争取时机，稳定东欧局势，巩固并扩展其在中东及亚洲的地盘，增加同美国进行争夺的资本；同时，坐在谈判桌前向美国打中国牌，以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中国响应苏联举行边界会谈的建议，除了谋求解决中苏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外，更重要的则是利用谈判桌对美国打苏联牌，以利用苏美矛盾，促进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谈判期间，在中国代表团于双方会晤后的每次讨论中，周恩来最先询问的不是谈判的情况，而是美国方面有何反应，[②]以至于苏联方面认为，中国坚持其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是要随着与帝国主义战略关系的推进而加大对苏联的压力，是将苏中关系当作某种政治交易所，在这个政治交易所里，中国方面可以根据整个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赌注。[③]

其实，中美两国通过进行军事合作，构筑起了一种准同盟性质的战略安全关系。这种双边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中美双方交往的纽带。实际上，在中美苏三角外交中，中国本有可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在三角平衡的天平中增减砝码，影响美苏力量对比的

① 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5年10月21日。

② 2000年9月29日沈志华、张玥等采访王荩卿记录。

③ *Дальнев П.* В чем ж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ть затруднений на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х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81，№10，с. 87.

变化。但是强硬僵滞的反苏立场和对苏政策，阻碍了中国灵活地运用这种身份，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选择了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到底的方针，并试图从某种程度上把三角关系变为一种反苏的工具。其结果，不但消除了美国对中苏言归于好、再结同盟的顾虑，削弱了中国向美国打苏联牌的分量，而且还加重了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刺激苏越联盟的巩固。中国的外交再次陷入了实现世界革命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矛盾之中。

总之，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 1950 年代的亚洲冷战中，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始终处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进入 1960 年代，中苏两党分裂，两国同盟关系破裂。及至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国调整外交战略，开始联合美国抗衡苏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际退出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美苏重新站在冷战的第一线，使国际冷战格局出现了继中苏签订同盟条约后的第二次转型。

第四篇

走向“正常化”（1979~1991）

中苏关系正常化完全不同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后者是双方是否承认对方政府为国家的代表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两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没有中断过。所谓的“正常化”主要是为两国关系维持常态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在从同盟到对抗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种处于中间的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是否和如何最终形成并固定下来，取决于中苏双方对两国关系准则的探索和共识的建立。

正常化作为一个过程，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有三个，即中苏关系的历史结构、中苏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结构，从中可以大致梳理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发展脉络和归宿。要分析和理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起因、动力、背景和主要特征，就必须完整地理解中苏关系的历史结构、两国的国内政局和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这种复杂的结构导致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仅是解决双边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同时也是双方在全球和地区等层次进行战略博弈的过程；其结果不仅仅是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而且对全球和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的影响。

第一章

"正常化"问题的缘起

· "正常化"的由来 / *606*

· 对抗中的交集 / *611*

· 缓和的开端 / *616*

1980年代初，中苏关系经过结盟、合作到对抗与冲突之后，再次回到寻求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原点，不过历史条件已经与以往大为不同。一般地说，中苏两国并无所谓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因为它们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没有中断过。所谓的"正常化"，主要是为两国关系维持常态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在从同盟到对抗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种处于中间的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是否和如何最终形成并固定下来，取决于中苏双方对两国关系准则的探索和共识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常化"就是双方探索和逐步建立共识的过程和结果。这完全不同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即双方是否承认对方政府为国家的合法代表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个概念出现在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过程中，是双方关系破裂后，被两国领导人提出作为追求的目标的。在以党际关系为中心和主要基础

的同盟关系瓦解后，由于双边关系无法被规范和军事冲突的发生，这在逻辑上导致中苏双方必须考虑两国关系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以及依据什么准则，才能维持两国关系的基本正常。与此同时，恶化的双边关系同历史遗留问题和两国内外政策等纠结在一起，既造成了解决有关问题的迫切性，也加剧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并导致探索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在对抗和冲突中逐步和缓慢地前行。

第一节　“正常化”的由来

多数论著均将 1979 年春中苏双方围绕终止 1950 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或双方围绕 1982 年 3 月 24 日勃列日涅夫的一次有关对华政策的谈话所展开的决策与相应的外交活动等，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历史进程的开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两国提出关系正常化建议的时间要早得多，而两国领导人开始模糊地意识到，有必要将国家关系同党际关系有所区隔并同时能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则要更早一些。大致梳理清楚这个过程对理解后来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如果回溯中国领导人的有关思考和论述，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础，是在 1956 年秋波匈事件期间。当年 11 月 1 日，中国政府在表示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的声明中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真正实现兄弟般的友好和团结，并且通过互助合作实现共同的经济高涨的

愿望。”[1] 从当时特殊的背景和中国后来处理中苏关系的实践看，中国领导人这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他们还是将国家间关系放在社会主义阵营和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框架中思考的。换句话说，在他们心目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作为外交的一个原则，至少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后者的位阶还更高一层。另一方面，这次表述毕竟不是特指中苏关系，而且当时的中苏国家关系同20世纪70年代是根本不同的。

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个概念最早是在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谈中提出的。不过由于无法看到双方会谈的记录，所以无法确认到底是谁首先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据苏联方面的翻译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的回忆，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会谈中提出，苏共领导人认为“采取一切措施使苏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必要的”。[2] 中方的资料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年谱》披露的，即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3] 究竟是谁首先提出“正常化”最终要看公布的会谈记录，不过这时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定程度的共识，或者说都同意保持国家间的正常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会谈中两国总理都同意，派代表举行边界谈判、恢复贸易关系和恢复互派大使，这大致表明了他们对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理解。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1956年11月1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21～24期，第103页。

② 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回忆中苏关系》，《当代世界》1998年第7期，第45页

③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0～321页；另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935页。王泰平主编的另一部书的有关部分中没有写这句话。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75页。

目前还无法确切地知道，苏联最高当局最终是如何评价这次会谈的，有间接的资料表明，柯西金本人表达过希望从更积极一些的意义上评价中国方面的立场。[1] 中国方面披露的资料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此次会谈的意义一度给予比较重要的评价。周恩来在两天后报告毛泽东说："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对报告的肯定则表明，他同意周恩来的判断。周恩来随后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决定，于9月18日致信柯西金，提出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建议，并准备根据苏方的回应，再决定发表政府声明。[2] 可以说这次两国总理会谈至少引起两国领导人开始共同思考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尽管对"正常化"的理解并不都是一致的，也很不清晰。当然，两国总理当时的共识很快就被证明是无法成为实际行动的。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回函中仅提出"使边境局势正常化"。[3] 这大大压缩了苏方在机场会谈中表达的改善关系的意愿。中国则实施针对设想中的苏联大规模入侵的全面备战。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认为，两国总理会谈提出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概念和准备采取的措施表明，在边界军事冲突的压力下，两国领导人都有意探寻如何区别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以便在无法解决两党意识形态冲突的背景下，尽可能通过缓解国家关系的紧张来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

需要说明的是，两国总理会谈提出"正常化"问题，同中苏边界军事冲突造成的危机形势有直接的关系。不过从逻辑上推论，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情况下，如何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相区别，以免两党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严重破坏国家间关系思考与努力，应该是从中苏之间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就开始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争论发生的初期，都曾经为维持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做过努力。

① 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回忆中苏关系》，第45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2～323页。
③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3页。

在这方面，与苏联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的思考开始得更早一些，更深入一些，做出的努力也更多一些，尽管有过剧烈起伏和变化。因为一旦意识形态的争论给国家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中国遭受的损失会大大超过苏联。这是由中苏两国的实力对比所决定的，当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多方面的援助。

在1960年初，中共中央就提出要“尽力来推迟中苏两党、两国的破裂时间”，这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并力图做到将两党关系与国家关系有所区别。① 当年7月16日，苏联对中国实行制裁，宣布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这意味着将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扩展到国家关系。中方在交涉中表达了希望维护两国关系的愿望，陈毅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坦率说明，苏联撤回专家受损害大的是中国。此后中国方面向苏联政府提出，就两国经济贸易领域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举行政府间谈判。这是中方为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冲击国家关系所做的第一次尝试。从结果看，1961年间中苏经贸关系有所发展，双方就中国偿还贸易欠款的期限和部分欠款的利息等达成了协议。此外，双方还签署了一些新的经济合作协定和为期5年的科技合作协定。②

中苏在两党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处理国家关系的另一轮尝试是1964年2月至8月举行的边界问题谈判。尽管这一时期中苏两党关系因为意识形态大论战而尖锐对立，两国代表团仍然在谈判中就中苏边界东段4280公里边界线中的4200公里部分基本上按照中方的主张达成了协议，并草签或谈妥了部分工作小组协议。③ 后来由于两国国内政局出现剧烈动荡，谈判在8月结束后未能继续进行。④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13页。

② 参阅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36、240～243页。

③ 参阅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54～255页。

④ 关于这一点，李丹慧有不同的解释，见《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46～167页。

1965年3月之后，中苏国家关系伴随两党关系破裂也进入全面破裂时期。当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越南往返两次路过北京，其间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谈。这些会谈涉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两国共同援越抗美的合作、支持非洲新独立国家，以及双边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谈话中展示的思维，包含着将两党关系与国家关系分开的逻辑。从目前能看到的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片段中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希望为“改进国家关系”而留有余地。[1] 此次会谈后不久，中苏两党关系全面破裂，国家关系随即严重恶化。不过如果没有双方都曾尝试过在党际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维持国家关系的过程，就不会有后来1969年9月两国总理机场会谈提出关系“正常化”，以及根据这个概念提出稳定国家间关系的具体主张。苏联领导人曾经根据此次会谈后中苏关系发生的一些积极变化认为，中苏国家关系“出现了某些正常化的迹象”，声称苏联方面将“争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2]

总之，“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个概念是出现在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中，并在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后，被两国领导人提出作为追求的目标的。当时，双方提出这种诉求都有策略方面的考虑，至于对其含义是否有过足够精确的思考，则是有疑问的。但无论如何，正是在敌对的环境中双方开始共同建构“正常化”这个范畴，并且在双方的理解中，这个范畴存在着很大的重合部分，“正常化”因此成为后来中苏关系从缓和到和解再到正常化的一个起点和动力，也是双方能够沟通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话语。从历史过程看，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在中苏两国的对外政策话语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几乎从一开始就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06、708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913～921页；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20～921、923～924、931～932页。

②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71年3月3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13页。

具有了所谓“政治正确”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常化”反映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方向和最具实质意义的诉求。

第二节　对抗中的交集

如第三篇所述，由于1969年春夏的边界军事冲突，中苏关系进入紧张的敌对状态。这种局面虽然因为两国总理的机场会晤一度有所缓解，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善。双方不仅继续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强化对对方的批判和谴责，而且在安全战略上互相视为威胁。尤其是中国方面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一方面，将苏联定性为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威胁。毛泽东在1973年2月到1974年1月，相继提出所谓“一条线”、“一大片”战略，这也被称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①] 另一方面，中国实现了与美国的历史性和解，这一外交战略的转变导致冷战格局中出现了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中国的对苏政策更加紧密地同冷战纠结在一起，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人更愿意从全球均势而不是双边关系的角度考虑中苏关系的强烈倾向。

这个时期在中国对苏政策的话语中，继续保持着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则性论述。苏联领导人的谈话透露，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代表就曾向苏联提出，两国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②] 1973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的政治报告在国际形势与对外政策部分突出地强调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危险性，即便如此，报告仍然将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列入其中。报告正

---

① 参阅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7页。

②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2年3月2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8集，第34页。

式说明："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1] 这是第一次将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所应遵循的原则写进中共党的最高文件中。鉴于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这部分表述可以被视为中国对苏政策的重要指针之一。这段表述在当时看来，可能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政治和道义的立场，但后来的发展证明，它被写进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是有重要意义的，其特别之处是指出了目前的中苏关系与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根本性的不同，即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所谓共同"理想"和"精神"。显然，经过两党关系破裂、中苏同盟解体和边界军事冲突后，中国领导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未来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只能基于普遍的国家关系准则，不可能再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的状态。他们在这个时期就未来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准则做出了明确而且坚定的决定，这个决定的精神实质被载入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文件中。

中共十大是在"文革"的炙热气氛中召开的，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为什么会有这段文字？它背后所反映的中国领导人对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外交问题有怎样的思考等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的分析。当然，这首先取决于有关历史档案的解密。

这个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继续向中国施加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压力，包括在中苏边界部署50个师和在蒙古驻扎8万部队；部署的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升级，包括先进的坦克、重型轰炸机、SS－20导弹，苏太平洋舰队增加了航空母舰在内的20多艘大型水面舰艇，等等。苏联还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先后同越南、阿富汗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这些行动都包含有针对中国的意图。

---

[1]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

与此同时，苏联通过外交手段积极离间美国、日本等国同中国的关系，防止美、日同中国结成反苏战略同盟，以阻止中国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苏联分别在1972年和1979年两次同美国谈判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同牵制美中关系的发展有关。从时间上看，第一次谈判是1972年5月，即尼克松访华后3个月；第二次谈判是1979年6月，即中美建交后6个月。同时苏联不断向美国和日本等国施加压力，苏联舆论也不断抨击中国的对外政策，挑拨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恫吓日本不要积极发展中日合作，等等。

其二，苏联领导人也一再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同中国领导人一样，他们显然也意识到了中苏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只能建立在与20世纪50年代结盟时期有所不同的基础上，不过他们还多少有些指望能使两国关系更密切一些。在197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会议上，苏联领导人明确宣布：苏联“不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促进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恢复。”[①] 在此前后，苏联方面多次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应采取措施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中方拒绝了苏方的建议，要求苏联方面首先履行1969年9月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

苏联领导人看来仍然抱有希望，以为中苏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实现正常化”之后，还可以“更进一步”。他们利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和9月毛泽东逝世的机会，向中国发起一轮改善中苏关系的攻势。特别是9月9日凌晨毛泽东逝世，苏联很快便未加评论地播发了简单的消息，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出唁电，当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苏联方面改善关系的尝试。9月13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人为毛泽东逝世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苏联主要媒体播

①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71年3月30日，第14页；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2年3月20日；均见《勃列日涅夫言论》第8集，第34页。

发了这一消息。[1] 苏联媒体此后一段时间没有发表批评中国的评论。勃列日涅夫后来的一次讲话表明，苏联领导人之所以试图利用中国主要领导人逝世的时机缓和两国关系，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中国对外政策也可能随之发生对苏联有利的变化。勃列日涅夫当时就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复杂的时期。这种状况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领导当前的立场。"[2] 所以，他们是在有意利用悼念毛泽东逝世的机会，做出缓和中苏关系的姿态。

苏联领导人的试探没有得到任何他们愿意看到的回应，中共中央表示拒绝接受苏共中央的唁电，并同时退回了其他一些当时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追随苏联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唁电。中国新领导人在几乎每一个外交场合都重申，将坚持执行毛泽东在世时的对外政策，包括将苏联视为新的战争策源地，以及继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贯彻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1977 年 8 月，中共召开十一大。大会的政治报告称："苏美两家是新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苏修亡我之心不死"。[3]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论述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篇文章是在中国政局转换的时刻，从理论上肯定毛泽东后期对外政策的正确性与权威性，并表示新的领导人将坚定地贯彻这些政策。[4] 如前所述，"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从提出起，就同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对中国新领导人的反应感到绝望，苏联领导人从 1977 年春开始恢复对中国的指责，苏联媒体也重新展开对中国的抨击。

---

① 《参考资料》1976 年 9 月 16 日（下），第 49 ~ 50 页。

② 勃列日涅夫：《在招待保加利亚党政代表团的宴会上的讲话》，1977 年 5 月 30 日，《勃列日涅夫言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 146 页。

③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 年 8 月 12 日。

④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1977 年 11 月 1 日

1978年11月3日，越南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在鼓励越南谋求地区霸权，特别是在越南发动入侵柬埔寨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1月25日，越南建立了一个柬埔寨傀儡政府，随即派大军侵入柬埔寨，1979年1月7日攻占柬埔寨首都金边。苏越之间建立的相互利用的战略关系明显包含针对中国的意图，自然会引起中国的警惕和反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决定了它不可能允许一个敌对国家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本国的边境地区。中越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以及两国在地区层次上的矛盾，特别是越南入侵柬埔寨，都因为有苏联在背后支持越南对抗中国这一因素而迅速激化，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发起对越南的军事打击，同时也是为了阻止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并鼓励其他国家勇于反对苏联的扩张政策。

1979年2月17日，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等地区，向越南发起军事进攻。中国政府公开声明，军事打击越南就是为了打击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因为“苏越大小霸权主义勾结起来，进行侵略扩张，这是当前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遭到破坏、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受到威胁的根源所在”。[①] 苏联一方面指责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增加在中苏边界地区的军事活动，如进行军事演习等，中苏间的敌对气氛明显增加。

从历史的长过程看，这个阶段的中苏对抗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苏对抗的确是一种“反常现象”，两国希望建立正常的睦邻关系才是自然的诉求。正因为如此，中苏关系中才呈现这样奇特的现象，即当两个国家处于最尖锐对抗的时刻，双方却已经基本建构起了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平共处”，而且双方对此范畴的共识在向增加的方向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在双方的外交话语系统中

① 人民日报评论员：《越南当局的霸权主义逻辑》，《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

都是无可争议的“政治正确”，所以双方才能在对抗时期都将这一范畴作为攻击对方和谋取道义优势的重要思想武器。

第三节　缓和的开端

在中国结束了对越作战，中苏关系几乎是立即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围绕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存废，两国政府终于展开了正式谈判，尽管级别并不很高。这次交往并没有具体成果，但的确极大地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关系，并为国家间谈判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有益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它是中苏两国结束对抗和走向缓和的开端。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50年4月11日生效，有效期30年，即到1980年4月11日期满。根据规定，双方应于有效期满前一年就条约的存废进行谈判。1979年春因此成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时刻，双方此前都在考虑条约的存废，并显然都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缓和紧张关系，甚至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行有益的探索。

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1月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经常从北京听到这样的说法，似乎《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就我们的意志而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1] 苏联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一方面为缓和中苏关系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将中苏关系因此进一步恶化的责任推给中方。那种根据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就认为苏联方面这个时期既不希望终止条约，也没有预计到中方可能提出终止条约的看法，有些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更有可能的是，苏联方面不

1　转引自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第62页

愿主动提出终止该条约。

中方的反应要复杂得多，这主要同中国的内外局势都处在变动时期有关。一方面，中国这时在积极努力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如果延长与苏联的同盟条约，将与中国的对外政策背道而驰。例如，在1978年7月重新开始的中日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中，中日双方分歧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条约中是否增加反霸（实际上就是反苏）的条款。加上反霸条款是当时中国方面的坚定主张，也是两年多以前导致谈判中断的主要原因，新一轮谈判仍然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在新一轮的谈判中，为促使日方接受中方的立场，在8月9日的两国外长会谈中，黄华已经向园田直外相表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期将予以废除，园田直外相当时“顿时笑逐颜开”。[①] 邓小平在8月10日会见园田直时也告诉后者，中方到时“会正式宣布废除”中苏条约。[②] 显然，终止中苏条约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既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也有外交利益的具体需要。

另一方面，中国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内正处于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对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的检讨和思考也很活跃，其中也涉及了中苏关系。加之中国于1979年1月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2月进行了对越作战并基本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外交上正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客观上看这是很有利于处理对苏关系的。

目前能看到的资料主要是中国外交官的相关回忆。从这些回忆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国内对如何处理中苏条约有过比较多的讨论，尤其是中国驻苏联使馆内部，在大使王幼平的主持下，展开了比

① 汪培柱：《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收入郑言编《外交纪实》（3），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237页。汪回忆会谈日期是8月8日有误。另黄华的回忆没有提到他当时谈过有关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见《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232页。

②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232页。

较充分的讨论。他们经过分析认为，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使中苏军事同盟关系已经过时，但从对越作战中苏联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看，条约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客观地说，苏联没有在对越战争期间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与中苏条约是否有关，是需要证明的，因为这并不完全符合逻辑。不过，驻苏联使馆的外交官还是据此提出，从全局考虑，最稳妥的办法是签订新的条约来代替旧的，这样解除同苏联的军事同盟关系，同时避免大的震动，有利于稳定周边环境和加强中国在美中苏战略三角中的地位。他们建议的具体做法就是在终止条约的同时，推动中苏双方就国家关系举行谈判，争取签订一个新的国家关系文件。驻苏使馆的马叙生随即衔命回国汇报使馆的建议，他后来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外交部的想法同使馆的建议是吻合的。[①]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这些回忆和传记尚不足以勾勒出中国决策的全貌。

经过一系列讨论后，外交部提交了《关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请示》，主管外交工作的邓小平于3月24日批准了该报告。4月初，邓小平做出一个明确指示，不再延长名存实亡的中苏条约，但应为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中苏关系举行谈判，签订相应的文件。[②] 4月3日，黄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递交了中国政府关于不延长中苏条约的照会。照会指出，中苏条约曾为促进中苏友好和维护地区和平发挥过历史作用，但现在世界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及中苏分裂导致条约已经名存实亡，中国政府决定中止条约，并建议双方就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签订相应的文件。根据避免引起较大震动的原则，黄华在会见中告诉谢尔巴科夫，中方将不会公布照会，而是由新华社播发一条短消息。[③]

---

①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3～34页；另参阅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247页。

②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209页。

③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6页。

同一天，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延长"。[1]

苏联在接获中方照会后，第二天即发表声明，指责中方"在有计划地执行一条使苏中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和遭到破坏的路线"，并称中方要为中止条约"承担全部责任"。[2] 随后苏联主要媒体又掀起一波谴责中国的宣传浪潮。但到4月7日，也就是中方宣布终止条约仅三天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约见王幼平，递交了苏联政府的复照，宣布苏联同意举行谈判，并希望中方告知其主张谈判的题目和希望达成的目标。[3] 苏联态度的这种变化不是没有轨迹可循的，苏联政府没有预计到中国会中止条约的可能性很低，而且苏联同样抱有举行谈判的愿望。实际上在1971年1月和1973年6月，苏联政府曾经先后提出双方签署《互不使用武力条约》和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等建议。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此予以拒绝，并认为能履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可以保证不使用武力。1978年2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致函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中苏双方就两国关系的准则发表原则性声明，并为此举行"足够高级别的代表会谈"；[4] 同时还提出派议会代表团互访。这些建议也均为中方所拒绝。此时既然中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取签订新的协议在苏联方面不仅是不可回避的，甚至有可能是求之不得的机会。

5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约见谢尔巴科夫，递交了中方有关谈判内容和宗旨的备忘录，其内容包括确定两国关系准则；消除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发展贸易、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并提出根据谈判结果签订相应的文件，以及举行中苏边

---

① 《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议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79年4月3日，《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1979》，新华通讯社，1980，第164页。

② 《参考资料》1979年4月5日（下），第2页

③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946页。

④ 转引自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2~943页。

界谈判。[1] 中方提出的方案实质上反映了政府职能部门倾向以制定两国关系准则为中心，就中苏关系正常化展开谈判。6月4日，苏方回复表示同意举行谈判，并建议7月和8月在莫斯科举行副外长级谈判。苏方的建议是通过谈判来制定一项关于两国关系准则的文件，苏方还提出了文件应包括的主要内容。[2]

中方接受了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的建议。与以往谈判的姿态相比，中方这次没有以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先决条件。这一点与同意首先在莫斯科举行谈判一起，显示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已经有所变化。不久前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回复中，中方曾坚持一贯的立场，即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是否举行谈判，取决于苏方是否先执行1969年中苏总理机场会谈的谅解，签订缓和边界紧张局势和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包括苏军从蒙古撤军等。[3] 到这时为止，可以说双方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他们的谈判立场至少也是在逐渐接近。中方这时的谈判原则显然还是要争取解决两国国家关系准则问题，并争取能达成有关的协议。这同当时苏方的期待的确有较大的重合之处。

6月24日，中国政府任命驻苏大使王幼平为谈判代表团团长。随后组建了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办公室，并组成政府代表团。代表团需要完成的文件包括《关于两国关系的协议草案》、《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协定草案》、《关于两国事务来往的有关设想和意见》以及谈判方案等。此前外交部门的讨论和代表团的工作情况表明，外交部门一直是在按照争取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达成协议的初衷进行准备的，但在8月间，谈判方针出现了重大的变化。8月间，外交部上报《关于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方案的请示》。目

① 马叙生：《结盟和对抗都不好——80年代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2000年第12期，第36页。

②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6页。

③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3页。

前还不清楚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邓小平的批示是“以在政治局讨论为好”。[1] 显然，邓小平对外交部的谈判方案是不满意的，至少也是认为报告的内容还需要认真讨论。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苏谈判问题，主要领导人均出席。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做主旨发言。后者在发言中提出，中方谈判的核心目标应该是解除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即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具体原则是要求苏联从蒙古撤军和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中苏双方都承诺：不在对方邻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利用邻国威胁对方。谈判策略则是不急于求成，如何把握灵活性的尺度视谈判进展的具体情况而定。[2] 现在还无法了解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但是根据邓小平的政治地位和后来中国政策的发展可以基本断定，邓小平的谈话表明中国决策层决定将谈判方针从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签署协议转向消除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决心继续贯彻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会议结束后，邓小平专门与王幼平谈话，告诉后者谈判不要“急于求成”。与之前将解决中苏国家关系准则和争取达成协议的指导方针相比，这次会议的决定显然是一次重大的转变，其重大意义在于它成为后来中国指导并控制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进程的战略方针，因此需要分析它产生的背景。

如前所述，中国外交部门显然试图通过中止中苏条约的时机，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并争取取得成果。中国决策层对展开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也是支持的，因为他们同样认为缓和与改善中苏关系符合中国国家战略转变的需要。但是他们最终的决定是以消除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为首要条件，以及在美中苏战略三角中避免因为中苏过

①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第546页。
②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4页。

快接近而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他们相信，毕竟是中美战略合作关系才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战略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他们认为苏联不仅在威胁中国，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也还不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①

8月27日上午，邓小平同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会谈；28日下午，邓小平同蒙代尔签署了未来两年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水力发电和有关水资源利用的协议，他对此协议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会有更积极的前景。② 中美关系的这一进展必定会直接影响到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以及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中苏副外长级谈判开始前，邓小平通过同尼克松的会谈，向美国公开了中国指导中苏谈判的原则。他告诉后者，中苏谈判的前提是消除中苏关系的障碍，即“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不只是中苏边界问题。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一百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他还介绍了中方将在谈判中提出的具体要求。③ 邓小平这样做的原因显然包括不希望中苏谈判给中美战略合作带来消极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对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其中的一段谈话非常能代表中国领导层此时此刻对中国外交的战略性思考。他说：“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个战略

①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7页

② 《邓小平在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举行的告别宴会上的讲话》，1979年8月28日，《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1979》，第306页。

③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57页。

"对于打破苏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 在这种战略认识指导下处理中苏关系，必定有其特点和限度。邓小平要求苏联首先消除对中国的安全威胁等，也可以在毛泽东后期处理中苏关系的思路中找到线索。毛泽东在1973年12月21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就说过，苏联要改善中苏关系，首要的条件就是要从中苏边界地区撤军，"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当时邓小平在被打倒后刚被平反和被任命为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这次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还进一步要求苏联承认从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如果说这个阶段中国对苏政策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在考虑国家关系时有意放弃意识形态争论是最主要的变化。

中苏副外长级谈判从10月17日开始正式在莫斯科举行。苏方按照原定计划，首先提出苏中《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的草案，并要求进行讨论。中方则提出《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要求苏方首先应消除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包括将苏联在中国毗邻地区的军事力量减少到1964年以前的水平；撤走在蒙古的驻军和军事设施；停止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此外还应先解决边界问题，以及扩大经贸交流等。中方代表提出的观点是，过去虽然存在中苏同盟条约，却未能阻止中苏之间发生冲突和苏联威胁中国的安全，因此苏联有必要首先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对中国的威胁，从而证明签订新的协议是有意义的事情。苏方则提出，苏联并没有威胁中国的意图，以及中苏谈判不应超出双边关系的范围，不能涉及第三方，意即不能涉及苏联在蒙古驻军和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双方谈判立场的巨大差距表明，此时还不

---

[1]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60页

具备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基本条件。在随后的谈判中，双方各执己见，经过六次正式会谈，也未能取得任何共识。12 月 3 日，在第六次正式会谈结束后，双方同意 1980 年春在北京举行新的会谈。

1979 年 12 月 27 日，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31 日，中国副外长张海峰约见谢尔巴科夫，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同时宣布推迟两国副外长会谈。1980 年 1 月 20 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正式宣布，苏联入侵中国的邻国阿富汗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设置了新的障碍，不宜继续中苏谈判。[1] 中苏国家间谈判就此中断。但是无论如何，这次谈判的气氛比较缓和，实际上极大地缓解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它表明双方如果有意愿，是可以就国家关系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而且实际情况也是在这次谈判之后，两国开始了双边交流。

① 《人民日报》1980 年 1 月 21 日。

第二章

开启“正常化”进程

·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 / 626

· 打开“正常化”之门 / 635

· 政治磋商陷入僵局 / 652

为改善中苏关系举行的两国副外长级谈判陷入停顿后，中苏之间交往的大门却在逐步开启，两国间各层级的人员交往在增加，双方一些事务性谈判取得了圆满的结果，这些为不久后出现历史机遇时，双方能够做出合理判断并采取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82 年 3 月 24 日，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的一次授勋大会上阐述苏联对亚洲政策时，其中有关对华政策部分被国际舆论广泛认为是苏联改善对华关系的最积极的表态。中国领导人则在夏季决定，争取有条件地大幅改善中苏关系，决心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如上所述，10 月 5 日，中苏副部长级特使的政治磋商开始在北京举行，第一轮持续到 21 日，其间共举行了六次会谈。这轮会谈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因为双方在这一轮会谈中分别清楚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原则，同时也表明尽管存在严重的分歧，但都希望保持这个谈

判平台，作为推动正常化进程的正式渠道。双方在政治磋商过程中的言行反映出中苏在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原则区别。中方是站在国家战略的层次上，坚决地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作为谋求战略利益的过程，务必要达成获得既定的实质性战略利益的目标，即逐步地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中苏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只能建立在双方拥有基本的战略互信的基础上。

苏方则是希望通过谈判缓和与改善双边关系，从而缓解在亚洲方向面临的战略压力，因此并不希望对已经获得的战略地位做根本性调整，不想减轻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只要双边关系有所改善即可。苏方对正常化的定义就是双方谈出一个作为双边关系基础的准则，然后签署一个有关这个准则的外交文件。双方的这种分歧在政治磋商中充分展现，并使谈判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到 1988 年 6 月止，双方共进行了 12 轮谈判，是典型的马拉松式的谈判。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

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中苏副外长级谈判陷入停顿，但是中苏之间交往的大门逐步开启，两国间各层级的人员交往开始增加，如著名汉学家、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齐赫文斯基和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等，都曾访问北京，同中国有关研究机构和部门进行交流。另外，苏联科学院一些学者还访问了中国东北地区。中方也做出了类似的安排。苏联外交部有关部门同中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来往也在增加。这些交流对双方加深了解和制定政策是大有裨益的。至少可以肯定，在中国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高校全面恢复“文革”时期被摧毁的苏联问题研究的时刻，双方这些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实际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为不久后出现历史机遇时，双方能够做出合理判断并采取行动，做了有益的准备。此外，中苏之间的事务性谈判都取

得了圆满的结果。到 1982 年 2～3 月，敏感的国际舆论界普遍注意到，中苏之间的交往在明显增加，双方都在为改善双边关系进行试探，而且苏联方面更积极和主动。[①]

1982 年 3 月 24 日，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的一次授勋大会上阐述苏联对亚洲政策时，主要谈到了对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政策，其中有关对华政策的部分，被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是苏联改善中苏关系的最积极的表态。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有关苏联方面有意通过调整对华政策来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并非空穴来风，尽管其基础和动力都很薄弱。这里有必要全文照录中国内部发行的《参考资料》刊登的原文，因为这最有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最早看到的文本，中苏双方的互动应该是以这个文本为根据开始的。勃列日涅夫讲话如下。

第一，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公开批评中国领导所奉行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中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与准则的观点，但我们从来也不想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生活。我们过去没有否认，现在也不想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同帝国主义者的政策相呼应当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

第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

第三，从苏联方面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任何威胁。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领

① 参阅《参考资料》1982 年 3 月 12 日（上），第 9～10 页；13 日（上），第 5 页；15 日（上），第 5 页；16 日（下），第 4～5 页。

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以便达成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准备讨论关于在苏中边界地区加强互相信任方面可能采取的措施。

第四，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的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我们从来也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的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和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就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既涉及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政治关系，但是这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的措施。①

通观这篇讲话，第一部分强调了苏联仍然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关注的是中国实行何种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而不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实际上在苏共二十六大的总结报告中，勃列日涅夫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就将中国列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中，只是集中批评中国的对外政策。② 至于苏联方面为什么将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是需要更深入分析的问题之一。对比苏方以往的言行，勃列日涅夫这段讲话的实质用心是要说明，苏联不再像毛泽东等资深中国领导人逝世前后那样，指望并推动中国内部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他们不再将中苏关系的改善寄托于中国的内部变化之上。苏联领导人宣布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表示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实际上是承认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已经基本稳定，新领导人足以承担处理中苏关系的重任；另一方面也是给苏联

---

① 《参考资料》，1982年3月25日（下），第9~10页。

② 勃列日涅夫：《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1981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言论选集》，第55~56页

自己调整对华政策提供合法性，以便同毛泽东逝世后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免去来自苏联内部的干扰。

第二部分关于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针对中美之间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的谈判。1979 年 4 月，苏方曾经就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发表评论，谴责美国搞“两个中国”政策，同时也指责中国政府为了与美国合作而丧失了原则立场。[1]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台关系问题上，中国此时也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尖刻的攻击。例如，昔日的战友阿尔巴尼亚即声称，中国政府在美台关系问题上的做法是“欺骗人民”。[2] 勃列日涅夫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期，专门阐述苏联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应该承认这是抓住了事态的转机。这部分表述是向中国政府转达，在中美关系中最敏感和最麻烦的台湾问题上，苏联的立场是值得考虑的，对中国有可能是有帮助的。从后来的情况看，中国领导人显然在有意利用苏联释放的信息，以改善同美国谈判的地位；同时他们也在提防苏联利用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遇到的麻烦，谋求在谈判中的优势。这段话的复杂含义很可能就是导致邓小平决定在中美关系稳定后才迈开改善中苏关系的步伐的关键因素。

第三部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说明，也是在回应中方长期的关切，表明苏方的意图和愿意就此问题随时展开谈判。3 月 24 日，很可能是为了强调苏方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是真诚的，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时，重申了勃列日涅夫谈话中关于中苏边界谈判的主张，并称他作为苏方边界谈判代表团的团长，“已准备好现在就进行边界问题的会谈”。[3]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谈话成为当天《参考资料》下午版的头条消息，这反映了当时中国方面对此类信息的确非常重视。

---

① 《参考资料》1979 年 4 月 12 日（下），第 18 ~ 19 页。
② 《参考资料》1982 年 3 月 29 日（下），第 34 ~ 35 页。
③ 《参考资料》1982 年 3 月 26 日（下），第 1 页。

第四部分是关于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原则，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坚持苏联的既定立场，即不附带先决条件和不涉及第三方，只谈中苏双边关系的问题，不接受中方的实质性立场，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孤立等政策。从谈话中还可以看出，苏联的确希望缓和与改善中苏国家关系。苏方已经不坚持将谈判的目标锁定在就两国关系的准则达成协议，而是改为就“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协议的内容可以是双边关系各个领域的，既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这一改变显然是要表明，苏方希望通过更为灵活的谈判方式，争取早日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它在国家关系问题上也变得比较务实，不再像过去那样咄咄逼人和急于求成，愿意接受在非政治方面如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达成协议和恢复合作关系，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空谈“正常化”问题。这对后来中苏谈判以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和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表明苏联方面认为，在双方无法就战略层面的问题达成协议和共识时，中苏国家关系应该而且仍然可以缓和与发展。这就是所谓苏联对华政策展现出的“务实”的一面。在有关对华政策谈话的整个部分，勃列日涅夫都没有像以往一样提到“正常化”三个字。

不过，要是认真分析“三二四”讲话第四部分的内容，也可算是似曾相识。勃列日涅夫在 1972 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也曾提出苏联愿意将中苏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而且还可以把“这种意愿变为关于互不侵犯，关于解决边界问题，关于在互利基础上改善关系的十分具体和建设性的建议”。[①] 因此对这次旧话重提，更重要的还是要分析苏联对华政策出现变化的背景，以及中国领导人如何理解这篇讲话和他们是否比过去更愿意改善中苏关系。

勃列日涅夫发表上述谈话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媒体都进行了报

①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第 34 页。

道并给予积极评价，同时敦促中国政府认真对待苏联这一新的表态。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苏联领导人希望中国方面加以注意，勃列日涅夫的谈话是苏联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政府从未如此认真地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从更广阔的角度分析苏联的对外政策。尤其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苏联对华政策制定过程的复杂性，毕竟勃列日涅夫已经年迈且多病，他到底付出多少精力来思考改变对华政策，以及能推动苏联决策体制中的各个方面达成什么样的共识，都是很有疑问的。

首先，苏联此时调整对华政策是被苏联对外政策改变所带动的一个结果，所以需要从勃列日涅夫去世前苏联对外政策调整中去寻找根源。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苏联依恃在经济和军事等各领域取得的成就，终于能够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达到与美国相抗衡的地位。另一方面，1973 年美军撤出越南和面临中东危机的冲击，美国正处于全面战略收缩阶段。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标志着美国以及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在衰落，美国不论情愿与否，都已经将苏联视为平等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在各个领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苏联的立场和意愿。为了通过军备竞赛进一步取得对美国的战略优势，苏联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订之后，继续投入巨大的资源，更加努力地增强自己的核打击力量。结果是苏联在这种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中不仅未能取得对美国的优势，反而造成国家经济的畸形发展，军事工业大量地吞噬国家的资源，直到后来的灾难降临。

苏联对外政策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加强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侵略。客观地说，苏联当时在缓和欧洲局势方面是取得了重要进展的。但是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苏联试图利用在欧洲取得的有利地位，转而谋求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扩张。尤其是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进行军事干涉的失败导致苏联领导人相信，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已经决定性地下降，它已经没有意愿和能力在广大的亚洲和非洲地

区进行干预，这对苏联来说是历史性的机遇。对世界政治局势的上述估计推动苏联领导人选择了扩张性的对外政策。这个时期，苏联在中东地区以及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大规模干涉，直到1979年12月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其扩张达到了顶点。当然事实也证明，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苏联在战略核力量领域的竞争和在第三世界的干涉与侵略，导致它同美国的关系持续紧张，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苏缓和的可能不复存在。而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对华政策是它全球性扩张政策的延伸和反映，苏联企图同时取得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战略对手的全面优势，其结果是强化了中苏关系中的对抗因素，苏联不得不两线作战，在亚洲的印度支那地区和阿富汗承受着尤为直接和巨大的压力。从历史的演变看，苏联扩张战略的溃败差不多就是从亚洲地区开始的。

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末期已经感受到苏联过度扩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尤其是苏联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到20世纪80年代初，其增长已经接近停滞，例如1980年的经济增长只达到3%。一方面，长时间的扩张和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导致苏联军事力量急剧膨胀，例如苏联军队人数到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440万，比赫鲁晓夫时期最高人数多出100万。这种情况使苏联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1980年的军费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1%～14%，1979年对重工业的投资占当年全部工业投资的89.2%，而苏联的重工业同军事工业关系特别密切。[①] 另一方面则是畸形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导致各类民用品严重短缺，甚至出现公众“排队买食品的时间比生产食品的时间还要长”。[②] 勃列日涅夫后期，在苏联军事力量空前膨胀的同时，国内竟然出现了“短缺经济”的状况。

---

① 参阅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0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27、32页。

② 参阅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白洁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第52页。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在国内发出要认真解决经济问题（甚至包括食品短缺）的政治呼吁。1979 年 7 月 12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议》，试图进行某种程度的经济改革。姑且不论这项计划本身是否真能改善苏联的经济状况，12 月苏军入侵阿富汗的行动几乎完全破坏了苏联经济改革的外部环境，西方国家宣布对苏联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和禁运，苏联在政治上也非常孤立，它的国际环境严重地恶化。1980 年 12 月，苏共中央公布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草案，其中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都低于过去几个五年计划。显然，苏联经济进入困难时期，同时又缺乏调整政策的基本外部环境。

虽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均面临严峻的局面，苏联领导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并没有打算彻底放弃其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在他们看来，苏联在世界上正面临历史性的机遇，即各方面都具备了使苏联发动“历史性进攻”的条件，“当代强大的革命力量已经对帝国主义、反动派、侵略者及新老殖民主义黑暗势力进行无法阻挡的历史性进攻”。[①] 所以，苏联领导人在其内外政策面临挑战时，只不过企图通过有限地调整对外政策来大致改善苏联两面受敌的战略处境，同时减轻国内经济面临的压力。正是这种逻辑促使苏联采取了两个重要的外交行动。一是 1982 年 3 月 16 日，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宣布，苏联单方面暂停在欧洲部署 SS－20 中程导弹，并停止用 SS－20 导弹更换已部署的 SS－4 和 SS－5 型导弹。他说，应该“注意苏联和美国之间关于限制和减少战略核武器协议问题对世界的命运，对于减少世界战火的威胁的意义”。[②] 另一个重要行动

① 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 10 卷，第 23～25 页。

②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十七大的讲话全文》，1982 年 3 月 18 日，《参考资料》1982 年 3 月 18 日（上），第 10～11 页。

是勃列日涅夫在一周后（24 日），选择在中亚地区发表上述关于缓和中苏关系的讲话。

从上述背景中可以大致看出，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有两个特征。首先是他的讲话内容表明，苏联的对华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它打算根本改变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和放弃在这一地区谋求战略优势的企图；其次是在政策的优先次序上，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性远低于保持欧洲战略武器优势的重要性。例如，有关暂停在欧洲部署战略武器的谈话发表在先，而且是在莫斯科举行的全国工会会议上，苏联领导人通常会在这样的场合发表比较重要的对外政策谈话。有关对华政策的讲话发表在后，是在中亚的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府。如果比较了解苏共政治文化的某些特点，通常可以从这种安排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领导人此次调整对华政策的行动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处位置并不是很高，不是苏联政府的优先考虑，更多是为了大致缓解苏联面临的安全压力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争取改变正在形成中的不利的战略地位。但是它并不准备为此根本放弃扩张政策，因此也不会做出实质性让步。当然，这种政策调整也不是因为国内政策发生了什么足够重大的变化。这两个特点大致决定了苏联当时不可能接受中方提出的消除对中国安全威胁的要求，因此其政策调整很难成为导致中苏关系出现突破性发展的主要因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分析了以勃列日涅夫“三二四”有关讲话为标志的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国内外宏观背景。不论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还是从目前已经出现的研究成果看，仅有这种宏观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根据这种宏观分析还不足以对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特点和变化程度等做出细致准确的判断。最新的研究表明，苏联的外交决策体制中，存在复杂的机构之间和人员之间的矛盾，这些机构或人员同勃列日涅夫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或亲或疏的关系，事实证明，该讲话只是反映了与勃列日涅夫接近的少部分职位并不很高

的人的看法。[1] 在苏联的体制中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三二四”讲话并不是经过体制内有关机构系统的讨论并达成共识后才发表的。当然，要证明这一点需要发掘新的档案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只有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更为合理地界定和评价这次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含义和限度，更全面地理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而更合理地评价中国随后进行的有关政策的调整。

第二节　打开“正常化”之门

中国方面对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的直接反应可以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官方出版的年谱类文献中得到部分印证。

根据《邓小平年谱》和钱其琛的回忆录记载，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发表的当天即3月24日或第二天即25日，邓小平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2] 时任外交部长的黄华的回忆提供的情况是，外交部内部先讨论了讲话，然后黄华本人第二天（很可能是25日下午）当面向邓小平汇报了外交部讨论的结论并请求指示。邓小平当时即指示：外交部应立即做出反应，谈话要言简意赅，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回击攻击；又要有灵活性，不拒人千里之外。[3]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于3月26日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有关中苏关系的讲话，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4] 黄华认为

---

① 这方面的新近研究可参阅拉钦科《苏联外交机构的干部更替与对华政策（1985～1986）》，沈志华、李滨（Douglas Stiffler）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525～537页

②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06页；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4页。

③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8页。

④ 《人民日报》1982年3月27日。

这是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方面的"初步回应"。

确定邓小平主导中国回应的过程是很重要的，这涉及如何全面理解中国决策系统对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反应。如果按照钱其琛的回忆，外交职能部门在邓小平发出指示前似乎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没有反应或无所作为。黄华的回忆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外交部内部的讨论情况，而邓小平是在听取外交部领导人的汇报后才做出决定的。外交部的报告内容是比较谨慎的，认为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有两面性。一方面，苏联调整对华政策是迫于客观形势，包括苏联在中美苏战略三角中处于不利地位，美苏军备竞赛导致军事对峙更加激烈，以及苏联国内经济困难，等等。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只是示好的姿态，很难根据这个讲话了解苏联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该讲话还是包含了积极的成分。外交部建议以此为契机缓和中苏关系，使之逐步走上正常化。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二是增强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的回旋余地。①

如果未来公布的档案能支持黄华的回忆，甚至提供更多的细节，那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外交职能部门如同 1979 年中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期的看法一样，在推动缓和中苏关系和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方面是比较积极的，对外交行动的事务性层次也有了比较周到的考虑。

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决定做出的回应则是初步的，而且很可能是试探性的和留有余地的。作为需要总揽全局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心中有不同于他人的轻重缓急的战略排序。在外交部发言人发表有关谈话后，4 月 16 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他请后者转告勃列日涅夫，中国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苏联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例如从柬埔寨、阿富汗问题上做起，或者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

①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 357 ~358 页。

军做起，没有这样的实际行动，中国不赞成。[1] 这是后来中方提出的所谓消除“三大障碍”问题的最初表述，意即在中国决策层正式讨论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之前，邓小平已经有了自己比较明确的看法，并且已向苏方转达，即他继续坚持将解决安全威胁问题置于“正常化”之上。

这里有必要分析中国决策系统中的上述特点，即政府职能部门和最高决策之间在缓和中苏关系并争取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这一目标上有共识，但在思路和做法上是有差别的。前者不论基于什么原因，显然更关注的是国家关系层面的各种问题；后者关注的重点则是根本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和战略地位，关系正常化与否以及何时实现等，要为国家的安全战略服务，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服务，要取决于中国本身面临的战略性问题能否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的谈话已经表明了中国最高决策者这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灵活度，即三大障碍问题可以一个一个逐步解决。如果只是按照谈话中的先后顺序的排列，可以大致推断邓小平这时首先关心的是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当然这个推断准确与否取决于这个间接资料本身的可靠程度。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个顺序的表达即使是有意的，其意义也比较有限。

首先应该看到，中国外交部门的分析大致反映了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对中苏关系的讨论和形成的基本倾向和特点，即应该采取措施来缓和与改善中苏关系，同时对苏联很不信任，对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调整对苏政策，总的看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种倾向和特点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背景。

如同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许多阶段一样，这一时期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苏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化，而不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以改

①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815页

革开放为方向的国家发展战略，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开始相继发生变化。简而言之，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

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必须重视已经长期执行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其中包含的一些主要问题的重大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客观上至少也需要相辅相成，对外政策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对于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同样也是根本性的。根据中国领导人长期一贯的思维逻辑和论述框架，如果他们不能合理和有说服力地论证诸如“时代”、“形势”、“格局”、“力量对比”、“外交基本方针”等认知结构中的基本概念，并提出和有效地执行相应的政策，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也无法确定并得到广泛支持，至少也会比后来看到的要困难得多。

中国对外政策演变的历史已经证明，那种主要是由国内政策重大变化而引起的对外政策转变，通常都是滞后的，而且并不会立刻反映在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对外政策在时间上是同十年“文革”的极“左”外交相连接的。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要巩固和发展，就必须要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一样，在对外政策领域也必须清除此前极左外交的影响，才有可能逐步形成新的政策。实际情况表明，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是缓慢实现的，落后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剧烈变化，相关认知框架的变化更为缓慢，而对苏政策的转变可能是其中最为滞后的。

中国极“左”外交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一种教条、僵化甚至极端的态度；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基本估计和对中国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估计过高；否认或不重视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在政策上“四面出击”和四面树敌。[1] 当时在

---

[1] 可参阅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23～24页。

这种框架中勾画出来的世界基本图景，必然是极度紧张和充满战争危险的。特别是对国际紧张局势的认知同国内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紧张环境互相促进，互相强化，造就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即保持高度的警惕和紧张的战争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世界战争或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上述战略及其赖以产生的思维方式很可能是导致中国领导人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改变对苏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在1978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一重大决定对中国领导人改变对外政策的影响至关重要。根据中国战略思维的基本特点，其影响至少包括这样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第一是需要回答是否会有相对比较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问题。

早在1975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适当调整了对爆发世界大战的估计，认为“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意即有可能推迟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此一调整得到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当时据此说明，“五年以内打不起来”。[1] 不过很难证明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达到何种程度，不少资料表明，他们仍然认为中国面临着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安全威胁。事实上，从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以及随后中国政府的主要媒体发表的评论看，中国领导人明确地表示，他们相信存在着大规模战争的危险。1979年2月对越作战期间，由于获得了比较准确的情报和苏军的确没有采取任何敌对的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一度对苏联威胁的估计有所缓和。但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他们对苏联威胁的担心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迅速强化。

随之而来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认为存在战争危险和严

---

(1)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191页。

重的安全威胁，那么中国能否通过制定和执行恰当的战略和政策，塑造一个适应中国发展战略的安全环境和对外关系结构。中苏关系紧张和对苏联威胁的严重担心，是中国决策层在20世纪70年代断定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大规模外敌入侵不可避免，甚至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等的重要原因。那时中国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战备，就是为了应付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当时差不多都对苏联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怀着深刻的警惕。

观念的相对稳定决定了人们的认识经常落后于现实。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的思路是，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通过执行适当的对外政策，为中国赢得一段发展经济的和平时期。结果是这个时期中国对外政策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却趋向严峻，认为苏联威胁至少是没有减轻，中国甚至面临苏联入侵的威胁。正是因为仍然认为苏联威胁很严重很危险，所以中国领导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时期制定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政策。在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和加紧经济建设。其中的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反对苏联。[1] 中国继对越作战之后，又采取了一些重大的行动，包括参加美国主导的对苏联的制裁，如不出席莫斯科奥运会等；1981年夏季在华北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及为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做出更为坚决和巨大的努力等。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威胁的担心达到何种程度，以及他们确实在认真准备应付苏联的威胁。

显然，中共中央工作重心的战略性转移虽然带动了对苏政策变

①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9~240页。

化，但远不能说这个变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重大的。中国领导人为了确保工作重心顺利地转移，甚至有可能宁愿用更多的外交和其他资源来防范所谓的苏联威胁，以赢得稳定的国际环境。历史进程的戏剧性也许正在于此。

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很可能同样导致了中国对苏政策转变的滞后。从历史上看，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便决定"一边倒"向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领导人当时宁愿选择苏联式的发展模式。如之前有关章节所述，1949 年夏季，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之所以能够为中苏同盟奠定基础，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决心要"走俄国人的路"。很多研究都将注意力放在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谈上。实际上在四十多天的访问中，刘少奇只同斯大林会晤了六七次，其余很多时间是在参访苏联政府和企业等。人们能看到的，是他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和贷款，无法直接看到的，是他已经装在脑子里的苏联发展模式，但这是可以推断出来的，因为后来新中国就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开始国家重建的。其影响，包括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至深且久。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进程看，中国领导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与 1949 年正相反，实际上是从否定苏联模式而开始了改革的长征。这既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也是当时一些重要事件造成的。1978 年春夏季，中国派出的大批出访团，他们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访问团。该团于 1978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5 日考察了西欧五个国家，随后撰写了详细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谷牧的汇报。此后，邓小平本人又专门听取了谷牧汇报，他给予相当的肯定并做出指示。在 7 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中国领导人再次讨论了如何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①] 会议讨论

① 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第 5～6 页；谷牧：《我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酝酿和起步》，《党的文献》2009 年第 1 期，第 21～25 页。

的详情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而言，最有意义的是会议确定的向西方学习的方向。之后不久，邓小平本人又密集地访问日本、东南亚和美国，从而完成了中国现代化战略所必要的对外布局。这一系列的行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中国领导人开始推行现代化战略的时候，很难从积极的方面对中苏关系予以重视。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重新肯定向西方学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它的确导致中国领导人对处理中苏关系的关注程度不高，但另一方面也清除了改变对苏政策的一个巨大障碍，为改善中苏关系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逻辑。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学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中国以往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甚至否定。由于毛泽东后期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同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必然导致重新评价论战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伴随着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中国报刊逐步开始公开讨论所谓“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并批评对待社会发展道路的教条主义的态度。这场讨论的主要倾向是认为，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普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并不能垄断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同样其他国家也不能垄断，并用它来确定其他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各项政策，给其他国家贴上属于什么“主义”的标签。这种认识自然会延伸到中苏关系领域，并从根本上否定中苏意识形态争论的合理性。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胡耀邦就曾经说过：“应该把（苏联的）政策和社会制度分开。”他认为，说苏联搞资本主义制度的理由不充分。据当事人回忆，胡耀邦的观点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①

显然，当中国领导人以开放的姿态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时，

---

① 马叙生：《结盟与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61 页。

他们已经为终止中苏意识形态论战提出了合理的逻辑。而且随着对“文革”的否定，他们也逐渐停止了对所谓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些基本的变化对改变对苏政策是很重要的，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不可能再将意识形态争论作为中苏关系的内容，当然意识形态争论更不可能再成为改善中苏关系的障碍。由此可以推断，勃列日涅夫在“三二四”讲话中表示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对中国对苏政策的调整应该不会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从两个关键的方向上，决定了中国对苏政策转变的进程和时间表。总的看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显然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但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在一个时期里没有花足够的精力考虑中苏关系问题。与他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情况相比，尤其如此。从实际情况看，经常从美中苏战略三角的认知出发思考有关问题，是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制定对苏政策和处理对苏关系的主要特点，至少也是主要特点之一。从外交实践的角度看，1981年里根当选总统后中美关系出现的动荡，才是中国领导人考虑调整对苏联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而且他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也直接影响着对苏政策调整的幅度。

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和威胁认知的变化，与中国同美国特别是与苏联关系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20世纪70年代初促使中美从对抗走向和解的主要因素是双方对付苏联扩张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等方面有共同利益。随后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将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1978年春，卡特政府终于下决心迈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中美双方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中美建交谈判，尽管国内事务的议程已经极为紧张，邓小平仍然亲自过问每一轮谈判情况，并做出具体指示。由于中美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尖锐对立，谈判显得异常艰难。邓小平在谈判

的关键阶段下决心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步伐。他在1978年11月27日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说，最重要是不要错过时机。[1]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四次会见美方代表伍德科克，亲自参加讨论双方争执不下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和中美建交草案等。由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中美双方最终签署了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从历史的进程看，如果没有共同对抗苏联扩张威胁的需要，中美在当时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迅速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至少也是很困难的。不过，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并未能消除中美双边关系中那些带有根本性的矛盾。中美建交后不久，1979年4月美国国会提出并由美国行政当局批准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中国领导人对这个法案的看法是相当严峻的，认为它的出台相当于“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2] 邓小平曾因此警告美方下不为例。

里根在1981年1月入主白宫后即宣布，将采取所谓“双轨”对华政策，一方面表示继续发展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声称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出售高性能的FX系列战斗机，这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的波动。里根政府的行动使中国领导人断定，中美关系正面临严峻的考验，他们决定采取逐步升级的对抗措施，遏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3] 中国政府相继取消了军事领导人的访美计划，并公开谴责里根政府干涉中国内政。邓小平亲自向美国发出严厉的警告。[4] 这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好具体准备，不惜采取使中美关系降级的行动。除台湾问题外，中美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是矛盾冲突层出不穷。

---

①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1页。

②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08页。

③ 参阅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231～238页。

④ 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年1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

中美建交后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等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决策层在1981年初做出决定，适当与美国拉开距离，并适度调整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1981年1月2日，中国外交部召见荷兰驻华大使，告诫荷兰政府如果它坚持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将不惜将两国外交关系降格。中方将这一决定通知美方，以显示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中国领导人在准备同美国摊牌的同时，也在估量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邓小平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的战略地位已经获得明显改善，"如果中美关系倒退，苏联也只能凶到那么个程度吗！"[1] 意即苏联对中国安全威胁的程度在下降，导致中国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倚重程度亦随之下降，所以中国可以比较坚决地反击里根政府的倒行逆施。

1月11日，邓小平审阅了外交部有关《里根政府加强与台湾关系和我对策的请示》。他当时的批示是在"政治局会议上郑重讨论一次"，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事，是台湾官方人士将参加里根就职典礼，外交部应就此提出交涉，并拟出对案"。[2] 邓小平当天还召见了外交部负责人，专门讨论了应对里根政府采取何种反击措施方能达到目的。分析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表达的逻辑，大致有三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是必须坚决反击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行为，否则中国的地位和形象都会受到损害。第二，要做好准备不惜使中美关系倒退到1972年以前的状态，但具体步骤要妥当，要有准备。第三，各种措施的目的是要经过曲折之后，保持正常和稳定的中美关系。[3] 1月16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美关系，讨论的具体情况和结论固然不得而知。从后来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看，与邓小平11日的谈话并没有什么不同。

经中方交涉，里根政府取消了台湾官方代表出席里根就职仪式

①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133页

② 冷溶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05页。

③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第134页

的安排。2 月 27 日，由于荷兰政府不顾中方警告，坚持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中方宣布召回驻荷兰大使，并要求荷兰召回驻华大使。5 月 5 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将中荷关系降为代办级。中国政府这种做法是典型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通过打击荷兰警告里根政府，中国政府将言行一致，对任何售台武器的行为都不会予以容忍。此后不久，中国政府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同里根政府展开正式的外交交涉。

邓小平决心通过强硬反击的方式来争取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他认为苏联的威胁已经不是那么严重了。至于他的根据，大致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苏联本身的威胁并不是那么严重；二是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应对威胁的能力已经有所改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些都需要档案进一步解密才能解释清楚，不过对苏联威胁在降低的认识从逻辑上说会影响到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 1 月 2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外政策问题时，邓小平提出有必要认真议一议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看待第三世界和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①] 不少外交官的回忆认为，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同美国拉开一些距离的问题。这可以说明，邓小平提出考虑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的本意，就是要调整美中苏三角关系。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的确花了不少时间讨论对外政策，不过其中涉及对苏政策的内容反映出他们的看法还是比较复杂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他们一方面认为有必要缓和中苏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不能走得太快，否则有可能得不偿失。2 月 11 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外政策问题。邓小平发言指出，中国的外交战略方针是建立反霸统一战线，这个格局不要变。中苏可以谈贸易，谈边界问题，但没有大的新

---

①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 708 页。

情况出现（比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两国的国家关系谈判就不能恢复。他认为这是大原则，不这样就会损害中国外交的大格局。[①]

客观地说，由于中国与苏联长时间处于尖锐对抗，美国在战略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即美国与苏联和与中国的关系都分别好于中苏关系。只要中国提出改善战略地位，就有必要考虑改善中苏关系。但是，从美中苏战略三角的框架思考有关问题，在中国对外政策现实中主要表现为中苏关系受到中美关系的严重牵制，而不是相反。邓小平在初步了解美方的情况后，于6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即一定要使用“边缘政策”，不怕倒退，准备倒退，这样美国才会谨慎，中国才能争取到好的结果，即保持乃至发展中美关系。[②] 总之，中国选择用“边缘政策”与里根政府对抗，目的包括了最终导致一个稳定甚至向前发展的中美关系。

从1981年夏季到1982年夏季，中美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谈判。正当中美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矛盾急剧升级，双方在进行意志较量的最紧张时刻，勃列日涅夫发表了“三二四”讲话。邓小平要求立即做出回应，其动机包括了利用缓和中苏关系的姿态，向美国施加压力。钱其琛在回忆中介绍了邓小平上述决定的重要背景，他认为中方立即做出积极反应，是因为中美关于售台武器的会谈“取得了新的进展”，“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从实际情况看，这时中美之间还没有就谈判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取得进展，钱其琛的回忆可能在时间上有些大而化之了。不过他的回忆揭示了中国领导人此后即在当年夏季，决定采取重大步骤改善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冷溶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11页。

② 冷溶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48页；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135页。

即他们相信，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是有利于缓和和改善中苏关系的。[1] 如上所述，这一思路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虽然有心利用中苏关系缓和来加强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但他们并不打算让苏联利用中国在中美关系中遇到的麻烦，在缓和中苏关系的过程中取得优势地位。此外，如果回顾中国以往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的历史，就应该看到这一思路还有另一层重要含义，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认知方面的重要变化。

毛泽东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决定与苏联结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应付与美国的对抗。1969 年秋季毛泽东下决心缓和中美关系，是因为他极为担心他所认定的苏联威胁，他甚至认为，紧张的中苏关系也是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条件。邓小平在 1978 年末下决心完成与美国的建交谈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相信，为了对抗苏联的威胁，有必要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2] 他在 1979 年 1 月访美期间，在公开场合反复谴责苏联的对外政策，并呼吁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历史表明，中国领导人很长时间里都相信，在美苏冷战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对外政策是“非杨即墨”，很难做到左右逢源，不可能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领导人考虑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也是从根本上逐步改变他们以往在冷战影响下形成的战略思维方式的开端。

1982 年 5 月，中美开始就美国售台武器等问题举行谈判。在夏季中美谈判进入收官阶段期间，邓小平在自己家里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改善中苏关系问题。根据参加会议的钱其琛回忆，邓小平在此次会议中提出，要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条件的。他由此将同齐奥塞斯库所谈的三点归纳为苏联应主动解决的“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3～4 页

② 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1979 年 1 月 1 日，《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55 页。

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方案获得与会者的同意。邓小平还提出，由外交部派遣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驻东欧国家使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直接向苏联方面转达中方的意图。[①] 这次会议可以确定是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开始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标志。

邓小平显然在用新的思维考虑如何同时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8 月 17 日，中美代表签署了“八一七”公报。美国在公报中再次声明，它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承诺对台军售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准备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做最后解决。[②] 后来的事实表明，尽管美国并没有严格履行公报中的承诺，但要发展与台湾的关系毕竟还是受到极大的限制。

“八一七”公报的签署使中国领导人确信，中国在处理中苏关系方面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有利条件，即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苏联将继续处于弱势。因此，在 8 月 10 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签订前一周，中美关系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于洪亮衔命前往莫斯科，随身携带外交部起草的说帖。综合黄华和钱其琛的回忆，可知说帖是经过邓小平亲自核准。该说帖主要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中方认为时机已到，已经可以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些实际的事情了；第二，建议苏方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做起；双方还应考虑为苏军撤出蒙古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同时中方也可在阿富汗问题上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③] 这是中方第一次正式直接向苏方提出解决三大障碍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中方对三大障碍的关切是有轻重缓急

---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7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82 年 8 月 17 日，《人民日报》1982 年 8 月 18 日。

③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 359 页；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7～8 页。

的，而且对每一个问题都留下了讨论的余地。例如，用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代替苏联从边境地区撤军，这样的表述更接近建立边界信任措施，其中表达的缓和与善意是显而易见的。对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表述也有同样的意味。

于洪亮到达莫斯科后，即要求在中国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伊利切夫在第一远东司副司长贾丕才陪同下会见了于洪亮，后者几乎一字不差地将说帖的内容当面背诵一遍。伊利切夫等表示，要待请示后才能答复。于洪亮此后前往波兰，在回程经过莫斯科时，再次与伊利切夫会见，后者表示已经向上峰汇报此前的谈话内容，苏方会做出正式答复。苏联方面的决策过程尚不清楚，但结果显然是积极的。8 月 20 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递交一份备忘录作为正式答复。备忘录中表示，苏方愿意在任何时间、地点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谈判，以便"消除任何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邓小平不久后在听取有关的报告后决定，重开中断了两年多的中苏谈判。中苏双方很快便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10 月 5 日，谈判在北京举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此开始。

从间接公布的邓小平于 9 月 18 日下午在专列上同金日成单独会谈的资料中，可以更多地了解到中国决策层的思考，他们的决定大致包含了四个方面：第一，此次中苏接触的目的是要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第二，中方提出解除三大障碍是因为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了威胁，苏联可以先做一件来表示诚意；第三，中苏谈判将是长期的，双方已经决定展开副外长级谈判，但谈到实质性问题不会容易解决；第四，中方处于有利地位，苏联比中国更急于谈出成果，因为它"日子不好过"。[①] 邓小平的这段谈话表明，中国领导人一方面确定了此次中

① 冷溶等主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 851 页。

苏谈判的目标就是实现正常化；另一方面这时对谈判仍然是不急于求成，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处于比苏联有利的战略地位，有条件而且有必要从正常化进程中获得实质性的战略利益。这一认识导致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进程进行了相当严格的控制。例如在中苏谈判开始前，中国对外友协曾经请示派代表团参加苏中友好协会成立 25 周年纪念活动，即被邓小平否决。原因是他不想在谈判前给对方造成中方急于改善关系的印象，以致冲淡了消除三大障碍这个主题。

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时期同时处理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实践，对中共十二大确定新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说明这一点对理解后来中国政策的发展是必要的。这些外交实践使中国领导人后来逐步认识到，在冷战的美苏两极尖锐对抗中，中国是可以左右逢源，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建立正常或比较缓和的关系，而且这对中国很可能更为有利。

对美和对苏外交对中共十二大确立新的对外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对苏联政策方面，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说：“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其次是提出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将其正式写进十二大政治报告，从此决定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调。[①] 这项政策的确包含着中国领导人对以往三十年同时处理与美国和苏联关系的基本经验。

这里所谓的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基本经验，其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认识冷战和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处理与美国和苏联两个

---

① 这项政策最初是胡耀邦于 1982 年 9 月 1 日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提出。赵紫阳在 1984 年 5 月 15 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和 1986 年 3 月 25 日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全面阐述了这项政策，并在后一个报告中正式完整地使用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表述。

超级大国及其各自领导的两个阵营的关系等，其中包括与苏联结盟和对抗、与美国对抗和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与美国建交前后处理中美关系的主要经验。中国领导人从决定缓和中苏关系起，实际上已经不打算继续在冷战中扮演过去那样的积极角色，他们逐步地意识到，中国有可能在两极格局中争取到一个超然的能够更多的自主行动的地位。中共十二大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阶段上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第三节　政治磋商陷入僵局

中苏副部长级特使的政治磋商从 1982 年 10 月 5 日开始在北京举行，到 1988 年 6 月止共进行了 12 轮谈判，可以说是典型的马拉松式谈判。

中苏副部长级特使的政治磋商第一轮于 10 月 5 日在北京举行，持续到 21 日，其间共举行了六次会谈。第一轮会谈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因为双方在这一轮会谈中分别清楚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原则，同时也表明尽管存在严重的分歧，但都希望保持这个谈判平台，作为推动正常化进程的正式渠道。这一方面对双方了解对方的意愿和态度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双方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调控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甚至有时利用来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

中方的特使是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苏方特使是当时主管非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后者有同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王幼平等中国资深外交官谈判十多年的经验，对中苏关系涉及的具体问题及其复杂程度有较深刻的了解。同时作为职业外交官，他长期浸淫于充满官僚作风的官场，似乎缺少了对重要的新信息的足够敏感，要么就是过于谨小慎微，因此在重要的外交行动中绝不越雷池一步。

中方代表团在谈判前即按照邓小平“不要转弯太急”和“不急于

求成”的指示，确定了磋商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是“立足战略全局，坚持原则立场”。值得重视的是，中方在要求苏联采取实际措施消除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方面，与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明确的方案，即确定了邓小平在同奇奥塞斯库谈话时提出的所谓“先从一件事做起”，就是要求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 中方为第一轮政治磋商拟订的谈判方针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界碑，它标志着中方实现正常化的政策最终形成。这项政策完整地说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第一，中苏关系正常化应该以实现中国的战略利益为目标，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战略利益就是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和解决在地缘安全领域面临的麻烦；第二，解决苏联的安全威胁问题可以分步骤，可以优先解决的是印度支那地区问题，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第三，由于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在中苏关系中中国的战略地位优于苏联，中国在正常化问题上“不急于求成”。

苏联方面的决策过程目前还不得而知。尤其需要搞清楚的是，前述邓小平在4月同齐奥塞斯库的谈话和在9月同金日成的谈话是否在政治磋商开始前已经被转达给苏联领导人。由于罗马尼亚和朝鲜都是苏联阵营的国家，同苏联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很难想象邓小平的那些讲话不被齐奥塞斯库和金日成转达给苏方。齐奥塞斯库的地位尤为特殊，他一直在为中国领导人向两个超级大国方面传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领导人一直对他很信任，谈话很少是无的放矢的。如果历史档案能证明苏联领导人已经了解邓小平的谈话内容，那么可以大致断定，他们对谈判也抱定了不急于求成的态度。从伊利切夫在磋商中的立场和态度看，苏方的指导思想基本没有超出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的范围，他本人则表现出足够的耐心。

---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1页

从双方在政治磋商过程中的言行分析，可以看出中苏在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原则区别。中方是站在国家战略的层次上，坚决地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作为谋求战略利益的过程，务必要达成获得既定战略利益的目标，即逐步地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中苏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只能建立在双方拥有基本的战略互信的基础上，以及不能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布局。

苏方则是希望通过谈判，缓和并改善中苏双边关系，从而缓解在亚洲方向面临的压力，因此并不希望对已经获得的战略地位做根本性调整，不想减轻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只要双边关系有所改善，甚至只要有改善的姿态即可。苏方对正常化的定义就是双方谈出一个作为双边关系基础的准则，然后签署一个有关这个准则的外交文件。中苏双方的这种分歧在政治磋商中充分展现，并使谈判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10月5日，第一轮磋商开始后，钱其琛即将中方的发言集中在消除三大障碍上。他强调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以便消除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他在谈判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中方各种安全关切中的轻重缓急，指出一下完全消除中苏之间的所有障碍是有困难的，中方认为可以从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做起。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因为它对维护地区和平至关重要；其次是因为它比较切实可行，苏联只是施加自己的影响而已。由于目前无法获知中方内部讨论的内容，所以对中方为什么在第一轮磋商中提出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苏联应采取的第一步，目前只能依据钱其琛的有关回忆来分析了，但这样的分析很可能是不充分的，还有待档案进一步解密。

伊利切夫的发言则是坚持苏方一再阐述过的原则：第一，中苏关系的改善不能有“先决条件”；第二，中苏关系正常化不应当损害“第三国利益”；第三，重申苏联“从不威胁中国”。他反复重申，苏

联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并继续以往的做法，建议共同制定中苏国家关系的基础文件，也可以先就改善和发展两国在经贸、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等达成协议。

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磋商过程中两位特使针锋相对，气氛有时非常紧张。不过双方显然都保持着继续磋商的意愿，所以在正式谈判之外的气氛相对轻松，中方特意安排了游览活动，以便进行私下沟通。钱其琛利用招待伊利切夫游览休闲的机会，专门向后者说明，中方确有意愿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他告诉伊利切夫，于洪亮于8月转达的口信中有重要的新内容，而这正表明了中方希望认真地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些事情。例如，在减少中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中方的措词包含着双方都承担后撤边界驻军义务的含义；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方的措词是只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不涉及苏越关系的其他方面；等等。伊利切夫则继续谨言慎行，除了重申苏联的立场，未作其他回应。①

第一轮政治磋商共谈判了六次，最后一次于21日结束。此轮磋商结束后，10月24日，中方基于对谈判以及对改善中苏关系表示重视的考虑，由外交部长黄华出面会见了伊利切夫。后者借此机会继续阐述苏方的一套老生常谈，黄华则照例一一予以驳斥，并再次要求苏联为消除那些障碍做一两件实事。② 尽管谈判中双方在阐述各自立场和反驳对方时都是唇枪舌剑，而且双方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中方对谈判的评价显然是正面的，认为能够在坦率的气氛中深入地交换意见，增进对彼此立场的了解，也算是一个积极的进展。

第二轮政治磋商于1983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结果依然是照例的争论和无实质性进展。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第八轮政治磋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1~16页。
②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0页。

商为止，双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仍然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同时中苏任何一方都没有因为政治磋商旷日持久且毫无进展，便提出中断谈判，在维持政治磋商这个对话平台的过程中，双方都展现了坚忍不拔的政治毅力。由于中苏在全球战略、地区问题和双边关系三个层次都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利益和立场，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在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能够长期持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国领导人的确都有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

中苏政治磋商持续数年无结果，双方都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导致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国家关系谈判，这在中苏双方都是有深层原因的。苏方从政治磋商一开始，就不准备讨论涉及安全战略层次的那些问题。中方提出要消除的三大障碍，几乎每一个都涉及苏联对外政策或者说是东亚政策的全局，只要其对外政策不出现根本性的调整（这实际上还需要苏联国内政策的重大改变），苏联的确是连一步都迈不出来的。从实际情况看，由于苏联对外政策还处在全球性的扩张阶段，在中苏政治磋商开始后，苏联还在加强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到1984年，苏联在东亚的军事力量空前地加强了。苏军在这个地区部署了140枚SS－20导弹和100多架可运载核武器的逆火式轰炸机；苏军有4艘航空母舰，其中2艘部署在太平洋地区，苏军太平洋舰队还增加了导弹潜艇和核动力潜艇。苏方一再解释他们没有威胁中国的意图，但是如此增强的苏联军事力量至少也是无助于消除中国的被威胁感。

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既无其调整自身全球战略的支持，也无其国内政策改变的动因，甚至还受到国内政局变化的严重牵制，这主要是指苏联最高领导人因健康原因频繁更迭。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病逝。此时中苏第一轮政治磋商结束不久。从苏联对华政策的角度看，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留下了一堆疑问。根据中国外交部了解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

打打电话，无法正常视事”。在这种情况下，中方怎么可能相信他会集中精力认真考虑对华政策问题。就算前述9月邓小平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转达到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是否有时间和精力了解和思考，都值得怀疑。而对华政策如此的复杂和重要，不能集中精力处理，是不可能有积极的变化的。由此推断，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后苏联对华政策陷入停滞，在逻辑上是非常合理的。实际情况也是中国方面在不断采取主动行动，力图打破僵局，而苏联方面几乎无所作为。

中国方面如上所述，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决定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同决定“与美国拉开距离”联系在一起的，特别重要的是同美中苏战略三角的思维框架有直接的关系。问题是尽管美苏冷战在这个时期有加剧的趋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没有因中国改善中苏关系而受到影响。中国领导人这时的确有意设想过“与美国拉开距离”。所谓“与美国拉开距离”，包含着对美国的不信任，在战略上防止被美国所利用，等等。但是，在经历了一段动荡后，中美关系从1983年秋季开始稳定并得到明显的改善。1984年上半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实现了互访。这以后中美关系不仅逐步稳定下来，而且在某些领域的合作甚至出现了跃进式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清楚地表明，中国提出的“与美国拉开距离”是有其内在的限度的。它主要是指在安全战略上使中国尽可能地避免被美国利用，避免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不再重视和不想发展中美关系，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更何况，中美关系正常化虽然是建立在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上的，但两国建交后双边关系的内容迅速丰富起来，大大超出了战略合作的范围，在经贸、科技、文化等广泛的领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这导致中美关系的基础正变得更加丰富和更加稳固。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中国方面有极为深刻的国内根源，中国的改革在不断

深化，对外开放在不断扩展，而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从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向越明确，政策越坚定，中美关系就发展得越快，其内容就越丰富。

这个时期中美关系开始全面发展这一事实在多大程度上牵制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的确是需要专门探讨的。例如中国总理赵紫阳在 1984 年 1 月访问美国期间，直接告诉里根总统，中国正在同苏联对话，但是中苏关系不可能有大的改善。他在接受美国五大电视网记者联合采访时说，中国在美苏之间不会采取等距离的政策。[①] 2 月 22 日，邓小平接见了布热津斯基率领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在后者询问中国的国际战略是否有变化时，邓小平说，有变化主要就是美国对台湾政策引起的，中苏作为邻国会“改善和发展一些关系”，“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戏剧性的变化”，除非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上迈出一步。[②] 由此可以大致看出，中美关系的每一次向前发展，一方面提升了中国在同苏联谈判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牵制了中苏关系的改善速度，甚至降低了中国领导人大幅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中国领导人从中得出的结论除了应该继续改善中苏关系以外，也包含着有必要保持甚至向苏联提出比较高的条件。何况苏联的对外政策仍然被中国定义为是霸权主义的，中国领导人仍然将反对霸权主义作为重大的外交任务，他们仍然将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军事部署等，视为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总之，他们对苏联威胁的认知并无根本性的变化。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但中国调整对苏政策的确改善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即在处理对美关系中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较多的筹码，尽管这未必是中国领导人的初衷。中国调整对苏联

---

① 参阅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 161～162 页。

②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 962 页。

政策促使美国不得不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这也是1984年以来中美关系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又使中国处理对苏关系时，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中共十二大开始推行的新对外政策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中国领导人不会体会不到，他们认识的逐步转变是后来中国对苏政策大幅调整的重要条件。

第三章

双边关系逐步改善

- “葬礼外交” / 661
- 政治关系缓慢改善 / 666
- 恢复经贸科技文化合作 / 674

中苏关系并没有因为政治磋商陷入僵局便裹足不前。在这个过程中，两国的政局变化对它们各自的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是在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的过程中，中方显然做出了远比苏方更为主动和积极的努力。这部分地是因为中国的决策层团结和决心坚定，以及国内改革方向明确且政局稳定。苏联方面则正相反，苏联最高领导人相继辞世，导致国内政局复杂化，各项政策停滞不前。所以这个时期中方的努力成为中苏关系缓和与改善的主要动力。这个时期中苏间在政治、经贸、文化科技领域和较高层级的人员往来都不断扩大，双边关系各领域的持续改善和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造成了日益稳固的基础，也使两国关系正常化逐步成为难以逆转的大趋势。

第一节　“葬礼外交”

中苏政治磋商陷入僵局后，中苏关系并没有因此便停滞不前。在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的过程中，中方显然做出了远比苏方更为主动和积极的努力。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中国决策层决心坚定以及国内政局稳定。实际情况是，在苏联国内政局因最高领导人相继辞世变得复杂化的时期，中方的努力成为中苏关系缓和与改善的主要动力。

1982年11月10日，苏联政府宣布勃列日涅夫逝世。中方很快做出重要决定，利用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机会，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利用一个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逝世的机会试图打开国家关系的政治僵局，在中苏之间是有先例的。如前所述，在1976年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逝世时，苏联曾经通过参加吊唁活动来尝试改善中苏关系，当时未获任何积极成果。此次勃列日涅夫逝世，中共中央首先发出唁电，并送了花圈。外交部最初建议，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和外交部长黄华前往苏联使馆吊唁，向苏方表示深切哀悼，并表达希望中苏两国逐步实现正常化的愿望。[①] 同毛泽东去世时苏方的吊唁活动相比，中方的规格基本相同，在表态上更积极一些。外交部的建议获中国决策层批准并付诸实施。苏方对中方的行动表示欢迎，苏联媒体也做了积极的报道。

中方的第一轮行动是带有试探性的，双方之间出现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领导人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苏联宣布11月12～15日为哀悼日，15日为勃列日涅夫举行国葬。中国领导人很快决定派遣外交部长黄华率领代表团，专程前往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的国葬。代表团成员包括外交部苏欧司司长马叙生、副司长王荩卿和中苏谈判办公室主

①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0页。

任李凤林。根据黄华的回忆，外交部在代表团行前，上呈了此次参加莫斯科国葬的工作方针。它们包括：第一，以改善中苏关系为主调，不主动谈分歧，不直接提三大障碍，不搞正式会谈；第二，对勃列日涅夫只评价其正面作用，肯定他生前多次表达愿意改善中苏关系的积极态度；第三，强调中国真诚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主张以务实的态度和方式逐步实现正常化；第四，吊唁时强调中苏传统友谊；第五，祝贺苏联新领导人就职，并转达中国党政领导人的问候；第六，不涉及两党关系，不参加苏联阵营国家的多边活动。[①] 外交部的建议很快获批准。

为确保中国代表团能及时参加勃列日涅夫的国葬，中国为代表团准备了 11 月 14 日前往莫斯科的专机，这反映了中方对此次外交行动的确是足够重视的。13 日晚，黄华在离京之前专门打电话给邓小平，在报告行程安排和准备工作的同时，请求进一步指示。很有必要说明的是，邓小平在电话中，对上述的方针做了补充和修改。修改的内容包括：代表团要进一步阐述中国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主动争取拜会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并进行坦率的对话；在会见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时，要表达希望新领导人用新的努力来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还提出，为了使苏联公众了解和重视中国代表团此行的意义，要用外交部长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方式，直接播出中方的立场。[②] 最后一条十分重要，它使代表团的任何行动都不会脱离在北京确定的界限，而且苏联方面也不致因代表团的言行而误读中国的政策。

现在还很难完全解读清楚邓小平做出上述指示是基于何种考虑，从字面含义可以做这样的判断，即邓小平的谈话凸显了他对消除三大

①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 361 页。
②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 361 ~362 页。

障碍的重视和对以往方针的坚持。他显然希望黄华此行能更为准确和清楚地表达中方的原则立场，避免礼节性的活动模糊了焦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再次证明了邓小平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对战略问题的关注和坚持，以及对整个进程的掌控，他断不能允许任何外交程序和事务性的交往导致正常化进程的失焦。这个事实有两种含义：一是上述黄华所说的中共中央批准的外交部的建议，尚未经邓小平本人直接定夺；二是经过第一轮吊唁活动的试探，邓小平决定利用参加葬礼的机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

14 日清晨，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邓小平随后不久又做出进一步的决定。他指示新华社要发表一个简短的谈话，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既不能简单地批评，也不能只说好话。[①] 这一指示同外交部最初的建议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即增加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方恶化中苏关系的批评，而不是外交部建议中的回避对勃列日涅夫的批评。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了以黄华名义发表的谈话稿，并于当天播发。这份谈话稿在反映外交部建议的同时，对中苏关系做了大略的回顾，其中隐含了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方恶化中苏关系的批评，以及希望苏联新领导人做出新的努力来改善中苏关系。与外交部建议的另一处明显的不同是，谈话稿明确提出了消除三大障碍的问题。[②]

黄华到达莫斯科机场后，立即被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告知，中共中央有特急电报，他到使馆后看到了特急电报和新华社播发的谈话稿全文。黄华立即理解了谈话稿的内容与外交部建议的区别之处。至于那份特急电，则是明确指示黄华应根据谈话稿的精神表态，此外还对原定方针做了两处重要修改。第一是黄华以外长身份主动要求拜见葛罗米柯，争取举行一次外长级政治会谈，意即利用这一机会，直接将中苏政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20 页。
② 《人民日报》1982 年 11 月 15 日。

洽谈判的层级从副外长级升至外长级。第二是在会见安德罗波夫时，要明确表达出中方对苏联新领导人是寄予希望的，意即表示中方愿意同苏联新领导人打交道。[1] 以这个急电为标志，中方“葬礼外交”的指导方针最终形成，它为黄华在莫斯科的外交行动确定了基调，表明中方希望通过“葬礼外交”，为改善中苏关系取得更积极的成果。

中方的“葬礼外交”得到苏方积极的回应，中方代表团认为，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是“热情友好”的。苏联媒体对中方的言行做了比较多的报道，这有利于使苏联公众了解中方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和行动，从而改善中国在苏联公众中的形象。安德罗波夫接见参加葬礼的各国来宾时，对黄华的礼遇也是突出的。这种安排使黄华有时间利用这次礼节性的会面，直接转达中国领导人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不知因何缘故，虽然有中共中央的指示，黄华后来未能单独见到安德罗波夫，因此这次礼节性会面显得特别有意义。由于没有安排安德罗波夫与黄华的专门会见，苏方曾经找到黄华，认真逐句地核对了他在葬礼上与安德罗波夫谈话的内容。苏方的这些行动部分地反映了苏共新领导人对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视，同时也是对中方“葬礼外交”的试探性回应。

黄华在莫斯科期间取得的最重要进展，是在 11 月 16 日下午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正式会谈，这是 20 年来中苏外长第一次政治性会谈。黄华一度对会谈有可能打破僵局产生希望，尽管代表团事先也预计到，会谈不大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由此可见葛罗米柯在会谈中表现出的积极态度。黄华在会谈中重申了苏联需要消除三大障碍，他并没有表达苏联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而是期待葛罗米柯在苏方从中苏边界撤军方面有所表示。这算是照顾了苏联提出的“不涉及第三方”的原则。但是，葛罗米柯一方面明确

---

①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 363～364 页。

排除讨论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并没有表示，苏联有从中苏边界撤军的意愿，他只是含糊地说，苏联可以做所有取决于苏联的事情来推动正常化。他强调中苏可以从那些没有争议的问题做起，如发展贸易、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等。黄华认为这些双边往来可以逐步安排，但对实现关系正常化来说，意义不会很大。[1] 会谈最终未能取得中方界定的那种实质性进展，但为推动中苏关系改善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气氛。

这里需要指出，比照黄华和钱其琛等人的回忆，他们陈述的事实在反映中方政策变化方面是有一些差别的。根据钱其琛的回忆，中方在于洪亮于1982年8月访问莫斯科时转达的口信中，已经对苏方消除三大障碍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这一点有所表达，即"建议"苏方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从减少中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做起"。[2] 钱其琛在第一次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中，就向苏方明确且足够详细地提出，苏方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他在私下向苏方详细解释说，从这个问题入手至关重要，因为越南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张破坏了那里的和平与安宁，也加重了中国的不安全感；另外苏联劝越南撤军不涉及苏联撤军问题，故对苏方比较现实可行。他说这是实现正常化的"一个关键性步骤"，但没有说苏方如此做了，中方便会做出何种回应。按照钱其琛回忆中的用词，这一建议应该是中方谈判代表团拟订的方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当然是得到了决策层首肯的。[3]

在黄华有关于洪亮转达口信的回忆中，并没有上述有关建议苏方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的内容。而且黄华在回忆"葬礼外交"时说，他在同葛罗米柯会谈时，对苏方如何消除三大障碍并没有

①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8～369页。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8页。
③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1～13页。

指出具体的设想，他本人则期待苏联在撤退中苏边境驻军方面有所表示。[1] 参加会谈的中方代表团成员马叙生的回忆，为黄华的说法提供了佐证。他说葛罗米柯与黄华都强调了中苏关系的重要性，黄华表示三大障碍中“任何一个如能得到解决，就能使关系向前迈进一步”。马叙生认为这是中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表现的松动姿态”。[2] 马叙生长期参加中苏谈判，他的判断有参考价值。这里的问题是，他认为中方首次表现出松动姿态指的是“任何一个如能得到解决”这句，还是“就能使关系向前迈进一步”这句。毕竟在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中，中方在要求苏方可以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先做一件事时，并没有说明中方因此会做出何种回报。从中方当事人这些回忆中至少可以看出，中方在 1982 年 10 月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中，提出苏联可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个建议，很可能并不是在战略层次进行全面衡量后做出的决定，澄清这点对理解中国有关政策的调整是有意义的。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那些回忆出现如此大的差别，需要档案进一步开放才有可能解答清楚。

第二节　政治关系缓慢改善

不论如何评价中方“葬礼外交”的影响，中苏双方领导人在这次外交行动中展现的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是确定无疑的。中国最高决策者直接参与了“葬礼外交”决策的全过程，甚至在一些重要行动中亲历亲为。苏联新领导人同样很关注改善中苏关系的这次机会。葛罗米柯在与黄华会谈前，曾经面见安德罗波夫并直接获得了后者的指示。他本人告诉黄华，他是代表安德罗波夫表示，苏联主张改

①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 367 页。
②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 年第 4 期，第 36 页

善中苏关系。双方虽然没有在消弭战略层次的分歧方面取得任何进展，但都清楚地了解了对方决策层的确有意愿来改善两国关系。这种互信的形成对改善中苏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在这次外交活动之后，中苏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特别是苏联的政策开始逐步发生变化。

苏联新领导人确实在采取一些措施，试图逐步消除中方的战略疑虑，尽管那是远远不够的。这首先表现在安全领域，苏方虽然没有采取行动消除三大障碍，但也没有采取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甚至还有一些象征性的措施。

1983 年春季，美苏就在欧洲地区削减中程导弹部署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国际舆论注意到，中国正关注着美苏在谈判中的立场，因为中国会担心，一旦美苏达成在欧洲地区削减战略武器的协定，苏联就有可能把从欧洲削减下来的中程导弹转移部署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从而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①] 同年 8 月 26 日，安德罗波夫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明确表示，美苏一旦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苏联将削减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并加以销毁，而不会转移到其他地区。他明确指出，这样中国就没有理由担心了。[②] 中国领导人基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长期认为“大国妥协，牺牲中国”几乎是不会改变的规律。客观地说，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对于消除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疑虑是有积极作用的。实际上中方对安德罗波夫的这部分谈话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这和苏联过去坚持要把欧洲削减的导弹移到东亚的态度相比，是前进了一步”。[③] 当然，从这一评价的用语本身也可以看出，中方的肯定还是有限的。

---

① 《纽约时报》1983 年 3 月 2 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83 年 3 月 4 日（下），第 4 页。

② 《安德罗波夫答〈真理报〉记者问》，塔斯社 1983 年 8 月 26 日电，转引自《参考资料》1983 年 8 月 27 日（下），第 3 页。

③ 《人民日报》1983 年 9 月 17 日。

上述安德罗波夫谈话包括了两部分内容。除了关于美苏削减在欧洲地区部署的中程导弹谈判问题外，他还专门谈到中苏关系，认为中苏关系“出现了某种积极的趋势”，而且双方在“进一步扩大贸易、安排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在文化、体育联系以及其他联系方面还可以做许多事情”。关于三大障碍问题，安德罗波夫说：“在对待某些国际问题上，对同某些国家的关系的态度上，我们同中国之间还有不小的分歧。但是，我们坚定地认为苏中关系的安排不应当给第三国带来损害。”[①]

《人民日报》8月28日摘要转载了安德罗波夫的谈话，这是一个非常的举动，表明中方对安德罗波夫谈话的重视。但是，其中没有转载安德罗波夫谈话涉及三大障碍的部分，只是将其概括为：“安德罗波夫在谈话中对中苏关系中存在的障碍只字未提，却仍然坚持所谓的在确定中苏关系时应‘不损害第三国’的立场”。[②] 邓小平在27日会见美国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时，对安德罗波夫的这部分谈话几乎持完全否定态度，他说安德罗波夫说中苏谈判不涉及“第三国”这一句，就是“拒绝了中苏谈判的基础”。[③]

不过，中国领导人很快释放出了不同的信息。9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在欢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宴会上发表讲话，肯定安德罗波夫的讲话是“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这是值得欢迎的”。他同时指出“正常化道路上还存在一些障碍”。[④] 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公开地回应安德罗波夫的谈话，塔斯社和苏联各大报均报道了李先念的这一讲话内容。中方的这一正式表态是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即将访华释放的信息。

---

① 《参考资料》1983年8月27日（下），第4页。
② 《人民日报》1983年8月28日。
③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26页。
④ 《人民日报》1983年9月3日。

贾丕才于9月8～16日访华，公开的理由是为即将开始的中苏第三轮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做准备，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首次邀请苏联副外长正式访华，尽管贾丕才本人已经以其他各种身份多次访华。从贾丕才在北京的活动和离华时发表的言论看，他访华的目的是代表安德罗波夫政府，探讨推动中苏政治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不仅限于第三次副外长级政治磋商。目前还不能获知贾丕才访华双方会谈的详情，但从公开的信息中可以看出一些变化。例如，中国外交部说，贾丕才访华将谈双方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参考资料》在这期间刊登了长篇综合报道，称苏联对新疆地区广播中的反华内容大大减少，并有不少对中国情况的“客观”报道。[1]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期间，中方未在苏联战斗机击落韩国客机一事上采取同美国等国家一致的立场。贾丕才在离华时发表谈话说，会谈是务实的，“中苏两国的关系还存在着障碍，这是不能回避的”。[2] 显然，这次访问至少是增加了双方对对方改善中苏关系意愿的信心。例如，邓小平在9月24日同金日成谈话时，对他一个月前对上述安德罗波夫谈话的评价做了重大修正。他说安德罗波夫对三大障碍涉及“第三国”的表述已经有变化，即从“不要涉及第三国”改为“不要损害第三国的利益”。[3]

苏联对华政策的这些微妙变化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反映了苏联新领导人面对日益被动的战略处境，有意尝试改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对外政策。如前所述，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苏联推行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已经走到尽头，确实难以为继了。美国则正相反，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经济全面回升，军备不断加强，处境获得很大的改善。1983年3月23日，里根向美国公众作题为《和平和国家安全》的电视演讲，提出了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的所谓“战略防御计划”，从

① 《参考资料》1983年9月9日（下），第6～9页。
② 《人民日报》1983年9月17日。
③ 冷溶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36页

而向苏联发起了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攻势。6月15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经里根批准，在参院外交委员会全面阐述了里根政府的对苏联政策，其核心就是要用各种方式重新确立对苏联的战略优势。[①] 里根政府随后开始在各个领域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其中最突出的是宣布，如果苏联不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问题的谈判中做出让步，美国将于当年底开始，在西欧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安德罗波夫政府曾经提出所谓的“同等裁减建议”，即苏联把部署在欧洲的SS－20型中程导弹减少到162枚，结果被里根政府拒绝。11月14日，美国开始在英国部署第一批陆基巡航导弹。23日，苏联宣布退出谈判。美国随即开始在西欧大规模增加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对苏联来说尤为严重的是，美国的主要盟国对里根政府的政策表达了几乎是一致的支持。

里根政府的行动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欧洲，几乎摧毁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推行欧洲缓和政策所取得的那些进展。加之苏联推行过度的扩张政策，造成它在国际社会中处境孤立。面对这种局面，安德罗波夫政府试图在一些领域做出妥协，以便改善苏联日益恶化的战略环境，其中包括改善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以及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在军事安全领域开始有所松动，对中方做出上述和解的表示，是苏联调整对华政策的一种反映。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两国政治交往的层级不断升高，这种变化反映了两国关系改善的程度。在勃列日涅夫葬礼期间，中苏举行外长级正式会谈之后，中苏开始酝酿更高层级别的交往，具体考虑是中方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但此次访问尚未成行，苏联国内政局因为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逝世而出现新的变化。中方此次较早获悉安德罗波夫病重的消息，并很快在安德罗波夫逝世

① 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879～880页。

期间采取重要的外交行动，派遣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前往莫斯科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这一决定已经再次升高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层级。

万里参加葬礼期间，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这是二十年来两国举行的第一次副总理级的会谈。这期间，苏联新领导人契尔年科明确表达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苏方曾经通过中国驻苏联使馆询问万里，是否有意同契尔年科会晤。在代表团起程前，邓小平曾指示不要主动要求同苏联新领导人会谈，如苏方提出这类建议，可应邀参加并听取意见。同黄华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时中国领导人的积极态度相比，这次的决定显得比较谨慎。

由于事前确定了谨慎行事的原则，在苏方提出上述建议后，万里回复说中方的态度是“客随主便”。苏方对这句“客随主便”的理解是，中方无意同契尔年科会面，因而未做进一步安排。[①] 这次交往表明，中苏更高层级的交往本来是有可能提前一年多时间的。之所以未能如此，原因在于中方的决策和执行中的判断和尺度掌握，这种相对慎重的决定一方面可能是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情况不甚了解，后者曾经参与处理过欧洲事务，从未访问过亚洲国家，中国领导人同他没有什么交往，并认为他比较平庸且身体欠佳，“属过渡性人物，不可能有大的作为”。[②]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中苏正常化进程的看法。中国总理一个月前刚刚访问美国，中美正在就里根总统4月访华进行磋商和安排，这种情况下适当控制中苏关系升温的速度，是合理的选择。

1984年12月21~2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阿尔希波夫访华是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开始策划的，而且是苏方为

① 汤世稼：《随万里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中苏关系杂忆》，《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41页。

②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新华出版社，2008，第5页。



1984 年 12 月陈云在南海会见阿尔希波夫

推动中苏改善关系而主动提出的。根据阎明复回忆，阿尔希波夫本人曾经告诉他，苏联方面最初提出，阿尔希波夫以苏联驻华使馆客人的名义访华，征询中方是否同意接待。中国外交部的答复是，希望阿尔希波夫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而不是苏联驻华使馆的客人访华。[1] 中方决定正式向阿尔希波夫发出邀请，是万里在莫斯科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期间。当时阿尔希波夫多次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向中方表达他希望访问中国的强烈意愿。万里则是在同阿尔希波夫会谈时，正式提出邀请阿尔希波夫访华的。[2] 实际上，万里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的安排，为苏联新领导人上台后继续推动阿尔希波夫访华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毕竟是中国副总理首先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同中国很多资深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对改善中苏之间的气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双方固然未就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取得任何共识，或许双方本来也没有将讨论这个议题作为访问的重点，但双方都同意共同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向前发展。12 月

---

① 阎明复：《忆阿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96～97 页。

②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 年第 4 期，第 36 页。

28 日，中苏双方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等三个重要文件，并同意进一步谈判签署长期经济贸易协定。阿尔希波夫访华本身就表明两国政治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三个协定的签订则为恢复中苏之间的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奠定了基础。

1984 年 9 月，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和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举行了正式会晤。中苏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正式会晤就是安德罗波夫本人提出的建议。[①]当时是吴学谦首先去苏联代表团驻地访问葛罗米柯，然后葛罗米柯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回访。双方会晤大致是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毕竟开始了两国外长在第三地正式会晤的进程。从这次会见后，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会晤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交往机制。后来的发展也证明，在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这个机制对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起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 1983 年开始，中国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的关系走上改善和发展的轨道。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政治交往的级别越来越高。中国同这些国家议会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也得到恢复和加强。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到 1986 年，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和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相继访华，使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全面正常化的局面。这些变化固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和这些东欧国家共同做出了积极努力，不过，由于这些东欧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的盟友，苏联同这些国家保持着紧密的同盟关系，苏联这个时期开始逐步放松对这些国家改善对华关系的控制，也是这些东欧国家改变对华政策和发展对

---

① 参阅周晓沛《我看中苏关系近四十年变迁》，《百年潮》2007 年第 12 期，第 16 页。

华关系的重要原因。苏联甚至希望利用这些东欧国家改善对华关系，影响中国的对苏政策。[1]

第三节　恢复经贸科技文化合作

1982年夏季以后，中苏政治关系的进展虽然缓慢，但还是为两国关系的缓和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气氛。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落实，同苏联发展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内在需求。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中苏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

1983年中苏第二轮副外长级政治磋商期间，双方达成协议，恢复互派留学生，并于当年秋季互派了10名留学生、研究生等，到对方大学学习。[2] 这多少有些象征意义，但大门毕竟就这样打开了。此后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两国各有14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

1984年12月阿尔希波夫访华后，由于双方签署了三个重要协议，中国国务院所属的几十个部委和一些省市分别同苏联的相应机构建立了联系，双方开始通过这些渠道进行科技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两国的各类机构如工、青、妇和其他民间团体也按照协议展开交流，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1985年7月，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苏联，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1986~1990年换货和支付协定，以及在中国建设、改建工业和其他一些项目的合作协定。1986年3月，阿尔希波夫再次访华，进一步推动和落实两国在经济、贸易和科技等方面的合作。

---

① 参阅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311~312页；王俊逸（Péter Vàmos）《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中国与东中欧关系》，沈志华、李滨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第482~506页。

② 《参考资料》1983年9月6日（上），第6页。

两国经贸关系有明显的恢复和增长。据统计，1982 年两国的贸易额为 6 亿瑞士法郎。从 1983 年起，中苏的经济贸易关系明显开始加强，贸易关系回升也比较快，到 1985 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 46 亿瑞士法郎。[①] 1986 年 3 月，阿尔希波夫第二次访华，参加中苏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双方在这次会议中签署了《中苏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另外阿尔希波夫在访问期间还同中方签订了《中苏两国关于互相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条件的议定书》。这些协定的签署促进了中苏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苏经贸关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东北地区同苏联东部边疆地区之间的地方贸易的恢复与发展。1982 年 10 月，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开始时，双方就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就边境贸易问题举行过会谈。从 1983 年开始，中苏边境地区的贸易开始迅速地发展。4 月 10 日，中国边疆省份如内蒙古自治区就与苏联的毗邻地区签订了两个有关恢复两国边境地区贸易的协定。当年中苏在中亚毗邻地区开放了两个边境口岸，以利于边境贸易和人员往来。根据中方的统计，1988 年中苏边境贸易的总额达到 8 亿瑞士法郎，约占两国贸易总额的 1/8。

随着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改善，以及东北边疆地区落实改革开放政策必然导致的打开中苏边境贸易的强烈要求，促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支持发展中苏边境贸易。胡耀邦在 1984 年 8 月到黑河考察时说，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往来不必等待两国政治谈判的结果，黑河要同深圳在对外开放方面"比翼齐飞"。[②] 在苏联也有相同的情况发生。苏联远东地区的地方领导人积极主张发展同中国的边境贸易，认为这有利于解决苏联远东地区的物资紧缺问题。[③] 中苏边境地区的经

---

① 数字引自周晓沛《我看中苏关系近四十年变迁》，《百年潮》2007 年第 12 期，第 16 页

② 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第 272 ~273 页。

③ 参见魏丽莎（Elizabeth Wishnick）《1980 年代早期苏联对中国政策延续和变化的压力》，沈志华、李滨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第 507 ~524 页。

贸发展对两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中苏政治关系总体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总体上看，1983年以后中苏两国的政治关系在缓慢改善，例如两国的高层互访达到了副总理层级，形成了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正式会晤的机制，等等。但在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的交流及人员往来等，都获得了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双方关系的发展势头强劲，政治与战略安全领域的僵局不仅没能阻碍经贸领域合作的发展，倒是经贸领域持续加强的合作凸显了政治关系的滞后和这种滞后的不合理性，并在实际上为解决两国间的政治难题创造了条件。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随着中苏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的改善和发展，“中苏关系正常化”越来越像一个人为制造的假命题，越来越凸显了它是为解决中苏关系中一些战略问题而设定的话语。总之，客观地看中苏双边关系的发展状况，“正常化”作为政治问题是很有可能被逐步边缘化的。

第四章

走向“正常化”的转折

· 打破政治僵局 / *678*
· 莫斯科改变政策 / *688*
· 清除最后的障碍 / *695*

1985 年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关键性的一年，其标志是当年秋季，中国领导人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决定。首先，中国领导人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这凸显了中国领导人贯彻“安定南疆”战略的决心，以及他们对苏联威胁的认知实际上趋向缓和。其次是邓小平提出，将实现中苏两国领导人高层互访作为正常化的标志。这些变化表明，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中苏关系正常化政策的重点已经转向追求区域性地缘安全的政治目标，具体地说就是明确地利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为根本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创造条件。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内外政策逐步出现巨大变化。1986 年 7 月 28 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在涉及对外政策部分中的不少内容与中苏关系有关，这些内容回应了中国方面关切的几乎所有

基本问题。其中反映苏联领导人思考中苏关系的深度和高度最为关键的一句是："首先我们是邻国，我们之间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因此就决定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表达了对中苏关系带有根本性的认识。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最基本的动力，也是中苏关系的历史命运。

中苏高层在中苏关系问题上认知的逐步接近，最终导致双方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达成协议，从而清除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最后的障碍。

第一节　打破政治僵局

1985 年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关键性的一年，其标志是当年秋季中国领导人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决定。从目前中国公布的一些间接的历史文献中可大致看出，邓小平本人是在 1985 年春开始考虑有关问题的。是年 4 月 18 日，邓小平在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提出，在消除三大障碍的问题上，苏联可以先做说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条。他说："苏联人比较容易做而无任何损失的是，让越南人从柬埔寨撤出去。"[①] 从目前可以看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历史文献中可知，这是他首次亲自表达，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如前所述，中方在副外长级政治磋商的首轮会谈中即提出这个建议，不过后来中方在两国不同层级的交往中，对这个问题曾有一些不同表述。这表明最初提出该建议还不能算是最后的决定，或者说还没有最后确定何为战略优先考虑的选项。包括邓小平本人在谈到三大障碍时，也曾经将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地区大规模驻军放在首

①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 1041 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9 页在登载该谈话内容时，删去了这一部分。

位，而且在谈到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可以分几步走时，并没有提出确定不移的顺序。[1] 此次邓小平本人亲自提出这一问题，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在发生变化。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他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能有重大的改善，并且认为，只要双方都愿意，这是完全可能的”。[2] 中方很快就做出回应，派遣副总理李鹏前往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中国领导人在代表团行前已经决定，李鹏可以争取在适当场合会见戈尔巴乔夫。根据李鹏日记记载，3月12日晚，他在从机场到下榻旅店的途中，向前来迎接的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罗高寿表明，如能见到苏联领导人，他将有信息转达。值得一提的是，李鹏到莫斯科后，拒绝了当时也到莫斯科的美国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舒尔茨的会谈约请。

3月14日下午，李鹏会见了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会谈中说，中苏关系改善不能只局限在经济，要谈政治，提高对话的级别。李鹏则表示中苏不可能成为盟友，但可以成为好邻居、好朋友。中方参加会谈的人回忆说，戈尔巴乔夫还表示希望中苏关系能获得“重大改善”。不过双方此次会谈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共识。[3] 客观地看，如果与其前任相比，戈尔巴乔夫此次谈话的内容并无特别之处，不过亲自接见李鹏这一行动本身可以表明，他将继续遵循安德罗波夫时期的比较积极的对华政策。

根据时间顺序看，前述邓小平4月与希思的谈话可以看作对戈尔巴乔夫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一个回应。不过，邓小平在发表这番谈话的前一天，还在同到访的比利时首相弗里德·马尔滕斯谈到苏联

---

① 冷溶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52页。

② 《参考资料》1985年3月12日（下），第15页。

③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第10页；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309页。

对欧洲的威胁。邓小平在与希思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消除三大障碍可以有先后，但都要消除，因为那样做"就是要解除对我们的威胁"。[①]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苏联还没有根本改变扩张性的对外政策。这些情况表明，在这个阶段，在推动中国领导人调整对苏政策方面，苏联政局变化和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所起的作用显然是间接的，而且也是有限的。

中国领导人终于迈出新的一步是在当年秋天。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后者给苏联新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带口信，进一步提出，在三大障碍中苏联只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具有可信性的谅解，他本人或胡耀邦总书记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他说他甚至可以破例，到莫斯科去与戈尔巴乔夫会见。[②]邓小平的这个口信还显示了中国有关政策的两个重要变化，即将正常化进程与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直接挂钩；以及以中国最高领导人访苏作为对苏联协助解决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的回报，以增加促使苏联做出决定的压力，也可以说是增加对戈尔巴乔夫改变政策的诱惑力。在时隔三十年后实现中苏首脑峰会，对任何有欲望成为伟人的政治家来说都是值得向往的，对戈尔巴乔夫这样个性的人恐怕尤其如此。指出这一点能更加清楚地展示中国领导人在加速推动正常化进程，即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美后曾经说，他的出访任务已经完成，今后没有出国的必要了。这一次为了推动苏联做出更积极的回应，他主动提出"可以破例"，到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

中方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一方面凸显了中国领导人贯彻"安定南疆"战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从逻辑上分析也表明，他们这时已经基本确定，苏联在

①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39、1041页

②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85～1086页。

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中国直接面临的安全威胁，至少他们不认为苏联有入侵中国的意图，所以不再视苏联威胁为中国的首要安全关切。这种看法何时开始成形值得分析。

在贾丕才1983年9月访华期间，国际舆论便分析指出，贾丕才曾经向中方提出双方可谈判解决双方军队从边境地区各自后撤的问题。这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安德罗波夫在贾丕才访华前发表的有关谈话即提出，可以同中方谈判"共同制订和实施在苏中边界地区的信任措施"。[①] 当时一些分析家也注意到，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在谈话中表示："苏联在蒙古暂时驻军"并不是通向改善中苏关系之路上的障碍。[②] 这被认为是苏联政策的一种反映，即蒙古并不反对苏联从中蒙边境地区撤军。

安德罗波夫提出这个建议很可能是为了改善中苏关系，选择性地回应中方的部分关切，因为双方军队在边境地区脱离接触这类信任措施，最初是中方在1969年9月两国总理机场会晤中提出的。当时周恩来建议："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柯西金当场表示赞成，但后来柯西金在回函中，唯独未就此建议做出书面承诺，甚至连说明都没有。[③] 这一次是中方并不打算松动立场。《人民日报》在贾丕才离开北京的当天即发表评论，要求苏联撤出在亚洲部署的SS－20导弹。评论指出，中方所说的撤退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军事力量，"当然也包括导弹在内"，因为这些导弹"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构成了威胁"。[④] 中方这时提出苏联销毁在亚洲部署的导弹，显然是为了贯彻反苏国际统一战线，配合美方在欧洲中导谈判中的立场。至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到底是何种程度的威胁，

---

① 《参考资料》1983年8月27日（下），第4页。
② 《参考资料》1983年9月9日（下），第4～5页。
③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第275页
④ 《人民日报》1983年9月17日。

并不那么重要。

进一步说，邓小平将两国领导人高层互访作为正常化的标志，从以往的情况看，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为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开出的具体回报。这时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间不长，在国内和党内的政治地位并未稳固，中方提出这样的建议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肯定是值得向往的，因为如果能如此大幅改善中苏关系，有利于巩固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权力地位。总而言之，按照邓小平的这个口信，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即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越南是可以做到的，邓小平本人甚至以访问莫斯科作为条件，敦促苏联新领导人做出政治决断。这一明显而且巨大的变化表明，中国领导人是在有意地更加积极地利用中苏关系正常化，达到结束印度支那地区冲突的目的。

中国政策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需要深究。从消极的方面看，在中苏关系持续改善的情况下，中国方面的确已经有必要突出“正常化”的政治含义，以避免关系到中国战略利益的三大障碍问题被边缘化。当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表示愿意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也是一个因素。不过导致中国领导人决心进一步调整对苏政策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在中国的内部，主要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新发展，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对涉及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的思考等，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飞跃式的变化。这些思考自1978年以来从未中断，积累到1985年夏季出现了重大的转折。19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主题的思想。[①] 这是中国领导人在认识“时代”问题上的一次巨大变化，它彻底否定了中共中央在所谓“时代”问题上长期坚持的主要观点。与此相联系的是，继1983年军队精简机构之后，中国

---

①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决策层从1984年春夏开始，酝酿实施规模达百万人之众的大规模裁军。是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宣布裁军一百万的决定，并为此阐述了不可能爆发大战争的观点。[①]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百万裁军方案和精简后的军队改革和编制。这样内容和规模的会议，不可能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3月才开始筹备的。这次会议做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决定：（1）国防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考虑其轻重缓急，意即军费在国家预算中总的比重将进一步下调；（2）对解放军进行精简，即实行百万人规模的大幅裁军；（3）在对外政策方面，放弃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并确定不再像以往那样，以“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为基础，设计中国的对外政策。

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地概括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思考和结论，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这次会议的决定，对中国的对苏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月4日，邓小平在与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中说，经过几年仔细观察和思考，中国决策层已经完成了“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这句话可以被合理地延伸为，苏联的威胁也并不像以往被认为的那么严重。第二个转变是放弃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不在所谓“美中苏战略大三角”的思维框架中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②]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意义重大，它可以被看作中国退出冷战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其实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实行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纠结在为所谓两个目标服务的矛盾中，用当时人的话讲就是“既服务于消除现实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又有利

---

① 邓小平：《裁减军队，提高军队素质》，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军事文选》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第266～267页。

②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9页。

于为实现现代化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战略目标”。①

差不多从1985年夏开始，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已经放弃以反苏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对外政策的战略性目标，并希望在建立多元世界政治秩序的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时明确承认，毛泽东后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有缺陷”。②

另一个需要重视的因素是，在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大致形成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划，即争取经过七十年的努力，在21世纪中期使中国的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说中国“希望有七十年的和平”。③ 这种对未来的思考是促使邓小平本人下决心根本改变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关键性动力。以上所述可以说是中国领导人的认知的根本性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他们对中苏关系的思考，后来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迄今还无法得到足够的历史文献来更深入完整地分析和呈现这个过程。

除了上述中国内部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印度支那形势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中美关系这个时期的变化与发展产生了复杂的影响。1982年夏季中美签订“八一七”公报后，中美关系并没有立即稳定下来，双方在诸如第二个纺织贸易协议、湖广铁路债券案、胡娜政治庇护事件、美台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不断发生纠纷和冲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3年秋季。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中苏关系有所进展，很难说与同时发生的中美关系动荡没有关系。

但是，中美关系动荡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84年初到5月，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中国领导人利用中美高层互访

---

① 汪培柱：《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外交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236页

②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76页。

③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另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57、1059页

的时机，促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进一步明确的承诺，从而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扩展创造了更宽松的政治环境。美国总统里根5月访华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双方的军事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根据前述钱其琛回忆的逻辑，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会使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正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可以更加主动和自信地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

当然，中美关系对中国处理中苏关系的影响并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推理来概括的。一方面，中国领导人相信，中美关系逐步趋于稳定并开始向更为全面的领域快速发展，为中国处理中苏关系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他们相信已经有条件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中苏关系。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对中国领导人处理中苏关系形成了牵制，至少使他们认为，可以更加从容不迫地与苏联打交道。从实际情况看，中国领导人更为坚定地要从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获得战略利益，因为当时从苏联那里确实也得不到其他什么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东西，何况过于积极地快速改善中苏关系，还要冒损害中美关系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一再向美方解释，中苏关系不可能再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状况，中国不会再同苏联结盟，也不是在美苏之间搞平衡政策，而在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方面，还会继续同美国合作。顺便指出，牵制中苏关系使之不要发展太快，本来也是里根政府决定调整对华政策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方面积极改善对华关系同其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意图等，有直接的关联。

1985年夏，中国对外政策转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反映在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上。从目前公开的文献看，这一政策调整可能是以“安定南疆”为主要目的，即争取尽快结束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战争和恢复印度支那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这同中国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是协调一致的，中国不可能在全力以赴地追求现代化目标时，继续无限期地接受印度支那处于战争状态，并使自己一直卷入其中。

"安定南疆"的战略思考会直接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三大障碍问题的态度，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向戈尔巴乔夫转达的口信，凸显了中方要尽快彻底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迫切愿望。毕竟，中国同越南的边境军事冲突仍在持续，这不仅在干扰中国的发展战略，而且柬埔寨问题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中国长期被拖在其中，会损害自身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政策调整并不是一相情愿的，印度支那地区形势在1985年夏季的确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越南因为深陷侵略柬埔寨的战争，给国内经济和其他方面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越南领导人已经显露出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意向。当时国际舆论对越南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做了相当悲观的分析，甚至认为越南由于入侵柬埔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从黎笋去世后越共中央很快开始在党内检讨和批评黎笋在世时的经济政策这一情况看，越共内部已经存在严重的不满和矛盾。正是在柬埔寨陷入绝境与中苏关系缓和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促使越南领导人不得不开始考虑并公开表示希望缓和同中国的关系。

1985年3月25日，越南提出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点建议。这一方案看起来虽然尚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但在越军全部撤出柬埔寨这个关键问题上，文字表述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①] 当时有关国家对越南的这个声明普遍持否定的评价，认为越南的立场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声明发表在契尔年科逝世两周以后，越南这样做很难说不包括向莫斯科的新主人做姿态的目的，这也是分析这个声明的价值所在。6月下旬，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访问莫斯科，以便同苏联新领导人加强联系。在莫斯科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戈尔巴乔夫竟然在致辞中说，苏联和越南都希望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认为这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黎笋不论是否情愿，也在致辞中表示，要

① 《参考资料》1985年3月26日（上），第53页。

恢复中越的“传统友好关系和正常的睦邻关系”。[①] 6月28日，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苏越领导人在会谈中“涉及到了中苏关系问题”，他们相信“苏中以及越中关系的正常化将符合加强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宗旨”。[②] 在黎笋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苏越联合宣言》，其中专门有一部分谈到同中国的关系，即“双方认为，苏联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将符合加强亚洲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目的”。[③] 目前还无法看到具体的历史文献，因此也无法分析和判断苏联在越南领导人就中越关系做这种表态方面起了何种作用，不过可以推断，戈尔巴乔夫要求越南领导人在对华政策上与苏联保持步调一致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黎笋访苏期间出现苏越向改善对华关系的方向协调对华政策，这很可能是推动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转达口信的直接原因。

上述情况表明，邓小平10月9日的口信不能说是简单的谈判策略，更不是一时兴起。至少他本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包含着战略思考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已经将关注的焦点从解除所谓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转向集中力量解决印度支那地区的问题，通过改善中苏关系来实现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战略利益，包括彻底打消越南在该地区扩张的意图，并为根除印度支那地区的紧张局势创造有利的条件。可以设想，如果在改善中苏关系的同时，利用苏联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印度支那地区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将获得实质性的改善。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主要追求已经窄化到实实在在的地区战略利益。

中国之所以利用中苏关系正常化来推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也是因为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遇到相当复杂而且困难的局面。在如何安排

① 《参考资料》1985年6月29日（下），第18、20页。
② 《参考资料》1985年6月29日（下），第13页。
③ 《参考资料》1985年6月30日（下），第22页。

越军撤出后柬埔寨的政治前途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来自越南和苏联，也包括了东南亚国家反对红色高棉在越军撤出后再度控制柬埔寨的要求。中国这种直接挂钩的做法反映了对自己战略利益的评估，结果是在决定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诸多因素中，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中苏关系正常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取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度，而柬埔寨问题的确不是苏联能够完全控制的。对于中国来说，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可以接受的，即可以为中苏领导人峰会扫清道路等，仍然保留着可以操作的空间，也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相关问题的评估。例如，如何评估中苏政治关系取得大幅进展的紧迫程度；如何评估苏联在促使越南撤军问题上的能力；以及随着时空的变化，中方愿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做出的让步的程度；等等。后来中苏政治谈判之所以持续到 1989 年春夏之交，中苏一时难以在越南撤出柬埔寨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上达成谅解等，是主要原因，至少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节　莫斯科改变政策

齐奥塞斯库于 1985 年 10 月 22 日在保加利亚开会期间，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戈尔巴乔夫当时表示会认真考虑。[①]但从这个时期的中苏交往看，这一情况并没有立即反馈到中国。另一种可能是戈尔巴乔夫的表态被中方认为是不清楚的。11 月 4 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邓小平的谈话，其中包括分先后解决三大障碍的内容。[②] 很可能是因为中国方面这种公开和直截了当的反应，两

① 冷榕等主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 1086 页。该页注释提供了这一信息

② "An Interview with Deng Xiaoping," *Time*, November 4, 1985, p. 40.

天后中方即接到苏方通知说，收到邓小平的口信了。[①] 随后不久苏方又提出，双方可以立即在远东某地举行中苏峰会。苏方对邓小平口信的反应和实际上继续坚持不以解决三大障碍为先决条件的立场等均表明，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准备好为中苏关系正常化采取实质性的步骤。

1985 年 12 月下旬，李鹏访问欧洲途经莫斯科回国。李鹏在莫斯科停留期间，戈尔巴乔夫临时决定与其会见。李鹏事前并无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计划，故临时请示北京并获批准。根据李鹏的日记记载，戈尔巴乔夫首先表示，他收到了邓小平托齐奥塞斯库转达的口信并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然后他阐述了苏联的对华政策。李鹏将他的谈话概括为两点：一是苏联继续争取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二是苏联希望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站在一条战线上"，意即结成某种国际统一战线。李鹏在答复中陈述了中方的立场，包括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可能与苏联搞统一战线，中国需要与西方国家友好相处，以及当前中苏关系中最关键的障碍是能否解决柬埔寨问题，"只要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之间一切都好谈"。[②] 显然，双方这次仍然未能就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共识。

导致戈尔巴乔夫无法为改善中苏关系做出重大决定的原因同他在苏联国内面临的巨大困难有关，他与李鹏的会谈内容大致反映了他当时所面临的局势的特点。根据中方参加会见的人士回忆，戈尔巴乔夫在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主要谈了改善中苏关系与苏联国内改革两个问题，而且他"用了很长时间谈苏联当时的形势和改革"，尤其是改革面临的国内阻力。[③] 根据其谈话可以做这样的推断，戈尔巴乔夫试图利用这次会谈向中方清楚地表明，他对改善中苏关系是真心诚意的，并且不排除他也很向往亲自实现两国峰会，不过实际上他的主要

---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23 页。

②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第 15 ~ 16 页。

③ 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世界知识》1996 年第 6 期，第 308 ~ 309 页。

精力是在思考和处理国内问题，从逻辑上看也就是苏联国内还不具备改变对华政策的必要条件。

1986 年 2 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谈到改善中苏关系时，除了继续表达将追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外，并没有在中方关切的实质性问题上做出改变。苏共二十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该次大会的情况。在涉及中苏关系方面，与会的李鹏认为苏联“只走了一小步”，还没有下决心按照中国的条件解决印度支那问题。[①] 根据钱其琛的回忆，中苏政治谈判直到这时也未能在三大障碍上取得所谓实质性进展。不过苏共二十七大为苏联调整对华政策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即戈尔巴乔夫巩固了其权力地位，他试图推行的改革也获得了必要的支持。这一关键性的变化对后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演变是至关重要的。

苏共二十七大后不久，印度支那局势一度迅速变化，最突出的标志是越南提出了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的时间表。1986 年 3 月 4 日，波兰《晚快报》刊载了越南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阮颐年对记者的谈话。他说：“越南军队将在 1990 年前撤出柬埔寨，即使那时波尔布特集团的残余分子还在”，“这甚至还可以发生得更早一些”。[②] 这是自从越军入侵柬埔寨以来，越南方面第一次非正式地公开表示，要在 1990 年前撤出柬埔寨，并且不以彻底清除红色高棉作为从柬埔寨撤军的绝对条件。3 月 10 日，越南外交部发表《关于中国反越的敌对政策备忘录》，指责中国无视越南已经提出“将于 1990 年全部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能有一个政治解决办法的话还可以早些撤军”这一事实。[③] 越南方面以这种方式，正式宣布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撤军时间表。柬埔寨韩桑林政权的外交部副部长贡昆本也很快表示，最多用两年时间，找到

---

①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第 16 页。

② 《参考资料》1986 年 3 月 5 日，第 42 ~ 43 页。

③ 《参考资料》1985 年 3 月 15 日，第 11 页。

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1] 越南政策的变化同苏共二十七大之间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种关联，是值得深入分析的，这有助于全面评价戈尔巴乔夫的对华政策，甚至他的全部对外政策。

越南政策的变化引起各方的重视和积极评价。民柬联合政府的三方代表不久即在北京召开内阁会议，经讨论后一致同意，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提出，越南可以同民柬联合政府直接谈判撤军问题，越军可以分两阶段撤军，在越军第一阶段撤军完成后，即可同越南扶持的金边政权谈判；越军全部撤出后将组成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意即在有关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不排除将越南扶持的金边政权包括在联合政府中。[2] 民柬联合政府三方在北京做出这样重大突破性的决定，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3 月 18 日，胡耀邦在民柬联合政府提出八点建议的当天，就会见了民柬三方领导人。他在会见中表示，民柬的建议“不仅代表了整个柬埔寨民族的利益，而且是一个为消除东南亚的战争热点、求得东南亚局势的和平与稳定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它也充分照顾到了越南人民的利益，是一个非常宽厚的建议”。[3] 胡耀邦会见民柬三方领导人并发表上述谈话，无疑是代表中国政府，公开表态支持民柬联合政府的八点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12 月 29 日的《参考资料》刊登了记者马胜荣的年终专稿，分析了民柬八点建议出台的背景，指出红色高棉一方面是考虑军事上不能很快取得优势；另一方面则是担心西哈努克和宋双两派同东盟联合，使红色高棉被排除在政治解决进程之外，所以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让步，这才有了八点建议出台。[4] 这篇专稿多少透露了中

---

① 《参考资料》1985 年 3 月 15 日，第 12 页

② 参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 50 年》（上），第 203 页。

③ 《人民日报》1986 年 3 月 19 日。

④ 《参考资料》1986 年 12 月 29 日，第 72～73 页。

国方面对柬埔寨局势的看法。当然，对于中国在其中的作用，还要依靠历史档案进一步开放才能进行深入的分析。

胡耀邦在此次会谈中的谈话也涉及中越关系，他说中国对越南没有“坏心眼”，“只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就可以恢复中越传统友谊”。[1] 这部分谈话可以解读为中国政府愿意按照八点建议的原则，参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包括同越南方面接触，以及在未来改善同越南的关系。4 月 22 日，中国政府利用中国同老挝建交 25 周年的机会，开始主动寻求改善同老挝政府的关系。此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和改善，到 1988 年 6 月，中老恢复互派大使，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可以说从 1986 年春开始，印度支那局势开始向缓和的方向逐步移动。

上述变化构成了苏联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和重要的背景。7 月 28 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其涉及对外政策的不少内容与中苏关系有关。戈尔巴乔夫宣布：关于从蒙古撤军问题，苏联“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联军队撤出蒙古的问题”；关于中苏关系，苏联在各个领域发展同中国的合作，理解与尊重中国的国内政策，也愿意谈判解决黑龙江地区的边界遗留问题，“而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关于撤退中苏边境苏联军事力量问题，“苏联认为彻底削减亚洲的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并使之达到合理的限度具有重大意义”，“苏联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讨论旨在相应地降低陆军水平的具体步骤”；关于柬埔寨问题，苏联承认高棉人民遭受极大的牺牲，但同东南亚问题一样，“这里的许多事情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关于从阿富汗撤军，苏联“愿意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使驻在这个国家的苏联军队回国”。[2]

以上内容被戈尔巴乔夫分别置于苏联亚太政策的各个部分，它们

---

① 《人民日报》1986 年 3 月 19 日

② 《参考资料》1986 年 7 月 30 日，第 30 ~ 38 页

回应了中国方面关切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其中反映苏联领导人思考中苏关系的深度和高度的最为关键的一句话是：“首先我们是邻国，我们之间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因此就决定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表达了对中苏关系带有根本性的认识。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最基本的动力，也是中苏关系的历史命运。本篇开始阐述的历史结构的全部原因，即在于中国人民与当时属苏联的人民，命中注定了要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他们除了找到和平相处的办法，没有别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不同的利益考虑不论在哪个层次上，其实都是阶段性的，从历史的长河看甚至是短暂的。

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发表后不久，苏联开始履行从蒙古和阿富汗逐步撤军的承诺，唯独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苏联的政策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明显透露出不愿意再支持越南打这场毫无前途的战争，苏联不仅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而且也付出了政治上的代价。不过苏联并不准备按照中方的要求向越南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将柬埔寨问题作为一种地区冲突加以专门论述，也是在这个基调上说，应由中越之间加以解决。这是苏联在权衡各种利弊后的选择。一方面苏联还不想而且实际上很可能也很难做到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因为苏联未必能完全支配越南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因为了解中方对柬埔寨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希望因无所表示而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在当年4月的中苏第八轮副外长级政治磋商期间，苏方就提出，可以将柬埔寨问题作为一种地区冲突，与中方讨论解决办法。[1] 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循着相同的逻辑，将解决柬埔寨问题作为地区冲突，推给印支地区的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和越南去解决。

中国领导人这时显然认为，戈尔巴乔夫已经表现出有诚意改善中

---

[1] 参见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第293页。

苏关系；同时，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模糊了双方矛盾的焦点，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已经改变了的地缘战略关切。简单地说，在中国的地缘战略关切中，首要的问题已经不是所谓的“苏联大军压境”，而是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彻底消除印支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有利于中国实现其在印支地区的战略利益。恰逢此时，越共总书记黎笋逝世，这当然会加强中方的立场。8 月 13 日，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奉命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告诉后者中方并不满意戈尔巴乔夫忽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而这正是邓小平通过齐奥塞斯库转话的核心。[①] 9 月 2 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表示，如果苏联在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就可以会见戈尔巴乔夫。[②] 几乎与此同时，民柬联合政府再次在北京举行内阁会议，三方领导人并正式访问中国。这次会议发表的宣言称：民柬方面将坚持八点建议，直到越南接受以民柬的建议为基础进行政治谈判。中国政府立即表示支持民柬的立场。[③]

可以说到 1986 年夏季，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双方在除了柬埔寨问题之外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在取得共识。特别是苏联方面，在中方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上，已经开始着手清除其中的两个。苏联采取这种行动固然并不都是因为改善中苏关系的需要，它毕竟是一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都有比中国更为复杂的战略利益和战略考虑。但是，苏联的言行无疑有利于增加双方的战略互信，有利于消除中国领导人对所谓“苏联威胁”的疑虑。中国领导人的信心增强势必推动其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来改善中苏关系，甚至有可能更愿意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中苏双方建立起战略互信是这个时期

① 《人民日报》1986 年 8 月 14 日；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25 页。
②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67～168 页。
③ 参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 50 年》（上），第 203 页。

中苏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实质性内容，也是此后中苏关系能够迅速改善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基础。以越南侵略柬埔寨为例，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判断是，越南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张是苏联包围和威胁中国的一个战略步骤。如果能够确定苏联并无此意图，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将是一个单纯的地区问题，合乎逻辑的推断是中国的处理方式有可能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第三节　清除最后的障碍

1987年间，中苏关系的最主要进展是双方于2月开始，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轮边界谈判。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谈话发表后，中方即决定同意恢复边界谈判。1986年8月13日，吴学谦在会见费多托夫时提议，双方应着手恢复中断了九年的边界谈判。中苏两国外长9月在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达成协议，1987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边界谈判。谈判如期举行，中方团长是副外长钱其琛，苏方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苏联方面也表示对边界谈判持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当时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的贾丕才在苏联中央电视台上发表谈话，说中苏在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上存在分歧，现在若能解决边界问题将是“非常重要的”。[①] 谈判开始后，气氛友善务实，双方都没有纠缠历史上的恩恩怨怨。通过这次谈判，双方达成重要共识：从东段开始解决问题；根据条约和国际法准则具体讨论边界走向；1964年边界谈判中工作小组达成的协议继续有效。此后边界谈判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协议，并就西段边界划界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②]

---

① 参见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5)，第312页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5～27页；参见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328页。

在柬埔寨问题上，苏联的政策在5月间显示出变化的迹象。首先是5月13日，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中苏第十轮政治磋商结束后发表谈话。他在重复戈尔巴乔夫关于将柬埔寨问题当作地区问题（而非双边问题）同中国一起讨论的同时，表示苏联“准备尽可能地协助解决柬埔寨局势问题”。他也说明苏联的条件是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不能有红色高棉，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意愿。[①] 在此前一天，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刚刚访问北京的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后者曾被中国领导人要求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5月23日，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回答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记者提问时，集中阐述了他的外交新思维。在这个大题目下，他首次将柬埔寨问题放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范围内加以论述，认为双方都应关心解决该问题，而且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②]

苏联领导人的这些表态同中方存在明显的互动。5月上旬，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访华。中国总理赵紫阳在7日会见他时，请他向戈尔巴乔夫转达口信：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越南撤军，越军撤出后柬埔寨的内政由柬埔寨人自己解决，中国不支持任何一派单独掌权，而是希望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联合政府。[③] 中国领导人在这里明确表态不支持红色高棉在越军撤出后控制柬埔寨，这是对苏联和国际社会的关切的积极回应。邓小平在会见日夫科夫时说，两党过去的恩怨“一风吹，一切向前看”。[④] 5月11日，邓小平委托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向越南方面转达中方的建议，包括：（1）柬埔寨的内政和某个人犯的错误都不能成为侵柬的理由，越南必须首先从柬埔寨撤军，结束那里的战争；（2）越军撤出后，柬埔寨问题由柬

---

① 《参考资料》1987年5月14日，第16~17页。

② 《参考资料》1987年5月24日，第79页。

③ 转引自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第205页。

④ 《人民日报》1987年8月8日。

四方协商解决；（3）中国支持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不希望红色高棉掌权；（4）只有解决了柬埔寨问题，中越关系才能正常化。[1] 至此，中方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可能做出的妥协已经相当明确。上述戈尔巴乔夫5月23日的谈话实际上就是对中方的回应除了与中方互动外，苏联政策的变化也有更深刻的背景，它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带动的结果。苏共二十七大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地位日益巩固，他同时提出了以“新思维”命名的系统和明确的改革思想，其中包括对世界政治的新认识和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考。在“新思维”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开始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同时也开始对外交部进行人事调整，这个调整在1986年基本完成。作为苏联对外政策调整的反映，1987年，美苏关系即出现缓和与持续的改善，包括美苏领导人互访在内的接连不断的峰会、美苏就中程导弹问题达成协议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中导条约、美苏等国达成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美苏在讨论地区冲突时也在讨论解决柬埔寨问题等。

与此同时，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必然引起并加剧苏越关系中已有的矛盾，苏联媒体开始公开表达对越南的不满。8月上旬，《真理报》、《消息报》都刊登了文章，批评越南没有有效利用苏联援助和苏越贸易状况不佳等。[2] 苏联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已经具有改变对柬埔寨问题政策的足够动力。

不过，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已经表明了苏联亚太政策的优先次序，即解决苏军撤出阿富汗要先于解决柬埔寨问题。从苏联方面看理由也很简单，阿富汗问题对苏联的影响大大高于柬埔寨问题，也是苏联可以单独做出决定的问题。所以，苏联在柬埔寨问题上虽然不断表

---

① 《人民日报》1987年5月12日；参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第206～207页。

② 《人民日报》1987年8月8日。

明态度，但真正采取实际行动则要迟缓得多。越南方面当时继续坚持将撤军同不允许红色高棉参加越军撤出后的柬埔寨政府这一条件挂钩。苏联在此问题上显然还无法或者还不愿意劝说越南做出让步。[1] 11 月 16 日，邓小平在会见土井多贺子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再次表示只要苏联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采取行动，他愿前往苏联任何地方会见戈尔巴乔夫。27 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同中国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赞比亚领导人卡翁达时说，他注意到邓小平同土井多贺子的谈话，他本人期待在北京、莫斯科或任何地方同邓小平会见，但中方不应预设“先决条件”。[2] 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回应中方举行中苏峰会的建议。

直到 1988 年 4 月，苏、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达成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之后，苏联才开始采取实际行动。美国这时也表现出同中国积极配合的姿态，向苏联施加压力。5 月 24 日，里根在前往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前发表谈话，要求越南提出“迅速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而苏联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方面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美国近年来一直在同苏联讨论此问题，这次还会继续予以讨论。[3]

5 月 23 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越南外长阮基石时表示：“苏联准备同有关各方一起为解决围绕柬埔寨形成的局势做出贡献。”[4] 两天后，越南方面宣布，于 6 月开始从柬埔寨撤出 5 万军队，剩下的军队将由金边政权指挥，并于 1990 年底前全部撤出。罗高寿第二天即发表讲话，将越南部分撤军的决定同即将举行的中苏第十二

---

① 见戈尔巴乔夫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文灵 1987 年 5 月 18 日谈话和阮文灵在克里姆林宫招待宴会上的讲话，《参考资料》1987 年 5 月 19 日，第 556 页；5 月 20 日，第 23 页。另见 1987 年 5 月 21 日《苏越联合声明》，《参考资料》1987 年 5 月 22 日，第 45 页。

② 《参考资料》1987 年 11 月 28 日。

③ 《人民日报》1988 年 5 月 26 日。

④ 《参考资料》1988 年 5 月 24 日，第 51 页。

轮政治磋商联系起来，说柬埔寨问题“将在议程上处于明显的地位”。[1] 5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越南部分撤军是“重大的建设性的贡献”，苏联准备同所有相关国家一起，寻求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建设性办法。[2]

苏联方面当时公开表示，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为解决柬埔寨问题提供了榜样，外国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正是因为苏联做出如此明确的表态，中方认为根本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在6月上旬的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见了中国外长钱其琛，主动提出希望双方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柬埔寨问题。[3] 6月13~20日，第十二轮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结束时宣布，不再有新一轮政治磋商。经过十二轮谈判，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已经解决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的大部分问题，这一机制的确已无存在必要。特别重要的是，双方同意由专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副部长级磋商代替它，以利于清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后障碍。这一决定极有象征意义，它表明中苏之间只剩下这一个问题了，并且建立了有效的解决机制。

在这次联大会议期间，中方也感受到有关各方不仅坚持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也坚决反对红色高棉在越军撤出后控制柬埔寨政权。7月1日，中国外交部就柬埔寨局势发表四点声明：“越南尽早从柬埔寨全部撤军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随着越南撤军，中方“赞成在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下建立柬埔寨四方参加的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成立后，柬各派的军队应当冻结，不参与政治，不干预大选，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和武力威胁的情况下，进行自由选举”；“对越南撤军、维持柬埔寨和平和进行自由选举都要有切实

① 《参考资料》1988年5月27日，第5页。
② 《参考资料》1988年5月30日，第31页。
③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7页。

有效的国际监督”，中国“愿意同其它国家一道对柬埔寨的独立、中立和不结盟地位作出国际保证”。[1] 第二天，7月2日，李鹏在担任总理后首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专门谈到中苏关系与柬埔寨问题，他重申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贯原则和一天前外交部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立场。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苏外长能否会晤，取决于副外长级商谈的结果。[2] 至此中方非常清楚地表明，不会不支持红色高棉在越南撤军后控制柬埔寨政府，也不会支持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参加柬埔寨联合政府。

8月27～31日，中苏举行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第一轮副外长级会谈。从事后双方披露的情况看，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中方表达出来的满意度低于苏方。9月1日，钱其琛会见罗高寿时说，双方“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有分歧”。[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做了同样的表示。中方的这种表态也是在继续施加压力，谈判取得的实际进展可能比公开宣示的要大些。2日，罗高寿发表谈话时说，苏方希望越南“明年撤出其全部军队，这样做肯定会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4] 从罗高寿的谈话中可以大致推断，在越南撤军问题上，中苏的分歧包括越南全部撤军的时间表，即中方希望越南撤军早于1990年。

根据李鹏日记记载，7月间越南方面已经向中方表示，越南撤军时间可早于1989年底开始。[5] 苏方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意愿采取更积极的行动。罗高寿第二天向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通报了中苏会谈的情况，向越方转达了中方在越南撤军时间上的立场以及苏联的态度。[6]

---

① 《人民日报》1988年7月2日。
② 《人民日报》1988年7月4日。
③ 《人民日报》1988年9月2日。
④ 《参考资料》1988年9月3日，第6页；4日，第5页。
⑤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第27页。
⑥ 《参考资料》1988年9月4日，第3页

当然，越南方面当时还没有接受苏联的建议的可能性比较大。

中苏副外长级商谈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将柬埔寨问题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解决。[1] 这一进展是有意义的，因为越南方面一直坚持将撤军同阻止红色高棉参加联合政府挂钩，并且苏联坚持越军撤出后只建立一个西哈努克领导的临时机构而非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金边政权还能作为政府存在，同时保持排除红色高棉进入未来政府的机会。罗高寿的谈话表明，尽管中苏双方不大可能会就上述问题立刻达成一致，但将越南撤军与柬埔寨未来的内部问题分开解决，显然是有利于进一步寻找突破点的。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当时在此问题上已经或可能会轻易做出让步。例如在9月24日，越南国务委员会主席武志公访苏后发表的苏越联合公报称，越南撤军同消除红色高棉控制柬埔寨政权的威胁是“相互联系的关键问题”。[2]

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谈话。他在中苏关系部分表达了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苏联“愿意立即着手准备苏中最高级会晤”，前不久的中苏副外长级商谈扩大了双方对柬埔寨问题的相互了解；其二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希望中越之间直接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这“是对改善亚洲局势发挥重要的作用”。[3] 这一谈话表明，苏联一方面希望加快实现中苏峰会的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推动中越直接谈判来打破僵局。此前苏联曾经一再表示，希望中越关系正常化。此次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中越直接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是苏联政策的一项重要发展，它表明苏联的确在为摆脱柬埔寨问题上的困境寻找切实可行的办法。这也是中方对戈尔巴乔夫谈话给予

① 《参考资料》1988年9月3日，第6页；4日，第5页。
② 《参考资料》1988年9月25日，第28页。
③ 《参考资料》1988年9月17日，第21~22页。

肯定性评价的原因之一。[1] 戈尔巴乔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谈话发表不久，中方即同意接受邀请，派外长钱其琛访问莫斯科。苏外交部于28日发布了两国外长将进行互访的消息，而且是钱其琛首先访问莫斯科。

10月9日，中共中央外事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越南撤军作为钱其琛访苏争取达成的目标，并决定如越南承诺1989年撤军，即可同意举行中苏首脑会晤。换句话说，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角度看，有关越南撤军后柬埔寨内部的政治问题，将不是中苏外长会谈的重点，甚至不是中苏首脑会谈的障碍了。11月8日，在中央外事小组会议上，已经确定中苏首脑会晤的具体形式。[2] 12月1～3日，钱其琛访问莫斯科。他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3]这些变化表明，中方对中苏首脑会晤的态度越来越积极，到中苏外长会谈前已经大体定局了。至于这期间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中国领导人如何判断形势，以至他们表现出愿意加快中苏首脑会晤的进程，可能涉及更广泛的问题，有待历史文献的进一步公开才能分析清楚。

1988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中苏外长会谈。其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见了钱其琛。这次两国外长会谈有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关于中苏首脑会谈的安排。戈尔巴乔夫在同钱其琛的会见中，主动表示希望到北京访问，钱其琛则当面转达了中方希望戈尔巴乔夫1989年访华的邀请。在外长会谈中，双方同意将峰会时间定在1989年上半年。其次是双方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达成一致。苏方按照戈尔巴乔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谈话的方针，再次建议中方直接同越南谈判，促使越南方面接受中苏达成的关于越南最迟于1989年底

---

① 《人民日报》1988年9月23日。
②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第27页。
③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9页。



1988年12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与

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举行会谈

撤军的方案，以及加快政治解决的进程。[1] 这表明苏联不希望继续因为柬埔寨问题而拖延中苏首脑会晤，不过它的确还需要顾及与越南的关系，而且实际上苏联也很难为越南做出最终的决定。此次外长会谈的结果是双方以《共同记录》的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包括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是1989年6月到12月底之间。[2]

中苏外长会谈结束不久，越南外交部于12月14日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转达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请中国驻越大使李世淳于15日上午10时前往越南外交部商谈两国关系问题。李世淳按照国内指示，于15日访问越南外交部。会见中，丁儒廉面交了越南外长阮基石给钱其琛的一封信，信中提出1989年3月前在北京举行两国外长会晤。中方经研究于23日答复越方，建议越方在近期内派一位副外长访问北京，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内部磋商。中越之间直接展开秘密谈判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1～32页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2页

从此提上日程。[1] 以上的分析表明，苏联极有可能是越南此次向中国提出直接谈判的幕后推手。中方的积极回应当然也同中苏外长会谈取得的进展和中苏建立的互信程度有关。

中越直接会谈无疑有助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同时也缓解了苏联在柬埔寨问题上面临的中方压力。1989 年 1 月 6 日，越南外交部宣布，越南至迟到是年 9 月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1 月中旬，丁儒廉秘密访问北京。其间越方明确承诺，根据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协议，越军将于 1989 年 9 月底全部撤出柬埔寨，中方则表示基本接受这一时间表。[2] 双方在政治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不过事实表明，这对中苏首脑会晤已经没有实质性影响。



1989 年 2 月 2 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中国

① 李家忠：《亲历上世纪 90 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始末》，《湘潮》2010 年第 4 期，第 36～37 页。

② 参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 50 年》（上），第 205 页。

2月2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北京。此次中苏外长会谈是为两国首脑会晤做进一步准备，包括就解决柬埔寨共同发表公开声明、确认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具体时间、未来双边关系的准则、就边界谈判和边界军事互信措施等交换意见等。实质性谈判仍然围绕柬埔寨问题，中方继续利用举行中苏峰会向苏方施加压力，争取苏联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做出更多的承诺。谈判开始比较顺利，但在最后时刻，苏联方面表示不同意就柬埔寨问题发表共同声明。中方经研究回复称，将不公开戈尔巴乔夫5月访华的日期，谈判似乎陷入僵局。2月4日，邓小平会见了谢瓦尔德纳泽，后者向邓小平面交戈尔巴乔夫的亲笔信。戈氏的亲笔信表达了苏方对促成峰会的渴望，信中说，中苏正处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关头”，双方可以为解决分歧找到办法等。同时他没有直接回应谢瓦尔德纳泽关于确定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的请求。[1]

直至2月6日，在经过一番曲折之后，中苏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发表了《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同时公布了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18日访华。从有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的内容看，中苏双方在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方面仍然存在分歧。后来的发展表明，即使中苏之间完全达成共识，也未必就能使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变得很顺利，这是由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

---

① 参见田曾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297页。

第五章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 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 / *706*

· 向中俄关系过渡 / *711*

1989 年 5 月 15～18 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党政最高领导赵紫阳、李鹏和杨尚昆等都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谈。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 5 月 16 日同邓小平举行会谈，邓小平在会谈开始即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了。1991 年，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苏联最终解体，中苏关系也从此走入历史。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

1989 年 5 月 15～18 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党政最高领导赵紫阳、李鹏和杨尚昆等都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谈，对中苏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这些活动标志着两国关系和两党

关系全面恢复正常。

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最具象征性的事件是5月16日同邓小平举行会谈。由于邓小平在中国决策层和在处理中苏关系过程中的最高决策者地位，中方已经确定，将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作为最高级会谈。邓小平本人对这次谈话的内容早已经过深思熟虑，在2月会见谢瓦尔德纳泽时，就向对方说明他对中苏关系的基本看法，即通过峰会"结束过去，开辟未来"。[①] 在会谈前他还专门就礼宾安排提出要求，要适度，"只握手，不拥抱"，即在所有细节上明白无误地表示，中苏正常化绝不意味着两国将回到1950年代。



1989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举行会谈

根据中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登载的部分内容，邓小平在会见中谈话的核心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认为中苏之间以往的意识形态争论并无多少实质意义，双方都有错误，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尊严和安全。他指出，中国在历史上遭遇过列

① 周晓沛：《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第52页

强的欺压和侵略，为害最烈的两个国家就是日本和沙皇俄国。日本由于侵华战争失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而沙俄还有后来一段时期的苏联，则从中国“得利最大”，并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特别是后来苏联曾经在中国边界陈兵百万，威胁了中国的安全。邓小平这段话阐述了他对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症结的认知，并据此提出，未来的中苏关系如果要友好发展，就只能建立在彼此互相尊重和互不威胁的基础上。他表示相信，中苏关系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双方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①] 由于邓小平亲历、参与和领导了中苏从结盟到破裂再到正常化的整个过程，他的这番谈话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对解读中国领导层的认知过程有重要的价值。根据戈尔巴乔夫对会谈的回忆，他在会谈中并没有提出与邓小平不同的看法，这实际上也就是认可一个事实，邓小平主导了这次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谈。[②]

5 月 18 日，中苏双方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共 18 项条款，其中第二款说明：“双方一致认为，中苏两国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第三款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这为后来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并在苏联解体后实现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等奠定了基础。《公报》的其他部分对中苏关系所涉及的各个主要领域均做出具体的规范，从排列顺序看，通过合作最终解决柬埔寨问题，仍然是双方议程中的突出问题。[③]

①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 年 5 月 16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91 ~295 页。

②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2, Москва: Новости, 1995, Глава 39. Москва и Пекин: закрывают прошлое, открывают будущее. 感谢沈志华提供的中译文

③ 《人民日报》1989 年 5 月 19 日

这种状况反映出大国关系中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性，有了战略互信也就有了处理有关事务的基础和前提，至于是否有立即可见的结果有时并不特别重要。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很快就体现出来。在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苏联没有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制裁。在后来苏联国内政局出现大动荡时，中国方面则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中国希望苏联政局稳定，并且不打算评论苏联的内部事务。双方基于历史经验和《中苏联合公报》的原则所采取的互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的立场，是有利于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的。在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两年里，两国全面恢复了政治、经济贸易、军事安全、文化和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交往也持续不断，中国领导人对苏联进行了重要的访问。



1990 年 4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参加苏联对外友协在莫斯科友谊宫举办的招待会

1990 年 4 月 23 ~ 26 日，中国总理李鹏正式访问苏联。从李鹏访问期间双方签署的六项文件可以看出，中苏关系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获

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六项文件是《中苏关于经济、科学技术长期合作发展纲要》、《中苏关于和平利用与研究宇宙空间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中苏关于在中国合作建设核电站和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的备忘录》、《中国向苏联提供日用消费品政府贷款的协定》、《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协定》和《中苏外交部磋商议定书》等。

1991年5月15～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应邀访问苏联。这是戈尔巴乔夫访华满两年后，中苏之间又一次峰会，也是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同苏联最高领导人会晤；此时苏联国内政局正剧烈动荡，中国国内政局也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这也使这此访问具有了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表明中国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视和对保持对苏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承诺。

江泽民在访问中，特别突出地强调了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他表示中国作为苏联的邻国，希望苏联政局稳定，否则对各方都不利。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重申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两国虽然存在不同观点和处理国内事务的不同做法等，这并不妨碍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访问结束时中苏发表了联合公报，重申了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这方面的差异不应妨碍各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和合作”。[①] 中苏第二个联合公报对稳定当时的中苏关系和随后不久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正常关系等均有重要的影响，公报中确定的规范不仅在特殊时期为维护中苏关系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双方后来在处理相关事务时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访问期间，两国代表团举行了大规模会谈，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外长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将中苏边界谈判达成

① 参见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308页

的一致意见用条约形式确定下来。回顾之前有关各章阐述的两国边界遗留问题对双边关系的复杂影响，就能从此一协定中判断出这次峰会的重大意义。它足以证明，正常稳定的中苏关系是可以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足够的动力和基础的，不论这些问题有多么复杂。

第二节　向中俄关系过渡

江泽民访苏3个月后，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此后不久，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加盟共和国率先宣布独立，其他加盟共和国随后纷纷效法，相继宣布独立。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外，其他原苏联11国成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四天后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最终解体。由于苏联不存在了，中苏关系也从此成为历史。

苏联解体对世界政治格局造成重大的冲击，在如此剧烈变化的时期，能否建立正常的中俄关系，并使中俄关系的发展适应变化的国际新环境，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布局、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在多元化的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等，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从俄罗斯方面看，这个脱胎于苏联的新国家具有复杂的多面性，一方面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强烈的亲西方倾向，叶利钦政府基于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的考虑，急于密切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系，对中国最初表现出戒备、不信任、不重视。另一方面，俄罗斯面临内部政治转型的极大困难和混乱，在外部则面临混乱的周边环境。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后，俄罗斯需要时间逐步调整和稳定与它们的关系。内忧外患的局面使俄罗斯客观上需要保持稳定的中俄关系。

中国在苏联解体后第三天，派出以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和外交部

副部长田曾佩等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建立联系。12 月 27 日，中国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三天后，中国同俄罗斯签署了两国会谈纪要，双方确认 1989 年以来两国领导人互访中所确定的各项原则应成为发展中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①]

不论基于何种原因，中国政府的确在积极地推动中俄关系发展，通过外交努力促使叶利钦新政府很快表示，愿意继承中苏关系的一切积极成果，保持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继续履行苏联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包括 1989 年和 1991 年两个《中苏联合公报》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并同意尽快批准中苏东段国界协定。1992 年 1 月 31 日，李鹏总理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这次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面中，双方就发展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叶利钦表示俄罗斯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保证尽快审批中俄已经签订的东部边界条约，并希望继续发展中俄经济关系。

1992 年 2 月，中国全国人大和俄罗斯议会分别批准了中俄东段边境条约。双方随后不久恢复了边境地区裁军和建立信任措施的会谈。5 月，俄罗斯副总理绍欣访华，双方就设立定期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工作达成了协议。6 月，中俄联合边境勘察委员会开始运作。当年，中俄国防部长也进行了互访。当年 3 月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访华期间，中方正式邀请叶利钦总统访华，俄方接受了邀请。

1992 年 12 月 18 ~ 19 日，叶利钦总统访华，中俄发表了《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双方确认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以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尊重对方人民选择各自发展道路的自由，以及在处理双边关系中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不参与针对对方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不与任何第三国

---

① 参见《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第 481 页。

签署任何有损对方主权和安全的条约和协议，等等。俄方明确保证，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1]《中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苏关系已经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中俄关系也从此开始了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4 年）并发展为战略伙伴关系（1996 年）的进程。

历史的进程证明，中俄关系同中苏关系相比不论有多少不同，没有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过渡就不可能如此平稳，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为迅速建立正常的中俄关系奠定了基础。

---

① 《人民日报》1992 年 12 月 19 日。

跋　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原因

沈志华

本书讨论的中苏关系史，实际上可以大体分为两个时期：1917～1949年的32年，是苏联与旧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关系，1949～1991年的42年，是苏联与新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关系。以后，苏联解体，所谓中苏关系作为一段历史便结束了。

作为同盟关系，尽管1945年斯大林与蒋介石签订了第一个同盟条约，但实际上有其名而无其实，中苏之间真正的同盟关系，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斯大林与毛泽东签订的第二个同盟条约建立起来的。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形式上的同盟依照条约规定存在了30年，而实际上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同盟，从盛极一时到土崩瓦解不过只有几年的时间。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同盟何以如此短命？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更直接影响和改变了整个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1950年代初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美国远东战略的走向，于是冷战从欧洲扩展到亚洲；1960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最终导致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及正常化，以至中国

实际上退出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为标志的冷战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中苏关系历史的讨论，是国际冷战史，尤其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中苏分裂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多年来一直是各国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关注的问题。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档案文献大量解密并开放，把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涉及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原因的讨论层出不穷，硕果累累。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分析了中苏关系变化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根源，尽管说法各有侧重，但问题是越来越清楚了。[①] 最近，美国连续出版了两部讨论中苏同盟破裂过程及其原因的著作，在英语世界颇引人注意。[②] 中国学者也发表了一篇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考察中苏分裂原因的论文，把这一讨论更推进了一步。[③]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把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大体归结为两个方面：或者是国家利益的冲突，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学术争论也主要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然而，笔者在对中苏分裂整个历史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之后发现，无论意识形态分歧，

---

① 在近年来有关中苏分裂原因的研究中，除笔者的系列文章外，比较重要的论著还有：O. A. Westad ed. , *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 – Soviet Alliance*，*1945 – 1963*；Mercy Kuo，*Contending with Contradictions*：*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no – Soviet Split*，*1953 – 1960*；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 – Soviet Alliance*，*1949 – 1963*；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Делюсин Л.* Подоплека недавнего конфликта//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1999，№7、8；*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杨奎松《走向破裂——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 ~ 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3、5 期；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牛大勇、沈志华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② Lorenz M. Luthi，*The Sino – 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Sergey Radchenko，*Two Suns in The Heavens*：*The Sino – Soviet Straggle for Supremacy*，1962 – 1967.

③ 王栋：《中苏关系研究的理论与历史》，《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 4 期。

还是国家利益冲突，都是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或开始走向分裂以后出现的，而不是导致中苏同盟瓦解的内在的和根本的原因。这一看法，是受了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和推断中苏关系发展前景时所犯的错误的启发。

2004年10月，笔者及本书的其他三位作者受邀到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对美国冷战时期情报分析报告进行评估的特殊的学术会议，并因此而提前看到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最新解密的一些非常珍贵的原始档案。这些被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称为“代表美国政府最具权威性的评估”的文件，是中央情报局自1948～1976年间对中国大陆各发展阶段局势、政策、前景的评估和预测。[1] 其中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中苏分裂前夕美国人对中苏关系状况和前途的判断，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判断几乎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以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为例。危机前，中情局在1958年5月的报告中估计，“只要中国认为可能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们就不会采取公然的军事侵略”；“只有估计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涉，他们才会做出以军事行动夺取这些岛屿的决定”。[2] 事实是，三个月后毛泽东就下达了炮击金门的命令。当时毛泽东确实考虑了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不过他巧妙地利用了中苏同盟作为威慑力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显然是中情局始料不及的。[3] 危机爆发后，中情局的判断是：“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中苏双方都认为世界的和平有赖于彼此在政策上

---

[1] 会后，情报委员会出版了这批档案部分影印件的汇编本及光盘：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 - 1976*, NIC 2004 - 05, October 2004。研究者也可以在网上查阅这些文件（http:\\bookstore.gpo.gov）。

[2] NIE13 - 58, *Tracking the Dragon*, p. 124.

[3] 参见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当然需要指出，毛泽东炮击金门的目的是想迫使蒋军主动撤离，而非直接夺取这个岛屿。

更为紧密的合作”，“他们可能已经就未来军事合作的性质和范围达成了新的协议”，总之，“我们相信，中苏在对台政策上所持立场基本一致”。[①] 事实上，中苏对台湾海峡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并且不断扩大。这一分歧成为后来中苏分裂的主要事由之一。[②] 危机结束后，到1959年7月，中情局又估计：“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将不会让台湾海峡的局势永久地保持平静”。虽然不会进攻主要岛屿，但“大概会继续对该地区保持零星的军事压力，如偶尔的海军或空军演习。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将采取一些手段在台湾海峡试探美国的意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袭击由国民党人控制的一个或更多的较小的岛屿”。[③] 可是，直到毛泽东去世，台湾海峡再也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军事冲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中国已经失去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后盾和依托，而这又是美国人当时没有估计到的。

再看核武器的问题。中情局在1958～1959年的估计是：“苏联不可能将核武器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然而，他们却有可能向中共提供一些可携带核武器且其射程足以到达台湾的地对地导弹。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导弹的核弹头可以安置在共产党中国的领土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几乎可以确信它们将处在苏联的监管之下。”即使不在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④] 而实际情况是，苏联被迫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核技术和核设施援助，而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把核按钮交给苏联人掌握。同样，莫斯科也不会为了中苏的共同利益冒险使用核武器。[⑤]

---

① SNIE 100-9-58, 26 August 1958, *Tracking the Dragon*, p. 16.

② 详见沈志华《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1期。

③ NIE 13-59, 28 July 1959, p. 4. 此文件 *Tracking the Dragon* 一书尚未收入，笔者存有复印件。

④ NIE 13-58, 13 May 1958, *Tracking the Dragon*, pp. 123, 137; NIE 13-59, 28 July 1959, p. 3.

⑤ 参见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沈志华：《援助与限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在中情局的预测中，始终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1958年夏季毛泽东因“共同舰队”问题发难及台海危机爆发前，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同盟”，并“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①] 尽管看到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之间引起了一些新的摩擦”，但1959年2月美国的情报分析估计，“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②] 到1959年7月底，毛泽东已经在庐山会议期间决定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而中情局的报告依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虽然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同盟本身”。[③] 甚至到1960年8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美国情报评估的结论竟然还认为，至少在五年之内，“中苏关系中的内聚力会比离心力更为强大”。尽管面对中苏分歧日益加重的明显事实，报告承认“无法对这些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将如何影响中苏关系做出评估”，但还是坚持认为中苏“任何一方都不想把矛盾推向会给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后果的程度”。[④]

美国情报分析官员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但做出这样结论的理由

---

① NIE 13-58, 13 May 1958, *Tracking the Dragon*, p. 124.

② NIE 13-2-59, 10 February 1959, p. 2. 此文件 *Tracking the Dragon* 一书尚未收入，笔者存有复印件。

③ NIE 13-59, 28 July 1959, p. 3.

④ NIE 100-3-60, 9 August 1960, *Tracking the Dragon*, pp. 218, 227.

是很充分的，推理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美国人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他们之间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在他们共同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①] 看起来，美国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国情报来源有限，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和依据缺乏必要的了解等。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析方法有误。中情局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依据中蕴含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熟西方外交决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准则和理念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说，与一般的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即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属于非理性的因素。显然，只有寻找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规律，才能对中苏关系发展

---

① NIE 100－3－60，9 August 1960，*Tracking the Dragon*，pp. 220－221，224－232.

趋向做出正确判断，并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中苏同盟破裂问题的讨论涉及方方面面，既有对具体事件的考察，如苏共二十大路线、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停止核援助、苏联对人民公社的反应、中印边界冲突等，也有从抽象角度的分析，如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家利益的冲突，乃至领导人个人性格的差异等。对于这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本书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这里重点是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以及这种关系的政治结构，以便发现影响中苏同盟关系，并使其处于不稳定状态乃至最终解体的内在因素。

面对中苏同盟瓦解的过程，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从本书的历史叙事看，中苏同盟破裂的大致过程如下：中苏关系恶化的起点是1958～1959年双方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为了证明各自方针政策的合理性，中苏之间先后采取间接和直接的方式展开了理论观点上的争辩；争论没有结果，双方各持己见，导致两党关系破裂；两党关系紧张直接造成国家关系紧张，随着双方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国家利益冲突便凸显出来，以至最后兵戎相见。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解答：一是中苏之间发生政策性分歧的基础何在，这种分歧是不是根本性的，是不是必然要发生的？二是这种分歧为何没有得到消除，为什么一定要导致分裂？

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释，从根本上讲，1950～1960年代中国和苏联还处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苏联已经进入战后国际体系，甚至参与构建了这个体系，而新中国则被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苏联党已经是成熟的执政党，而中国党才刚刚掌握政权，还没有摆脱革命党的思维和意识。由于这种时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往往出现差异，他们所制定的发展路线和方针从根本上

讲也是对立的。苏联要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这就是中苏分歧的根源所在。

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展开论述。

研究中苏同盟的命运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与此同时存在的西方盟国的内部关系，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前者呈现一种稳定性，后者则呈现一种非稳定性。中苏同盟的状况与前者完全不同，却是后者中的一个典型范例。

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之间的关系，并非和谐无阻，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乃至出现法国退出北约这样的重大事件。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破裂。用前引中情局的方法和逻辑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它们之间维系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它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表现则完全不同，那里明显地缺乏一种妥协机制。人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于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存在于中苏关系之中。在欧洲，苏南分裂后，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决定开除一些亲苏分子，便招致苏联大军向华沙挺进；匈牙利政府想要

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军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在亚洲，中朝、中越之间亦如此，今天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明天就会恶语相向，乃至血染沙场。总之，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不断的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与同盟相始终。

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同盟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实现妥协而保证同盟的继续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同盟在其成长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呢？这当然不能归咎于一时一地的政策失误：即使铁托没有因政治局委员茹约维奇向苏联驻南大使透露党内秘密而决定不再向苏联官员提供经济情报，斯大林也会找到其他理由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即使罗科索夫斯基没有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哥穆尔卡同样会指责苏联在其他方面侵犯了波兰的主权；即使赫鲁晓夫认可了人民公社的原则，毛泽东追求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进一步举措也会迫使莫斯科感到无法容忍；即使赫鲁晓夫听从众人的规劝而收回撤退在华专家的命令，也无法扭转中苏分裂的必然趋势。此外，恐怕也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遵行的是领袖外交，而其结果无疑会使某些个人性格凸显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铁托的桀骜不驯，斯大林的恃强凌弱，赫鲁晓夫的喜怒无常，以及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固然都对他们之间双边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就社会主义的同盟而言，国家之间关系的不稳定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其根本原因就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原则和理念有关，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进而分析这一关

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失衡的关节点。在笔者看来，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双重结构，一些欧洲和亚洲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以后，它们之间一方面作为共产党继续保持着各党之间的“兄弟”关系，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又要处理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而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奉行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准则。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这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工人阶级无祖国”是共产党人长期信奉的理念。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也不包含地域的外延，其适用范围在全世界，这就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前普遍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由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的完全不同的立场和理论阐述。

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的主张中。平时大家都认可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有意无

意地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性，而当分歧和冲突显露出来的时候，却各自有所主张。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况且，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南斯拉夫指责苏联侵犯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硬要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 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维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 1968 年苏联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于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综观共产党之间及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国家主权的平等，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内和党际关系中，强调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革命成功的先驱性，使得莫斯

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延续。当然，共产党情报局的地位和权力是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比的，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也比较顾及阵营其他各国的反应。不过，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首，则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仍旧是适用的，那么在这里，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也就无从谈起。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匈牙利在 1956 年 10 月危机中的地位：苏联为平息波兰危机刚刚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却理直气壮地派军队占领布达佩斯，解散了匈牙利合法政府。

中国人常常指责苏联侵犯了中国主权，而越南人又往往指责中国人侵犯了越南的主权；中共批评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批评中共是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

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等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势必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遇到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

这些结构性的弊病无法克服，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出现分歧就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矛盾和分歧，也无法争辩和认定其中的是非曲直，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分歧和矛盾，其结果当然就是兄弟分家。

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无疑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不过，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比较，中苏关系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苏联和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两个大国，一个领导着欧洲各国共产党，一个指挥着亚洲革命运动，如果它们像以前那样继续分工合作，相互协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景可能是光明的。但是，在1950年代中期，出现了隐患，即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

事件取得成功，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提出了他的不同主张。

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上升为同一意识形态领域内不同理解和阐释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本意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但问题是由谁来当家。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

2010 年 9 月修改于香港

参考文献

档案和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

长春市档案馆

福建省档案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

台北“国史馆”

吉林省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

上海市档案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伊犁自治州档案馆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

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现改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ГАНИ）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ПРФ）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现改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8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

《邓小平文选》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6

《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1979》，新华通讯社，1980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

《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73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3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988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6

本书编委会编《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51年12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

大学出版社，1985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北京，1988，未刊

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李大钊文集编辑组编《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五、七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瞿秋白文集编辑组编《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1988

人民出版社编《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张仲实、曹葆华校译，人民出版社，195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22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藏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2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

沈志华编《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会谈》，《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沈志华编《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条约》，《中共党史资料》总67辑，1998年9月

沈志华编《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俄国档案文献》，《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

沈志华编《关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俄国档案文献（1953～1959）》，《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4年

沈志华编《关于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俄国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83辑，2002年

沈志华编《建国前夕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党的文献》2002年第1、2期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孙武霞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

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等，1994

唐屹等主编《外交部档案丛书》，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2001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62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伊犁自治州公安局史志办编印《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1988

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国社会出

版社，1997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0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 е личност и Ст 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 ы,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

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 （сосм）Никит а Хрущев，1964，Ст 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е документ ы，Москва：МФД，2007

Визит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екрет аря ЦК КПСС，Председат еля Призизиума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 а СССР，М. С Горбачев в Кит ай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15－18 мая 1989，Москва，1989

Реабилит ация：как эт о было，Документ 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 ериалы，Март 1953－Февраль 1956，Том 1，Москва：МФД，2000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 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 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

Фурсенко А. 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 – 1964，Том 2，Пост ановления 1954 – 1958，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6

Фурсенко А. 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 – 1964. Том 3. Пост ановления. 1959 – 1964，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8

Dennis J. Doolin，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ino – Soviet Conflict，Documents & Analysis，*Hoover Institution Studies*：7，*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Stanford University，196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 6*，*Far East and Pacific*，Washington D. C.：GPO，197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8 – 1960*，*VoL 19*，*China*，Washington D. C.：GPO，1996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Admiral L. Leahy，Wednesday，April 11，1945，*V. K. 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7，No. 5，Butler Library，the Columbia University

Odd Arne Westad，Chen Jian，Stein Tønnesson，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 – 1977*，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orking Paper

专著

A. B.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李辉译，三联书店，1982

A.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北京印刷三厂工人理论

组、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商务印书馆，1977

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 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三联书店，1982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资料室编《苏联大事记（1964～1966）》，1975，未刊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资料室编《苏联大事记（1967～1970）》，1978，未刊

本书编写组：《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本书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92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邓力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

东方鹤：《张爱萍传》下卷，人民出版社，2000

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赵敏善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费德林等：《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彭卓吾译，东方出版社，2004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富文等主编《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黄瑶、张明哲编《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南出版社，1998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李华：《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人民出版社，2007

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李明斌：《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3版，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3

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白洁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刘同舜等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000

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黄河出版社，1998

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翻译组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罗伊·麦德维杰夫、若莱斯·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邹子婴、宋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

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蒲国良：《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齐辛：《珍宝岛事件真相（增编本）》，香港，集思图书公司，1969

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8 年）》，台北，“国史馆”，1993

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

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沈卫平：《“8.23”炮击金门》，华艺出版社，1998

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1991 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 1956～1957》，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新华出版社，2009

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00

沈志华、李滨（Douglas Stiffer）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苏起：《论中苏共关系正常化（1979～1989）》，台北，三民书局，1992

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塔德·肖尔茨：《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邓辛

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

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0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个志愿兵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郭家申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79～1994）》，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

徐焰：《金门之战（1949～1959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徐焰：《中印边界之战历史真相》，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张金发：《中苏共关系：中国民族主义的背离》，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86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张月明、姜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

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赵文清等编著《边境贸易实务》，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

郑言：《外交纪实》（3），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

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党史委编《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 1898～1969》，中央文献出

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翻译《苏联百科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等编《中苏经济合作研讨会论文集1990》，未刊，北京，199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 4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0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人民出版社，1999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Галенович Ю. 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 ай в X X веке: Граница, Москва, 2001

Галенович Ю. М. Белые пят на и болевые т очки в ист ории совет скокит айских от 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1992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 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 ы и форми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 ая (1949 – 1960годы), Саикт – Пет ербург, 2000

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 ское общест во: полит ика 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 ь (1945 – 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 ско – кит 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 Москва, 2000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 ат ьями ут вердили, Москва, 1996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п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 ая: Ист 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2001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 ория т 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 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 аем, 1917 – 1974, Москва, 1977

Ткаченко Б. И. Россия – Кит ай: воет 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в документ ах и факт ах, Владивосг ок: Уссури, 1999

C. Martin Wilbur,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 – 1927*, Harvard, 1974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Canada) Ltd., 1979

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van R. Dee, 1996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Luthi, Lorenz M.,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Mercy A. Kuo, *Contending with Contradictions: 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no – Soviet Split, 1953 – 1960*,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1

Mikhail A. Klochko, *Soviet Scientist in Red Chin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 Publisher, 1964

Odd Arne Westad ed. ,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 – Soviet Alliance 1945 – 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 – 84*, Harlow: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5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 – 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 – 196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 – Soviet Alliance, 1949 – 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therlands, 1991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h & Company, 2003

论文

C. 贡恰罗夫、B. 乌索夫:《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 马贵凡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 年第 4 期

S. N. 冈察洛夫、李丹慧:《俄中关系中的“领土要求”和“不平等条约”》,《二十一世纪》(香港) 2004 年 10 月号

陈兼:《革命与危机的年代——大跃进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7 辑, 2008 年

储峰：《两次台海危机中的中苏关系》，《近代中国与文物》2009年第1期

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

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董志凯：《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设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宫力：《两次台海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侯晓佳：《炮击金门的决策与曲折进程》，《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2期

孔寒冰：《苏联经济模式是如何在中国确立起来的》，《俄罗斯研究》2000年第1期

李丹慧：《对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1945～1965）》，《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李丹慧：《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

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李丹慧：《同志加兄弟：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一）》，《国际冷战史研究》2004年第1辑

李丹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

李丹慧：《也谈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究竟从何而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李海文：《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进行的努力》，《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

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廖心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问题的原则和办法》，“195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04年）论文

林蕴晖：《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之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林蕴晖：《苏共二十大与毛泽东走自己的路》，《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罗平汉：《关于人民公社建立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牛军：《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再探讨》，《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

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牛军：《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普罗祖缅希科夫：《苏中领导人眼中的1960年》，闻一译，《中共

党史资料》第 65 期

任东来：《从“两大阵营”理论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看法和政策的演变》，《太平洋学报》2000 年第 4 期

沈志华：《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沈志华：《1953 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1 年第 2 期

沈志华：《1958 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以中俄解密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31 期，2009 年 5 月

沈志华：《对 50 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沈志华：《对朝战初期苏联出动空军问题的再考察——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解密档案》，《社会科学研究》2008 年第 2 期

沈志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史学月刊》2004 年第 8 期

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

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沈志华：《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历史教学问题》2010 年第 1 期

沈志华：《试论 1951 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外交评论》2010 年第 4 期

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

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国际冷战史研究》2004年第1辑

沈志华:《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年

沈志华:《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

宋银桂:《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苏格:《炮击金门的决策及其影响》,《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6辑,1998年6月

万家安:《〈苏共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与马共路线》,《东方文荟》2006年8月6日

万家安:《华玲会谈前的〈苏共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东方日报》2005年10月23日

王真:《50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

武力:《论八大对苏联工业化模式认识的深化及其历史局限》,《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6期

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刑和明:《1956年中共对苏联模式认识的转变及启示》,《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

熊华源:《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

杨奎松：《1958年炮击金门与毛泽东外交政策的转折》，“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武夷山，2002年8月）论文

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月刊》2003年第11、12期

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杨奎松：《走向破裂——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张志辉：《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究竟从何而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9期

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

赵学功：《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X X съезде//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2

Аксютин Ю. В. Пыжиков А. В.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 Н. С. Хрущева X X съезду КПСС в свете нов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и, 2002, №2

Барсуков Н. Как создавался “закрытый доклад” Хрущева//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1 Февраля 1996

Дальнее П. В чем ж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ть затруднений на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х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81, №10

Делюсин Л. П. Некоторы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начале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北京, 1997 年 10 月）论文

Зубкова Е. 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чистки в КПСС（1949 – 1953）//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9, №3, №4, №6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 – 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3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тал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1950 – 1953 год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Наумов В. П. Борьба Н. С 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2

Наумов В. 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 С Хрущева на Х Х съезде КПСС//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4

Наумов В. 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репрессий//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7, №4

Пихоя Р. 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 – 1958 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6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1960 год глазами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北京, 1997 年 10 月）论文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Неуавшаяся попыта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имиреня. 1964 – 1965г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6, №5

Пыжиков А. XX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Свободнаямысль, 2000, №8

Пыжиков А. Истоки 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а: Молодёжь после XX съезда КПСС//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3, №12

Пыжиков А. Социально –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в годы " оттепели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3, №6

Пыжиков А. 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в годы хруще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4

Пыжиков А. В. Советско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хрущевских реформ//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2

Рейман М.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3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 – 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 – 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65

Chen Jian, "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 and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8, No. 3, Summer 2006

Jim Hershberg, "Anatomy of a Controversy: Anatoly F. Doberynin's Meeting Wish Robert F. Kennedy," Saturday, 27 October 1962, *CWIHP Bulletin*, 1995, No. 5

M. Kramer,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 – Soviet Split, 1955 – 1964," "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香港，1996 年 1 月）论文

M. Y.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 – Indian Conflic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ino – Soviet Split, October 1962: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D Bulletin*, Issues 8 – 9, Winter 1996/1997

Mark Kramer,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s Appraisal of Sino –

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香港，1996年1月）论文

Michael M. Sheng，“Mao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in the 1950s：A New Look at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the Sino – Soviet Split，” *Modern China*，Vol. 34，No. 4，October 2008

S. Goncharenko，“Sino – 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W. Taubman，“Khrushchev Versus Mao：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 – Soviet Split，” *CWIHD Bulletin*，Issues 8 – 9，Winter 1996/1997

口述和回忆

《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李树柏等译，东方出版社，1990

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薄一波：《关于一九六四年计划的问题》，《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

邓力群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谈话记录，1999年11月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章嘉琳等译校，东方出版社，1988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李代军等译，新华出版社，1981

李丹慧、张玥等采访荣植记录，2000年11月30日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2000年12月

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新华出版社，2008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马叙生：《梳理中苏边界变迁史——找回失落的国界线》，《世界知识》2001年第11、12期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

齐赫文斯基：《回到天安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马贵凡等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钱其琛：《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1998年3月

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2002年6月5日

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2000年9月12日

沈志华采访李越然记录，1998年8月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

央文献出版社，1995

师哲口述《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师秋朗笔录，人民出版社，2001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彭卓吾译，《党的文献》1993 年第 5 期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王亚志：《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 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李丹慧、沈志华整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王幼平：《回忆 1979 年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新中国外交风云》第 4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达洲等译，三联书店，1980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中共党史资料》2005 年第 4 期

阎明复、朱瑞真：《随周恩来出席苏共二十二大》，《中共党史资料》2007 年第 1 期

阎明复、朱瑞真：《忆 1958 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6 年第 2 期

阎明复：《1958 年炮击金门与葛罗米柯秘密访华》，《百年潮》

2006年第5期

阎明复：《1960年莫斯科会议补记》，《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3期

阎明复：《1960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亲历记》，《百年潮》2007年第6期

阎明复：《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补记（二）》，《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3期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阎明复：《随彭真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中共党史研究资料》2007年第2期

阎明复：《忆周总理1964年访苏》，《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5辑，1998年2月

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Брежнев А. А. Китай: 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 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 ношения, 1998

Б. Н. В ст 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 ае,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 а, Москва: Инст ит 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ет ока, 1999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В двух т омах, Том 2,

Москва：Новосг и，1995

Долинин А. Как наши ракет чики кит айцев обучали，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3 мая 1995 г.

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 у//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г ока，1992，№5，1993，№1

М. 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 а，Москва：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1996

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 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г ока，1991，№6

Коваль К. 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 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 в 1953г. в Москве и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1954г. в Пекине//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 ория，1989，№5

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 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 с//Новое время，1993，№2－3

Федотов В. П. Полвека вмест е с Кит аем：Воспоминание，записи，размышление дипломат а，Москва，2005

报刊

《朝日新闻》，1964 年

《晨报》，1919 年

《大公报》，1929～1937 年

《读卖新闻》，1964 年

《共产党》，1920～1921 年

《国民公报》，1919 年

《劳动界》，1920 年

《每日新闻》，1964 年

《民国日报》（上海），1917～1927 年

《人民日报》，1949～1991 年

《太平洋》，1917～1919 年

《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1979～1989 年

《新潮》，1919 年

《新青年》，1918～1924 年

《言治》季刊，1918 年

《真理报》（*Правда*），1949～1989 年

人名索引

A

阿布拉希莫夫（П. А. Абрасимов，P. A. Abrasimov） 224，259

阿尔希波夫（И. В. Архипов，I. V. Arkhipov） 240，244，245，294，303，328，423，443，670～675

阿合买提江（Ahmet Jan Kasim，Ahmadjan Qasim） 127

阿里斯托夫（А. Б. Аристов，A. B. Aristov） 196，198，384

艾力汗·吐烈（Ali Han Ture） 108，127

艾奇逊（Dean Acheson） 164～166

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 109，319，321，323，325，345，346，352，360，364，365，375，383，387～390，392，393，396，410

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561

安德罗波夫（Ю. В. Андропов，I. V. Andropov） 332，333，340，428，453，456，474，662，664，666～673，679，681，684

安东诺夫（С. Ф. Антонов，S. F. Antonov） 296，306，322，326，344，356

安井郁（Yasui Kaoru） 472

岸信介（Nobusuke Kishi） 296，425

昂纳克（Erich Honecker） 673

B

巴甫洛夫（Павлов，Pavlov）　43
薄一波　238，277，287
鲍格莫洛夫（Богомолов，Bogomolov）　78～80，92
鲍罗廷（M. M. Бородин，M. M. Borodin）　28，29，32，35，36，38～41，44，49，50
贝利亚（Л. П. Берия，L. P. Beria）　192～194，305
贝舍夫（Б. П. Бещев，B. P. Beshev）　155
彼得鲁舍夫斯基（Петрушевский，Petrushevskii）　240
彼得洛夫（A. A. Петров，A. A. Petrov）　111
别尔乌辛（M. Г. Первухин，M. G. Pervukhin）　246
别洛夫（Белов，Belov）　178
波立特（Harry Pollitt）　262，268
波斯佩洛夫（Поспелов，P. N. Pospelov）　195，196，198，378，382
勃列日涅夫（Л. И. Брежнев，L. I. Brezhnev）　435，493，537，538，543～545，549，551，555，556，558，566，583，591，606，614，616，625～636，643，647，653，656，657，661～663，669～671
博古（秦邦宪）　56，68，69，94，95，101
卜士奇　56
布勃诺夫（A. C. Бубнов，A. S. Bubnov）　42
布尔加宁（H. A. Булганин，N. A. Bulganin）　200，214，223，227，242，245，381，520
布拉（Marcell Boula，Boulad）　399

C

蔡廷锴　71，72
曹聚仁　321
曾涌泉　442，523，527，528，531，533
陈伯达　278，381，513，517
陈昌浩　56
陈独秀　11，12，31，32，39，54，56，60，61
陈赓　240，245
陈兼　275
陈立夫　79，80，92
陈乔年　56
陈潭秋　105
陈延年　56

陈毅　287，325，331，341，344～346，353，354，393，414，417，421，430，435～443，448～450，475，480，583，584，609
陈郁　63
陈云　212，238，671
崔可夫（В. И. Чуйков，V. I. Chikov）　89，100
崔庸健（Choi Yong-kon）　590

D

达赖　337～341，353，354
大平正芳（Ôhira Masayoshi）　598
德拉特文（М. И. Дратвин，M. I. Dratvin）　89
邓发　66
邓文仪　79，80
邓小平　56，209，221，231，261，262，265，272，304，307，313，316，360，366，375，383，393～395，399，420，427，428，430，432，441，451，453，454，458，480，498，542，599，617，618，621～623，629，635～637，639～653，657，658，662，663，668，669，671，677～680，682～684，686～689，694，696，698，705～708
邓子恢　66，515
丁儒廉（Dinh Nho Liem）　700，703，704
东乡茂德（C. Toro，Togo）　98
董必武　56
董亦湘　56
杜勒斯（Allen Dulles）　316，318，319，325，359，360
杜鲁方诺夫（Труфанов，Trufanov）　300
杜鲁门（Harry Truman）　111，122，134，164
段祺瑞　7，15，25，37
多勃雷宁（А. Ф. Добрынин，Anatoly Dobrynin）　479
多列士（Maurice Thorez）　125，126，262
多洛雷斯（Ibarruri Dolores）　202

E

恩琴（Унгерн，Ungern）　18

F

范文同（Pham Van Dong）　571，576
费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

N. T. Fedorenko） 213
费多托夫（В. П. Федотов，V. P. Fedotov） 694，695
冯玉祥 25，36～39，42，44，45，49，50，73
冯自由 7
弗雷德（曼弗雷德）（Манфред Штерн，Manfred Stern） 67
伏罗希洛夫（К. Е. Ворошилов，K. E. Voroshilov） 222，384
傅烈 56
傅钟 56

G

高岗 171～173，176，305，475
戈尔巴乔夫（М. С. Горбачев，M. S. Gorbachev） 677～680，682，683，686～698，701，702，705～708，710，711
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 220，265，266，269，271，285，504，722
格里申（В. В. Гришин，V. V. Grishchin） 398，399，404，428
葛罗米柯（А. А. Громыко，A. A. Gromyko） 133，155，176，233，317，319，320，325，340，352，440，594，613，619，662～666，673
宫本显治（Kenji Miyamoto） 567，577
贡昆本（Kong Korm） 690
谷牧 641
郭松龄 39，42

H

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 103
韩光弟 60
韩桑林（Heng Samrin） 690
何健 50，63，80
何来 63
何叔衡 56，66
何应钦 97，105
贺龙 538，542
赫尔利（Patrick Hurley） 103，110，117
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щёв，N. S. Khrushchev） 167，188～198，200，201，203～207，209～215，218～227，231～235，237，245，252，254，257～259，261，262，264～267，269～272，274～276，281，284～291，293，294，296～299，301～304，306～312，314～317，319，320，323～332，

334，335，337，345，347～357，359～367，371～374，376～384，386～397，401，403～405，407～415，418，420，422～424，426，428～442，444，447～455，470，471，473～486，488，490～495，497～499，501，504，506，507，509，511，515～517，520，521，525，532～534，536，537，539～547，549，553～557，561～563，566，567，591，592，623，632，718，720，722

胡汉民　39

胡乔木　259，339，533，663

胡耀邦　642，651，675，680，691，692

胡志明（Ho Chi Minh）　199，285，451，453，567

华莱士（Mike Wallace）　694

黄华　617，618，635，636，649，655，661～666，671

黄永胜　590

霍查（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　447，456，457

J

基里林（Кирилпн，Kirilin）　333

基里洛克（С. Кирылюк，S. Kiryluk）220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591～598，600

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75，81，82，85，93，95～97，101～103

季诺维也夫（Г. Е. Зиновьев，G. E. Zinov'ev）　48

季山嘉（古比雪夫）［Кисанька（Куйбышев），Kisan'ka（Kuibyshev）］　41，42

季托夫（迪道夫）（Г. С. Тиков，G. S. Tikov）　463

济里亚诺夫（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Pavel Ivanovich）　523，527，529

加拉罕（Л. М. Карахан，L. M. Karakhan）　21～25，38，39

加伦（布留赫尔）（В. К. Блюхер，V. K. Bliukher）　40，41，43，44，53，59，79，88

加蓬（Гапон，Gapon）　10

贾丕才（М. С. Капица，M. C. Kapitsa）　317，423，626，650，668，669，681，695

贾拓夫　231

蒋介石　1，27～29，39～42，44，47，48，50，58～60，64，70，76～85，87，88，91，92，94，

96，99～101，104～106，110～116，121～126，128，129，131～133，138，174，276，312，316，318，321，322，326，337，425，427，499，714
蒋廷黻　78，87
金日成（Kim Il Sung）　166～168，171～173，175～177，396，453，506，515，650，653，657，669
金树仁　103

K

卡德尔（Edvard Kardelj）　271
卡冈诺维奇（Л. М. Каганович，L. M. Kaganovich）　222，223，227，515
卡恰诺夫（К. М. Качанов，K. M. Kachanov）　89
卡斯特罗（Fidel Castro）　478，480，481
卡特（Jimmy Carter）　643，644
卡翁达（Kenneth Kaunda）　599，698
凯丰　56
康生　376～378，405，475，485，490
柯克（Alan Kirk）　176
柯西金（А. Н. Косыгин，A. N. Kosygin）　537，538，543，557，568，571，584，588～590，592，600，607，608，610，681
柯兹洛夫（Козлов，Kozlov）　108
科济列夫（А. В. Козырев，A. V. Kozyrev）　712
科瓦利（К. И. Коваль，K. I. Koval'）　211，212
科瓦廖夫（И. В. Ковалёв，I. V. Kovalev）　136，152
科兹洛夫（Ф. Р. Козлов，F. R. Kozlov）　283，384，407，412～414，419，432，453，493
克鲁泡特金（П. А. Кропоткин，P. A. Kropotkin）　5
克洛奇科（М. А. Клочко，M. A. Klochko）　419
肯尼迪（John Kennedy）　476，479～482
孔祥熙　78
库达舍夫（Р. Ш. Кудашев，R. S. Kudashev）　607
库尔久科夫（И. Ф. Курдюков，I. F. Kurdiukov）　158
库尔恰托夫（И. Курчатов，I. Kurchatov）　233，237
库里申科（Кулишенко，Kulishenko）　89
库梅金（П. Кумыкин，P. Kumykin）

443
库西宁（O. B. Куусинен，O. V. Kuusinen） 384，385，493
袴田里见（Hakamada Satomi） 515

L

拉赫曼诺夫（Рахманов，Rakhmanov） 89
拉祖瓦耶夫（B. H. Разуваев，V. H. Razuvaev） 175
黎笋（Le Duan） 453，686，687，694
李德（奥托·布莱恩）（Otto Braun） 67，68
李凤林 662
李富春 56，157，211，231，242，246，277，422，512
李立三 55，64，65
李鹏 679，689，690，700，706，709，712
李奇微（Matthew Ridgway） 176
李强 214，244，328
李世淳 703
李四光 231，234
李天佑 571
李维诺夫（M. M. Литвинов，M. M. Litvinov） 87
李章达 26
李之龙 41，42
李竹声 56
李卓然 56
里根（Ronald Reagan） 643～647，658，669～671，685，698
梁忠甲 60
廖仲恺 26，32，39
列宁（B. И. Ленин，V. I. Lenin） 5，37，194，197，202，277，363，366，374，379～386，391，403，407，408，412，453，490，498，500，525，526，723
林彪 132，135，136，172，176，353，354，383，394，506，507，584，590
林伯渠 32，56
林基路 105
林克 359，360，374，450
刘伯承 56
刘伯坚 56
刘江 26
刘杰 234，236，238，302，330
刘宁一 398，399，401，404，428
刘少奇 55，142～144，150，151，162，165，168，209，214，219～221，224，229，259，278，288，289，307，350，373，380，393，399，408，427，431，432，435，436，445，448，454，471～473，

475，489，495，496，499，515，517，533，548，567，571，641
刘伟　238
刘晓　227，246，294，297，323，324，331，359，377，408，414，449，455，483，484，557
刘亚楼　251
刘长胜　400，401
鲁米扬采夫（Лумиянцев，Lymiiantsev）　548
陆定一　217，381，384
罗多斯（Б. В. Родос，B. V. Rodos）　196
罗高寿（А. Рогачев，A. Rogachev）　679，695，696，698，700，701
罗贵波　420，521
罗瑞卿　482，571，572
罗申（Н. Рощин，N. Roshchin）　135～137，171，172，174，305
罗舜初　302
罗斯福（F. D. Roosevelt）　110
罗亦农　55

M

马尔采夫（А. Ф. Мальцев，A. F. Mal'tsev）　650
马尔滕斯（Wilfried Martens）　679
马利诺夫斯基（Р. Я. Малиновский，R. I. Malinovskii）　226，300，301，308，310，388，541～544，555
马林（Малин，Malin）　27，31，32
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св，G. M. Malenkov）　190～194，214，222，223，515
马赛尔·布拉（Marcell Boula）　399
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125，127，131，134
马占山　72
马仲英　103
麦德维杰夫（Медведев，Medvedev）　423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71
麦斯武德（Masud Sabri）　143，144
毛泽东　1，11，32，52，66，95～97，99～103，117，121～126，133～144，148～153，157，158，161，162，164，165，167～178，180，181，185，186，199～201，204，205～209，211，212，217，218，220～222，224，225，227，230～232，234，245，247，253～255，257～262，264～272，275～

280，284，286～290，294，296～298，300，302～324，326～328，335，337，339，343，344，347～363，365，367，370～374，376～378，380，381，384，386，387，390～397，405，406，408，410，411，415，424～426，431，435～437，440，442，444，445，449，450，452，454～456，470～477，482，489，491，492，495～497，499，501，502，505～509，511～517，520，524，525，530～533，536～548，552，554，555，557，558，561，565，567，568，571，572，577～581，583，584，586～588，590，591，598～601，608，610，611，613，614，622，623，628，629，639，640，642，648，661，684，714，716～718，720，722，727

毛泽民　105

茅盾　474

蒙代尔（Walter F. Mondale）　622

孟戈非　238，252

米夫（Миф，Mif）　94

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A. I. Mikoyan）　137，138，140～142，150，153，157，161，195，196，204，207，211，212，223，225，227，254，270，303，305，306，384，404，451，453，520，537，544

米丘诺维奇（Veljko Micunovic）　254，256，257，270

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V. M. Molotov）　103，104，111，116，153～155，162，173，195～197，222，223，225～227，260，270，455，515

穆青　56

N

尼古拉耶夫（Л. Николаев，L. V. Nikolaev）　195

尼赫鲁（Pandit Jawaharlal Nehru）　199，234，299，338～343，345～348，353，357～359，362，365，375，379，425，473，475，476，483，485

尼克松（Richard Nixon）　591～594，596～598，613，622

聂荣臻　56，174，175，238～246，248，252，302，331，333，583

诺维科夫（И. И. Новиков，I. I. Novikov）　236，237

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　271，284

P

潘汉年　79
潘友新（帕纽什金）（А. С. Панюшкин，A. S. Paniushkin）　101
裴克斯（Пайкис，Paikis）　19，20
彭德怀　63，172～176，181，234，240，243，246，250，287，293，294，300～303，305，310，313，327，474～476，515
彭湃　32，62，63
彭真　237，257，258，353，401，404，407，409，410，412，432，437，438，449，454，455，480，537

Q

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636，637，648，653，680，686～689，694
齐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S. L. Tikhvinskii）　626
契尔年科（К. У. Черненко，K. U. Chernenko）　671，679，686
契尔沃年科（К. У. Черненко，K. U. Chernenko）　359，360，374，383，393，394，417～419，423，436，442，448，451，458，483，484，536～538，541，557，609
钱其琛　635，636，647～649，652，654，655，663，665，685，690，695，699，700，702，703
钱三强　230，231，234，236，237
钱学森　240，241，250
乔冠华　588，652
切列潘诺夫（А. И. Черепанов，A. I. Cherepanov）　89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24
瞿秋白　7，32，54，55，66

R

任弼时　55，142
任新民　240
任卓宣　56
日夫科夫（Zhivko Zhivkov）　286，696
阮基石（Nguyen Co Thach）　698，703
阮维桢（Nguyen Duy Trinh）　572
阮颐年（Nguyen Dy Nien）　690

S

赛扬（Louis Seilhan） 399

沙鲁诺夫（Шалунов，Shalunov） 461

沙图诺夫斯卡娅（О. Г. Шатуновская，O. G. Shatunovskaya） 195

绍欣（А. Н. Шохин，A. N. Shokhin） 712

什特科夫（Т. Ф. Штыков，T. F. Shtykov） 166

沈泽民 56

盛世才 103～107

盛忠亮 56

师哲 56

斯大林（И. В. Сталин，J. V. Stalin） 45，46，48～50，53，55，65，74，81，83，93，101，103，107，110～116，121～126，129，130，133～144，148～154，156～159，161～178，180～182，185～198，200～211，218，219，222，229～231，234，254，266，276，277，279，304～306，309，310，347，351，357，371，376，407，423，447，451～453，455，490，520，549，641，714，722，725

斯拉夫斯基（Е. П. Славский，E. P. Slavskii） 329

斯特朗（A. L. Strong） 428

斯特潘诺维奇 108

宋美龄 85，105

宋任穷 239，245，246，330

宋子文 85，99，111～116，163

苏达利柯夫（Н. Г. Судариков，N. G. Sudarikov） 414，415，420，440，442，449，454，521

苏斯洛夫（М. А. Суслов，M. A. Suslov） 223，260，262，266，352～354，362，363，373，405，419，428，432，493，498，556，563，564

苏兆征 63

孙传芳 38，39

孙泱 231

孙冶芳 56

孙中山 1，4，5，25～40，42，43，142

T

唐生智 50

铁托（Josip Broz Tito） 136，164，220，256～258，289，361，381，385，386，425，430，447，721，722

土井多贺子（Takako Doi） 698
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L. D. Trotskii） 48，49，202，399

W

万里 671，672
汪精卫 39～42，50
王炳南 322，541
王淦昌 237
王鹤寿 276，277
王稼祥 56，66，93，95，258，353，354，472～474，476，515
王荩卿 661
王力 473，474，476，557
王明（陈绍禹） 56，77，94，95，100，101，141，366
王若飞 56
王一飞 56
王幼平 617，619～621，652
王正廷 21～23
威尔科克斯（V. G. Wilcox） 515
威尔逊（Woodrow Wilson） 7，8
维经斯基（吴廷康）（Г. Н. Войтинский，G. N. Voitinskii） 10，12，26，33，39
维连斯基（威廉斯基）（Виленский-Сибиряков，Vilenskii Sibiriakov） 10
维辛斯基（А. Я. Вышинский，A. I. Vyshinskii） 154，155，157，161，164
魏道明 110
魏列夏金（Б. Н. Верещагин，B. N. Vereshagin） 304～306
文进勇（Van Tien Dung） 565，571
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 202
乌斯满（Uthman Batur） 107，143，144
吴冷西 339
吴亮平 56
吴学谦 673，694，695
吴玉章 56，457
伍德科克（Leonaed Fried Woodcock） 644
伍修权 56，257，376，377，408，493，536，537
武志公（Vu Chi Cong） 701

X

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 439，691，696，697，699，701
希特勒（Adolf Hitler） 74，98
夏斗寅 49
夏曦 56

向忠发 54，55，64
肖劲光 55，180，301
谢尔巴科夫（И. СЩербаков，I. S. Sherbakov） 618，619，624
谢尔宾（СербиН，Serbin） 333
谢富治 504
谢罗夫（И. А. Серов，I. A. Serov） 196，223
谢苗诺夫（Семёнов，Semionov） 18
谢皮洛夫（Д. Т. Шепилов，D. T. Shepilov） 241，350
谢瓦尔德纳泽（Е. Шеварднадзе，E. Shevardnadze） 698，699，705，707
熊雄 56
徐特立 56
徐向前 583
许崇智 39
许克祥 49，50

Y

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Jaruzelski） 673
颜惠庆 16～19
晏殊 549
杨虎城 84，85
杨杰 88
杨尚昆 56，393，449，536，706
杨殷 63
耶斯佩森（Knude Jespersen） 397
叶戈罗夫（А. И. Егоров，A. I. Egorov） 45
叶格纳洛夫（Егнаров，Egnarov） 106
叶海亚·汗（Yahya Khan） 596
叶季壮 426
叶剑英 56，240，583
叶利钦（Б. Н. Ельцин，B. N. Yeltsin） 711，712
叶利扎维金（Елизаветин，Elizavetin） 588
叶挺 63
伊格纳托夫（Игнатов，Ignatov） 384
伊利切夫（Иличев，Ilichev） 629，650，652～655
伊林（Ильин，Il'in） 310
优林（Юлин，Iulin） 14～18
尤金（П. Ф. Юдин，P. F. Iudin） 207，227，259，260，284，295～298，302～309，314，341，354
于洪亮 649，650，655，665
余湛 454，619，652
俞秀松 56
雨果（Victor Hugo） 382
袁成隆 248
袁世凯 7

岳振华　251
越飞（А. А. Иоффе，A. A. Ioffe）　20，21，27，79

Z

泽登巴尔（Tsedenbal Umzhagin）　504，505，681
扎哈罗夫（М. В. Захаров，M. V. Zakharov）　175，542，586
张伯华　251
张冲　79
张国焘　32，66，77
张海峰　624
张浩（林育英）　77
张继　31
张培元　103
张曙光　274，319
张太雷　32，63
张闻天（洛甫）　56，95，199，296，326
张学良　52，57～60，81，83～85
张治中　71，126，127
张作霖　20，24，37，39，42，57
章汉夫　344，345，414，415，418，485，486
赵世炎　56
赵毅敏　493
周保中　56
周达文　56
周恩来　85，93，100，102，123，151，153，157～159，161～164，171～174，176，178，180，181，199，200，211，212，221，222，230，231，234，236，237，239～241，243～246，248，256～258，287，295，296，301～303，305，307，311，316，320～326，328～331，337，338，342～345，350，351，353，354，356～360，374，376，379，393，394，399，400，415，421，424～428，434，440，443，451～457，472，480，482～484，489，508，520～522，524，533，534，536～539，541～546，548，555～557，567，571，572，576～578，580，581，583，585，588～590，592～597，599～601，607，608，610，613，639，681
周光召　237
周文雍　63
周以粟　66
朱德　56，66，122，134，152，165，297，353，383，394，454
竺可桢　231
左权　56
佐林（В. А. Зорин，V. A. Zorin）　242
佐佐木更三（Sasaki Kôzo）　530